

中國唐代學會 會刊

第二十一期

典型在夙昔：羅聯添教授

唐代學者羅聯添	林淑貞	1
羅故教授聯添先生事略	王基倫	5
志凝而意聚，思深而論嚴——羅聯添教授的學術風度與研究視野	黃雅莉	9
羅聯添教授學術年表	謝佩芬	35

唐代學術研究概況

《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校理	小南沙月	47
百年來王黃之亂研究綜述（附：王黃之亂學術史編年錄）	胡耀飛	69
唐代中興名相研究述評（1970-2015年）	邱顯鎮	109
唐日文化、人物及禮令交流研究述評	嚴茹蕙	135
臺灣地區唐代文學研究概況（2014-2015年）	洪國恩	187
臺灣地區敦煌學研究綜述（2014-2015年）	張家豪	213

學術訊息

台灣地區「第十一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林淑貞	235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七屆年會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 紀要	李堯涓	245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七屆年會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 各專題組代表大會交流第一組報告	侯雅文	255
敦煌學讀書會 2015 年訊息	林仁昱	261
唐人選唐詩的讀書會簡介	林淑貞	265
學會預告：「第十一屆通俗與雅正文學暨第十二屆唐代國際學術研討會」		269



本會為景仰羅先生於唐代研究之深厚學養與貢獻，並紀念羅先生創辦中國唐代學會之艱辛，特製作專輯，向羅先生致敬。

唐代學者羅聯添

唐代學者羅聯添

林淑貞^{*}

一直深知羅聯添教授是研究唐代文學的巨擘，也知道台灣的中國唐代學會是他和諸多學界朋友一手創建的。

以前雖曾在國際會議謀面，此後，再也相會無期了。

駐立在他公祭的靈堂前，手捧鮮花代表單位致意獻祭，望著他岸偉而悠閒神情的立牌，居高臨下地凝視整個公祭的會場，似乎，笑貌音容還在，他正在看著學界朋友們，為他張羅一場肅穆的祭禮。

會場播放家人為他製作的剪影，伴隨著送別的音樂而驟生感傷難捨之情。影像浮現他一生的事蹟功業，令人哀惋不捨。九十歲的高齡，走過漫長的歲月，為我們留下傳世的鉅作與誨人不倦的身影。

因為接掌中國唐代學會理事長之職，才能夠深刻體會開創學會之不易，而在會員日益流散、凋零中接下這個職務，似乎也預示著，這是一個艱鉅的

*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專任教授兼系主任

任務，必須在風雨飄搖中擎起唐代學會的旗幟，繼續前進，希望薪火永續不滅，希望能點燃大家共創唐代研究的熱情。

當司儀唱名中國唐代學會公祭時，一群學界朋友們紛紛起身、列隊進行公祭，近二十人參與公祭，讓我似乎看到了唐代學會的未來，只要大家有心，共同努力，必能再造當年的榮景，不才不會辜負當年一群學者們，跨越文學、歷史、敦煌的藩籬，創造出輝煌的唐代學會。

想著，去年十月赴蘇州參加大陸的唐代文學會議，感受大陸唐代學會組織規模龐大，老中青各種年齡層的學者輩出，沒有斷層，反觀台灣，新血未注入，似乎有斷層之虞，要喚起大家的熱情，似乎需要再努力經營，方能枝繁葉茂。

想著，大陸學者們曾殷殷對我致意，期盼來台灣參與國際唐代研討會，因經費短絀，未能支應太多人的參與，頓覺歉意很深。

想著，學界前輩們在改選理事長的宴會中，殷切期盼能再造唐代學會的榮景，並且提供建議，銘感於衷。但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經費支撐，要舉辦各種活動，頓覺壓力很大。

想著，後頂尖時代的來臨，經營系務的業務費用驟減，捉襟見肘的窘態時見，能如何撐起一場龐大的國際會議，也令人憂心。

想著，應如何向各機關單位申請經費，懇請奧援，也成為一項重要的任務了。

想著，念著，羅聯添教授一生為唐代文學研究孜孜矻矻，努力付出，做為後生晚輩的我們，期望能朝著他指引的方向，繼續扛起這個任務，往前邁進，將台灣的唐代學會發揚光大。

唐代學者羅聯添

會後，和高明士、宋德喜老師一同用膳，也商談未來的走向，目前正在籌畫明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也在張羅會刊的主題內容與專題研究，希望一切能在預定的規畫中，圓滿完成。

一路走來，雖然步伐踉蹌，內心卻充滿感恩，感謝學界的朋友們不斷地鼓勵，也提供歷年活動的經驗與意見，供我參酌，每一個建議，每一通電話，每一封電子信函，每一次會談，都特別珍惜，因為能力淺薄，需要大家幫忙，才能完成唐代學會提交的任務。

感念前輩們創業維艱，而我們更要努力守成，甚至將它發揚光大。

中國唐代學會會刊 第二十一期

羅故教授聯添先生事略

王基倫^{*}

羅聯添先生，福建省永安縣槐南鄉洋尾村人。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夏曆十月二十七日）生，為南宋大儒羅從彥之二十八世孫。羅從彥字仲素，學者稱豫章先生，諡文質；從楊時龜山學，龜山弟子千人，朱熹獨以「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一人而已」推尊之。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先生自福建省立永安高中畢業，時神州板蕩，因隨師自福州搭乘鷺江輪來臺；八月，考入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就讀。畢業後曾任公職一年；四十三年八月受聘為臺大中文系助教，歷講師而副教授、教授，教學研究達四十載。曾於民國五十五年應邀赴美國哈佛大學遠東系訪問研究一年，返臺途中，順道遊訪美、歐各地，瞭解學術發展。民國五十七年，升任臺大中文系教授。民國六十四年起，擔任國立編譯館《中國文學論著集目》、《歷代詩文集校注》工作小組召集人，並主編臺灣學生書局《書目季刊》多年。民國七十二年，榮獲教育部大學校院教授傑出研究獎，獲獎助二年。民國七十三年，國內文史學者假臺灣大學文學院會議室成立「唐代研究學者聯誼會」，共推先生為首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專任教授

任會長。民國七十四年，接任中文系主任；三年任期內，創辦《臺大中文學報》、《中國文學研究》，提升師生研究風氣。民國七十五年，再獲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獎助二年。民國七十九年，赴南京大學參加「唐代文學國際研討會」，開啟兩岸學術交流活動新頁。民國八十三年八月，自臺大中文系退休。

先生為人率直真純，治學尤篤實謹嚴。一生鑽研唐代文學，著述不輟，對唐代作家之生平研究，尤多創見。蓋先生之學也，承清季民初考證學風，復益縝密，每能於無疑處發掘問題，廣蒐資料，反覆考辨，追根究柢，故能從作家研究而作品研究，其中或涉及作家生平事蹟、文集版本、典故運用、文人風尚、作品比較等，有微觀，亦具宏觀，並屢創新猷，啟迪後學，影響深遠。

先生著述等身，成就卓越，聲譽至隆。著有《韓愈研究》、《韓愈傳》、《柳宗元事蹟繫年暨資料彙編》、《白居易散文校記》、《唐代詩文六家年譜》、《唐代文學論集》、《白樂天年譜》、《唐代四家詩文論集》等專書暨論文數十篇。編有《隋唐五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唐代文學論著集目》、《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精選》、《續編》、《國學論文選集》、《精選》、《國學導讀》、《隋唐五代文學論著集目正編》、《續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韓柳文析論綱要暨研究資料》、《唐代文學研究綱要》等，另有《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唐代文學研究論著集成》二書，為先生引領弟子纂輯而成者，尤見先生提攜後進心意。諸書均名噪一時，蜚聲兩岸。

先生在校期間，不分平時假日，無論互寒酷暑，恆在中文系第一研究室專心治學，一燈微明，映照孜孜矻矻身影，當年已傳為美談矣！先生治學於

羅故教授聯添先生事略

斯，授課亦於斯；每課間小暇，輒喜與學生煮茶論學，師生質疑辯難，融洽熱烈，有陶然忘機之樂焉。然於講授討論問題時，學生報告若有疏失，往往不假辭色，反覆指正；嘗提示學生，論文之「結論」，乃綜合前文討論結果而成，不可節外生枝，更添註解，引出新問題。先生之論文結論，即條列敘明，具體揭示發明新創，層次詳實，別具一格。學生論述有足稱道者，先生必推薦至《國立編譯館館刊》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口試，於學生尤不吝讚許肯定。蘇州大學羅時進教授推稱先生指導後學「無私無我」者，蓋以此也。

先生於兩岸開放互通之始，與大陸中文學界著名學者傅璇琮先生初識於南京。二老望重士林，相見恨晚，於交換著作後，始發覺海峽兩岸論文有討論相同主題者，或所見略同，或可以互補參證。傅先生有感於此，嘗撰文推崇先生之卓識高見。又嘗與程千帆先生晤談，程先生追述文革時所受迫害之慘，不免感慨係之，以至涕泗漣漣；先生婉言寬慰，哀憫同情，見於容色。先生心懷傳統學術文化，多次帶領學生走訪神州各地，參與兩岸學術會議，讜論侃侃，知無不言，且不忘為後輩爭取發言機會，以更積極扎根學術交流。其碩學博識，眾所共睹也。

先生於民國六十九年參與編纂《戴靜山先生全集》，七十六年主編《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榮退之後，再獨力完成《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兩巨冊，辨識文字，考覈書史，費時經年。其後，始陸續整理個人文稿，其尊師重道，固可為後學典範；而勤奮治學，一以弘揚學術為己任，誠能宏揚其先祖豫章先生之精神，尤足為學界楷模也。

先生家居簡易，生活素樸，平日好飲茶，喜登山臨水之樂。頃因年事日高，體氣益衰，且不良於行，需有專人照護。但神智清明，仍每日清晨至

臺大總圖書館長廊推扶輪椅慢走、閱報，對總圖書館之設計讚不絕口；下午至臺大校園遊觀，舉止閒靜，樂與人交談，皆要言不煩而藹然可親；間或感歎生命之迫促，有如風中之燭，大有「古人誠不我欺」之慨！然某日與弟子品茶談天，則自以時刻有看護隨侍，儼然帝王，夫復何憾？臨分之際，使弟子開車相送。看護提醒說：「先生已有輪椅。」先生遂笑謂弟子：「汝有車，吾亦有車。汝之車也四輪，吾之車也二輪，皆便於行也！」其幽默如此。先生行動不便，夫人悉心調理起居，使先生得以精神安和，從容適意。方期百歲期頤，上壽稱觴，乃三月十八日(夏曆乙未年正月二十八日)晨，起身欲往臺大校園時，竟因心肺衰竭，猝然云逝！雖略無纏綿床榻之苦，而識者寧不慟哉！先生於七十初度時，曾有感而作詩云：「可堪回憶總成塵，四顧周邊幻似真。日暖藍田煙不起，輕風滄海浪未平。鍾君捉鬼常無奈，道士畫符亦失靈。世事推移誰能料，無災得過七十春。」是亦得見先生隨時順化之襟抱也。

先生與夫人陳真美女士，鸞鶴偕老。夫人有傳統女性勤儉持家之美德，照料先生無微不至，先生畢生奉獻學術，無後顧之憂者，均夫人之賢淑持家有以致之也。先生與夫人育有三女：長於陵，現任科技部國家實驗研究院研究員；次惠，國中教師，適郭；次筠，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主治醫師，適葉。均能卓然有成，是皆可以告慰於先生矣！

羅聯添先生治喪委員會 謹述

(本文承蒙「羅聯添先生治喪委員會」全體委員校閱一過，尤其感謝黃啟方教授悉心指正，謹此一併致謝。)

志凝而意聚，思深而論嚴

——羅聯添教授的學術風度與研究視野

黃雅莉^{*}

一、前言：從「士，志於道」說起

近代中國學術史是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在學有專長的行家眼裏，學術不僅是高山豐碑林立之地，且更應是一條路，從過去一路行來、通過自己腳下一步步的累積，還要向未來走去。古人把這樣的路稱作「道」。在厚積薄發的上輩學人的著作裡，都可以感知這種對「道」的執著。一個人只要肯在自己專業的領域裡深耕易耨，日積月累，聊以暇日，他便會成為這個領域的一個代名詞。臺灣大學中文系羅聯添教授便是這樣一位用一輩子心力在唐代文學追求一種「志於道」的生命事業的大師。

從歷時性角度來看，唐代，是一個青春洋溢、生命勃發的時代，是一個將人的創造力揮灑得五彩繽紛、張揚得淋漓盡致的時代。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裡，詩文創作的美學旨趣、藝術特質發展達到最高峰，對後來的文學發展也

*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語系專任教授

有重大的影響。但相較於唐詩所獲得的高度重視，唐文的研究就顯得非常不足。羅聯添教授從六十年代以來，便長期地用心致力於唐代文學、尤其是中唐散文的研究大家，五十年來有著紮實豐厚的累積。若要在台灣學界中端出唐代文學研究的代表，羅聯添教授足堪當之。大陸學者鐘來茵〈耕耘不輟，成就卓著——臺灣羅聯添教授的唐代文學研究〉一文中稱揚之：「**臺灣首任唐學會會長、國立台大羅聯添教授是海內享有盛譽的唐學專家。近四十年來，他始終在唐代文學研究園地辛勤耕耘，孜孜開墾，勇猛開拓，不停播種，至今已碩果累累，出版唐學專著九種，發表論文五十余篇，成為這一領域引人矚目的學者。**」¹可謂推崇備至。羅聯添教授以其畢生的心血、智慧和情感投入到唐代文學的研究中，顯示了腳踏實地的治學品格，老驥伏櫪的追求精神，繼往開來、承先啟後的學術擔當，廟堂江湖、學以致用的歷史責任，他在唐代文學辛勤耕耘，以其八十八年的生命，為後人留下許多紮實的鉅著與孜孜不倦的精神典範。吾人雖未曾親炙其人，亦未直接受業於門，但每每拜讀其質量厚實的著作，便油然而感佩其念茲在茲的治學態度。僅以拙文，緬懷一位大師的學術品格與風範。

二、羅聯添先生的學術生涯

關於羅聯添教授的生平與著作，筆者依循的資料有臺灣大學中文系網頁中的「師資介紹」、羅聯添教授的門生王基倫先生的〈羅故教授聯添先生生

¹ 鐘來茵：〈耕耘不輟，成就卓著——臺灣羅聯添教授的唐代文學研究〉，《書目季刊》，1992年第十二期。

平事略〉、〈在斗室內成就自己——側記羅聯添教授〉²二文，以及聯添教授幾本代表著作中的「作者介紹」。

羅聯添教授（1927——2015），福建永安人，在1948年自福建省立永安高中畢業，於內戰前夕時局板蕩之際自福州搭乘鷺江輪來臺。考入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就讀，畢業後留任於台大中文系，歷助教、講師而副教授。³茲依時間先後，把羅聯添教授的學術生涯分為三個重點介紹。

（一）受臺靜農先生之年譜學與傳記學學風之影響

羅聯添教授是臺靜農先生晚年的人室弟子。臺靜農先生一生著述宏富，與二十世紀相始終，經歷許多波折卻豐富多彩，羅聯添教授深得臺靜農先生的年譜學與傳記學學風之影響，亦精此道，但羅聯添教授在秉承師教之餘又有所創新拓展，他在五十年代完成的《柳子厚年譜》⁴與《韓愈傳》⁵，已展現了紮實的國學功底，也在此預示了唐代文學是他終生的研究方向。

作為臺靜農先生的弟子，羅聯添教授對臺先生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沒有停留於靜態的資料匯集，而是在研究中心領神會，做到資料考證與藝術分析並重、背景探索和注重作品並重，某一作家或某篇作品的獨特性與它在某一個時代或某一流派中的總體位置，以及與其他作家或作品的關係並重。這種兼顧並重的態度，是羅聯添教授學術個性的靈魂，也是他能開拓出一條適合自己學術道路的契機。

² 王基倫：〈在斗室內成就自己——側記羅聯添教授〉（刊於《文訊》第355期，2015年5月），頁54-57。

³ 引自張志華：《燕城兒女續集》（福建永安市：愛國主義教育資料選編、永安市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2006年2月），頁15-17。

⁴ 〈柳子厚年譜〉，《學術季刊》，6卷4期，頁1-19，1958年6月，收入《唐代四家詩文論集》，又擴充為《柳宗元事跡繫年暨資料彙編》。

⁵ 羅聯添《韓愈》（台北：河洛，1997年），頁14，後改名《韓愈傳》（台北：國家出版社，1998年3月），頁208。

(二) 唐代文學研究和兩岸學術交流的因緣

羅聯添教授對於唐代文學的研究並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從斗室走出，與外界形成學術網絡。為了向世界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羅聯添教授在 1966 年赴美國哈佛大學遠東系漢學專業做研究。1968 年，升任臺大中文系教授，更能發揮他的學術影響力。此後他主編過《中國書目季刊》雜誌，並出任唐代研究學者聯誼會會長、「臺灣唐代研究學會」常務監事。學會是民間學術團體，學會的組織與領導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心力時間投注其中，若非具任勞任怨的奉獻精神何能至此？羅聯添教授就是這樣一位樂於奉獻的學者。他為大家創造了切磋研討的機會，在一次又一次研討會開幕詞或閉幕詞中，他不僅總結學會工作的成績，肯定大家取得的學術成果，而且提出唐代研究的前沿課題，指出有待開拓的新領域和研究的方向。學會的成立，對於唐代文學研究開闊視野，探索新問題，都起到了啟發和指導的作用。

羅聯添教授在 1985 年，接任台灣大學中文系主任；三年任期內，提升師生研究風氣，創辦《臺大中文學報》、《中國文學研究》，前者是教師發表的園地，後者是研究生投稿的園地，二份刊物延續至今，已有三十年歷史，近年來不再只刊登內稿，成為接受外界投稿且具有嚴謹審查制度的核心學術期刊。學報作為一個系所學術地位的傳播媒體，深深地發揮著該系所與學界交往互動的關係。這兩本學報至今已成為臺大中文系的學術代表，在編輯委員會追求刊物定位中已獲得一個獨特的位置，或者說已成為一種物質化的學術精神的紐帶。

羅聯添教授對於學術的用心並不拘限在台灣中文學界，他更期望可以結合大陸學界，共同為復興古典文學而努力，故於民國七十九年，赴南京大學參加「唐代文學國際研討會」，開啟兩岸學術交流活動新頁，誠如王基倫先生所述：

先生於兩岸開放互通之始，與大陸中文學界著名學者傅璇琮先生初識

於南京。二老望重士林，相見恨晚，於交換著作後，始發覺海峽兩岸論文有討論相同主題者，或所見略同，或可以互補參證。傅先生有感於此，嘗撰文推崇先生之卓識高見。又嘗與程千帆先生晤談，程先生追述文革時所受迫害之慘，不免感慨係之，以至涕泗漣漣；先生婉言寬慰，哀憫同情，見於容色。先生心懷傳統學術文化，多次帶領學生走訪神州各地，參與兩岸學術會議，讜論侃侃，知無不言，且不忘為後輩爭取發言機會，以更積極扎根學術交流。其碩學博識，眾所共睹也。（〈羅故教授聯添先生生平事略〉）

四十年來的政治阻隔，海峽兩岸的學術文化交流長期未能暢通，臺灣對大陸的研究未能有具體的瞭解，大陸也無由了解台灣的研究現況，羅聯添教授與大陸唐學研究名家傅璇琮教授結下深厚友誼，又與程千帆先生情意交流，交往因素使得研究領域同行者享有共同的文化氣候，而且在一個重友情的國度裡，使學術個性的追求滲透著幾分人間情義。他們辦研討會、約稿交流、合作編輯書寫，也多少帶點文學社團的傾向，對唐代文學研究的共同愛好滋潤著他們的理念追求。羅聯添教授與傅璇琮、程千帆、陳友冰等大陸研究唐學的學者們互通聲息，並進行文學觀念的交流，凝聚理念，形成團體效應與生學術回響。傅璇琮先生是北京中華書局總主編、中國唐代文學研究的大老，他在〈於平實中創新——記臺灣學者羅聯添先生的治學成就〉一文中說：「在臺灣的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羅聯添先生是耕耘極為辛勤，因而收穫也極為豐碩的一位學者。特別是在唐代文學研究方面，我以為羅先生是年資較深一輩學者的代表。」⁶羅聯添教授在台灣唐文研究的地位正如傅璇琮先生在大陸的地位。

⁶ 傅璇琮：〈於平實中創新——記臺灣學者羅聯添先生的治學成就〉一記臺灣學者羅聯添先生的治學成就〉，《中國典籍與文化》，1992年第1期。

學術研究不可能完全只是個人的工作，尤其是中國古典文化的血脈就像遺傳基因一樣滲入兩岸學者的研究線索中，隱然有同源的脈絡可尋。學者各有所長，應當集思廣益，兩岸學界勢必攜手，共同合作推動學術發展，唐代研究學會的成立是必然的結果，學會的延續就在研討會的交流中形成生命力。在學術的切磋中，發揮了領域導向、心得傳授、情感溝通、精神激勵和學術合作等多種效應。羅聯添教授與對岸的同行互動深刻，更強化兩岸在學術上的交流。如此一來，兩岸研究唐代文學的學者們，便是以群體結合的方式推進專業的發展，聲氣相應，把可能分散的個體探索的熱情凝聚成一股衝擊力。

羅聯添教授致力於古典文學研究的兩岸交流，希望能夠通過學術上的合作，激起兩岸學者對同根同源傳統文化的共鳴。希望大陸的學者能從他的研究中得到有益的啟示，也希望大陸學者有關的研究成果也能為臺灣學者所認識，在交流互動中，更好地為傳承古典文化作出貢獻。傅璇琮先生從參照和比較兩岸的唐學研究，發現羅教授所研究的課題，大陸學者幾乎也都研究過，有不少的結論是彼此相同的，但「羅先生在唐代文學研究上的起步比較早，而且沒有中輟，他的研究計畫有層次的展開，連貫性極強，也便於研究課題的逐步拓展，而大陸則因某些客觀的社會因素，其間有較長時期的學術停頓，這樣就顯得在不少課題上由羅先生先占了一步。」⁷肯定了羅聯添教授的唐學研究在起步時間和主題的連貫上都超越大陸學者，羅教授走在他人之前，面對一條當時仍是人煙稀少的遠路，其藜莽始闢之功，輝音峻舉，鴻風遠蹈。我們甚至可以說，臺灣中文學界治唐學的學人中，傾力於史實考證，創獲最多，可資利用的成果最豐富者，不能不推羅聯添教授。他對唐代

⁷ 同上。

幾位作家的史料全面而精密的把握，對其年譜巨細不遺、契入微茫的深入研究，已沾溉了以後幾代學者，他已成為國內唐學研究卓有成就的一代學人的代表。

(三) 退休之後的潛心著述

民國83年8月，羅聯添教授自臺大中文系退休。榮退之後，仍然過著退而不休的著述生活，他為了替恩師臺靜農先生保留一份真實寶貴的紀錄，費時經年，以一己之獨力完成《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兩巨冊。⁸就現代文學研究而言，我們總遺憾沒有誰能夠編出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作家全集。但聯添教授為臺先生做到了，就傳統的史料學來說，作家史料板塊包括作家個人專集、全集、大系、叢書；作家的傳記、年譜年表、書信、回憶錄；作家作品的目錄、版本、訓詁、考據，以及各種文學研究、報刊出版。羅聯添教授此書，辨識文字，考覈書史，洋洋六十萬言，依照編年體例清晰記述了恩師的作品和經歷，詳細回顧了恩師與魯迅、陳獨秀、張大千、胡適、啟功等諸多學界名流的交往實錄，通過本書，讓吾輩可以一覽臺先生一生行誼與學術藝文成就之全貌，並掌握臺先生所有的書目與論著，是現今有關臺靜農先生研究的論著中，資料最完備的集大成之作。向讀者重現了臺靜農先生的氣度風範，字裡行間流露出深厚的師生情誼，更在讀者心中樹立了一種人格與楷模，其尊師重道，盡心盡力揄揚師學的用心，足為後學典範。

步入晚年的羅聯添教授，生活更加簡易素樸，平日閱讀、飲茶、登山臨水，後因年事日高，體氣益衰，漸不良於行，但神智清明，仍每日清晨至臺大總圖書館長廊推扶輪椅慢走、閱報。2015年3月18日，如同往常般，聯添教授起身欲往臺大校園健身散步時，突然因心肺衰竭，溘然長逝，享年八十

⁸ 羅聯添：《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上、下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9月出版)。

八⁹，給台灣中文學界留下了無限的遺憾。消息傳到他的故鄉——福建永安，他的三弟羅聯漢悲痛萬分，寫下了追憶大哥的詩句：「聯添少壯出鄉關，飛赴臺北為哪般？力挽中華復興業，東海揚名哺芬芳。」¹⁰這幾句詩已道出了聯添教授少壯離家，在台灣近六十七年在學術園圃裡辛勤耕耘正是一份對生命事業的追求，為掄揚唐代文學、為往聖繼絕學的一分熱情，因此成為台灣唐代文學研究的一大重鎮。

聯添教授著有《韓愈研究》、《韓愈傳》、《柳宗元事蹟多年》、《唐代詩文六家年譜》、《白居易散文校記》、《唐代文學論集》、《唐代文學史兩個問題的探討》、《隋唐五代文學理論的發展與演變》等專著和四十多篇論文。另外編有《中國文學論文》四冊、《唐代文學論著集目》、《隋唐五代文學批評資料集編》等。從其著作目錄來看，羅聯添教授始終專注於唐代文學。每讀其著作，便覺感動，他為唐代文學提出了不少具有說服力的論點，既顯示出宏觀的眼光，深入的思考，又反映出非常細致刻苦的研究態度。正如聯添教授的入室弟子王基倫先生所言：

先生為人率直真純，治學尤篤實謹嚴。一生鑽研唐代文學，著述不輟，對唐代作家之生平研究，尤多創見。蓋先生之學也，承清季民初考證學風，復益縝密，每能於無疑處發掘問題，廣蒐資料，反覆考辨，追根究柢，故能從作家研究而作品研究，其中或涉及作家生平事蹟、文集版本、典故運用、文人風尚、作品比較等，有微觀，亦具宏觀，並屢創新猷，啟迪後學，影響深遠。（〈羅故教授聯添先生生平事略〉）

⁹ 參考自王基倫：〈羅故教授聯添先生生平事略〉。

¹⁰ 參考自張志華：《燕城兒女續集》（福建永安市：愛國主義教育資料選編、永安市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2006年2月），頁15-17。

王先生這段文字提及了聯添教授的學術路向與研究視角。對於學術成果而言，任何一本研究專著都是研究者不斷探索以求創新的學術歷程的反映，其作用不僅在於對當前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填補和深化，而且會為後來的研究者帶來了新的視野和拓展的空間。筆者以下即據此而對聯添教授的學術路線與研究視野做一評介，茲分「點—線—面」的循序漸進、文史互證、宏微齊觀三個方面說明。

三、「點—線—面」的循序漸進：建立據點，由點延展成面

從事唐代研究，必不可能全面掌握，治學者首需要精研一兩位大作家的著作，以此為根據地，以之為立足點，以求有所深入與創發，才能由此而挺進前行，向更廣大的範圍探入。個別作家的研究，既是出發點，又是據點，因為由個人至於熟，便可以由此前進，向四外擴張。羅聯添教授在1958年發表了〈柳子厚年譜〉¹¹和〈劉夢得年譜〉¹²兩文，這是他研治中唐時期作家的開端。60年代，羅聯添教授便全面展開對中唐幾位大家進行研究，兼及文獻整理，有對張籍生平的考察¹³、繼50年代劉禹錫事蹟之研究的〈劉賓客嘉

¹¹ 羅聯添：〈柳子厚年譜〉，《學術季刊》第6卷第4期，1958年6月，頁1-19。後收入《唐代四家詩文論集》，又擴充為《柳宗元事跡繫年暨資料彙編》。

¹² 羅聯添：〈劉夢得年譜〉，台大文學院《文史哲學報》第8期，1958年7月，頁181-295，增訂後收入《唐代詩文六家年譜》。

¹³ 羅聯添：〈張籍年譜〉，《大陸雜誌》，〈張籍年譜〉，《大陸雜誌》，25卷4期，頁14-19；5期，頁15-22；6期，頁20-29，1962年8-9月，增訂後收入《唐代詩文六家年譜》。〈張籍之交遊及其作品繫年——張籍年譜附錄之一、二、三〉，《大陸雜誌》，26卷12期，頁14-18，1963年6月。〈張籍軼事及詩話——張籍年譜附錄之四、五〉，《大陸雜誌》第27卷10期，1963年11月。

話錄校補及考證》¹⁴、白居易生平及作品的繫年考證¹⁵、韋應物¹⁶、司空圖¹⁷的年譜，皆從史傳入手研究作家事蹟，進而研究其作品，顯示其文史兼通的治學道路。70年代，他集中研究韓愈，並兼及與韓愈有關的前後古文大家，誠如傅璇宗先生所言：「這10年間也是他的學問臻於成熟的時期，奠定了他作為臺灣唐代文學研究界代表的地位。」¹⁸羅聯添教授在70年代前期，仍承繼前10年對中唐時期古文家的研究，似乎有意先打週邊戰，把與韓愈有關的其他作家創作狀況理清，例如關於李翱研究的兩篇¹⁹、關於獨孤及的二篇²⁰，然後才集中火力向古文運動的主將韓愈挺進。羅聯添教授對於韓愈研究，有〈韓愈家庭環境及其交遊〉²¹、〈韓愈事蹟考述〉²²、〈韓文淵源與傳承〉²³、〈韓文辭句來源與改創〉²⁴幾篇文章，還出版了專著《韓愈傳》²⁵，以及更

¹⁴ 羅聯添：〈劉賓客嘉話錄校補及考證〉，《幼獅學志》第2卷1至2期，1963年，頁1-4。

¹⁵ 羅聯添：〈白香山年譜考辨〉，《大陸雜誌》第31卷3期，1965年8月。羅聯添〈白居易中書制諸年月考〉，《大陸雜誌》第32卷2-3期，1966年1至2月。羅聯添：〈讀白居易的秦中吟〉，《思與言》第5卷4期，1967年11月。羅聯添〈白居易作品繫年〉，《大陸雜誌》第38卷3期，1959年2月。〈白居易散文校記〉，台大文學院《文史哲學報》19期，1970年第6期。

¹⁶ 羅聯添：〈韋應物事蹟繫年〉，《幼獅學志》第8卷1期，1969年3月。

¹⁷ 羅聯添：《司空圖事蹟繫年》，《大陸雜誌》第39卷11期，1969年12月。

¹⁸ 傅璇琮：〈於平實中創新——記臺灣學者羅聯添先生的治學成就〉一記臺灣學者羅聯添先生的治學成就，《中國典籍與文化》，1992年第1期。

¹⁹ 羅聯添：〈李翱研究〉，《國立編譯館館刊》2卷3期，1973年12月。羅聯添〈李文公集源流、佚文及偽文〉，《書目季刊》第8卷3期，1974年12月。

²⁰ 羅聯添：〈獨孤及考證〉，《大陸雜誌》第48卷3期，1974年3月。〈昆陵集及其偽文〉，《書目季刊》第7卷4期，1974年3月。

²¹ 羅聯添：〈韓愈家庭環境及其交遊〉，《國立編譯館館刊》第3卷2期，1974年12月。

²² 羅聯添：〈韓愈事蹟考述〉，《國立編譯館館刊》第4卷1期，1975年6月。

²³ 羅聯添：〈韓文淵源與傳承〉，《書目季刊》第10卷1期，1976年6月。

²⁴ 羅聯添：〈韓文辭句來源與改創〉，《書目季刊》10卷3期，1976年12月。

²⁵ 羅聯添：《韓愈傳》（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7年），共140頁。

具規模的《韓愈研究》²⁶，這些論文與兩本專著使臺灣關於韓愈研究的層次有了明顯的提高。

其代表作《韓愈研究》²⁷是一部被公認為學術質量很高的著作。《韓愈研究》在性質上儘管屬於專家的研究範疇，但一個人不是孤立生存，其思想行為在不同程度上必然與他人發生聯繫，韓愈是中唐一位重要的文學家，對韓愈的研究也可以觀察中唐古文運動的歷程。全書對韓愈的家世、行年、交遊、文學主張、古文運動的理論與實踐、詩文成就等作出全面的考訂和評析，並附有年表、論著目錄和歷代詩文評，反映出宏闊的研究視角和不囿於一隅的學術魄力。被陳友冰先生許為「韓愈研究中的集大成之作，在海峽兩岸皆產生了較大的影響」。²⁸《韓愈研究》用了極多的篇幅探討了韓愈的家世事蹟與交遊，但這並不是靜態客觀的敘述，羅聯添教授是把韓愈放在一個大背景中，看到他與他人發生的聯繫，在韓愈的交遊部分，從其交遊圈中選了幾位比較重要的人物作為研究對象。而這些交流對日後的文學活動產生重要的影響，例如他提及韓愈早年的朋友李觀為文不沿襲前人，韓愈日後倡導古文，主張「陳言務去」，可能受李觀的影響。又如他提及韓愈長兄韓會與柳宗元父柳鎮友善，並主張文以貫道，韓柳相交是因為世交關係，二人倡導古文運動，乃是承受父兄的主張加以發揚光大。又提到韓愈詩文寫作，在詩方面，有孟郊和他角力；在散文方面，有柳宗元和他爭勝，提出韓愈的文學成就與孟、柳的角力爭勝有密切的關係。以上幾點皆發人所未發，見證了作家總在與他人之間的互動形成文化網絡，多方位地為後人了解韓愈打開了更多的窗口。

²⁶ 羅聯添：《韓愈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7年），409頁。1988年增訂三版，457頁。

²⁷ 同上。

²⁸ 陳友冰，〈五十年來台灣唐代文學研究歷程述論〉，《文學遺產》2001年第二期，頁99-108。

羅聯添教授治學非常具有系統性與專精性，其側重於中唐各大家，在中唐作家中選擇的研究重心便是韓愈，特別是韓愈與古文運動的關係，更是其著力所在，這方面創獲尤多。因古文運動，遂旁及中唐時的幾位重要作家，如白居易、柳宗元、張籍、劉禹錫、李翱、獨孤及等，他都有專文、專著問世。因古文運動而又涉及隋唐五代的文學理論，他遂又從材料的輯集與理論的闡發著手，對這一時期的文學思想作全面的考索。這便是一種由點及線，由線及面的循序漸進的研究脈絡。在韓愈研究稍告一段落後，作為古文理論的前後串聯而作的一種縱向探索，他發表了專論《隋唐五代文學理論的發展與演變》²⁹，這便是在治學方法上求通的可喜收穫，是一種史的流變連貫性的發展研究。

由「專」而求「通」，由「點」而及「面」，點→線→面循序漸進的研究方法可以作為吾人研究路徑的範式，以「點」牽「線」，以「線」帶「面」，以具體的文本閱讀提升分析評論的能力為核心，進而及於相關與外圍作家、時代風潮與文學運動。羅聯添教授有系統的治學路徑便讓自己的研究視野能收能放。既可沿續考據的傳統，又可在理論體系方面有所建樹。既可做文學本體的微觀探索，尋繹文學的內在規律，又可以文化的宏觀視野審視作家與文本，研究文學與社會的血肉聯繫，如此一來，研究成果便能向深處挖掘，亦能向廣度挺進。

四、文史互證的研究路徑與實證精神

²⁹ 羅聯添：〈隋唐五代文學理論的發展與演變〉，《國立編譯館館刊》第6卷2期，1977年12月，頁1-19，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上）。

(一)編年與年譜之建立：以考證為文學研究的先備條件

羅聯添教授的研究路徑是以年譜的編校入手的。年譜學是一種基礎性的研究，正如房屋的地基，地基雖不能取代房屋供人居住，但沒有地基卻造不起房屋。沒有考證，沒有確實的資料，即使寫出滔滔不絕的分析，也都是空論。很多文學史的問題都在對事實的實證研究中被重新認識。考證與分析議論不同：考證是確立事實，分析議論可以百家爭鳴，有所差異；考證主要在澄清基本事實，事實一經澄清之後，便可以確定一是一，二是二。為了對它所提供的史料提確立保證性而取信於人，必須對資料搜輯、整理和鑑定，透過調查研究從而得出相應的結論，考證是文學研究的先備條件與基礎工作。1958年，羅聯添教授發表了〈柳子厚年譜〉和〈劉夢得年譜〉兩文，他對於中唐時期作家的研究便是從年譜入手。年譜常常包含為某些作品繫年的內容，《柳宗元事跡繫年暨資料匯編》³⁰是羅聯添教授繼五十年代的《柳子厚年譜》之後的另一昇華，包含了年譜和資料匯編兩部份。年譜是在舊譜基礎上加以爬梳輯補，資料匯編則按時間先後，以分類方式考訂編排。年譜是按年月記載某人生平事蹟的著作。以譜主為核心，以年月為經緯，將涉及到譜主的一切有關活動加以交代，如此可以廣泛搜略資料和展示譜主生平全貌，羅教授對年譜正謬析疑，填空補闕，在資料的考訂上已為後人研究中唐文學的學術成就打下堅實的基礎。

一般以為，作年譜與作傳記不同，作傳需要史學知識還需要文學知識，作年譜只需要史學知識，把譜主的生平事蹟、人際關係等諸多方面按照年月一一列舉即可。但其實則大不然，年譜作為記述歷史人物生平的重要載體，年譜並非只是追求譜主一生的整體呈現，因為譜主的佚事已是一種歷史的活

³⁰ 羅聯添：《柳宗元事跡繫年暨資料類編》，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1年9月。

動，而年譜的作者之編撰是一種做學問的行為過程，應把凝固的歷史活動，透過史識而活躍起來，史識並不是一個被固定的概念，或是一種早已有了的陳說，是有著深厚的歷史內涵和嶄新的人文觀照，只有評判和思想，才能使年譜的歷史重生光彩。在細微處可時時處處體現作者的功力與學術素養。

一般以為，文學研究與自然科學不同，應具有比較強烈的審美思維，不如自然科學研究要進行大量的實驗，要經無次的失敗，才能得出較為正確的結論。但從羅聯添教授的嚴謹紮實的考鏡源流中，讓我感受到文學研究不能只憑一時靈感或審美聯想，也必須從事大量艱苦的、有時令人感到枯燥的工作。當我們看著一篇又一篇的中唐文人年譜，便會對羅聯添教授所付出的辛勞和執著大受感動。有許多問題是歷史上爭論不休的難題，例如李白的生平疑雲，又如韓愈、柳宗元是中唐一代大家，接觸的人物眾多，需要取捨剪裁的資料也很浩瀚，怎樣取捨並用並用適當的文字表述，無不考驗著研究者的才、識、學、力，正如鐘來茵先生〈一種成熟的學術風格——羅聯添《唐代四家詩文論集》〉云：

李白研究中的不少「老大難」的問題，歷史上長期眾說紛紜，爭論不休，羅先生似乎有意選之來作研究對象。這些問題如同一把亂麻，單憑聰明才氣是解決不了的。這裡，需要的是頑強的毅力，數十年的積累，客觀公正的心態，系統而兼顧辯證的科學方法。³¹

由此可見考證工作是在實是求是的原則下體現著作者的綜合素質。羅聯添教授的治學方法是對證據的探討，以證據的準確與充分來決定研究的方向與意義，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印證了「實驗是真理唯一的試金石」的定律。真理的表述雖然是簡單樸素的，但追求真理的過程卻非常複雜艱辛。但如果

³¹ 鐘來茵：〈一種成熟的學術風格——羅聯添《唐代四家詩文論集》讀後〉，《評論和研究》97年2月，頁71-73。

不肯花費那樣艱苦笨拙的勞動，便無法發現真理。以前章學誠曾說天下學術不出「沉潛考索」、「高明獨斷」二途，其實高明獨斷也往往是從沉潛考索中來。而我們從羅聯添教授的論文中，可以見到其選材精嚴、議論精當、考訂精嚴、文筆典雅錯落有致，其深厚的學術功力自然使幾部年譜長編充滿濃郁的思辯考證氣息，學術價值無異得到很好的提升。羅聯添教授為幾位唐代文人廣泛收集各種文獻資料，其具體的貢獻便在於提供人們各種不同的歷史圖景和歷史體驗。如此一來，歷史材料是首先值得重視的，因為它提供研究者一幅最直觀的思想圖景。

年譜、編年的考證工作貌似封閉實則具有建設性與開放性，看似無用其實具有大用，考證之學在中國學術史上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既能展現研究者文獻處理的技能，又能通過考證獲取充分證據以求得證解的研究歷程，文獻資料的發掘與考證，往往能給研究者提供多方面的資訊，有時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這也是文獻資料考據在學術上所起的不可忽視的作用。羅聯添教授一生學術活動最具鮮明性是他對考據實證路向實踐，注重材料與觀點、考證和理論相結合的學術風格，在羅教授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展示了紮實的考證功夫和獨特的見解，在考證中思辯，在思辯中考證，如此一來便超越了乾嘉學派繁瑣鉅釘之弊，把考證的精神貫穿到修史中來，學術識見是在長期的補證資料的工作中涵養證成。

(二) 輯佚校勘與唐代文史資料的整理、匯編、索引

羅聯添教授花了許多心力進行詩文的校勘，例如〈唐代詩文集校勘問題〉³²。另外，還有對唐宋文化、李白事蹟的考述，如《從兩個觀點試釋唐

³² 羅聯添：《唐代詩文集校勘問題》，國立編譯館館刊，12卷2期，1983年12月，頁1-16，1983年12月，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下）。

宋文化精神的差異》³³、〈李白事蹟三個問題探討〉³⁴，輯佚校勘之學，重點在於搜羅排比資料、辨析文字異同，擇其善者而從之，整理定本與校記。在《白居易散文校記》³⁵，羅教授在前言所明，「白氏散文，以不甚受推重，故前人及近今學者僅作零星之校勘，而未全力為之披榛莽掃蕪穢者，以致魯魚虛虎之訛，觸目皆是。」白居易作為元和詩壇之盟主，自唐而來，研究唐代文學史之學者多關注其歌，少能留意其散文之特色。談及中唐散文創作，多以韓柳為主，而對白居易散文之研多有偏廢，可以說白居易散文研究長期處於邊緣狀態，羅聯添教授為白居易散文作校，使白文得以回歸到散文研究的核心地位，對於唐代散文研究無疑具有糾偏匡正之功。

此外，羅聯添教授對於資料的匯編屬於集大成式的是《韓愈古文校注彙輯》³⁶，這是歷代韓愈散文研究資料匯編著作，羅教授在〈前言說明〉云：「昌黎詩文集，宋以後校注者非常之多，學者研讀參考，不易一一搜求，為節省四處尋檢之勞，便於利用，實有必要彙輯各家校注為一編，但考量錢仲聯《昌黎詩繫年集釋》合歷代各家校注評說為一體，問世以來，流傳甚廣，錢作相當精善，踵事難以增華，因棄詩取文，專輯古文校注，重加董理，以與之並行互補。兩者齊備，取以研讀參考，自更為便利。」該書輯錄從中唐到五四時期有代表性的評述，按時代先後順序排列。這種資料長編是把收集到的原始資料作歸類、整理、鑒別、篩選、考證、核實處理后，依時間順序進行編排的一種資料形式。它是全面的、系統的、原始的、準確的資料，對

³³ 羅聯添：〈從兩個觀點試釋唐宋文化精神的差異〉，《唐宋史研究--中古史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出版，1987年。

³⁴ 羅聯添：〈李白事蹟三個問題探討〉，《台大中文學報》第3期，1989年12月，頁29-54，收入《唐代四家詩文論集》。

³⁵ 羅聯添：《白居易散文校記》，台北：學海出版社，1986年2月，頁1。

³⁶ 羅聯添：《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台北：國立編譯館主編出版，鼎文書局總經銷，1993年6月。

於韓文研究者是必備之書。羅聯添教授在 1991 年開始進行這項工作，在 1997 年冬，校注彙輯工作接近完成時才得見大陸學者屈守元等主編《韓愈全集校注》(1997 年 2 月四川大學出版社)，取古文部分，加以勘較，屈編長處固多，但亦有所不足，未用台北故宮影印宋本昌黎集，未採童第德《韓集校註》，忽視選本評註，不錄各家評說，又體例作法與本編亦有不同。本篇雖未必兼其優長，然適可補其不足，兩者不妨並出，供學界研讀參考。羅教授系統全面搜集歷代研究韓愈資料，通過選本、刊本等資料的搜集、編者按語的新形式，以及師生共同攜作，呈現出與以往資料匯編不同的諸多新特色。羅聯添教授費時多年才完成此鉅著，且是在授課餘暇兼任此項工作，相當辛勞。

其次，對於唐代文史資料的整理、匯編、索引方面，羅聯添教也做出了很多的貢獻，他編選有《隋唐五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³⁷、為古代文學資料整理和索引編目做出貢獻。在唐代詩人事蹟及文獻資料的考證與比勘，這方面有《唐代文學史兩個問題的探討》³⁸、《唐詩人軼事考辨》³⁹、《唐宋三十四種雜史筆記題解》⁴⁰、《唐代三條文學資料的考辨》⁴¹。繼前 10 年所編文獻研究書目，這 10 年間又編印《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⁴²、《唐代文學論著集目》⁴³、《國學論文選集》⁴⁴、《中國文學史論文精選》⁴⁵、《中國

³⁷ 羅聯添：《隋唐五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臺北：成文出版社，289 頁，1978 年。

³⁸ 羅聯添：〈唐代文學史兩個問題的探討〉，《書目季刊》11 卷 3 期，1977 年 12 月，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下）。

³⁹ 羅聯添：〈唐詩人軼事考辨〉，《國立編譯館館刊》，8 卷 1 期，頁 113-129，1979 年 6 月，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下）。

⁴⁰ 羅聯添：〈唐宋三十四種雜史筆記題解〉，《書目季刊》12 卷 1、2 期合刊，1978 年 9 月，頁 57-66，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下）。

⁴¹ 羅聯添：《唐代三條文學資料的考辨》，《書目季刊》13 卷、第 1 期，1979 年 6 月，頁 53-57，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下）。

⁴² 羅聯添：《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四冊(臺北：學生書局)，1978 年。

⁴³ 羅聯添：《唐代文學論著集目》，臺北：學生書局，132 頁，1979 年。1984 年增訂再版。

文學史論文選集續編》⁴⁶、《國文論文精選》⁴⁷，這是一種較大規模的學術成果的匯輯。研究文獻的整理匯輯，這種工作可謂之「為人之學」，經由他不懈的努力，讓研究者更具方便與實用性。我們都知道史料在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但又很清楚發掘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史料何其難。羅教授一生都在為唐代文學積極做出踏實的基礎性文學研究的各類資料匯編、校勘、考證、補遺等史料的整理，為傳統文化遺產的傳承和光大做了鋪路的工作。

(三) 文史結合、以史證文的研究路徑

80年代，羅聯添先生進一步對與文學的發展有較密切關係的唐代科舉制、中晚唐時期的牛李黨爭等若干問題作了考查，又將文學的審美趣味與校勘結合起來，對唐代詩文集中某些有爭議之點作了富有啟發性的探討。有關唐代科舉與文學的，有〈杜甫「忤下考功第」的年歲與地點〉⁴⁸、〈論唐人上書與行卷〉⁴⁹、〈唐代進士科試詩賦的開始及其相關問題〉⁵⁰。有關牛李黨爭的，為〈唐代牛李黨爭始因問題再探討〉⁵¹。可見羅聯添教授以文史學功底為基礎，運用文史互證研究方法，挖掘作品的深刻內涵。使所有的見解都依托於翔實的史料，具有不可辯駁的脫服力而成定論。也使文學作品的研究可以往縱深處發展，他對文史互證的研究方法不獨有不凡而成功的實踐，

⁴⁴ 羅聯添：《國學論文選集》，臺北：學生書局，1981年。

⁴⁵ 羅聯添：《中國文學史論文精選》，臺北：學海出版社，1008頁，1984年。

⁴⁶ 羅聯添：《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續編》，臺北：學生書局，561頁，1985年2月。

⁴⁷ 羅聯添《國文論文精選》，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620頁，1987年11月。

⁴⁸ 羅聯添：〈杜甫「忤下考功第」的年歲與地點〉，《書目季刊》17卷3期，1983·12。

⁴⁹ 羅聯添：〈論唐人上書與行卷〉，《鄭因百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1985年6月。

⁵⁰ 羅聯添：〈唐代進士科試詩賦的開始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17期，1985年5月。

⁵¹ 羅聯添：〈唐代牛李黨爭始因問題再探討〉，《國立編譯館館刊》第14卷2期，1985年12月。

而且有推進和發揚之功，羅聯添教授以史證文及文史互證的研究路向，為後學者提供了文學研究的一種可行的路數。

我們原本以為，文獻與文學是分屬兩個不同層面的。文獻是文學研究的依據，文學分析只是在一個確定的、靜態的文獻基礎上進行。然而事實上對文獻處理方式本身就是對文學問題進行分析，把文學作品和社會文化史料合為一體的研究態勢，不僅有利於文學研究的深入，而且對於歷史的研究也能夠提供新的依據和史料，這是一種文史互證的實現。像這樣通過文獻與文學的綜合研究，或許才可能從新的層面重新構建文學的框架，發現以往隱藏著的深層面相。

綜合上述，可見羅聯添教授大部分的研究是在做古代文學的考據校注，對後人做出的一件極有意義的鋪路之工，是在細讀文本基礎上，關注作品的歷史原貌，完整地整理出作家的家世與年譜，他十分重視資料的考證和史實的勾稽，在原始材料的基礎上，努力考察事物之間的廣泛聯繫，以展現文學發展的規律。我們不妨說，「知人論世」的歷史學研究，是文學的「外部研究」，而在文本細讀基礎上的文學本位研究，則是文學的「內部研究」。文學研究應該重視文學本位，但並不反對用歷史學的方法對古代文學進行研究，因為借助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外緣研究」，能夠更好地促進我們在文本細讀後文學的「內緣研究」。外緣工作做完以後，更重要的是進入文本內緣研究，揭示作品的意義。除了歷史說的「作品表現了什麼」，還要讓文學說「是怎麼表現的」。研究者要把每一篇文本，都當成活的生命體。以「感性判斷」介入「理性判斷」，讓「審美判斷」與「歷史判斷」攜手，共同參與，互相詰難，最後趨於一致，得出全面的結論，這應該是21世紀古典文學研究中重要的思想路徑和研究方法。羅聯添教授已為我們做了很好的示範。

五、宏微相濟：從微觀的考據出發，向開闊博通的 宏觀視野邁進

就近三十多年來的古典文學的研究來看，不出三種路徑：一是以考據為主，對史料進行實事求是的鉤稽探蹟，考索隱秘的事跡，注重歷史的還原，但容易落於煩碎繁蕪。二是以情感的體悟為本，側重於接受主體細膩入微的同心感受，但容易於感性浮面，缺乏理論分析的知性與深度。三是以理論的批評為主，大多是運用現代西方理論對中國古典文學重新解讀，但容易有生硬比附硬套之嫌，從而使批評落流於空洞。三種方法各有利弊，各見優劣，通常依個人的主觀個性擇善從之。然而，看似壁壘分明的三種路向，又何嘗不可兼行共進呢？文史結合，考評結合，宏微相濟，大小相濟，全體與部分、外緣與內緣與相互關聯，理性與感性結合，多種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便能做到雖有考證但不繁瑣，雖有批評但不硬套，論題雖小，卻能以小觀大、以少總多；條目雖多卻能辯證觀之，材料雖多但不複雜，仍能條理清晰。並認識到方法整合之必須，不局限在某一種固定的研究方法，了解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價值與目標，同時也能清楚意識到不同研究方法自身的有效性和範圍的局限性，保持對不同研究方法界限的清醒認識。

羅聯添教授從史料的考據和文字的訓詁入手，力求復原歷史事實之本真，在借助考據校注的同時，又能以詩人之感情、哲人之深邃以及科學家的求證精神把對文學作品的研究拓展到整合與全方位的揭示。提昇為一種橫向的整體化，縱向的流變化，這在他的代表作《韓愈研究》便可見。研究作家其思想觀念時，不是僅停留在觀念層面上，而是深入到人物主體生活的各方面之中。作品是文人心聲的反映，從一個人的作品可見這個人的心聲，從一群人的作品可以見到這個時代的文人心態。時代背景、政治環境的錯綜複

雜，造成人們在複雜環境中種種反應。我們可以透過一個作者來觀看一個群體、一個時代的文學思潮。作家的出現和成熟、作品的內容和表現形式、文人的唱和交往、文化的傳播和接受，自有其生長的社會文化土壤。

從羅聯添教授研究成果來看，我們對作品的研究要放在一個時代的文化背景下，將文學的研究拓展到政治制度、傳統思想、社會思潮、社會群體(家族、流派、作家群、社團等)、科舉、幕府、音樂、繪畫、民俗、交通等文化層面，注意在文史哲相關學科和其領域的聯繫中探索知識份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心靈狀態和社會處境。對複雜的文化背景的綜合研究將有助於人們更真實而深入地解讀文學，理清文學與社會文化的多重互動關係，而從總體把握文學史的複雜流變和演進規律。這對研究思路的拓寬、研究領域的開闢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不無裨益。

從羅聯添教授對唐代文學史料的考證來看，有兩個特點：一是細密，深入的文獻輯集；二是廣博，清晰的理性思考。從這兩個特點來看，我們可以辨析長久以來的一種誤解——就是僅把考證視為微觀，把理論視為宏觀。但從羅聯添教授的考證研究來看，既要有微觀的細密探索，又需具備宏觀的整體素養。從治學路數來說，沒有對某一領域的整體把握和考察，沒有具備一種綜合觀照的科學思維能力，是不可能進行有效的研究程序的。羅聯添教授的研究是從某些具體對象入手，然後從中概括出某項可能成立的規律來，而不是從已有的概念出發，將研究對象套入現成的模式中，是從具體到抽象，從微觀到宏觀，在揭示文學現象時，不但善於探究根源，同時總是力求思考全面而又通脫。例如其《韓愈研究》是從考證年譜入手，探討時空背景對文學的影響，對後來的唐代文學與政治文化的關係以及文學流派的研究起了導夫先路的作用，他打開了文化研究的新視野。視野開闊，不局限於某一細小局部，能從一個時代的文化總體來把握所研究的課題，整個研究思路總蘊含有一種清晰的文化意識。

走過20世紀的學術發展，面向21世紀的學術趨向，唐代文學研究應走向更具廣闊前景和廣泛意義的社會——文化研究。這意味著，對作家作品及文本研究之外，更應將文學視為特定社會歷史文化條件的產物之一，對文學的研究應在社會文化大背景之下來進行。

六、羅聯添教授的學術風度與研究視野

由羅聯添教授的論著成果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多麼勤奮而又能注意有效地組織課題而作出研究成果的學者。從1958年開始發表論文起，中間沒有任何停頓，連續地作出可觀的成績，這種延續性與自發性是令人欽佩。一位學者的學術風範，尤其是從事人文傳統研究的學者，或許在專業領域各有偏嗜，在不同的學術路數各有特色，但其中總有一種共同的、值得吾人珍視的精神品質。在文學研究的歷史道路中，能夠確立研究價值的不僅是已出版的著作實體，我們更要關注的是那些曾經跋涉在道路上留下的腳印與身影，因為他們堅實的探究精神，已為來者預示著一種態度高度和精神範式。

不少文人習以「著書都為稻粱謀」為口頭禪，但我們回顧了羅聯添教授的一生，卻都在凝精會神地做學問，而不旁涉其他。孤燈冷窗，在斗室裡安於孤獨地走筆著書，著述豈為升斗計？淡泊名利地做人，內斂安靜地考證，扎實求真地治學，自覺地以擔負弘揚著人文精神的重任，以近九十年的生命終於成就了數十冊書稿篇章，尋本而探源，考辯而實證，其學術生命永遠青春煥發。

回顧今昔的學術環境有了極大的變異，文史學界的研究分類愈繁漸榮，古典文學研究已有了長足的進步與多元的發展，與此同時，因爭奪名利而彼此相輕的陋習也有所見，令人為之欣喜也亦之感慨。有些人習於門戶之見、

黨同伐異，或急功近利，粗製濫造，或媚於世俗，很多古典文學的論文專著只是爛熟地演繹著一套套流行的知識話語和技術譜系，只注重操作層面的技術要求和應用時效，寫出來的論文只是機械性的拼圖組裝，機巧滑溜，批量生產，目的只是在爭取計畫經費或累積論文篇數以謀一個學院教職或研究單位的職缺，缺乏觀念意識的正義衝動，只有職業觀念，忘卻學術責任，甚至放棄責任，沒有學術使命感，當然沒有人文意趣與靈魂饜足的陶醉。當我們在回顧羅教授的學術成就時，可以藉此反思學界正在流失一種美好。當我們尊仰羅聯添教授學術成就的同時，更要緬懷他的學術氣象和學者風度。一人之學術亦如一人之性情，其研究品性茲分兩點說明：

(一) 尋根索源，追本溯流的耐心

大凡學者之研究必要屬於自己的學術風格，這種風格是在對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去尋找最合乎自我個性的成份予以繼承與深化，再以研究實踐創造出最獨特的研究成果。羅聯添教授他那嚴謹的樸學精神主要是體現在具有考據色彩的論文中。不瞭解羅聯添教授的人可能會無法理解，他為何用那麼多的精力，投注到那令人枯燥乏味的考證工作中去？其實這充分表現了羅聯添教授對待學問具有強烈的追根究底的意識，一種直探本源的研究個性。木有本，水有源，源可追，流可溯，做人處事不能忘本，學術研究豈能忘卻源頭活水？羅聯添教授在〈論韓愈古文幾個問題〉一文中道出他選題研究的目的，是期望對問題能「澄其源而清其流」⁵²，此語頗能道出他的治學個性。「澄其源」便是從最初的起因出發，實事求是地探尋材料的真實究竟為何，對原始材料作準確的搜討與把握。「清其流」，就是把由原始材料生發的種種解釋、議論、記載，按照事物的本身發展加以清理。中國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因此，

⁵² 羅聯添：〈論韓愈古文幾個問題〉，《漢學研究》，9卷2期，1991年12月，頁275-303，收入《唐代四家詩文論集》。

文學批評的形式及發展和史學經學傳統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羅聯添教授他把經學的基本考證法和歷史的實證精神以及文學箋釋的方法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讓史學批評和經學批評構成了文學批評的前結構。唯有這樣，才能對課題的縱向發展與橫向聯繫有一個全面的概括，而由此得出的結論，才會有充實的材料基礎。聯添教授的論文，總能追討問題的起因，從材料的源頭加以澄清，由此加以科學的推理，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一般文學性的研究如果單純地用「以意逆志」這種研究方法，其結果往往只能停留在鑒賞層次，或許只能稱之為心得體會，無法得到折服人心的充份條件，若能添之以「追本溯源」，那麼「以意逆志」就更向前邁了一大步。「追本溯源」與「以意逆志」兩相參合必將使學術研究更具有公信力。「追本溯源」雖不是充要條件，卻畢竟比單純的鑒賞體會要深刻得多。考鏡源流，嚴謹求實，是聯添教授寶貴的學術涵養，也是其治學有成的主要經驗。

(二) 一種永恆的實證精神與嚴謹紮實的研究品格

談到史料考證，往往有人將此與乾嘉考據學扯在一起。近年來也有文章對古代文學的史料考證予以指責，認為有回歸乾嘉學風的傾向，有追求細屑、不顧大體的繁瑣化之嫌。當然，我們要注意在考證工作中可能出現的弊病。但個人以為，羅聯添教授對於古典文獻史料的考證方向應該是被肯定且發揚的。從事古代文學研究，一定要言必有據，對每個問題論述，每個觀點的提出，都需建立在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吸納總結的基礎之上，辨析學術，而不能膠柱鼓瑟，羅聯添教授正是沿著這樣路子踏踏實實地做學問。當我們見到他豐碩的研究成果，便情不自禁地佩服其考據的細緻和周詳。一位學者的生命意義，就在於他在學術行列中被時間長河所認定的位置，而不在於一時的社會名聲或過眼雲煙的經費多寡。仰觀羅聯添教授一本本又一篇篇的著作，總會感到一種苦心孤詣的投注力量，又能感受到做學問的一種極為難得的踏實任勞和持之以恆的長期投入。這種態度，使得他不僅未與史家的嚴謹

相互牴牾，而且以人性化的細膩心境，來豐富史料的嚴謹裁斷，他對古代文學，既有理性的思索，又有感情的傾注，從而使其論著具有極大的說服力，

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免受到西方文學理論的影響，讓傳統的考據編年的學術方法失去了昔日的光芒，誠然，我們今日已無法迴避現代的學術方法和理論分析，但古典文學畢竟是在傳統中形成，傳統的體證方法，雖不足以形成系統性的方法論，但對於學術研究來說也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通過史料審定到融會貫通，在實是求是的原則下，又可以開拓思路，做到理性與詩性、文獻史料與文學審美、科學實證與人文精神的完美結合。從羅聯添教授的研究方向來看，歷史考證學並不只停留在文獻資料上去做繁瑣鉅釘的工作，而是既能立足於傳統，又注入現代意識，雖然運用考據之學，卻能夠「大而化之」，展現了開放圓融的氣度。

七、結語

一代有一代的文學，唐代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登峰造極的時代，為後人留下了許多瑰寶。一代也有一代之學術，羅聯添教授代表的是1960年代以來的臺灣學術的中堅，40年來的孜孜吃吃，造就了羅聯添教授在唐代文學研究的輝煌成就，倘細細究察這成就所來自，對學術的熱愛，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虔誠信仰，以及對特定的研究方向的堅持和恪守，無疑是重要的原因。他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實已建立了一種學術品格，治學嚴謹又有耐心毅力的精神，這種嚴謹性表現在他對史實的充分尊重上，既不標新立異，也不故步自封，是一分史料說一分話。其次是建立據點，從微觀出發，再進入宏觀的文化背景下觀察文學本身演進的歷程。

羅聯添教授所以具有大家風度，在於其對學問的虔誠與尊重，一絲不苟的嚴謹。其次是遠離名利功利的清靜心，能潛心學問，不旁涉其他。其三，博大的學術心胸，不尊己卑他，不矜己長，不攻人短，不存門戶之見，足為今人的範式。

羅聯添教授是台灣古典文學研究史上對唐代文學付出熱忱的先鋒，先鋒的實質精神就是一種對真理永不止息的探索、實驗與創造精神。雖然先鋒勢必被後浪所超越，但先鋒會以永恆的精神引導後人前赴後繼，引領後繼者不斷前進。一代學人，乘風而去，在人間留下了他豐碩的著述，留下了他刻苦勵學的品格範式，歷史不會忘記他，後輩學人不會忘記他。我們相信，從唐代研究學會成立、發展，到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氣象，結出豐碩的成果，都將與羅聯添教授的名字緊緊相連。僅以拙文，表現吾人「以師師之、以友友之」的一分景仰，虔誠地獻上一瓣心香。

羅聯添教授年表

謝佩芬^{*}

- 1927年 生於福建永安。
- 1948年8月1日 自福建福州乘鷺江輪到臺灣，自基隆上岸。
- 1948年8月11日 參加臺大招生考試，獲錄取，入中文系就讀。
- 1951年10月 以〈柳子厚年譜〉為題，撰寫畢業論文，戴君仁教授指導。
- 1952年8月 卒業後，到高雄鳳山陸軍官校受預備軍官訓練一年。
- 1953年9月 參加就業考試及格，分發至省府機構任公職一年。
- 1954年8月 受聘為臺大中文系助教。
- 1958年6月 發表〈柳子厚年譜〉，《學術季刊》6卷4期，頁1-19。收入《唐代四家詩文論集》，又擴充為《柳宗元事蹟繫年暨資料彙編》，國立編譯館出版，見1981年。
- 1958年7月 發表〈劉夢得年譜〉，《文史哲學報》8期，頁181-295。增訂後收入《唐代詩文六家年譜》。
- 1958年8月 升等為臺大中文系講師。

*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專任教授

- 1962年8-9月 發表〈張籍年譜〉，《大陸雜誌》25卷4期，頁14-19；5期，頁15-22；6期，頁20-29。增訂後收入《唐代詩文六家年譜》。
- 1963年1-4月 〈劉賓客嘉話錄(顧文本)校補及考證〉，《幼獅學誌》2卷1期，頁1-39；2期，頁1-50。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下)。
- 1963年6月 〈張籍之交遊及其作品繫年〉——〈張籍年譜〉附錄之一、二、三，《大陸雜誌》26卷12期，頁14-18。
- 1963年8月 升等為臺大中文系副教授。
- 1963年11月 〈張籍軼事及詩話〉——〈張籍年譜〉附錄之四、五，《大陸雜誌》27卷10期，頁13-16。收入《唐代詩文六家年譜》。
- 1965年8月 〈白香山年譜考辨〉，《大陸雜誌》31卷3期，頁10-15。收入《白樂天年譜》。
- 1966年1-2月 〈白居易中書制誥年月考〉，《大陸雜誌》32卷2期，頁10-15；3期，頁24-30。收入《白樂天年譜》。
- 1966年8月 赴美哈佛大學訪問研究一年。
- 1967年11月 〈白居易作品繫年〉，《大陸雜誌》38卷3期，頁23-34。收入《白樂天年譜》。
- 1968年8月 升等為臺大中文系教授。
- 1969年2月 〈讀白居易的秦中吟〉，《思與言》5卷4期，頁7-13，改題〈白居易秦中吟寫作的背景〉，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下)。
- 1969年3月 從此年三月起，將近二十年參與大專聯考命題作業，所擬作文題〈一本書的啟示〉、〈人性的光輝〉、〈燈塔與燭火〉等，以為得當，獲佳評。
- 1969年3月 編〈近六十年來日韓歐美唐代文學論著集目〉，《書目季刊》3卷3期，頁15-42。收入《唐代文學論著集目》，又擴充為《隋唐五代文學論著集目正編》、《續編》。

羅聯添教授年表

- 1969年3月 〈韋應物事蹟繫年〉，《幼獅學誌》8卷1期，頁1-72，改題〈韋應物年譜〉，收入《唐代詩文六家年譜》。
- 1969年12月 〈唐司空圖事蹟繫年〉，《大陸雜誌》39卷11期，頁14-81，改題〈司空圖年譜〉，收入《唐代詩文六家年譜》。
- 1970年6月 〈白居易散文校記〉，臺灣大學文學院《臺大文史哲學報》19期，頁297-591，修訂再版為專書，學海出版社出版。
- 1971年 參與修訂周何本高中國文教科書，為時約二年。
- 1971年 擔任論文指導教授——梁東淑《王禹偁及其詩》，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1972年6月 本學年度臺大中文系第一次系務會議，受推為代表，由系主任召集，研擬有關本系聘任升等辦法。
- 1973年9月8日 臺大中文系第25次學術討論會主講「有關韓愈的問題」。
- 1973年12月 〈李翱研究〉，《國立編譯館館刊》2卷3期，頁55-90。改題〈李翱年譜〉，收入《唐代詩文六家年譜》。
- 1973年 擔任論文指導教授——呂正惠《元白比較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1974年3月 〈獨孤及考證〉，《大陸雜誌》48卷3期，頁21-42。改題〈獨孤及年譜〉，收入《唐代詩文六家年譜》。
- 1974年3月 〈毗陵集及其偽文〉，《書目季刊》7卷4期，頁3-8。收為〈獨孤及年譜〉附錄。
- 1974年12月 〈李文公集源流、佚文及偽文〉，《書目季刊》8卷3期，頁25-28。收為〈李翱年譜〉附錄。
- 1974年12月 〈韓愈家庭環境及其交遊〉，《國立編譯館館刊》3卷2期，頁47-79。改題收入《韓愈研究》。
- 1975年1月 受推選為五人小組之一，研擬刪減研究所入學考試專科可選學科，決議由40種刪為24種。

- 1975年6月 〈韓愈事蹟考述〉，《國立編譯館館刊》4卷1期，頁1-52，收入《韓愈研究》。
- 1976年6月 〈韓文淵源與傳承〉，《書目季刊》10卷1期，頁47-56。收入《韓愈研究》，又收入《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續編》，臺北：學生書局，頁370-390。
- 1976年9月25日 臺大中文系第69次學術討論會主講「唐代文學史的兩個問題」。
- 1976年12月 〈韓文辭句來源與改創〉，《書目季刊》10卷3期，頁81-91。收入《韓愈研究》。
- 1977年3月 《韓愈》，臺北：河洛出版社；臺北：國家出版社，1982年，140頁。
- 1977年6月 〈韓愈的交遊（續篇）〉，《國立編譯館館刊》6卷1期，頁41-54。收入《韓愈研究》。
- 1977年11月 《韓愈研究》，臺北：學生書局，409頁。1988年增訂三版，457頁。
- 1977年12月 〈唐代文學史兩個問題的探討〉，《書目季刊》11卷3期，頁11-21。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下）。
- 1977年12月 〈隋唐五代文學理論的發展與演變〉，《國立編譯館館刊》6卷2期，頁1-19。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上）。
- 1978年5月 《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一）、（二），臺北：學生書局；（三），1979年3月；（四），1979年4月，共1758頁。
- 1978年9月 〈唐宋三十四種雜史筆記解題〉，《書目季刊》12卷1、2期合刊，頁57-66。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下）。
- 1978年9月 《隋唐五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臺北：成文出版社，289頁。
- 1979年3月 〈柳宗元兩篇山水記的分析〉，《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三），頁1073-1081。收入《唐代四家詩文論集》。

羅聯添教授年表

- 1979年6月 〈唐代三條文學資料考辨〉，《書目季刊》13卷1期，頁53-57。
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下）。
- 1979年6月 〈唐代詩人軼事考辨〉，《國立編譯館館刊》8卷1期，頁113-129。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下）。
- 1979年7月 《唐代文學論著集目》，臺北：學生書局，132頁。1984年11月增訂再版，168頁。
- 1979年12月 〈韓文公的郡望與籍貫〉，《書目季刊》13卷3期，頁13-17。
收入《韓愈研究》。
- 1979年 擔任論文指導教授——姚垚《皮日休、陸龜蒙唱和詩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1979年 擔任論文指導教授——方介《柳宗元思想研究》，國立臺灣
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1979年 擔任論文指導教授——張尚梅《劉禹錫研究》，國立臺灣大
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1980年12月 〈柳宗元二篇議論文分析〉，《中外文學》9卷7期，頁34-57，
收入《唐代四家詩文論集》。
- 1980年 擔任論文指導教授——王毓秀《張說研究》，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 1981年2月14日 臺大中文系第99次學術討論會擔任特約討論，主講者
為楊承祖教授，講題「傳記研究與作品詮釋——從杜詩『王
翰願為鄰』談起」。
- 1981年9月 《柳宗元事蹟繫年暨資料類編》，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
書編審委員會，527頁。
- 1981年11月 〈張籍上韓昌黎書的幾個問題〉，《臺靜農先生八十壽慶論
文集》，頁353-38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收入《唐代文學
論集》（下）。

- 1981年11月 《國學論文選集》，臺北：學生書局，610頁。
- 1981年 擔任論文指導教授——金龍雲《杜甫寫實諷喻詩歌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 1982年9月 〈唐宋古文的發展與演變〉，中華文化叢書——《中國文學的發展概述》，頁121-184，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上）。
- 1982年 擔任論文指導教授——吳洙亨《杜牧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1983年12月 〈杜甫「忤下考功第」的年歲與地點〉，《中國書目季刊》17卷3期，頁17-23。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下）。
- 1983年12月 〈唐代詩文集的校勘問題〉，《國立編譯館館刊》12卷2期，頁1-16。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下）。
- 1983年 獲教育部民國72學年度大學校院教授傑出研究獎（連續獎助二年，72年8月-74年7月）。
- 1983年 擔任論文指導教授——王小琳《大曆詩人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1983年 擔任論文指導教授——吳正恬《韓愈交遊考》，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1984年6月2日 臺大中文系第139次學術討論會擔任特約討論，主講者為博士班應屆畢業生何寄澎，講題「釋契嵩對古文家排佛的反應」。
- 1984年 偕同葉慶炳、張敬、張亨、彭毅等教授赴韓國漢城(首爾)、全州等地訪問。
- 1984年 《中國文學史論文精選》，臺北：學海出版社，1008頁。
- 1984年 擔任論文指導教授——金容杓《柳宗元散文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羅聯添教授年表

- 1984 年 擔任論文指導教授——蔡振璋《柳宗元山水文學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1985 年 2 月 〈韓詩特色〉，《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續編》，頁 391-400，收入《韓愈研究》。
- 1985 年 2 月 《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續編》，臺北：學生書局，561 頁。
- 1985 年 3 月 〈論唐代古文運動的幾個問題〉，《韓國中國學報》25 輯（第四次中國學國際大會特輯），頁 43-57。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上）。
- 1985 年 5 月 〈唐代進士科試詩賦的開始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17 期，頁 9-20。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下）。
- 1985 年 6 月 〈論唐人上書與行卷〉，《鄭因百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下），頁 636-753。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上）。
- 1985 年 8 月 就任臺大中文系系主任暨中文所所長。
- 1985 年 8 月 〈長恨歌與長恨歌傳一體結構問題及其主題探討〉，《傅樂成教授紀念論文集》——《中國史新論》，頁 505-520。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下）。
- 1985 年 11 月 〈韓柳比較〉，《中國文學講話（六）隋唐文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頁 361-374。改題〈韓柳比較評論〉，收入《唐代四家詩文論集》。
- 1985 年 11 月 〈韓愈古文之淵源、創作與特徵〉，《中國文學講話（六）隋唐文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頁 333-345，收入《韓愈研究》。
- 1985 年 11 月 〈唐代古文的發展與演變〉，《中國文學講話（六）隋唐文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頁 317-332。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上）。

- 1985年11月〈柳宗元山水記與論辯文的分析〉，《中國文學講話（六）隋唐文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頁347-360。收入《唐代四家詩文論集》。
- 1985年12月〈唐代牛李黨爭始因問題再探討〉，《國立編譯館館刊》14卷2期，頁15-24。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下）。
- 1985年 擔任論文指導教授——劉素玲《宋儒論韓愈排佛與師道》，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1985年 擔任論文指導教授——徐玉美《姚合及其詩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 1986年7月 《白居易散文校記》（增訂再版），臺北：學海出版社，313頁。
- 1986年7月 《唐代詩文六家年譜》，臺北：學海出版社，600頁。
- 1986年12月29日 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文學組宣讀論文，題為：「白居易詩評論的分析」，中央研究院主辦。
- 1986年 創辦《臺大中文學報》（半年刊），臺靜農題署；又《中國文學研究》（刊載研究生論文），王叔岷題署。
- 1986年 獲國家科學委員會民國75學年度傑出研究獎（連續獎助二年，75年8月-77年7月），獲獎證書字號：七五傑獎字第〇一五號。
- 1987年4月 〈韓愈〈原道〉篇寫作的年代與地點〉，《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頁187-194。收入《唐代四家詩文論集》。
- 1987年5月 〈從兩個觀點試釋唐宋文化精神的差異〉，《中古史研討會論文集之二——唐宋史研究》，頁107-112。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上）。
- 1987年11月 《國學論文精選》，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620頁。

羅聯添教授年表

- 1988年1月29-31日 第一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宣讀論文，題為：「白居易與佛道關係重探」，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與唐代研究學者聯誼會合辦。
- 1988年5月 辭任臺大中文系系主任暨中文所所長。
- 1988年6月4日 臺大中文系第180學術討論會擔任特約討論，主講者為博士班應屆畢業生郭玉雯，講題「宋代詩話中的奪胎換骨法」。
- 1988年12月 〈宋儒對韓愈〈原道〉篇批評及其迴響〉，《書目季刊》22卷3期，頁62-70。收入《唐代四家詩文論集》。
- 1988年 以〈白居易與佛道關係重探〉一文獲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獎勵優等獎。
- 1988年 擔任論文指導教授——黃理喜《韓愈事蹟繫年考》，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1989年2月 〈白居易與佛道關係重探〉，《第一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頁25-76。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下）。
- 1989年5月 《唐代文學論集》（上下），臺北：學生書局，816頁。
- 1989年6月 〈白居易詩評論的分析〉，《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頁395-419。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下）。
- 1989年7月 《白樂天年譜》，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382頁。
- 1989年12月 〈李白事蹟三個問題探討〉，《臺大中文學報》3期，頁29-54。收入《唐代四家詩文論集》。
- 1989年 以〈白居易詩評論的分析〉一文獲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獎勵甲種獎助一年。
- 1989年 擔任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方介《韓柳比較研究——思想、文學主張與古文風格之析論》，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1989年 擔任論文指導教授——金卿東《張籍、王建社會詩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1990年1月 《國學導讀》（與戴景賢、張蓓蓓、方介聯合編著），臺北：巨流圖書公司，778頁。
- 1990年11月 受邀出席南京大學舉辦唐代文學國際研討會。同時受邀前往者，有政大教授王夢鷗、師大教授汪中等多人。
- 1990年11月21日~25日 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宣讀論文，題為：「論韓愈古文幾個問題」，南京大學主辦。
- 1990年 以〈李白事跡三個問題探討〉一文獲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獎勵甲種獎助一年。
- 1990年 擔任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王基倫《韓歐古文比較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1991年12月 〈論韓愈古文幾個問題〉，《漢學研究》9卷2期，頁275-303。收入《唐代四家詩文論集》。
- 1991年 以〈論韓愈古文幾個問題〉一文獲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獎勵甲種獎助一年。
- 1992年10月 〈論平淮西碑〉，《中國唐代學會會刊》3期，頁13-22。收入《唐代四家詩文論集》。
- 1992年 擔任論文指導教授——呂惠貞《元稹及其詩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1992年 擔任論文指導教授——陳凱莉《唐代遊士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1993年6月 〈李白〈蜀道難〉寓意探討〉，《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頁177-204。收入《唐代四家詩文論集》。

羅聯添教授年表

- 1993年6月 〈李白〈蜀道難〉寫作年代考辨〉，《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頁35-46。收入《唐代四家詩文論集》。
- 1993年 獲國家科學委員會聘為民國82學年度胡適紀念講座教授（82年8月-83年7月）。
- 1994年7月 自臺大中文系教授一職退休離職。
- 1994年 擔任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金容杓《曾鞏散文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1996年7月 《中國文學論著集目正編》，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3640頁。
- 1996年12月 《唐代四家詩文論集》，臺北：學海出版社，394頁。
- 1996年 與周學武共同擔任論文指導教授——黃晴惠《初唐四傑傳記考辨及其文學思想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1997年12月 《中國文學論著集目續編》，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845頁。
- 1998年3月 《韓愈傳》（《韓愈》一書改名，修訂三版），臺北：國家出版社，208頁。
- 2003年6月 《韓愈古文校注彙輯》（與方介、王基倫、邱琇環、潘呂棋昌、謝佩芬聯合編輯），臺北：國立編譯館，四冊，3630頁。
- 2003年6月 《韓愈古文校注彙輯附編》，臺北：國立編譯館，一冊，1208頁。
- 2004年10月 《唐代文學研究論著集成》（與傅璇琮聯合主編），西安：三秦出版社，1162頁。
- 2009年9月 《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上下），臺北：學生書局，1055頁。〈序〉萬餘言，《書目季刊》41卷3期、安徽大學出版《古籍研究》52期，刊載。

中國唐代學會會刊 第二十一期

- 2009年9月25日 應邀於唐代學術討論會(臺大中文系主辦)作主題演講，
講題：「唐詩校釋與地理」，文載《書目季刊》43卷3期。
- 2010年12月17日 第二屆「典型在夙昔」專題演講(唐代學會主辦)，講題：
「臺靜農先生的學術藝文成就」。
- 2011年11月 《韓柳文析論綱要暨研究資料》，臺北：學生書局，256頁。
- 2011年11月 門生故舊為恭賀八五嵩壽出版《羅聯添教授八秩晉五壽慶論
文集》，計收論文二十五篇，臺北：學生書局，718頁。
- 2012年1月 《韓愈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409頁。
- 2014年12月 《唐代文學研究綱要》，臺北：學生書局，409頁。
- 2015年3月18日 卒於臺灣臺北溫州街寓所。

《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

校理

小南沙月^{*}

內容提要

《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是日本天臺僧侶慈覺大師圓仁(七九四-八六四)於開成三年(八三八)隨同第十七次遣唐使入唐將來三種佛典目錄之第一種。圓仁到大中元年(八四七)歸國為止約十年間，去揚州、五臺山、長安等各地求法，攜帶七百餘部佛典歸國。後來圓仁成為比叡山延曆寺第三代座主，構建了日本台密的基礎。

*日本京都女子大學博士課程，研究領域為古代中日交流歷史、日本佛教史。發表論文有：《円仁將來目錄研究——《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及《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錄》的成立過程》（《京都女子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研究紀要》第14號，京都女子大學，2015年3月）、《円仁將來目錄研究——《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及《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錄》的諸寫本的分析》（《京都女子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研究紀要》第15號，京都女子大學，2016年3月，待刊）。

《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是從開成三年八月到開成四年三月之間，在揚州蒐集到的諸佛典一覽，是同年四月二十日圓仁在歸國的船上編寫的目錄。此佛典目錄的內容與《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錄》類似，但撰寫的過程與背景不同。本研究以現存最早的青蓮院本為底本，結合其他日本現存的諸寫本與刊本進行整理校勘，以作為研究圓仁目錄的基礎。

關鍵詞：圓仁；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入唐僧；遣唐使；日本天台宗

解題

《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是日本天台僧侶慈覺大師圓仁（七九四—八六四）隨同第十七次遣唐使入唐將來的三部佛典目錄之一¹。

圓仁於平安時代初期承和五年（八三八，唐開成三年）隨第十七次遣唐使入唐求法，到大中元年（八四七）歸國為止的約十年間，去揚州、五臺山、長安等地求法，將多部佛典帶回日本。這部目錄是從開成三年八月到開成四年三月之間，圓仁在揚州搜集到的經藏目錄。

這部目錄編寫的開成四年（八三九）四月二十日，圓仁本人就在航行於山東半島沿海的遣唐使第二船²裡，而所搜集到的佛典等卻裝在第八隻船上，佛典不在他身邊。圓仁當初在揚州登陸後希望去天台國清寺求法，但若

¹ 參照小南沙月《圓仁將來目錄研究——《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及《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錄》的成立過程》（《京都女子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研究紀要》第14號，京都女子大學，2015年3月）。

² 玄應《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本）卷第一、船舶條音白，《埤倉》舶大船也。《通俗文》吳船曰艚。晉船曰舶。大者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者是也。

前往天台山，他就無法隨同遣唐使回國，所以未能獲得唐朝政府的批准。開成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圓仁隨遣唐使出發。我們可以推測圓仁此時已下定決心要留在中國，因此就編寫了佛典目錄的草稿。圓仁整理行李，按佛典的類型分類為八帙，並且將最重要的佛典密封在皮箱裡。三月十七日，這八帙佛典與一個皮箱被裝上了遣唐使第二隻船。三月二十三日，圓仁將發給比叡山的信函托付給遣唐使的隨員兼畫家栗田家繼，二十四日登上了第二隻船。圓仁計劃留在密州不回國，但由於遣唐大使藤原常嗣決定了從東海山到日本直接航海的路線，於是圓仁將佛典裝在第八隻船上，他與自己的兩個弟子、隨從丁雄滿一起下船，藏在山中。但最後圓仁師徒隨從四人還是被當地官府發現，四月十日他們不得已纔登上了遣唐使第二船。圓仁在不得不歸國的情況下，爲了將他在唐期間的求法成果向日本朝廷報告，於是就在船上將攜帶的目錄草稿謄清，這就是《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六月在赤山法華院逗留期間，圓仁又暗中設法留在中國，他是在七月十四日與第二船告別的，在此期間將《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托付與乘坐第二船的栗田錄事。第二船的第一隻船與第二隻船皆歷經海上漂流的艱險，分別於翌年四月、六月抵達日本本土。其後圓仁編寫的《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被送到了延曆寺。

《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現存抄本共有三種。第一種抄本是現存最古的青蓮院本，乃京都栗田的天台門跡青蓮院吉水藏舊藏，現藏於獨立行政法人國立文化財機構，由京都國立博物館保管）。1979年，作為《圓仁入唐求法目錄〈開成四年四月二十日〉》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產³。抄本高27.2釐米，寬1085.0釐米，每張紙二十二行，寫卷凡二十九張紙，用墨

³ 國寶、重要文化財綜合目錄編纂會編《國寶 重要文化財綜合目錄美術工藝編》上卷（ぎょうせい、1998年）128頁。

筆抄寫⁴，封面題云：「求法目錄在唐前唐院本南第十一⁵」，末頁記云：「嘉保二年七月十六日於南陽御房書了，前唐院之本之寫得也云。」可知此本寫於日本嘉保二年（一〇九五）七月，我們可以推測「前唐院」的抄本是圓仁在世時，存放其將來物品的比叡山前唐院的原本，或者是與原本相近的轉抄本，這部抄本是現存最早的。第二種抄本曾經稱為個人藏本⁶，一卷，亦藏於獨立行政法人國立文化財機構，由京都國立博物館保管，被當做青蓮院本的附屬品⁷。此本高 28.5 釐米，寬 500 釐米，寫卷凡十二張紙，無欄⁸。末頁記云：「保安四年八月一日於防門殿南亭以一乘房和尚御本寫得之。」又記云：「右書本以前唐院御本之寫得。」我們推測這部抄本是保安二年（一一二一）從嘉保二年前唐院寫卷轉抄的本子。但是，封面紙背有寫於寬元三年（一二四五）到寶治二年（一二四八）數通文書，由此推測這部抄本並非寫於嘉保二年（一〇九五），實際上寫於鎌倉時代。卷末有明德二年（一三九一）賢寶⁹抄寫的《感得記》。第三種抄本是四天王寺本，據先行研究¹⁰，這部抄本沒有底頁，文本系統類似於第二種個人藏本。

⁴ 參照「e 國寶 國立博物館所藏國寶、重要文化財」<http://www.emuseum.jp/>，「圓仁承和五年求法目錄」。

⁵ 圖像見「國指定文化財等數據庫」<http://kunishitei.bunka.go.jp/>，「圓仁入唐求法目錄〈開成四年四月二十日／〉」。

⁶ 石田尚豐《關於圓仁的揚州求法》（《青山史學》第 8 號，青山學院大學文學部史學研究室，1984 年）第 205、206 頁。此本曾於 1966 年在奈良國立博物館「大陸傳來佛教美術展覽會」展出。

⁷ 參照前揭注 3。

⁸ 參照「e 國寶 國立博物館所藏國寶、重要文化財」，「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

⁹ 賢寶（1333—1398），日本京都東寺觀智院第二代院主，乃學識淵博的高僧。

¹⁰ 石田尚豐《關於圓仁的揚州求法》（《青山史學》8 號），第 206 頁。

凡例

- 一、本次整理以青蓮院藏本¹¹（現在由京都國立博物館保管）為底本。
- 二、以個人藏寫本¹²（現在由京都國立博物館保管）及《大正新修大藏經》本、《大日本佛教全書》本兩種活字本為對校本。以下，青蓮院本簡稱為「青本」，個人藏本稱為「個人藏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本¹³簡稱為「大正藏本」，《大日本佛教全書》本¹⁴簡稱為「全書本」。
- 三、諸本旁注皆略之。兩種活字本皆為旧体漢字，本次校勘皆略之不記。
- 四、本次整理以現存最早的青蓮院本為底本，包括異體字、俗字、常用漢字皆依照青蓮院本的記載翻刻。以本次的作業為根據，今後預訂公開以正字、舊體漢字為規範的校訂本。

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

(封面紙背)「青蓮藏本」(右下方)

「慶安二季首夏上浣之候加

修復畢」(左下方)

1 日本國〔一〕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

¹¹ 參照前揭注 4。

¹² 參照前揭注 8。

¹³ 高楠順次郎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55 卷《目錄部》（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1977 年 9 月）。1076-1078 頁。

¹⁴ 高楠順次郎、望月信亨編《大日本佛教全書》第 2 卷《佛教書籍目錄 2》（大日本佛教全書刊行會，1932 年 8 月）52-57 頁。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国」。

2 經疏章傳等壹〔一〕佰〔二〕參拾〔三〕柒〔四〕部貳佰〔五〕壹〔六〕卷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作「一」。〔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百」。〔三〕個人藏本、大正藏本作「三十」。〔四〕個人藏本作「七」。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漆」。〔五〕個人藏本、大正藏本作「二百」。全書本作「貳百」。〔六〕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作「一」。

3〔一〕茶羅并〔二〕印契壇樣〔三〕諸聖者影及舍利等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有「曼」字。〔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并」。〔三〕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樣」。

4 大吉〔一〕祥天女十二契一百八名無垢大乘經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吉」。

5 一切佛心中心經一卷

6 寶星經略述廿〔一〕八宿佉盧瑟吒仙人經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作「二十」。

7 陁〔一〕羅尼集要經一卷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作「陀」。

8 蘓〔一〕摩呼童子請〔二〕經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蘇」。〔二〕個人藏本有「問」字。

9 新譯般若心經一卷 般若三藏譯〔一〕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訊」。

10 阿利多軍荼利護國大自在拔折羅摩訶布陁〔一〕羅金神力陁〔一〕羅尼一卷 阿地多三藏〔二〕日照三藏翻本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作「陀」。〔二〕大正藏本、全書本無「三藏」字。

11 金剛頂蓮花〔一〕部心念誦儀軌二卷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華」。

12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念誦儀軌一卷 大興善寺不空譯〔一〕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訊」。

13 已上九部一十〔一〕卷同帙

【校勘記】〔一〕全書本作「千」。

14 金剛頂瑜伽千〔一〕手千〔二〕眼觀自在菩薩脩〔三〕行儀軌一卷

【校勘記】〔一〕全書本作「于」。〔二〕個人藏本無「千」字。〔三〕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作「修」。

15 普賢菩薩金剛薩埵瑜伽念誦儀軌一卷 大興善寺沙門〔一〕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有「不空譯」字。

16 金剛頂瑜伽金剛薩埵五秘密〔一〕脩〔二〕行念誦儀軌一卷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無「密」字。〔二〕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作「修」。

17 金剛頂勝初瑜伽經中略出大樂金剛薩埵念誦儀〔一〕一卷 大興善寺〔二〕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有「軌」字。〔二〕大正藏本、全書本無「大」以下字。

18 觀自在如意輪菩薩瑜伽法要一卷 金剛智譯〔一〕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無「譯」字。

19 如意輪菩薩真言注義一卷

【校勘記】個人藏本無此本。

20 金剛頂瑜伽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念誦法一卷

- 21 葉衣觀自在菩薩法一卷
- 22 大佛頂諸菩薩萬行品灌頂部錄出中印契別行法門一卷
- 23 阿闍如來念誦供養法一卷 不空金剛譯〔一〕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訊」。
- 24 已上十一〔一〕部一十卷同帙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作「一十」。
- 25 脩〔一〕真言三昧四時禮懺供養儀要一卷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作「修」。
- 26 金剛頂經〔一〕瑜伽十八會指歸一卷 大興善寺沙門〔二〕不空譯〔三〕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無「經」字。〔二〕大正藏本、全書本無「沙門」字。〔三〕個人藏本作「訊」。
- 27 佛頂尊勝陀〔一〕羅尼注義一卷 大興善寺沙門不空譯〔二〕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作「陀」。〔二〕個人藏本作「訊」。
- 28 最〔一〕上乘教授戒懺悔文一卷 大興善寺沙門不空譯〔二〕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最」。〔二〕個人藏本作「訊」。
- 29 大〔一〕元阿吒薄句無〔二〕邊甘露〔三〕降伏一切鬼神真言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太」。〔二〕個人藏本作「无」。〔三〕個人藏本作「呂」。
- 30 火〔一〕壇供養及供養十天法一卷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大」。
- 31 施焦面一切餓鬼食陀〔一〕羅尼法一卷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作「陀」。
- 32 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波羅密〔一〕多理趣釋〔二〕一卷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蜜」。〔二〕個人藏本作「穢」。

33 已上八部八卷同帙

34 梵漢兩字大毗〔一〕盧遮〔二〕那經字輪品悉曇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毘」。〔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舍」。

35 梵漢兩字金剛般若經二卷

36 梵漢兩字阿弥陁〔一〕經一卷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作「陀」。

37 梵漢兩字般若心經一卷

38 梵漢兩字最〔一〕勝無〔二〕垢清淨光明大陁〔三〕羅尼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最」。〔二〕個人藏本作「无」。〔三〕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作「陀」。

39 梵漢兩字不空羂索真言一卷

40 梵漢兩字青頸〔一〕大悲真言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口」，乃闕文。

41 梵漢兩字一切佛心真言一卷

42 梵漢兩字一切佛心中心真言一卷

43 梵漢兩字灌頂真言一卷

【校勘記】大正藏本、全書本無此本。

44 梵漢兩字灌頂真言〔一〕心中心真言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無「真言」字。

45 梵漢兩字結界真言一卷

46 梵漢兩字秘密心真言一卷

47 梵漢兩字秘密心中心真言一卷

48 梵漢兩字普賢行願讚一卷

49 梵漢兩字大佛頂根本讚一卷

50 梵漢兩字大佛頂結讚一卷

51 梵漢兩字大隨求大結讚一卷

【校勘記】大正藏本、全書本無此本。

52 梵漢兩字大隨求結讚一卷

53 梵漢兩字天龍八部讚一卷

54 梵漢兩字百字讚一卷

55 梵漢兩字送本尊歸本土讚一卷

56 梵漢兩字弥勒菩薩讚一卷

57 梵漢兩字慈氏菩薩讚一卷

58 梵漢兩字觀自在〔一〕菩薩讚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有「在」字。

59 梵漢兩字虛空藏菩薩讚一卷

60 梵漢兩字金剛藏菩薩讚一卷

61 梵漢兩字文殊師〔一〕菩薩讚一卷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無「師」字。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室利」。

62 梵漢兩字普賢菩薩讚一卷

63 梵漢兩字除蓋〔一〕障菩薩讚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蓋」。

64 梵漢兩字地藏菩薩讚一卷

65 梵漢兩字滿願讚一卷

66 梵漢兩字毗〔一〕盧遮〔二〕那佛神變加持經〔三〕吉〔四〕慶伽陁〔五〕讚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毘」。〔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舍」。〔三〕大正藏本、全書本作「結」。〔四〕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吉」。〔五〕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作「陀」。

67 梵漢兩字釋〔一〕迦如來涅槃後弥勒菩薩悲願讚一卷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穉」。

68 梵漢兩字金剛經論頌一卷

69 梵漢兩字法華廿〔一〕八品題目兼諸羅漢名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作「二十」。

70 已上三十〔一〕六部三十七卷同帙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卅」。

71 淨名經記五卷 一帙 無〔一〕量義寺文襲〔二〕述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无」。〔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龔」。

72 淨名集解開〔一〕中疏四卷 資聖〔二〕寺道液集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關」。〔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正」。

73 淨名經開〔一〕中疏釋微二卷 中條山沙門契真述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關」。

74 已上二部六卷同帙〔一〕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帖」。

75 法華經銷文略疏三卷 一帙 天長寺釋〔一〕迦〔二〕延秀集解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尺」。〔二〕大正藏本、全書本無「迦」字。

76 肇論略疏一卷 東山矩作

77 肇論抄三卷 牛頭山幽西寺惠〔一〕澄〔二〕撰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慧」。〔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證」。

78 肇論文句圖一卷 惠〔一〕澄〔二〕撰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慧」。〔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證」。

79 肇論略出要義兼注附焉并〔一〕序一卷 沙門雲〔二〕興撰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并」。〔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靈」。

80 已上四部六卷同帙

81 因明揉〔一〕抄三卷 章敬〔二〕寺擇隣述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揉」。〔二〕個人藏本作「教」。

82 因明義斷一卷 大雲苾芻沼述

83 因明入正理義纂要一卷 大神龍寺沼〔一〕集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口」，乃闕文。

84 已上三部五卷同帙

85 劫章頌一卷

86 劫章頌疏一卷 岑山沙門遍知集

87 劫章頌記一卷 沙門道詮述

88 劫章科文一卷

89 已上四部四卷同帙

90 智者大師修三昧常行法一卷

91 五方便念佛門一卷 智者大師〔一〕述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口」，乃闕文。

92 觀心遊心口決〔一〕記一卷 智顓述〔二〕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作「訣」。〔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智者」。

93 四十二字門〔一〕義一卷 南岳思大師〔二〕作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開」。〔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口」，乃闕文。

94 釋門自鏡錄五卷 僧惠〔一〕詳集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慧」。

95 觀心十二部經義一卷 天台頂述

96 形神不滅論一卷 靈溪〔一〕沙門海雲撰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漢」。

97 法花〔一〕三昧修證決〔二〕一卷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華」。〔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訣」。

98 天台智者大師所著經論章疏科目一卷

99 已上九部一十三卷同帙

100 鳩摩羅法師隨順修多羅四悉檀義不墮負〔一〕門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負墮」。

101 大般若經開〔一〕兼廿〔二〕九位法門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關」。〔二〕大正藏本作「二十」。

102 量處重輕〔一〕儀一卷 道宣絹〔二〕叙〔三〕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輕重」。〔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緝」。〔三〕大正藏本、全書本作「集」。

103 羯磨文一卷

104 略羯磨一卷 西大原寺懷〔一〕素撰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無「懷」字。

105 說罪要行法一卷 義淨三藏撰

106 諸天地獄壽量分限一卷 終南山宗叡撰

107 受菩薩戒文一卷

108 叡〔一〕上乘佛性歌一卷 沙門真覺〔二〕述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最」。〔二〕個人藏本作「寔」。

109 大乘楞伽正宗決〔一〕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無「決」字。

110 隋廬山遺愛寺慧〔一〕珎〔二〕禪師〔三〕念佛三昧指歸一卷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惠」。〔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珍」。

〔三〕大正藏本、全書本無「禪師」字。

111 梵語雜名一卷

112 四條式并〔一〕大小乘戒決〔二〕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并」。〔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訣」。

113 已上一十三部一十三卷同帙

114 南岳思禪師法門傳二卷 衛尉承〔一〕杜拙撰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丞」。

115 天台大師答陳宣〔一〕帝書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宜」。

116 天台略〔一〕錄一卷

【校勘記】〔一〕全書本作「畧」。

117 智者塚〔一〕松讚一卷 頂禪師〔二〕撰〔三〕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極」。大正藏本作「□」。全書本作「塚」。〔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乃闕文。〔三〕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述」。

118 天台智者大師十二所道場〔一〕記一卷 灌頂述〔二〕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場」。〔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汀述」。

119 法花〔一〕靈驗傳二〔二〕卷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華」。〔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一」。

120 感通傳一卷

121 清涼山略〔一〕傳一卷

【校勘記】〔一〕全書本作「畧」。

122 已上八部一十卷同帙

123 大唐韶〔一〕州雙岑〔二〕山曹溪寶林傳十卷 一帙 會稽沙門雲〔三〕
徹字明泳〔四〕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部」。〔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峯」。〔三〕大正藏本、全書本作「靈」。〔四〕大正藏本、全書本有「序」字。

124 上都清禪寺〔一〕至演禪師鍾傳一卷 大理牛肅与僧至演同叙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師」。

125 南荊州〔一〕沙門無〔二〕行在天竺國致於唐國書〔三〕一卷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洲」。大正藏本、全書本無「州」字。〔二〕個人藏本作「无」。〔三〕個人藏本作「畫」。大正藏本、全書本無「書」字。

126 內供奉談筵法師歎齊格并〔一〕文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并」。

127 集新舊齊文五卷 上都雲花寺泳字太

128 觀法師奉答皇太子所問諸經了義并錢一卷

【校勘記】大正藏本、全書本作「上都雲華寺泳字大觀法師奉答皇太子所問諸經了義竝牋一卷」。

129 歎道俗德文三卷

130 已上八部一十二卷同帙

131 揚州〔一〕東大雲寺演和上碑并〔二〕序一卷 李邕撰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洲」。〔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并」。

132 唐故大廣禪師大和〔一〕楞伽峯〔二〕塔碑銘〔三〕并〔四〕序一卷
陸亘撰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有「上」字。〔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岑」。〔三〕大正藏本、全書本無「銘」字。〔四〕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并」。

133 唐〔一〕故大律師釋道圓〔二〕山龕〔三〕碑并〔四〕序一卷 李邕撰

【校勘記】〔一〕全書本作「口」，乃闕文。〔二〕個人藏本作「円」。〔三〕大正藏本、全書本作「龕」。〔四〕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并」。

134 大唐大慈恩寺翻經大德〔一〕基法〔二〕墓誌銘并〔三〕序一卷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德」。〔二〕個人藏本有「墓法」字。大正藏本、全書本有「師」字。〔三〕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并」。

135 大慈恩寺大法師基公塔銘并〔一〕序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并」。

136 唐故終南山靈感寺大律師道宣行記一卷

137 大唐西明寺故大德〔一〕道宣律師讚一卷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德」。

138 天台大師答陳宣帝書一卷

139 已上九部九卷同帙

140 大唐新修定公卿士庶內族吉〔一〕凶書儀卅〔二〕卷 鄭餘慶重修定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吉」。〔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一」。

141 開元詩格一卷 徐隱〔一〕秦〔二〕字簫〔三〕然撰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隱」。〔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秦」。〔三〕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肅」。

142 裙〔一〕對義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祇」。

143 判一百條一卷 駱賓王撰

144 祝元膺詩集一卷

145 杭越寄和詩集并〔一〕序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并」。

146 詩集五卷

147 法花〔一〕廿〔二〕八品七言詩〔三〕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華」。〔二〕大正藏本作「二十」。〔三〕大正藏本、全書本有「集」字。

148 已上一十二部四十一卷同帙

149 大毗〔一〕盧遮那大悲胎〔二〕藏大曼荼羅一鋪 五幅 白畫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毘」。〔二〕個人藏本作「台」。

150 金剛界大曼荼羅一鋪 七幅〔一〕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福」。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帙」。

151 供養賢聖等七種壇樣〔一〕一卷

〔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樣」。

152 十七壇樣〔一〕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樣」。

153 金剛界三十〔一〕七尊種子曼荼羅樣〔二〕一張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卍」。〔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樣」。

154 金剛界八十一尊種子曼荼羅樣〔一〕一張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樣」。

155 法花〔一〕曼荼羅樣〔二〕一張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華」。〔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樣」。

156 胎藏曼荼羅手印樣〔一〕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樣」。

157 南岳思大師示先生骨影一鋪 三〔一〕幅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一」。

158 天台大師感得聖僧影一鋪 三幅

【校勘記】大正藏本、全書本無此本。

159 阿蘭若比丘見空中普賢影一張

160 法惠〔一〕和上〔二〕閻王前誦法花〔三〕影一張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慧」。〔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尚」。〔三〕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華」。

161 山登禪師誦法花〔一〕感金銀殿影一張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華」。

162 惠〔一〕滅禪師誦法花〔二〕神人來拜影一張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慧」。〔二〕個人藏本、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華」。

163 膜〔一〕禪師誦法花〔二〕善神來聽〔三〕經影一張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映」。〔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華」。〔三〕個人藏本作「聽」。

164 定禪師誦法花〔一〕天童給事影一張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華」。

165 惠〔一〕向禪師誦法花〔二〕滅後墓上生蓮花〔二〕及墓裏常有誦〔三〕經聲影一卷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慧」。〔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華」。〔三〕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誦有」。

166 秦郡老僧教弟子感夢示宿因影一張

167 道超禪師〔一〕誦法花〔二〕感二世弟子生處影一張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無「師」字。〔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華」。

168 法惠〔一〕禪師誦法花〔二〕口放〔三〕光照室宇影一張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慧」。〔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華」。〔三〕個人藏本作「張」。

169 大聖僧伽和尚影一張〔一〕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卷」。

170 舍利五粒

171 三粒〔一〕菩薩舍利 盛瑠璃〔二〕小瓶〔三〕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無「粒」字。〔二〕個人藏本作「玉玉」。〔三〕此下、大正藏、全書本有「子」字。

172 二粒〔一〕支佛舍利 盛白蠟〔二〕小合子 並〔三〕納白石壺子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無「粒」字。〔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蠟」。〔三〕個人藏本作「并」。大正藏本、全書本作「竝」。

173 前〔一〕件法門等，圓〔二〕仁，去承和五年八月到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右」。〔二〕個人藏本作「円」。

- 174 大唐揚州〔一〕大都督府，巡歷城內諸寺，寫取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洲」。
- 175 如前。爰有〔一〕終南山 宗叡和尚學逮〔二〕先達，悟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無「有」字。〔二〕大正藏本、全書本作「邁」。
- 176 究幽致，能解梵漢之語〔一〕、妙閑悉曇之音。為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無「之語」字。
- 177 向西天辭舊到府〔一〕，圓〔二〕仁幸得偶謁，受學梵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無「府」字。〔二〕個人藏本作「円」。
- 178 天悉曇，兼習梵漢之語。又逢大唐內供奉
- 179 弘〔一〕阿闍梨付法弟子 全雅阿闍梨，諮稟秘法，
【校勘記】〔一〕個人藏本作「和」。
- 180 和尚感乎遠誠，付以秘要，遂乃囑授念誦法門，
- 181 并〔一〕胎〔二〕藏金剛兩部曼荼羅諸壇樣〔三〕等。其後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并」。〔二〕個人藏本作「台」。〔三〕大正藏本、全書本作「樣」。
- 182 擬向〔一〕天台，為行路遼遠往還失時，有〔二〕 勅不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問」。〔二〕此下，個人藏本有「之」字。
- 183 許發赴，慨悵難及。所求法門雖未備足，且
- 184 錄卷秩〔一〕勘定如件。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全書本作「帙」。
- 185 大唐開成四年歲次己未四月廿〔一〕日天台宗請益傳燈〔二〕法師位
〔三〕円仁錄

《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校理

【校勘記】〔一〕大正藏本作「二十」。〔二〕個人藏本有「大」字。
〔三〕個人藏本無「位」字。

(末頁)「嘉保二年七月十六日於南陽御房書了」

「以前唐院之本寫得也」

【校勘記】個人藏本作「嘉保二年七月十六日於南陽御房書了。以前唐院之本寫得也云。保安四年七月廿九日於防門殿南亭寫了。一乘房御本也。求法勤息目貝」。

附記：

本文為 2014 年度一般財團法人佛教學術振興會《SAT 大藏經數據庫》學術研究部門的研究成果一部分。

百年來王黃之亂研究綜述

(附：王黃之亂學術史編年錄)

胡耀飛^{*}

提要

王仙芝、黃巢之亂(本文簡稱“王黃之亂”)是唐末一次波及甚廣的社會動盪，學界對此也有十分豐富的研究。不過隨著對“農民起義”或“農民戰爭”歷史的興趣下降，已經很少有學者再關注。但惟其如此，才為我們重新平靜地審視這一動亂帶來了契機。對此，需要首先綜述相關學術史，方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因此，本文目標即全面梳理近百年間的王黃之亂學術史，按時間和地域分 1949 年以前、1949 年以後的大陸、1949 年以後的港臺和海外四大內容。為配合文中的敘述，末附王黃之亂學術史編年錄，按年份編排所有直接關於王黃之亂的論著目錄。

一、1949 年以前

*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晚清以來，受惠於西方社會科學思想的傳入，各種精彩紛呈的理論愈來愈多地指導著歷史研究。而對於王黃之亂的研究來說，因涉及到唐末社會大動盪，故而多得經濟史家、社會史家的關注。如董家遵（1910-1973）於1933年發表的《唐末經濟恐慌與農民》，可以說是第一篇涉及唐末的近現代學術論文。¹李文治（1909-2000）於1935年發表的《黃巢暴動的社會背景》，則在經濟史之外，進入社會史研究領域。²另有羅伯昭（1899-1976）於1936年發表的《大齊通寶考》，證偽了黃齊政權曾經鑄錢之事。³此外，還有于鶴年（?-1949）《唐五代藩鎮解說》、羅香林（1906-1978）《唐代黃巢變亂與寧化石壁村》和王璞《論黃巢》等文章，也涉及到王黃之亂。⁴

單篇論文之外，學者多於著述中涉及王黃之亂。如吳廷燮（1865-1947）《唐方鎮年表》、錢穆（1895-1990）《國史大綱》等等。其中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尚屬於史料考訂類型的清儒樸學。⁵而錢穆《國史大綱》則屬於新時代的通史，其脫胎於1933年在北京大學開設中國通史課程的講稿，至1940年在商務印書館問世。⁶不過錢穆對於唐末五代的看法受其固有觀念之影響，認為這是一個“黑暗時代”，對於王仙芝、黃巢、秦宗權具體行事並不著詳細筆墨，甚至間或有誤。⁷

另外要特別提及的是對《秦婦吟》的研究。這雖然廣義上屬於敦煌學領域，因為《秦婦吟》發現於敦煌藏經洞。但因內容涉及王黃之亂時期的兩京社會，故學界對《秦婦吟》的研究不免涉及王黃之亂。在這方面，民國時期的研究開了風氣之先，此後直到八十年代，方有繼續關注。而綜觀民國時期

¹ 董家遵：《唐末經濟恐慌與農民》，《現代史學》，第1卷第3、4期，1933年。

² 李文治：《黃巢暴動的社會背景》，《師大月刊》，第22期，北平師範大學，1935年。

³ 羅伯昭：《大齊通寶考》，《古泉學》，第1卷第2期，1936年。

⁴ 于鶴年：《唐五代藩鎮解說》，《大公報史地周刊》，第25期，1935年3月8日；羅香林：《唐代黃巢變亂與寧化石壁村》，《說文月刊》，1944年6月；王璞：《論黃巢》，（重慶）《人物雜誌》，第10期，1946年。

⁵ 吳廷燮：《唐方鎮年表》（三冊），中華書局，1980年。

⁶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國史大綱出版說明》，載《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7冊，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第1-6頁。

⁷ 如把王仙芝之死說成“王鐸斬之於亳州”，把黃巢入潼關時的人數寫作“六十萬”等，見錢穆：《國史大綱》，《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7冊，第552-553頁。

的研究，多圍繞《秦婦吟》的文本進行校箋和考證。最早是王國維（1877-1927）的系統關注。⁸隨後是陳寅恪（1890-1969），他於1936年發表《讀〈秦婦吟〉》，並於1940年增補後在昆明自印了《〈秦婦吟〉校箋》單行本。⁹此後馮友蘭（1895-1990）《讀〈秦婦吟校箋〉》對陳文進行評議。¹⁰另一位專門研究《秦婦吟》的是徐嘉瑞（1895-1977），他的《〈秦婦吟〉本事》，亦引來周一良（1913-2001）的評議。¹¹陳寅恪又在1950年發表了《〈秦婦吟校箋〉舊稿補正》，是為其生前發表的對《秦婦吟》的最後一篇公開文字。陳寅恪對《秦婦吟校箋》雖續有訂補，但在1980年出版的《寒柳堂集》中收錄《韋莊〈秦婦吟〉校箋》時，已經再也看不到付梓了。¹²

總體而言，民國學人的研究成果並不多，除了對《秦婦吟》的關注較為深入外，其他與王黃之亂的議題多淺嘗輒止。

二、1949年以來的大陸

（一）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時期的大陸

關於1949年以來大陸對農民戰爭史的研究，1962年曾由三聯書店出版過一本《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討論集》，匯集了當時成為“五朵金花”之一的農民戰爭問題的討論文章。不過其中收錄的偏重理論，並未收入專門針對“黃巢起義”者。書末所附《報刊論文目錄》（1950年4月-1961年6月）

⁸ 王國維：《韋莊的〈秦婦吟〉》，《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1卷第4號，1923年12月。

⁹ 陳寅恪：《讀〈秦婦吟〉》，《清華學報》，第11卷第4期，1936年；陳寅恪：《〈秦婦吟〉校箋》，自印，1940年。

¹⁰ 馮友蘭：《讀〈秦婦吟校箋〉》，《國文月刊》，第1卷第8期，1941年。

¹¹ 徐嘉瑞：《〈秦婦吟〉本事》，《國文月刊》，第27期，1944年；周一良：《〈秦婦吟本事〉（徐嘉瑞著）》，《清華學報》，第15卷第1期，1948年10月；收入氏著《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

¹² 陳寅恪：《〈秦婦吟校箋〉舊稿補正》，《嶺南學報》，第10卷第2期，1950年。陳寅恪：《韋莊〈秦婦吟〉校箋》，氏著《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再版，三聯書店，2001年，第122-156頁。筆者參考後者。

倒是頗具檢索之效。¹³進入 21 世紀，又有一些宏觀的總結和反思，比如岑大利、劉悅斌《中國農民戰爭史論辯》和臧知非《生存與抗爭的詮釋——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¹⁴，但具體涉及不多，更未能專門針對王黃之亂的研究史予以梳理。因此，尚需全面梳理。此處先對五六十年代的情況予以整理（以下所涉及的大陸、日本學者具體研究王黃之亂的論文，為節省篇幅，以作者名加括號出版年為標識方式，具體篇名和刊物信息詳見參考文獻《王黃之亂學術史編年錄》）：

1949 年以後最早關注王黃之亂的，要數 1950 年出版的翁大草的《黃巢論》。在此書中，翁大草已經視王黃之亂為農民起義。¹⁵此後，周連寬《唐高駢鎮淮事蹟考》（1951）、《皮日休的生平及其著作》（1952）就高駢鎮淮事跡和皮日休的生平予以探討。林巖《黃巢起義究竟是為什麼？》（1952）關注了黃巢起義原因，何林天《怎樣認識有關黃巢和義和團起義的兩個錯誤流傳問題》（1954）關注了有關黃巢起義的錯誤流傳。鄧廣銘《試談唐末農民起義》（1952）、顧友光（顧德輝）《黃巢起義》（1953）¹⁶、王丹岑《唐代農民起義》（1953）、楊志玖《黃巢大起義》（1954）先後從整體上關注了黃巢起義。

從 1955 年開始，對於王黃之亂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更加細節化的階段，除了探討相對集中或稍具普及性的任傑《中國農民革命史話》（1956）、趙儷生《王仙芝和黃巢》（1956）、岑仲勉《隋唐史》（1957）、寧可《黃巢起義》（1959）以及林燁卿《黃巢》（1962）等書，以及楊志玖（1958）等文外，探討具體問題單篇論文的話題大致圍繞王仙芝、黃巢“起義”的時間、

¹³ 史紹賓編：《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討論集》，三聯書店，1962 年。“史紹賓”非人名，而是尹達（1906-1983）組織的一個寫作小組，取“史學界一哨兵”之諧音。

¹⁴ 岑大利、劉悅斌：《中國農民戰爭史論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4 年；臧知非：《生存與抗爭的詮釋——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9 年。

¹⁵ 翁大草：《黃巢論》，商務印書館，1950 年；再版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51 年。本文參考後者。關於本書，有宣非（1952）書評一篇。

¹⁶ 顧德輝為顧頡剛之子，1949 年後在“愛國主義通俗歷史故事叢書”中以“顧友光”為筆名出版過《黃巢起義》，筆者購得一冊大中國圖書局 1953 年出版的第七版《黃巢起義》，惜不知其第一版何年所出，姑以 1953 年繫之。

百年來王黃之亂研究綜述

地點，起義經過，戰死時間、地點¹⁷，是否投降¹⁸，以及“起義”的特點、性質¹⁹、經濟²⁰、意義、影響²¹等問題，和對一些人物的評價問題。²²這些研究除了具有意識形態色彩之外，對王黃之亂本身的歷史研究，具有很好的先導作用，也是後人進一步關注的前提。

文革時期，社會環境的混亂導致了學術研究的停滯。相關文章寥寥，僅有譚紹鵬（1971）討論到黃巢的下落問題，陳光崇（1973）討論到黃巢起義的反佛問題，周寶珠（1974）討論到黃巢起義的“均平”要求與反儒鬪爭。此外，也有華史斌（1972）、陳光崇（1976）泛論黃巢起義的過程。這些皆為響應上層政治風向之作，或不得已而為之之作。

（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大陸

文革之後，比較客觀的學術研究再次興起。對於1980年代的唐末農民戰爭，羅春雄（1990）的綜述頗能反映那個年代的相關研究進度。但此文僅四頁不到，留給唐末農民戰爭的篇幅較少，故對很多研究論著有遺漏。但此文從人物評價、起義原因、失敗原因、歷史意義、考辨等方面來梳理有關農民戰爭的學術史，亦不失為很好的角度。

故經過筆者梳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至今對於王黃之亂的研究，大致可細分為以下各種角度：起義原因²³、行軍路線²⁴、軍事戰略²⁵、失敗原因²⁶、

¹⁷ 有楊志玖（1955）、韓國磐（1956）、王興亞（1957）、徐俊鳴（1961）、王永興（1962）等文章，以及岑仲勉《隋唐史》（1957）針對王丹岑《中國農民革命史話》（1952）的一些錯誤而對行軍路線進行的相關考證，主要在第460-512頁。

¹⁸ 有吳澤、袁英光（1961A、1961B）兩文，以及徐德麟（1961）、胡如雷（1962）、寧可（1962）、吳節（1962）、徐德麟（1963）等文章。

¹⁹ 有李燕光（1955）、吳雁南（1959）、侯外廬（1964）等文章。

²⁰ 有孫達人（1961）、賴家度（1964）等文章。

²¹ 有尹湘豪（1956）、趙麗生（1956A）、胡如雷（1963）等文章。

²² 這方面有傅衣凌（1959）、胡如雷（1959）、尚友（1959）、周寶珠（1960）對朱溫的評價文章，嘉滄（1961）對張全義的評價文章，武慰萱（1962）對尚讓的研究文章。

²³ 有周荔（1986）、韓鼎洛（1995）、余桂元（1996）等論文。

²⁴ 有王永興（1978）、方積六（1980）、魏嵩山（1982）、張志康（1982）、鄭廣南（1984）、郭在忠（1985）、徐俊鳴（1987）、徐映璞（1988）、郭在忠、黃明光（1989）、曾祥委（1999）、陳習剛（2001）、朱子彥（2001）等論文。

黃巢下落²⁷、投降問題²⁸、政權性質²⁹、經濟訴求³⁰、歷史影響³¹、時地考辨³²、唐廷動向³³、文物古蹟³⁴等等。此外，對相關人物研究亦有不少，比

²⁵ 有白天（1978）、諸葛計（1980）、吳如嵩（1982）、賈乃謙（1988）、趙國慶·董建石（1999）、歐安欣（2005）、蔡海生（2007）等論文。

²⁶ 有張道貴·顧吉辰（1979）、徐明德（1983）、王大華（1985）、戈春源（1986）等論文。

²⁷ 有杞愚（1979）、施寶義（1981）、李希泌（1982）、傅永聚（1986）、周荔（1986）、陳耀東（1988）、崔同凡·賈鐵山（1988）、崔憲濤（2000）、李曉光·張令河（2001）、張劍光（2005B）、沈淦（2006）、楊陽（2008）等論文。

²⁸ 王永興（1978）、陸楓（1979）、寧可（1979）關注了尚讓的投降問題，張志康（1979B）、楊善群（1980）、戈春源（1982）、滕新才（2002）關注了黃巢的乞降問題，張劍光（2005A）、劉傑（2010）關注了王仙芝受降問題。

²⁹ 有俞兆鵬（1980）、衛文選（1981）、江民繁（1981）、衛文選（1982）、武伯綸（1987）、江連山（2001）、江連山·孫連城（2002）等論文。

³⁰ 有宋家鈺（1978）、趙偉明（1979）、劉美崧（1981）、唐森（1981）、王大華（1982）、吳宗國（1984）、董興振（1987）、謝忠明·江湧（1989）、丁柏傳（2002）等論文。

³¹ 有傅宗文（1979）、何應忠（1980）、周世範（1984）、徐明德（1985）、俞兆鵬（2000）、胡一華（2001）、史式（2004）、蔡海生（2008）、張冠凱（2014）等論文。

³² 陳耀東（1980）、臧嶸（1982A）、顧吉辰（1983）、周荔（1986）、劉傑（2010）關注了王仙芝、黃巢起義時間，王大華（1980）考察了王仙芝沂州之敗時間，又（1987）考察了王仙芝攻蘄州的時間，王永興（1978）考察了宜君砦之役的時間，李希泌（1982）、周荔（1986）唐廷收復長安的日期，戈春源（1984）考察了王鐸守潼關問題，馬世之（1987）考察了查牙山會師問題，關治中（1993、1994A、1994B、1994C、1995、1996）一系列文章考察了黃齊政權在關中的各場戰役地點，錢鎮國（1994）、朱馥生（1998）、楊一平（2005）考察了黃巢與錢鏐之間的交鋒。

³³ 方積六（1981）考察了唐廷鎮壓的領兵統帥，梁中效（1995）、張景平（2005）考察了唐僖宗奔蜀，賈艷紅（2001）考察了沙陀騎兵在鎮壓王黃之亂中的作用，潘書英（2011）考察了唐廷對王黃之亂的態度。

³⁴ 王士倫（1976）、韓尚勇（1986）、邱文彬（1998）考察了仙霞嶺遺跡，山西師院政史系“黃巢起義”研究小組（1978）考察了泰山地區關於黃巢最終下落的遺跡，楊新（1978）、諸葛計（1981）注意到敦煌文獻中關於黃巢的記載，臧嶸（1982B）、方積六（1983）證偽了《平巢事蹟考》，陳全芳（1983）討論到相關的兩方墓誌，秦珠（1983）亦注意到盧峻墓誌的價值，陳景富主編的《興教寺玄奘靈塔耀古今——“黃巢發塔”真偽辨學術文集》（2004）討論了黃巢是否發興教寺塔的問題，王廣峰（2006）考察了鳳嘴堆遺跡。

百年來王黃之亂研究綜述

如皮日休³⁵、韋莊及其《秦婦吟》一詩³⁶、高駢³⁷、張全義³⁸、朱溫³⁹、鄭畋⁴⁰、趙犖⁴¹等人。在這些相關的具體研究之外，還有一些形成專書的綜合性關注，主要有胡如雷《唐末農民戰爭》（1979）、謝天佑·簡修煒（1981）、趙國華《黃巢》（1982）、俞兆鵬《黃巢起義史》（1982）、方積六《黃巢起義考》（1983）、諸葛計《唐末農民戰爭戰略初探》（1985）、李斌城主編《中國農民戰爭史·隋唐五代十國卷》（1988）等學術性著作，以及馬世之《黃巢起義的故事》（1979）等通俗性作品。

以上這些論著，基本上把王黃之亂的方方面面都考慮到了。特別是以方積六的《黃巢起義考》為代表的論著詳細地考訂了王仙芝、黃巢的行軍路線和戰役時間、地點問題，為後人的進一步整理基本史料提供了較高的起點。相關社會、經濟層面的研究也已經在有限的材料下，得到了充分深入。

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在已經窮盡資料的情況下，對黃巢起義的關注日漸冷清。但農戰史學界曾一度想挽回昔日的風光，還特別於1997年

³⁵ 對此，申寶昆（1985）、李妍（2006）、張麗（2006）已有相關綜述。就其與黃巢的關係而言，有張志康（1979A）、賴家度（1982）、吳松泉（1982）、沈開生（1983）、袁宏軒（1985）、趙熙文（1985）、李慶年（1987）、陳耀東（1990）、吳松泉（1992）、正達（1993）、李福標（1999）、劉偉·高慎濤（2003）、王輝斌（2005）、張劍光（2005C）、徐連達（2012）等論文。

³⁶ 對此，張學松（2000）、張美麗（2008）、楊亞瓊（2014）已有綜述。具體研究方面，有黃廣生（1979）、王水照（1980）、宋遂良（1981）、金性堯（1985）、秦方瑜（1985）、張天健（1985）、高國藩（1987）、牖人（1987）、周嘯天（1987）、黃永年（1988）、馬新（1988）、韓雲波（1993）、張學松（2001）、方寧（2002）、唐韻（2002）、劉波（2006）、張學松（2006A·B）、楊福俊（2007）、吳淑玲（2008）、薛茜（2009）、黃永年（2000A、2000B）、肖偉義（2010）、曾思藝（2010）、張美麗（2010）、盧英宏（2011）、曾歡歡（2013）、田衛衛（2014A、2014B、2015A、2015B、2015C）等論文。

³⁷ 有周荔（1986）、李夢芝（1990）、孫永如（1990）、李烈輝（1991）、杜來梭（1995）、蔣長棟（1995）、田廷柱（1996）、汪俊（2003）、張卉（2007）、陳志堅（2008）等論文。

³⁸ 有諸葛計（1983）一文。

³⁹ 有梁太濟（1995）、李志文（2008）、陳忱（2009）等論文。

⁴⁰ 有陳明光（1997）、曠天全（2003）等論文。

⁴¹ 有陳習剛（2003、2006）的關注。

11月3-6日在黃巢戰歿地山東省萊蕪市舉辦了“黃巢起義 1122 週年學術討論會”。這樣一個紀念時間，並非一般研討會取整數週年的紀念，一方面顯示出其臨時性，另一方面也可能有現實的地方經濟利益摻雜其中。不過能夠舉辦這樣的研討會，也表明學界並未忘記“黃巢起義”問題。⁴²

新世紀以來，日趨熱門的是晚唐藩鎮研究和對原來較為冷門的五代十國史的關注。在這兩個領域，雖也涉及到王黃之亂，但畢竟不多，亦不專門。唯何燦浩《唐末政治變化研究》一書對王黃之亂到唐亡的歷史予以專門關注，其中不乏精當觀點。⁴³具體到王黃之亂本身的研究並不多，唯有王永興《討伐王仙芝、黃巢之亂的十年戰役》（2006）、胡可先《黃巢起義與唐末哀歌》（2007）、孫欽禮《黃巢傳》（2012）、李兵《從黃巢起義看晚唐政局》（2012）、榮海生《史話黃巢》（2013）等專門涉及，但論述皆較淺顯，相比於二十世紀五六十、八九十年代的精細研究，並無重要突破。

以上是直接與王黃之亂相關的研究，至於在晚唐藩鎮和五代十國史研究中涉及黃巢的部分，因相關論著數量頗大，且非專門研究，此處不再具列。

三、1949 年後的港台

（一）香港

受到大陸氛圍影響，香港對於農民起義史研究也有諸多關注。特別是 1978 年由存粹學社編輯的 1962 年至 1966 年 2 月期間大陸報刊發表的與農民戰爭史有關的論文合集《中國農民戰爭問題討論集》，是為香港學界對大陸學術動向予以關注的直接體現。⁴⁴從《出版說明》可知，此書是繼大陸 1962 年所出《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討論集》之後的論文合集，目的在於“供研治中國史學者之參考”。然而從入選文章來看，頗能體會香港學者所持客觀立場。正如《出版說明》中所說：“解放以來，國內歷史學者，以社會主

⁴² 曾振宇：《黃巢起義 1122 週年學術討論會述評》，《文史哲》，1998 年第 2 期。

⁴³ 何燦浩：《唐末政治變化研究》，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 年。

⁴⁴ 存粹學社編集，周康燮主編：《中國農民戰爭問題討論集》，大東圖書公司，1978 年。

百年來王黃之亂研究綜述

義觀點，對歷代平民反抗封建政權之戰爭，為一種有組織之農民革命運動。陳涉、吳廣，固躋於革命英雄之林，張角、黃巢、李白成、張獻忠，亦得豫革命健兒之選。祇以操守有殊，目的有異，取捨判斷，驟難可期。”⁴⁵

具體到黃巢研究方面，香港學者對王黃之亂的研究不多。張慕潔在《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年刊》上寫過一篇《黃巢造反？逼反黃巢》（1968-1969），惜未能得見其原文，不過從題目來看，當抱持唐廷逼反黃巢的看法，即對黃巢報以同情心。又有一篇周啟學的《試論王黃之亂》（1974）發表於香港的《史地》雜誌，亦未能見其全文。⁴⁶

更全面的專題研究僅有吳法《黃巢傳》一書。吳法真名高朗，是香港《大公報》編輯。此書初版於1974年香港文教出版社，1990年在臺北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再版。雖屬人物傳記，很多段落加入了作者在史料基礎上的渲染，並不能看作專題研究，但依然能反映吳法對王黃之亂的觀點。綜觀此書，吳法對黃巢本人抱有同情，視之為農民起義，對於王黃之亂所造成的社會變遷也予客觀分析。在《黃巢傳》之末，另附作者《唐朝詩人皮日休》一文和《黃巢年表》一份。前者主要以皮日休詩文來論證皮日休本人對農民的同情，對人君假仁假義的揭露，故大約在黃巢從廣州北上進攻揚州時加入黃巢集團。並認為皮日休未被黃巢所殺，甚至根據“南徐陵寢嘆齊梁”句，認為皮日休活到了南唐徐知誥時期。不過此處“南徐”實指南徐州，因南朝蕭齊、蕭梁兩朝陵寢在南徐州境內，故在南徐陵寢嘆齊梁王朝之促。⁴⁷何況南唐立國後徐知誥改名李昇，不可能有“南徐”的說法。⁴⁸無論如何，吳法對黃巢的同情，雖受大陸學者影響，也是那一個年代學術氛圍的反映。

⁴⁵ 大東圖書公司：《出版說明》，《中國農民戰爭問題討論集》，第1頁。

⁴⁶ 周啟學：《試論王黃之亂》，（香港）《史地》第4、5期，1974年。

⁴⁷ 蕭齊、蕭梁的陵寢方位大多在武進、丹陽等地，即南徐州所僑治的地方。參見羅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59-64頁；胡阿祥：《宋書州郡志匯釋》“南徐州刺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4-42頁。

⁴⁸ 關於李昇所出自的徐氏家族，參見胡耀飛：《世系·命運·信仰：唐末五代東海徐氏家族三題》，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13輯，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116-137頁。

此外，則在一些其他研究中附見，如八十年代香港大學章群所著《唐代蕃將研究》即用一節篇幅關注了李國昌父子作為蕃將在唐帝國的活動。⁴⁹

（二）臺灣

台灣學者對王黃之亂的研究不算很多，卻很重要，可分三階段概括：

第一階段，當以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1969）的出版為代表，此書對於唐後期藩鎮與中央之關係的研究，至今仍是重要的著作。雖然此書並不涉及王黃之亂本身，但對認識王黃之亂前後唐代藩鎮和中央之間相互態度，作者專門辟出第八章《中央之策略措施與藩鎮對中央態度的關係》來討論。另外，余衍福《唐代藩鎮之亂》（1980）以敘述史的筆調就唐後期五代的藩鎮進行全景式關注，其中也涉及到王黃之亂。不過此書在研究深度方面未能超越王壽南之著，只能就史料梳理方面稍作參考。王壽南尚在國際漢學會議上宣讀了《唐末變亂之分析》（1986）一文，惜未能得到此文原件，不知是否來自其早年的著作。在這一階段，還有一些零星論文具體涉及到王黃之亂，如王止峻（1970A、1970B）曾從復興文化的角度談到了王黃之亂；陳侃（1974）考察了閩南地區關於黃巢的民間傳說；張榮芳（1977）討論了王黃之亂對唐廷所倚仗的東南財賦之地所產生的破壞。

第二階段，以黃清連 1988-1993 年間發表的五篇論文為代表，包括：《為“唐人書黃巢之亂記事墨跡”定位》（1988）、《高駢縱巢渡淮——唐代藩鎮對黃巢叛亂的態度研究之一》（1990）、《宋威與王、黃之亂——唐代藩鎮對黃巢叛亂的態度研究之二》（1992A）、《楊復光〈收復京城奏捷露布〉考》（1992B）、《王鐸與晚唐政局——以討伐黃巢之亂為中心》（1993）。黃清連的研究，1988、1992B 主要是文獻考辨，兼及對參與鎮壓的藩鎮的考察；1990、1992A、1993 則是討論唐代藩鎮和朝臣對王黃之亂的態度。相比於王壽南的研究，黃清連對王黃之亂的研究無疑更加深入，因涉及到參與鎮壓的藩鎮之間的矛盾問題。黃清連的研究可以作為臺灣對王黃之亂研究的第二個高峰，但黃氏本人並未進一步形成專著，專門探討此事。故在他之後，對於王黃之亂的研究依然十分零散，學界在晚唐五代史領域的注意力大多關注唐宋變革期和藩鎮研究。

⁴⁹ 章群：《李國昌父子》，氏著《唐代蕃將研究》，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第324-341頁。此書為作者在1984年提交香港大學的博士論文《唐代蕃將考》基礎上修改而成。

百年來王黃之亂研究綜述

第三階段，涉及王黃之亂的研究主要以學位論文為主。陳奕亨《唐五代河南道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2005）第五章第二節討論了王黃之亂時期的河南道。李錦昌《國變的陰影——唐末詩人面對世亂國亡之作品試探》（2008）第二章討論了王黃之亂前後詩人的行跡和心跡。王祿雄《從軍事角度論關係唐朝國家安全的幾次戰爭》（2008）第六章第三節討論了黃巢之亂，並認為是國家安全的內部終結，不過論述較為簡略。黃英士《沙陀與晚唐政局》（2010）第三章第五節討論了沙陀入關救援之事。林至軒《從能臣到叛臣——高駢與唐末政局研究》（2013）第四章討論了高駢在淮南節度使任上對“剿撫順叛”的抉擇。這些論文還只是部分涉及，最直接相關的要數潘子正《唐僖宗朝前期（873-880）的政治角力分析》（2013）一文。雖然此文前兩章是對宦官干政和皇位傳承的再檢討，但後三章基本針對唐僖宗朝前期的政局，其中第三章梳理了乾符年間的宰相人事，第四章梳理了乾符年間的“鄭盧黨爭”，第五章則探討了黨爭環境下王黃之亂的問題。

四、海外

海外的研究方面，以日本和歐美學界最多。日本學界的情況，山根幸夫編有一本《中國農民起義文獻目錄》（1976），惜筆者尚無緣寓目。但根據伊藤宏明所編《唐五代民衆叛亂史關係研究文獻目錄》（2008）和增訂版（2011），依然能夠得到較全面的認識。不過這也僅僅是提供了一份目錄而已。歐美學界方面，雖有王宏杰整理《五代研究外文文獻目錄》（*A Bibliography of Five Dynasties Studies in Western Languages*）一份，其中專辟“晚唐研究”一節，但並未搜羅到直接涉及王黃之亂的個案研究。⁵⁰故以下主要依照筆者的理解，分別整理日本、歐洲、美國學界相關研究現狀。

（一）日本學者

⁵⁰ 王宏杰整理：《五代研究外文文獻目錄》（*A Bibliography of Five Dynasties Studies in Western Languages*），未刊稿，筆者所參考為作者所賜電子文本，更新於2011年4月15日。

日本學者最早涉及到的，或當以石橋五郎（1876-1946）和桑原鷺藏（1871-1931）為主，他們先後研究到阿拉伯人對黃巢在廣州活動的記載。其中石橋五郎所撰《唐宋時代の支那沿海貿易並貿易港に就いて》（1901）一文對唐宋時期中國的沿海貿易和港口進行了梳理，自然也涉及到唐末阿拉伯人在廣州的活動。桑原鷺藏則在《カンフウ問題殊にその陷落年代に就いて》（1919）一文中特別討論了被阿拉伯人 Abū Zaid 記載為 Khānfū（日文片假名作：カンフウ）的這個城市的陷落年代問題。雖然石橋氏和桑原氏都認為 Khānfū 是指廣州，但對於其陷落時間被阿拉伯人記載為 878 年而非中國史籍普遍認為的 879 年的情況，石橋氏認為是 Abū Zaid 所依據信息來源，即阿拉伯商人 Ibn Wahhāb 記憶有誤，而桑原氏則詳細論證了阿拉伯人記載是對的，中國史籍記載反而是錯的。當然，事實上桑原氏說法並不能成立，但卻體現出日本學者的精細程度。

日本學界對民眾叛亂史的普遍關注始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先是 1968 年成立的明治大學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出版了 5 期《中国農民戦争史研究》（1968-1979），以刊登日本學者對中國農民戰爭史的研究成果，以及譯介中國大陸農民戰爭史研究成果為主，每期文章雖然僅四篇左右，但質量頗為可觀。⁵¹隨後是 1970 年代末 1980 年代初由谷川道雄和森正夫兩位共同主編的《中国民眾叛乱史》全四卷，其時代背景是 1970 年代台灣和美國等地興起的保釣運動。在這套書中，第一卷（1978）即有關於王黃之亂的內容。雖然這套書受限於編纂目的，主要是史料的整理和譯註，以便於日本學生和大眾了解中國歷史上民眾叛亂歷史，但依然體現出日本學者把王黃之亂放入整個中國古代民眾叛亂歷史過程中來看待。此外還有一些零散研究，比如西川素治（1973）對中國關於唐末五代農民戰爭問題評價的評議文章。

就具體研究集大成而言，則是 1996 年作為《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集》第 19 卷出版的《唐末混乱史稿》，這是對從王黃之亂到朱溫代唐這三十多

⁵¹ 其中即有西川素治關於袁晁、皮日休的文章，即西川素治：《唐中期の江南における農民反乱をめぐって——袁晁の乱を中心として》，《中国農民戦争史研究》，第 4 號，1974 年 12 月，第 1-15 頁；西川素治：《皮日休試論——その傳記を中心として》，《中国農民戦争史研究》，第 5 號，1979 年 8 月，第 1-14 頁。

年歷史的一個全面論述。⁵²正如齋藤勝執筆《史学雜誌》1996年《回顧と展望》隋唐部分所說，這本書是日野開三郎在他關於兩稅法、商業發展、自衛義軍等個別研究的基礎上形成的集大成之作。且雖然受到了來自中川學的批評⁵³，但作為日野先生半個世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依然值得後學者從中取益。⁵⁴在筆者看來，此書最重要的貢獻即在於提供了觀察唐末混亂的一個宏觀視角，特別是從經濟和社會史角度而言。

由日野氏研究可知，日本學者對王黃之亂的研究，另一個普遍關注面即唐宋變革論。而唐末五代十國即處於唐宋之際這個具體的變革過程中，是繞不過去的話題。船越泰次的一篇綜述即以此為題，曰《唐末農民反乱と唐宋間社会変革に関する諸問題》（1982）⁵⁵。故對於日本學者在研究唐宋變革問題時涉及到王黃之亂的內容，都得予以注意。

此外，日本學者還擅長學術資料的收集與整理。如前所述，早在1976年，即有山根幸夫所編《中国農民起義文獻目錄》，1982年，船越泰次對當時關於唐末農民戰爭的研究進行了學術史綜述。近年來，伊藤宏明在其本人研究的基礎上，於2008年刊出了《唐五代民眾叛乱史關係研究文獻目錄》，並於2011年進行了增訂，亦具檢索之功效。

（二）歐洲學者

歐洲雖然是敦煌學重鎮，但對唐末五代中原地區的研究並不多。以致南洋華僑王賡武留學倫敦大學撰寫博士論文*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1963）時，竟然找不到合適的導師。參考文獻方面也僅有主要致力於民俗學研究的德國學者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早年幾篇五代史論文。⁵⁶不過

⁵² 此文由日野開三郎（1954A、1954B）二文合刊而成，為《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集》第19卷，三一書房，1996年。

⁵³ 中川学：《回顧と展望（隋唐）》，《史学雜誌》，第79卷第5號，1970年。

⁵⁴ 齋藤勝：《東アジア（中国-隋唐）——回顧と展望》，《史学雜誌》，第106卷第5號，1997年5月，第212-213頁。

⁵⁵ 船越泰次：《唐末農民反乱と唐宋間社会変革に関する諸問題》，唐代史研究会編《中国歴史学界の新動向》，刀水書房，1982年，第175-194頁。

⁵⁶ 比如：Wolfram Eberhar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leading political group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五代時期居於領導地位之政治集團的構成》），*Asiatische Studies*, vol.1, no.2,

這並不妨礙王賡武充分利用歐洲的學術環境來寫出高質量的論文。這本博士論文數年後在馬來亞大學出版社出版，數十年來影響了數代英語學界的五代史研究，可惜中譯本（2014）最近才被譯出。雖然名為五代時期，但實際論述的年代為 884 年至 947 年，亦即王黃之亂結束到後漢王朝建立。其中並未具體研究王黃之亂，但對出自王黃之亂的朱溫集團，以及對鎮壓王黃之亂的李克用集團皆有諸多基於史料統計的分析。

此後，歐洲漢學界對王黃之亂的關注依然不多，直到《劍橋中國隋唐史》（1978）的出版。當然，此書中關於唐末的部分由密蘇里哥倫比亞大學的美國學者 Robert M. Somers 執筆。其中關於王黃之亂的部分，引用了“敵對的精英人物”（counter-elite）這樣的詞彙來稱呼黃巢等人。雖然該書也詳細又簡潔明快地描述了王仙芝、黃巢的活動路線，不過最重要的貢獻在於揭示了王黃之亂後中國權力分佈的新解構，特別是繪製了一份《黃巢叛亂後的權力分配（885 年）》表。

俄羅斯學界的研究，不得不說到聖彼得堡大學斯莫林（Georgii Ia Smolin）氏對於唐末農民起義的研究，他在二十世紀末出版了 *Oni brosilivyzov nebu: o krestianskoi voine 874–901 gg. v Kitae*（英譯：*They challenged heaven: The peasant war of 874–901 in China*；中譯：《籲天：874-901 年中國農民起義》⁵⁷）（1997-2000）一書，惜筆者不懂俄文，只能留待日後發掘其價值。不過近年來有一位從民間信仰角度關注黃巢的學者，即目前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任教的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他專文（2008）討論了《目連三世救母寶卷》中的黃巢故事流傳。當然，此文所比較的對象更多是諸如《五代史平話》、《殘唐五代史演義傳》、《雁門關存孝打虎》等後世小說、雜劇中的黃巢故事，而非歷史記載中的內容。

（三）美國學者

美國學界的中國古代史研究，早年多始於對某部中國古代經典，或某位中國古代作家作品的翻譯。在對王黃之亂的研究方面，亦不例外。在 1950

1947, pp.19-28. 和 Wolfram Eberhard, “Remarks on the bureaucracy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tenth century”（《對十世紀北方中國文官的考察》），*Oriens*, no.4, 1951, pp.280-299.

⁵⁷ 題目英譯取自下引 Rostislav Berezkin 之文，中譯取自閻國棟：《俄羅斯漢學三百年》，學苑出版社，2007 年，第 166 頁。

年代出版的一套名為《中古史譯叢》(*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Translations*)的叢書中，第5本即李豪偉(Howard S. Levy)從《新唐書·黃巢傳》翻譯并註釋而成的 *Biography of Huang Ch'ao* (《黃巢傳》) (1955)。此書大致包括簡介、《新唐書·黃巢傳》英譯文、譯文註釋、附錄、參考文獻(中·日·英·法·德·阿拉伯文)、《新唐書·黃巢傳》刻本影印等幾個部分。其中附錄又包括三項內容：唐朝和黃齊政權的統治年號；《新唐書·黃巢傳》所涉及的州縣名稱及其相應的現代方位；阿拉伯人筆下的黃巢史事。不過由於《新唐書·黃巢傳》本身諸多矛盾記載，故而此書最有用的部分其實在於對兩位阿拉伯人 Abū Zaid 和 Mas'ūdī 相關記載的英譯與整理，從而為英文學界提供了一份值得依據的文本。

此後，對於王黃之亂的研究似乎一度沉寂。直到1980年代，華裔學者黃仁宇撰寫了一系列談論中國歷史的報刊文章，1989年匯集為《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在台灣出版，其中即有一篇《黃巢》，專門論述了黃仁宇對黃巢的看法。他首先認為，黃巢集團成員並不都是農民，也夾雜許多城市人口和唐廷降臣；其次，黃巢的“成功也還是歸功於對方的弱點為多”，即唐廷內部政治混亂；第三，黃巢佔領長安是“他事業的最高峰，也是自投陷阱”，因為“放棄流動性”，“無法開疆拓土，以致都城內的供應也漸成問題”；第四，對於黃巢起事原因，則是唐廷的“財政與稅收缺乏規律性與統一性，其結果一方面是科斂重，容易激起民變”，“另一方面的影響則是在這財政混淆的局面裡，國計也受限制”。以上觀點確屬卓見，特別是黃仁宇用其擅長的經濟學視角來觀察王黃之亂起因。不過黃仁宇的論述最終是為了他的大歷史，故並未也無意深入研究王黃之亂。此文對於唐廷鎮壓也未能全面考察，作者認為：“黃巢及其招討，只是推進歷史的工具，而不是歷史發展重要節目”。

近年來直接關注王黃之亂的依然不多，唯有Adam Fong的 *Ending an Era: The Huang Chao Rebellion of the Late Tang, 874-884* (《終結一個時代：晚唐黃巢叛亂，874-884》) (2006) 一文專門涉及。在此文中，作者主要利用《舊唐書·黃巢傳》和《新唐書·黃巢傳》進行對比，認為前者對王仙芝、黃巢起事原因重在強調天災，而後者強調唐廷各級官員的腐敗。另外，也根據《新唐書·黃巢傳》著重描寫黃巢在廣州與唐廷討價還價之事，認為宋代史家更注重關於與外國交往的事，因為唐廷不肯輕易讓出嶺南節度使給黃巢，

主要在於廣州有市舶之利，而這一點在《舊唐書·黃巢傳》中並未提及。⁵⁸不過這篇文章畢竟篇幅較短，所用史料也很局限，不能算作深入研究。

另外，從臺灣留學美國的方震華在布朗大學的博士論文 *Power Structure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D. 875-1063)* (《帝制中國的權力結構和文化認同：晚唐到宋初的文武權力(875-1063)》)(2001)第二章第一節也專門論述了王黃之亂對中央權威的打擊。而且此文對於唐宋之際文武關係的研究，也有助於加深對時代背景的認識。

最新的研究則屬譚凱(Nicolas Tackett)的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中古中國貴族的消亡》)(2014)一書，此書對於認識九世紀的精英群體十分有用，其中也以王黃之亂為界限梳理了前後時段精英的情況，以明瞭王黃之亂對這一群體帶來的毀滅性打擊。⁵⁹

附錄：王黃之亂學術史編年錄

凡例：

一，本編主要匯集與王黃之亂直接有關的先行研究，融合論文與著作於一爐。

⁵⁸ 相似內容亦可參考作者的博士論文，見 Adam Christopher Fong, *Flourishing on the frontier: Trade and urbanization in Tang dynasty Guangzhou, 618-907 CE*, Dissertation of Ph.D., University of Hawai'i, 2009, pp.221-227.

⁵⁹ 題目中譯為筆者所加。此書脫胎於作者的博士論文，即 Nicolas Tackett,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Elites (850-1000 C.E.)*, Dissertation of Ph.D., Columbia University, 2006. 關於此書，目前中文學界已有三篇書評可參考：孫英剛《書評：Nicolas Tacket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二十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23-531頁；殷守甫：《Nicolas Tacket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中國中世貴族的解體》，包偉民、劉後濱主編《唐宋歷史評論》第一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269-276頁；王晶：《重繪中古士族的衰亡史——以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15年第2輯，第371-390頁。

百年來王黃之亂研究綜述

一，本編為便於勾勒學術史進程，所有論著以發表年份為序，同一年之內以作者姓名首字為序。

一，本編所列著作以初版繫時，譯著以原文版繫時，本文所用若非原書，則在初版繫時後列出參考版次。

一，本編對於由學位論文修改而成的著作，取著作出版時間，對於學位論文從略；其他未出版之學位論文依舊以答辯年為準。

1901 年

石橋五郎：《唐宋時代の支那沿海貿易港に就いて》（1、2、3），《史学雑誌》，第 12 卷第 8、9、11 號，1901 年 8、9、11 月。

1919 年

桑原鷺藏：《カンフウ問題殊にその陷落年代に就いて》，《史林》，第 4 卷，1919 年。

1923 年

王國維：《韋莊的〈秦婦吟〉》，《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 1 卷第 4 號，1923 年 12 月。

1933 年

董家遵：《唐末經濟恐慌與農民》，《現代史學》，第 1 卷第 3、4 期，1933 年。

1935 年

李文治：《黃巢暴動的社會背景》，《師大月刊》，第 22 期，北平師範大學，1935 年。

1936 年

陳寅恪：《讀〈秦婦吟〉》，《清華學報》，第 11 卷第 4 期，1936 年。
羅伯昭：《大齊通寶考》，《古泉學》，第 1 卷第 2 期，1936 年。

1940 年

陳寅恪：《〈秦婦吟〉校箋》，昆明：自印，1940 年。

1941 年

馮友蘭：《讀〈秦婦吟校箋〉》，《國文月刊》，第 1 卷第 8 期，1941 年。

1944年

羅香林：《唐代黃巢變亂與寧化石壁村》，《說文月刊》，1944年6月。

徐嘉瑞：《〈秦婦吟〉本事》，《國文月刊》，第27期，1944年。

1946年

王璞：《論黃巢》，（重慶）《人物雜誌》，第10期，1946年。

1948年

周一良：《〈秦婦吟本事〉（徐嘉瑞著）》，《清華學報》，第15卷第1期，1978年；收入氏著《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

1950年

陳寅恪：《〈秦婦吟校箋〉舊稿補正》，《嶺南學報》，第10卷第2期，1950年。

翁大草：《〈黃巢論〉》，商務印書館，1950年；本文取用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51年。

1951年

堀敏一：《唐末諸叛乱の性格：中国における貴族政治の没落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第7號，1951年11月；收入氏著《唐末五代变革期の政治と經濟》，汲古書院，2002年。

宣非：《翁大草著的〈黃巢論〉》，（上海）《大公報》，1951年3月31日。

周連寬：《唐高駘鎮淮事蹟考》，《嶺南學報》，第11卷第2期，1951年6月。

1952年

鄧廣銘：《試談唐末農民起義》，《進步日報》，1952年10月17日。

林巖：《黃巢起義究竟是爲什麼？》，《河北日報》，1952年12月14日。

王丹岑：《中國農民革命史話》，國際文化服務社，1952年。

宣非：《翁大草著的〈黃巢論〉》，《大公報》，1952年3月31日。

周連寬：《皮日休的生平及其著作》，《嶺南學報》，第12卷第1期。

1953年

顧友光：《黃巢起義》，大中國圖書局，1953年。

王丹岑：《唐代農民起義》，國際文化服務社，1953年。

1954年

何林天：《怎樣認識有關黃巢和義和團起義的兩個錯誤流傳問題》，《小學教師》，1954年第9期。

日野開三郎 A：《唐末混乱史稿》（一），《東洋史學》，第10號，1954年5月。

日野開三郎 B：《唐末混乱史稿》（二），《東洋史學》，第11號，1954年9月；這兩篇收入《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學論集》，第19卷，三一書房，1996年。

楊志玖：《黃巢大起義》，《歷史教學》，1954年第2期。

1955年

Levy, Howard S. (李豪偉), *Biography of Huang Ch'ao* (translation from *Hsin T'ang Shu*),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5.

李燕光：《試論黃巢的遠征——中國農民戰爭的特點之一》，《文史哲》，1955年第7期。

繆鉞：《皮日休的事跡思想及其作品》，《四川大學學報》，1955年第2期。

楊志玖：《關於王仙芝起義的時間、地點、他的家鄉和戰死地點究竟怎樣？》，《歷史教學》，1955年第2期。

1956年

韓國磐：《黃巢起義事蹟考》，《廈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56年第5期；收入氏著《隋唐五代史論集》，三聯書店，1979年。

羅元貞：《論唐末農民大起義——駁北大鄧廣銘教授》，《山西師範學院學報》，1956年第2期。

任傑：《中國農民革命史話》，通俗讀物出版社，1956年。

善峰憲雄：《黃巢の乱》，《東洋史研究》，第14卷第4號，1956年4月。

尹湘豪：《農民革命戰爭過早失敗歷史上就出現五代十國混亂局面的提法是否恰當》，《新史學通訊》，1956年第2期。

趙儷生 A：《通過五代十國到宋初的歷史過程認識唐末農民大起義之更深遠的社會意義》，《文史哲》，1956年第5期。

趙儷生 B：《王仙芝和黃巢》，山東人民出版社，1956年。

1957年

岑仲勉 A：《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

岑仲勉 B：《從王渙墓誌解決了晚唐史一兩個問題》，《歷史研究》，1957 年第 9 期。

關履權：《試論唐末黃巢起義的特點》，《中學歷史教學》，1957 年第 3 期。

季甫：《論唐末農民戰爭——兼評鄧廣銘教授著〈試談唐末的農民起義〉》，《山西師範學院學報》，1956 年第 2 期。

堀敏一：《唐末の变革と農民層の分解》，《歷史評論》，第 88 號，1957 年 9 月；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史の視點——私の中国史學》，汲古書院，1994 年。

堀敏一：《黃巢の叛乱——唐末变革の一考察》，《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13 號，1957 年；收入氏著《唐末五代变革期の政治と經濟》，汲古書院，2002 年。

桑田六郎：《黃巢廣州陷落と新舊唐書》，《神田博士還曆記念書誌学論集》，平凡社，1957 年。

王興亞：《王仙芝起義的時間問題》，《史學月刊》，1957 年第 8 期。

1958 年

李菊田：《皮日休生平事跡考：並與繆彥威及蕭滌非先生商榷》，《天津師範學院學報》，1958 年第 3 期。

繆鉞：《再論皮日休參加黃巢起義軍的問題》，《歷史研究》，1958 年第 2 期。

蕭滌非：《論有關皮日休諸問題——校點〈皮子文藪〉說明》，《文史哲》，1958 年第 1 期。

楊志玖：《黃巢大起義》，李光壁、錢君擘、來新夏主編《中國農民起義論集》，三聯書店，1958 年。

1959 年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中華書局（上海），1959 年；本文用再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傅衣凌：《關於朱溫的評價》，《廈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59 年第 1 期。

胡如雷：《關於朱溫的評價問題》，《光明日報》，1959 年 9 月 17 日。

寧可：《黃巢起義》，中華書局，1959 年。

尚友：《“關於對朱溫評價”的一些看法》，《廈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59 年第 2 期

吳雁南：《試論隋末農民起義和唐末農民起義的特點》，《史學月刊》，1959 年第 11 期。

百年來王黃之亂研究綜述

周寶珠：《唐末農民戰爭史中一個問題的商榷》，《史學月刊》，1959年第6期。

1960年

周寶珠：《朱溫叛變與黃巢起義失敗的關係——兼論關於朱溫評價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1960年第9期。

1961年

嘉澹：《農民政治家——張全義》，《河南日報》，1961年8月3日。

堀敏一 A：《朱全忠政權の性格》，《駿台史学》，第11號，1961年；收入氏著《唐末五代變革期の政治と經濟》，汲古書院，2002年。

堀敏一 B：《朱全忠の廳子都》，《和田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講談社，1961年；收入氏著《唐末五代變革期の政治と經濟》，汲古書院，2002年。

孫達人(達人)：《黃巢大起義也曾經提出過土地問題》，《光明日報》，1961年4月12日。

吳澤、袁英光 A：《王仙芝受敵誘降問題初探》，《文匯報》，1961年5月12日。

吳澤、袁英光 B：《黃巢“乞降”問題考辨——唐末農民戰爭研究之二》，《學術月刊》，1961年第5期。

徐德嶙：《關於王仙芝受敵誘降問題》，《文匯報》，1961年6月23日。

徐俊鳴：《有關黃巢進軍嶺南的一些資料》，《光明日報》，1961年10月25日。

楊寬：《黃巢起義對瑤族人民的影響》，《文匯報》，1961年9月10日。

1962年

胡如雷：《對王仙芝、黃巢“乞降”問題的兩點意見》，《光明日報》，1962年9月12日。

林燁卿：《黃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寧可：《讀王仙芝、黃巢受敵誘降、乞降考辨諸文質疑》，《光明日報》，1962年7月19日。

史紹賓編：《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討論集》，三聯書店，1962年。

王永興：《試談黃巢進軍嶺南的路線》，《光明日報》，1962年6月6日；收入氏著《唐代後期軍事史略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吳節：《對王仙芝、黃巢“乞降”問題的兩點意見》，《光明日報》，1962年9月12日。

武慰萱：《尚讓的下落》，《江海學刊》，1962年第10期。

周到：《王仙芝起義》，《河南日報》，1962年5月24、27日、6月7日。

周齊：《讀唐末農民起義史料札記》，《哈爾濱師院學報》，1962年第1期。

1963年

胡如雷：《唐末農民戰爭的歷史作用》，《歷史研究》，1963年第1期。

Wang Gungwu(王賡武),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中譯本《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胡耀飛、尹承譯，中西書局，2014年。

徐德麟：《再談關於王仙芝受敵誘降問題——與寧可同志商榷》，《光明日報》，1963年1月16日。

1964年

侯外廬：《唐宋之際農民戰爭的歷史特點》，《新建設》，1964年第3期。

賴家度：《試論黃巢“禁刺史殖財產”》，《歷史教學》，1964年第9期。

1968-1969年

張慕潔：《黃巢造反？逼反黃巢》，《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年刊》，1968-1969年。

1970年

王止峻 A：《復興文化談唐末之亂》，《醒獅》，第8卷第7期，1970年7月。

王止峻 B：《復興文化談唐代黃巢之亂》，《醒獅》，第8卷第12期，1970年12月。

1971年

松井秀一：《唐末の民眾叛乱と五代の形勢》，《岩波講座·世界歷史》6，岩波書店，1971年。

譚紹鵬：《黃巢與“記得當年草上飛”》，《學術論壇》，1971年第1期。

1972年

華史斌：《唐末黃巢起義的大風暴》，《中國農民革命鬥爭史話》，湖南人民出版社，1972年。（此書當年在多個省份的省級人民出版社皆有出版，內容基本一樣。）

1973年

陳光崇：《黃巢起義反佛問題試探》，《遼寧大學學報》，1973年第4期。

西川素治：《唐末五代の農民闘争——中国における唐末農民戦争の評価をめぐって》，《駿台史學》，第33號，1973年9月。

1974年

陳侃：《閩南民間傳說“黃巢試劍”考》，《花蓮師專學報》，第6期，1974年6月。

Miyakawa Hisayuki(宮川尚志)：“Legate Kao P'ien and a Taoist Magician Lü Yung-chih in the Time of Huang Ch'ao's Rebellion”，*Acta Asiatica*, vol.27, 1974. 日文本題《唐末の節度使高駘と方士呂用之》，收入氏著《中國宗教史研究·第一》，同朋舍，1983年。

吳法：《黃巢傳》，香港文教出版社，1974年；再版，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年。

周寶珠：《黃巢起義的“均平”要求與反儒鬪爭》，《河南大學學報》，1974年第3期。

周啟學：《試論王黃之亂》，（香港）《史地》，第4、5期，1974年。

1976年

北京市東城區文教局《黃巢傳》註釋小組：《〈黃巢傳〉註釋》，中華書局，1976年。

陳光崇：《略論唐末的黃巢起義》，《遼寧大學學報》，1976年第1期。

山根幸夫編：《中国農民起義文獻目錄》，東京女子大学東洋史研究室，1976年。

王士倫：《江山仙霞嶺黃巢起義遺跡紀略》，《考古》，1976年第5期。

1977年

張榮芳：《黃巢之亂對東南財賦區的破壞》，東海大學歷史系《史學會刊》，第6期，1977年。

1978年

白天：《唐末農民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第1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

存粹學社編集，周康燮主編：《中國農民戰爭問題討論集》，大東圖書公司，1978年。

谷川道雄、森正夫編：《中國民眾叛亂史》第1卷《秦～唐》，平凡社，1978年。

山西師院政史系“黃巢起義”研究小組（宋元強執筆）：《黃巢起義史跡考察記》，《山西師範學院學報》，1978年第4期。

Robert M. Somers, “The end of T’ang.”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3, part 1,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 ed.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中譯本見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隋唐史（589-906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宋家鈺：《關於唐末農民起義領袖“天補均平”稱號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第1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

王永興：《關於黃巢農民軍的一些史料的考辨》，《文史》，第5輯，1978年；收入氏著《唐代後期軍事史略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楊新：《唐人書黃巢起義記事墨跡》，《文物》，1978年第5期。

1979年

傅宗文：《唐末農民戰爭的偉大歷史作用》，《廈門大學學報》，1979年第2期。

胡如雷：《唐末農民戰爭》，中華書局，1979年。

黃廣生：《韋莊自禁〈秦婦吟〉原因再析》，《吉林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

陸楓：《尚讓叛降考》，《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2輯。

馬世之：《黃巢起義的故事》，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寧可：《尚讓的結局》，《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1期。

杞愚：《談黃巢的一首詩》，《學術論壇》，1979年增刊。

西川素治：《皮日休試論——その傳記を中心として》，《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第5號，1979年8月。

張道貴、顧吉辰：《流動作戰不是黃巢起義失敗的原因》，《杭州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

張澤咸：《唐五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二冊），中華書局，1979年。

張志康 A：《皮日休究竟是怎樣死的？》，《學術月刊》，1979年第8期。

張志康 B：《黃巢“乞降”考辨》，《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集刊》，第 1 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

趙偉明：《試論唐宋農民戰爭的平等口號》，《西南師範學院學報》，1979 年第 3 期。

1980 年

陳耀東：《黃巢起義於乾符元年的一條旁證》，《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0 年第 3 期；收入氏著《唐代文士考辨錄》，團結出版社，1990 年。

方積六：《黃巢渡江南下考》，《文史》，第 10 輯，1980 年。

何應忠：《論唐末農民戰爭的歷史作用》，《中學歷史教學》，1980 年第 1 期。

王大華：《王仙芝沂州之敗時間考》，《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80 年第 4 期。

王水照：《關於韋莊〈秦婦吟〉評價的兩個問題——兼論古代作家對農民起義的一般態度》，《古典文學論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

楊善群：《黃巢乞降經過考辨》，《求是學刊》，1980 年第 4 期。

俞兆鵬：《試論黃巢建立的大齊朝的性質》，《江西大學學報》，1980 年第 2 期。

張志康：《略論黃巢起義失敗的原因》，《中學歷史》，1980 年第 3 期。

諸葛計：《唐末農民戰爭的戰略防禦階段略論》，《中國史研究》，1980 年第 2 期。

1981 年

方積六：《唐王朝鎮壓黃巢起義領兵統帥考》，《魏晉隋唐史論集》，第 1 輯，1981 年。

江民繁：《黃巢殺人辨》，《歷史知識》，1981 年第 6 期。

劉美崧：《〈題菊花〉等三首詩是黃巢寫的吗？——兼談對“冲天”的理解》，《江西社會科學》，1981 年第 2 期。

施寶義：《黃巢〈自題像〉詩辨偽》，《讀書》，1981 年第 10 期。

宋遂良：《話說〈秦婦吟〉》，《讀書》，1981 年第 5 期。

唐森：《“均平”與黃巢起義》，《暨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 年第 1 期。

衛文選：《黃巢愛儒生考辨》，《學術月刊》，1981 年第 10 期。

謝天佑、簡修煒：《中國農民戰爭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

諸葛計：《對黃巢起義記事墨跡內容的質疑》，《文史》，第 12 輯，1981 年 9 月。

1982年

船越泰次：《唐末農民反亂と唐宋間社会変革に関する諸問題》，唐代史研究会編《中国歴史学界の新動向》，刀水書房，1982年。

戈春源：《黃巢僞降於高駢時地考》，《江蘇師範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

吉原美根子：《黃巢の反亂における乱勢力の構造及び性格》，《大正史学》，第12期，1982年。

賴家度：《試論黃巢和皮日休》，《河北北京師院論文選集》，第2集，1982年。

李希泌：《黃巢被害與唐軍收京日期考訂——兼介紹宦唐朝鮮學者崔致遠〈桂苑筆耕集〉》，《文獻》，1982年第1期。

沈開生：《皮日休同情農民和農民起義嗎？——論皮日休地主階級立場》，《北方論叢》，1982年第2期。

王大華：《論均平在唐末農民戰爭中的經濟內容》，《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

衛文選：《黃巢與儒生》，《中國古代史論叢》，1982年第1輯。

魏嵩山：《黃巢起義進軍路線辨析》，《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集刊》，第2輯，1982年。

吳松泉：《〈題同官縣壁〉非皮日休作》，《南充師院學報》，1982年第4期。

吳如嵩：《從黃巢攻克兩京試談農民戰爭的決戰問題》，《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第4輯，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俞兆鵬：《黃巢起義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臧嶸A：《王仙芝、黃巢起義始年考》，《文史》，第16輯，1982年。

臧嶸B：《〈平巢事蹟考〉爲茅元儀所著考》，《文獻》，第11輯，1982年3月。

曾夫：《黃巢》，《歷史教學》，1982年第1期。

張志康：《黃巢自廣州北上路線考》，《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第4輯，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趙國華：《黃巢》，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築山治三郎：《唐末の政治と民衆叛亂》，《歴史における民衆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集》，国書刊行会，1982年。

1983年

陳全芳：《兩塊唐墓誌與唐末農民起義》，《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2期。

百年來王黃之亂研究綜述

方積六：《黃巢起義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

方積六：《評〈平巢事跡考〉》，《魏晉隋唐史論集》，第2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

顧吉辰：《王仙芝起義年代辨證》，《學術月刊》，1983年第6期。

秦珠：《唐末盧峻墓誌銘》，《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1期。

沈開生：《皮日休繫年考辨》，《研究生論文選集·中國古代文學分冊》，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

徐明德：《試論黃巢起義失敗原因》，《北方論叢》，1983年第3期。

諸葛計：《張全義略論》，《史學月刊》，1983年第4期。

1984年

戈春源：《王鐸守潼關辨》，《蘇州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

日野開三郎：《唐末五代初自衛義軍考》（上編），著者自刊，1984年。

吳宗國：《唐末階級矛盾激化的幾個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3期。

鄭廣南：《黃巢入閩活動事跡考察》，《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4期。

周世範：《黃巢兵敗後唐廷每況愈下的原因試析》，《青海社會科學》，1984年第3期。

1985年

郭在忠：《嶺南少數民族與黃巢義軍》，《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

吉原美根子：《唐代，塩商人の出現と発展のなかにみる黄巢の位置》，《大正大学大学院研究論集》，1985年第9期。

金性堯：《〈秦婦吟〉讀後感》，《群言》，1985年第8期。

秦方瑜：《堪與〈長恨歌〉媲美的史詩——〈秦婦吟〉》，《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3期。

申寶昆：《皮日休研究中若干問題討論綜述》，《棗莊師專學報》，1985年第1期。

王大華：《論大齊政權失敗的主要原因》，《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

徐明德：《略論唐末農民起義的歷史教訓》，《中學歷史教學》，1985年第3期。

袁宏軒：《皮日休死因探考》，《山西師範學院學報》，1985年第2期。

- 張天健：《〈秦婦吟〉諱因考》，《河南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
趙熙文：《略論皮日休參加義軍的思想基礎》，《湖北大學學報》，1985年第3期。
諸葛計：《唐末農民戰爭戰略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

1986年

- 傅永聚：《關於黃巢之死的幾個問題》，《齊魯學刊》，1986年第4期。
戈春源：《黃巢起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鐵道師院學報》，1986年第1期。
韓尚勇：《古代浙閩咽喉——仙霞嶺》，《浙江師範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
王壽南：《唐末變亂之分析》，國際漢學會議論文，1986年。
周荔：《從對黃巢起義的記敘看〈通鑑〉的價值》，《晉陽學刊》，1986年第5期。

1987年

- 董振興：《平等思想是黃巢最早提出的嗎》，《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87年第3期。
高國藩：《敦煌本〈秦婦吟〉新論》，《許昌學院學報》，1987年第3期。
李慶年：《關於皮日休的一些問題》，《唐代文學論叢》，第9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馬世之：《黃巢、尚讓查牙山會師問題考辨》，《許昌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1期。
王大華：《王仙芝攻蘄州的時間問題》，《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
武伯綸：《黃巢農民起義軍進入長安後各階層的態度》，氏著《古城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
徐俊鳴：《廣東的客家多集居於梅縣地區與黃巢起義軍入粵路線的關係》，《廣東史志》，1987年第1期；收入氏著《嶺南歷史地理論集》，中山大學學報編輯部，1990年。
牖人：《論〈秦婦吟〉的藝術真實》，《文學評論》，1987年第2期。
周藤吉之：《唐末淮南高駢の藩鎮体制と黃巢徒黨との關係について—新羅末の崔致遠の著『桂苑筆耕集』—》，《東洋學報》，第68卷第3-4號合刊，1987年3月。
周嘯天：《評韋莊〈秦婦吟〉》，《天府新論》，1987年第6期。

1988年

陳耀東：《黃巢遇害質疑》，《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1988年第3期；收入氏著《唐代文史考辨錄》，團結出版社。

崔同凡、賈鐵山：《黃巢之死》，《荷澤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

黃清連：《為“唐人書黃巢之亂記事墨跡”定位》，《歷史月刊》，第4期，1988年5月。

黃永年：《〈秦婦吟〉通釋》，史念海主編《唐史論叢》，第1輯，三秦出版社，1988年。

賈乃謙：《從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談起——關於中國農民戰爭史的研究》，《山東社會科學》，1988年第5期。

李斌城主編：《中國農民戰爭史·隋唐五代十國卷》第五章《唐後期農民戰爭》，人民出版社，1988年。

馬新：《〈韋莊《秦婦吟》校箋〉獻疑一則》，《文獻》，1988年第3期。

徐映璞：《黃巢入浙考》，氏著《兩浙史事叢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1989年

郭在忠、黃明光：《支持黃巢義軍的桂州“溪洞蠻”族屬小考》，《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黃仁宇：《黃巢》，氏著《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時報文化，1989年；簡體版，三聯書店，1992年。

謝忠明、江湧：《淺議唐末農民起義中“均平”口號的思想來源》，《長沙水電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3期。

1990年

陳耀東：《黃巢與皮日休——兼論黃巢對文士藝人的態度》，《唐代文史考辨錄》，團結出版社，1990年。

郭啟瑞：《唐末關中安全體系的破壞》，《晚唐的社會與文化》，學生書局，1990年。

黃清連：《高駢縱巢渡淮——唐代藩鎮對黃巢叛亂的態度研究之一》，《大陸雜誌》，第80卷第1期，1990年。

李夢芝：《高駢生於822年說》，《歷史教學》，1990年第7期。

羅春雄：《八十年代隋唐農民戰爭研究述略》，《中國史研究動態》，1990年第6期。

孫永如：《高駢史事考辯》，《唐史論叢》第5輯，三秦出版社，1990年。

1991年

李烈輝：《高駢與江淮鹽業》，《鹽業史研究》，1991年第4期。

1992年

黃清連 A：《宋威與王、黃之亂——唐代藩鎮對黃巢叛亂的態度研究之二》，《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臺灣中研院史語所，1992年。

黃清連 B：《楊復光〈收復京城奏捷露布〉考》，（日本）《中國史學》，第2號，1992年。

吳松泉：《皮日休參加黃巢起義軍時、地考》，《四川師範學院學報》，1992年第4期。

佐竹靖彥：《朱溫集團的特性和後梁王朝的形成》，《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臺灣中研院史語所，1992年。

1993年

關治中：《黃巢起義在關中》，《渭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4期。

韓雲波：《韋莊〈秦婦吟〉失傳之謎新探》，《唐都學刊》，1993年第2期。

黃清連：《王鐸與晚唐政局——以討伐黃巢之亂為中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2分，1993年5月。

楊西雲：《黃巢》，新蕾出版社，1993年。

正達：《論皮日休之死》，《四川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2期。

1994年

關治中 A：《龍尾坡敗北：黃巢起義在關中研究之二》，《渭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

關治中 B：《梁田坡戰場考證——黃巢起義在關中研究之三》，《渭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3期。

關治中 C：《中渭橋之戰辨析：黃巢起義在關中研究之四》，《渭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4期。

錢鎮國：《評錢鏐“計走黃巢”》，《錢鏐研究》，第4輯，1994年。

1995年

陳明光：《唐懿宗·唐僖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

百年來王黃之亂研究綜述

杜來梭：《唐高駘任鹽鐵轉運使時間考》，《中國古史論叢：祝賀胡如雷教授七十壽辰》，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關治中：《乾陀地理位置考證——黃巢起義在關中研究之五》，《渭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

韓鼎洛：《黃巢之亂的原因之探討》，《洛陽文獻》，第2期，1995年。

黃淑雯：《李克用研究》，中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1995年。

蔣長棟：《晚唐詩人考（系列之二）：高駘》，《中國韻文學刊》，1995年第2期；收入氏著《唐詩考釋的理論與實踐》，嶽麓書社，2007年。

梁太濟：《朱全忠勢力發展的四個階段》，《春史：卞麟錫教授還曆紀念唐史論叢》，1995年。

梁中效：《唐朝皇帝奔蜀再析》，史念海主編《唐史論叢》，第6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1996年

關治中：《黃巢起義敗退關中新探：黃巢起義在關中研究之六》，《渭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1期。

田廷柱：《論〈桂苑筆耕集〉的史料價值：兼評高駘其人》，《遼寧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

余桂元：《過重的徭役負擔是唐末農民戰爭爆發的原因之一》，《歷史教學》，1996年第2期。

1997年

陳明光：《鄭畋宦績考》，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凍國棟：《羅隱〈吳公約神道碑〉所見唐末之“杭州八都”》，《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5輯，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收入氏著《中國中古經濟與社會史論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Georgii Ia Smolin, *They challenged heaven: The peasant war of 874-901 in China*, Saint Petersburg: Saint Petersburg University Press, 1997-2000.

趙雨樂：《唐末北衙禁軍的權力基礎——神策五十四都的活動試析》，《第三屆中國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7年；收入氏著《從宮廷到戰場：中國中古與近世諸考察》，香港中華書局，2007年。

1998年

邱文彬：《黃巢開仙霞嶺路辨析》，《福建史志》，1998年第1期。

曾振宇：《黃巢起義 1122 週年學術討論會述評》，《文史哲》，1998年第2期。

朱馥生：《錢鏐計退黃巢與“鎮壓義軍說”的起源小考》，《錢鏐研究》，第8輯，1998年。

1999年

陳志堅：《唐末南方割據中北人武力的作用》，《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志》，1999年第3期；亦收入孫競昊、鮑永軍主編《傳承與創新：浙江地方歷史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

何燦浩：《唐末地方動亂的新特點》，張國剛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

李福標：《皮日休五入長安說》，《咸陽師專學報》，1999年第2期。

曾祥委：《黃巢由湘入粵考》，《韶關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5期。

趙國慶、董建石：《唐末農民起義為何採用流動作戰的戰術》，《中學歷史教學研究》，1999年第4期。

2000年

崔憲濤：《也談黃巢的最後下落》，《文史知識》，2000年第11期。

黃永年A：《韋莊何以要諱〈秦婦吟〉》，氏著《樹新義室筆談》，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

黃永年B：《韋莊在廣明元年至中和三年的行跡》，氏著《文史探微》，中華書局，2000年。

丸橋充拓：《黃巢——唐を滅亡に追い込んだ落第秀才》，《月刊しにか》，第11卷第10期，2000年10月。

俞兆鵬：《論黃巢起義的歷史作用》，《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2000年第3期。

張學松：《〈秦婦吟〉研究述略》，《天中學刊》，2000年第1期。

鄒重華：《唐僖宗時遷蜀士族及其入宋後的境況考析》，《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

2001年

陳習剛：《黃巢起義大軍自嶺南北伐始發今桂林市區考》，《湖北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

何燦浩：《唐末政治變化研究》，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

Cheng-Hua Fang, *Power Structure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D. 875-1063)*, Dissertation of Ph.D., Brown University, 2001. 此文修改後已於

2009年在德國 Saarbrücken 的 VDM Verlag Dr. Müller 出版了同名專著。

百年來王黃之亂研究綜述

胡一華：《從黃巢起義看農民戰爭的規律》，《麗水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1年第6期。

賈艷紅：《略論沙陀騎兵在鎮壓黃巢起義中的作用》，《濟南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

江連山（江山）：《從黃巢出身、職業看其階級屬性》，《綏化師專學報》，2001年第3期。

李曉光、張令河：《泰山狼虎谷黃巢遇難考》，《岱宗學刊》，2001年第3期。

俞兆鵬：《黃巢生平事跡考異》，《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2001年第2期。

張學松：《〈秦婦吟〉主旨新論》，《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

朱子彥：《黃巢起義軍南征辨析》，《軍事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002年

丁柏傳：《試論黃巢的“均平”思想》，《臨沂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

方寧：《從〈秦婦吟〉看唐末的黃巢起義——讀〈韋莊集〉一得》，《同舟共進》，2002年第12期。

江連山、孫連城：《黃巢政治思想性質辨析》，《綏化師專學報》，2002年第1期。

唐韻：《〈秦婦吟〉情韻結構探微》，《青海師專學報》，2002年第2期。

滕新才：《論黃巢的性格特徵及其影響》，《煙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

曾現江：《唐後期、五代之淮蔡軍人集團研究》，四川大學碩士論文，2002年。

2003年

陳習剛：《唐末陳州趙犇兄弟生平履歷考》，《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曠天全：《唐鄭畋〈壁州新建山寺記〉及其文獻價值》，《文山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年第4期。

劉偉、高慎濤：《晚唐詩人皮日休結局考釋》，《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7期。

汪俊：《崔致遠與高駢》，《江蘇文史研究》，2003年第3期。

竹村則行：《新羅·崔致遠と晩唐·顧雲の交遊について》，《文学研究》，第 100 號，2003 年 3 月。

2004 年

岑大利、劉悅斌：《中國農民戰爭史論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4 年。

陳景富：《金陵古記並非“鐵證”，玄奘頂骨仍存興教寺》，陳景富主編《興教寺玄奘靈塔耀古今——“黃巢發塔”真偽辨學術文集》，三秦出版社，2004 年。

杜文玉：《陝西師範大學杜文玉教授發言》，同上。

樊耀亭：《從興教寺歷史沿革看黃巢是否發塔》，同上。

韓宏：《“黃巢發塔”純屬無稽之談》，同上。

胡戟：《陝西師範大學胡戟教授發言》，同上。

呂卓民：《西北大學呂卓民教授發言》，同上。

馬馳 A：《“黃巢發塔”說質疑》，同上。

馬馳 B：《黃巢在長安》，同上。

馬馳 C：《黃巢農民軍史料選錄》，同上。

石杉：《黃巢農民軍佔領長安大事年表》，同上。

石興邦：《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石興邦研究員發言》，同上。

楊希義：《西北大學楊希義教授發言》，同上。

鍾坡：《從金陵天禧寺的沿革變遷看“黃巢發塔”的真偽》，同上。

傅璇琮：《岑仲勉〈補僖昭哀三朝翰林學士記〉正補》，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 10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山根直生：《唐朝軍政統治的終局與五代十國割據的開端》，《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3 期。

史式：《對“黃巢起義”的再思考》，《同舟共進》，2004 年第 12 期。

2005 年

陳奕亨：《唐五代河南道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5 年。

樊文禮：《李克用評傳》，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 年。

歐安欣：《論黃巢的軍事戰略》，《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5 期。

楊一平：《“八百里”錢鏐計退黃巢兵》，《錢鏐研究》，第 15 輯，2005 年。

張劍光 A：《是否變節，王仙芝受降之謎》，氏著《大唐王朝之謎》，黃山書社，2005 年。

百年來王黃之亂研究綜述

張劍光 B：《遁入空門，黃巢下落之謎》，同上。

張劍光 C：《被殺還是依附，皮日休下落之謎》，同上。

張景平：《試論中晚唐時期的“鑾輿播遷”》，《蘭州大學學報》，2005 年第 1 期。

張學松：《晚唐詩人在農民起義中的心態表現及命運》，《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5 期。

2006 年

陳習剛：《趙犖兄弟與唐末陳州》，《唐都學刊》，2006 年第 1 期。

Adam Fong, “Ending an Era: The Huang Chao Rebellion of the Late Tang, 874-884”, presented at the 5th East-West Cente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February 16-18, 2006 in Honolulu, Hawaii USA.

江瑋平：《唐末五代初長江流域下游的在地政治——淮、浙、江西區域的比較研究》，臺灣大學碩士論文，2006 年。

劉波：《韋莊〈秦婦吟〉之女性主義解析》，《蘭州學刊》，2006 年第 4 期。

沈淦：《黃巢與李順在傳說中的結局》，《文史雜誌》，2006 年第 3 期。

史式：《誰曰黃巢是義軍》，《歷史月刊》，第 222 期，2006 年。

王廣峰：《鳳嘴堆（黃巢點將台）與黃巢起義》，《荷澤學院學報》，2006 年第 6 期。

王永興 A：《論黃頭軍》，氏著《唐代後期軍事史略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王永興 B：《討伐王仙芝、黃巢之亂的十年戰役》，同上。

王永興 C：《討伐逆賊秦宗權六年戰役》，同上。

王永興 D：《討伐逆賊董昌之戰》，同上。

張學松 A：《論中國古代第一篇小說化長詩〈秦婦吟〉》，《中州學刊》，2006 年第 6 期。

張學松 B：《小說化的詩——〈秦婦吟〉藝術探微》，傅璇琮主編《唐代文學研究》，第 11 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張一農、張蕊：《大齊通寶，物歸原主——正羅伯昭〈大齊通寶考〉之誤》，《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06 年第 5 期。

2007 年

洪亦蔚：《黃巢詩歌的菊花情節》，《文學教育》，2007 年第 5 期。

胡可先：《黃巢起義與唐末哀歌》，氏著《唐代重大歷史事件與文學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年。

荒木猛：《「殘唐五代史演義」における黃巢物語について》，《文学部論集》，第 91 號，2007 年 3 月。

劉尚勇：《黃巢之墓在成都》，《文史雜誌》，2007 年第 6 期。

榮海生：《黃巢的軍事戰略藝術思想》，《荷澤日報》，2007 年 10 月 10 日。

吳玲玲：《唐末農民起義期間的幕府文人與詩歌創作》，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

楊福俊：《論韋莊〈秦婦吟〉的紀實性》，《職大學報》，2007 年第 1 期。

張卉：《從〈桂苑筆耕集〉看唐末高駢鎮淮史事》，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

2008 年

白若思：《歷史故事在中國通俗說唱文學的演變：黃巢起義的故事在〈五代史平話〉與〈目連寶卷〉中的流傳》，《第六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民間文學與漢學研究”論文集》，萬卷樓出版社，2008 年；英文增訂本見：Rostislav Berezk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 in Religious Storytelling: The Story of Huang Chao (d.884) in the Baojuan of Mulian Rescuing his Mother in Three Rebirths”, *Late Imperial China*, Volume 34, Number 2, December 2013。

陳志堅：《唐末中和年間徐泗揚兵爭之始末——崔致遠〈桂苑筆耕集〉事箋之一》，《魯東大學學報》，2008 年第 5 期。

焦寶、興越：《唐宋詞文學傳播的重要轉捩點——安史之亂和黃巢起義對詞體文學的影響》，《天中學刊》，2008 年第 4 期。

靜永健：《新羅文人崔致遠と唐末節度使高駢の前半生》，《文学研究》，第 105 號，2008 年 3 月。

李錦昌：《國變的陰影——唐末詩人面對世亂國亡之作品試探》，國立東華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

李志文：《論朱溫的性格及行爲方式與他的崛起》，《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年增刊。

榮海生：《從李自成起義看黃巢起義的成敗及影響》，《荷澤學院學報》，2008 年第 3 期。

王祿雄：《從軍事角度論關係唐朝國家安全的幾次戰爭》，中正大學博士論文，2008 年。

吳淑玲：《論敦煌唐寫本〈秦婦吟〉的傳播學價值》，傅璇琮主編《唐代文學研究》，第 12 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

百年來王黃之亂研究綜述

楊陽：《英雄末路：黃巢是自殺還是他殺》，《科學大觀園》，2008年第4期。

伊藤宏明編：《唐五代民衆叛亂史關係研究文獻目錄》，《鹿大史學》，第55號，2008年1月。

張美麗：《韋莊〈秦婦吟〉研究述評》，《文化學刊》，2008年第4期。

2009年

陳忱：《論唐末朱全忠勢力的興起》，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焦寶：《論安史之亂和黃巢起義對詞樂傳播的影響》，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梁麗：《唐僖宗、昭宗朝政局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王世聞：《宋子京“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說釋證》，《法制與社會》，2009年第7期。

吳玲玲：《唐末農民起義期間文人入幕狀況之研究》，《凱里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

薛茜：《〈秦婦吟〉之諱因考辨》，《現代語文》（文學研究版），2009年第4期。

臧知非：《生存與抗爭的詮釋——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

2010年

黃英士：《沙陀與晚唐政局》，中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劉傑：《關於王仙芝起義時間以及變節這一行爲的探討》，《太原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

沈文凡、全歲：《黃巢〈自題像〉探蹟與索隱——兼論韓國南義采〈龜磻詩話〉對唐詩的舉證價值》，《福州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

肖偉義：《斷腸春色在江南——解析韋莊和他的〈秦婦吟〉》，《西部廣播電視》，2010年第8期。

曾思藝：《敘事藝術的繼承與創新——試論〈秦婦吟〉的藝術成就》，《廣東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

張美麗：《論韋莊〈秦婦吟〉的詩史意義》，《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

朱澤坤、吳玲玲：《唐末農民起義期間之幕府文人研究——以時間地域分佈情況爲例》，《牡丹江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

2011年

李琚平：《關於黃巢起義諸問題的冷思考——晚唐五代文學思想背景研究之一》，《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8期。

盧英宏：《反戰詩劇冠千秋——〈秦婦吟〉新論》，《雲夢學刊》，2011年第2期。

潘書英：《從唐朝統治者的態度看黃巢起義擴大化的原因》，《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伊藤宏明編：《唐五代民衆叛亂史關係研究文獻目錄》（增訂版），斯文堂，2011年。

中尾健一郎：《唐末動亂期の洛陽と韋莊》，《日本文學研究》，第46號，2011年1月。

2012年

李兵：《從黃巢起義看晚唐政局》，山西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

蔡海生：《唐末黃巢起義釋疑》，《荷澤學院學報》，2012年第3期。

孫欽禮：《滿城盡帶黃金甲：黃巢傳》，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

田冰：《唐末長安城毀廢過程考察》，《史學月刊》，2012年第11期。

徐連達：《皮日休之死》，氏著《徐連達評說中國歷史的205個細節》，上海大學出版社，2012年。

2013年

林至軒：《從能臣到叛臣——高駢與唐末政局研究》，臺灣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

潘子正：《唐僖宗朝前期（873-880）的政治角力分析》，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

蔡海生：《滿城盡帶黃金甲：史話黃巢》，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

楊揚：《滿城盡帶黃金甲——黃巢與政和》，《福建鄉土》，2013年第4期。

曾歡歡：《陳寅恪的“文史互證”探析——以〈《秦婦吟》校箋〉為例》，《欽州學院學報》，2013年第12期。

2014年

Nicolas Tacket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

胡耀飛：《武康地區黃巢傳說的方志探源》，《德清政協》，2014年第2期。

百年來王黃之亂研究綜述

田衛衛 A：《〈秦婦吟〉敦煌寫本研究綜述》，《敦煌學輯刊》，2014 年第 4 期。

田衛衛 B：《〈秦婦吟〉在中原的傳播——興衰原因新探》，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 20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

楊愛民：《“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辨析》，《西南學刊》，2014 年第 1 期。

楊亞瓊：《淺談敦煌遺書的研究——以〈秦婦吟〉研究為例》，《鄂州大學學報》，2014 年第 6 期。

張冠凱：《黃巢起義對晚唐外國在廣州人口數量影響分析》，《金田》，2014 年第 7 期。

2015 年

陳金文：《壯族民間黃巢傳說的口述史意義》，《廣西社會科學》，2015 年第 6 期。

胡耀飛 A：《黃巢傳說在武康流傳的四個版本》，駱建海主編《西吳史學》，第 5 期，湖州師範學院歷史系，2015 年。

胡耀飛 B：《從防禦到割據：黃巢之變與唐末西北藩鎮的轉型》，周偉洲主編《西北民族論叢》，第 12 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

田衛衛 A：《從中原到敦煌——〈秦婦吟〉傳播原委新探》，高田時雄編集《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9 號，2015 年。

田衛衛 B：《〈秦婦吟〉之敦煌傳播新探——學仕郎、學校與詩學教育》，《文獻》，2015 年第 5 期。

田衛衛 C：《〈秦婦吟〉敦煌寫本新探——文本概觀與分析》，《敦煌研究》，2015 年第 5 期。

唐代中興名相研究述評（1970-2015 年）

唐代中興名相研究述評

（1970-2015 年）

邱顯鎮^{*}

提要

唐代中興名相有三，李泌、裴度、李德裕。他們在中晚唐政局散發出異樣的光芒，除了輔佐帝王、創造事功並影響大唐帝國國勢外，在文學領域的表現也極其優異，廣受文人所謳歌，在當時政文二壇皆有其地位。

因應唐代中興名相的特殊身份，人們對他們的生平、家世、交遊、學養、政事、事功、文學、生活及心靈活動等議題展露出興趣。自前世紀七、八〇年代起，便不斷給予關注，至今也已有一定成果。然而綜觀當前文、史學界皆尚無相關研究回顧、述評，故在此以臺灣及中國大陸的唐代中興名相相關研究成果，評介各時期的研究趨向與內容，並提供未來可資拓展與深化的研究方向，以供學界參考。

關鍵詞：唐代文學、事功、李泌、裴度、李德裕、中興名相

*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一、前言

在中國，常稱宰相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此可見宰相之稀有及尊貴。但在歷史的長河中，即便是貴為宰相，卻也非人人皆能名留青史。在唐祚前後近三百年（618-907年）的歷史中，受三省六部制與加銜宰相制的影響，雖然產生了三百六十九名宰相¹，但能受史家、文人或市井民眾所書寫、傳頌、記憶的卻是寥寥無幾。其中以「開國、盛世與中興」²三種名相最值得留意，相關的研究成果也較為豐富。本文便以唐代中興名相的相關研究成果（學位論文、期刊論文）作述評。

唐代中興名相的生成，在公元755年的安史亂後。其時唐朝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遭受巨幅震盪，一度有覆滅之兆。正當國運不濟、國勢頹敗時，卻仍有勤於政務、勇於改革且精勵圖治之「英主」與「名相」同時出現。他們為帝國注入生機，努力開創王朝新局，這便是著名的中興時期。而唐代著名的中興時期與中興名相有三：一是安史亂後的至德、貞元時，其時李泌助唐平亂、壓制外族，保全唐王朝並贏得相對安定的情勢，可說是唐祚一度危殆後的首次「中興」，其人亦是大唐首個中興名相；二是元和中興，裴度為此次中興最大功臣，尤以平定淮西之事蹟最為顯赫，為元和中興名相；三是會昌年間之會昌中興，其時李德裕深受武宗所信賴，外除邊患、內平藩鎮，同時又改革朝政、匡君是非，在國家統一、邊境安全及樹立國威等方面成果豐碩，是為會昌中興名相。唐代中興名相在極為特殊的時代、環境因素下產生，又能一反常態的創立事功，且某些中興名相在文學圈中也有相當程度的表現、地位與影響力，使得他們不僅受到歷史學界的關注，中文學界對唐代中興名相也逐漸表現出興趣。

¹ 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後序與《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集校》之前言，可知唐代宰相共三百六十九名。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75下，頁3465；趙超編：《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集校（上）·前言》（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

² 敝論《文學與事功——唐代中興名相研究》曾將唐代名相分為三類。詳見邱顯鎮：《文學與事功——唐代中興名相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2015年），第二章第二節，頁46-55。

唐代中興名相研究述評（1970-2015 年）

筆者在 2013 至 2015 年進行唐代中興名相的相關研究，曾蒐羅兩岸關於唐代中興名相的研究成果。有鑑於唐代中興名相相關研究的成長茁壯，而當前又沒有相關研究述評可供使用，故在此撰寫相關研究成果之回顧，以臺灣及中國大陸的唐代中興名相研究成果為主，評介各時期的研究趨向與內容，以供學界參考。

二、唐代中興名相研究成果述評

前面已有提到，李泌、裴度、李德裕三人為唐代中興名相。以下便圍繞這三人來進行相關研究成果之述評。

（一）李泌

與李泌相關的研究成果，自前世紀七〇年代尾聲一直延續至今，雖然數量不多，但也已有一定的基礎成果。以下將相關成果先列表並分析重點內容。

1. 學位論文方面

作者	論文名稱	出版年	核心內容
王淑端	《李泌與中唐政局》	1979	凸顯李泌在中唐的政治影響力，肯定他在肅宗、德宗朝之事功，兼論他的人生觀與智慧，認為李泌乃「救時之良相」。

2. 期刊論文方面

作者	篇名	出版年/月	核心內容
----	----	-------	------

³ 學位論文表格內文獻僅列「作者」、「論文名稱」、「出版年」及「核心內容」，其餘版本資訊詳見參考書目。且為避繁複，下文其它學位論文表亦同，不再另加說明。

⁴ 期刊論文表格內文獻僅列「作者」、「篇名」、「出版年/月」及「核心內容」，其餘版本資訊詳見參考書目。且為避繁複，下文其它期刊論文表亦同，不再另加說明。

李韜	〈試論李泌〉	1985	史家對李泌「毀譽迥異」，文中試就他的事功與人生態度提出看法，以明確歸納其人之特色。
何敦華	〈試論李泌在穩定中唐政局的作用〉	1986	簡介李泌生平，分析他積極輔政、穩定政局的種種作為，肯定其人的時代價值與貢獻。
盧華語	〈略論李泌〉	1986	說明李泌一生的各種事蹟，如早熟聰慧、好修道、時仕時隱、獻策定計等等。
李向平	〈難為中興卻能免禍全身的從政智慧——論唐中期政治家李泌〉	1991	分析李泌的各種事功，讚許他的政治策略，但卻因時局所困而難成「中興」。另一方面，更讚賞他時仕時隱的智慧，認為此乃其人能保全自身的關鍵。
馬亮寬	〈李泌與中唐政治〉	1995	分析李泌一生事蹟，並在歸納出三點特質。認為李泌有遠大之志向，而時仕時隱之作為，絕非為了沽名釣譽，亦非不沾政治、不聞世事，乃是保全自身之手段。
馬尚林	〈試論李泌〉	1996	討論李泌設謀略挽危局、調整皇室關係、穩定南方、定策安邊、解決政經問題之事，兼論他的處世哲學。
張金奎	〈李泌家學及入道原因〉	1997	說明李泌能通儒、道、兵三學，乃因其家學淵源所致。而他之所以入道，實際上乃是一種保全自身之手段。
沈世培	〈李泌與平定藩鎮割據〉	1998	分析李泌事肅、代、德三朝之做為及處世原則，讚許他為一代賢相。
陳宏對	〈李泌簡論〉	1999	簡論李泌在中唐政局上的建樹，且探討其人在政治漩渦中的進退與抉擇。
劉晶、吳豔玲	〈匡扶中唐政局的李泌〉	1999	有系統的條列李泌在中唐時，扶危定傾、穩定邊疆、直言上諫、改革弊端之做為，並分析其成果。
郝潤華	〈《鄴侯外傳》及其與《家傳》的關	2001/1	探討《鄴侯家傳》、《鄴侯外傳》二者的關係，並初步分析李泌在此二傳中的形象。

唐代中興名相研究述評（1970-2015 年）

	係〉		
韓文奇	〈李繁生年及其《相國鄴侯家傳》考辨〉	2005/9	探討李泌之後代「李繁」之生平，並將《相國鄴侯家傳》的內容與史傳、筆記之記載相比較，考證李泌各種形象形成之源流。
羅寧、武麗霞	〈《鄴侯外傳》與《鄴侯家傳》考〉	2010	比較《鄴侯外傳》與《鄴侯家傳》之異同，兼與史傳、筆記的文字相考證，挖掘李泌形象形成之源流。
劉海霞	〈困蕃之策：中唐名臣李泌的邊疆戰略〉	2011/10	探討安史亂後的唐蕃關係，並深入解析李泌困蕃之策實行之背景因素、過程、具體成果與缺失。認為困蕃之策乃是時政，而李泌僅是「時臣」。
劉海霞	〈由名臣李泌看中唐的邊疆經略〉	2012/8	探討中唐的唐蕃關係與唐王朝之邊境問題，剖析李泌當時對政治、經濟、文化與邊疆問題之各種策略與作為。
鄧小軍	〈杜甫與李泌〉	2012	探討杜甫寫到李泌的九首詩，挖掘他在詩中的寄託與隱喻。指出杜甫對肅宗的看法，並申明他對李泌所寄予的厚望。
鄧小軍	〈杜甫與李泌（下）〉	2012	關注杜甫與李泌之間連繫，探討雙方的同事關係、政治見解、理念、行動及道德觀。
汪武軍	〈“飄忽仕隱”之唐中興名臣——李泌述略〉	2012	簡述李泌的生平事蹟，討論他的事功表現，同時深入解釋他「飄忽仕隱」的作為與評價。
路學軍	〈道士宰相李泌與唐代中期政局〉	2012	分析李泌的身世與入道的經歷，探討他亦宦亦道的政治生涯，並肯定他對中唐政局的貢獻。
袁志鵬	〈李泌與唐德宗民族政策的轉變〉	2014	說明唐德宗時，對外民族政策的轉變，指出李泌在此轉變中擔任的重要角色。而此政策的轉變也直接影響的唐德宗以後，邊境情勢之改變。

從上面二表可知，在前世紀七〇年代末期就已有研究李泌之大篇幅專論。作為領航者，王淑端《李泌與中唐政局》一論，以史傳文獻為經緯，將李泌的一生與中唐政局相聯繫，同時也對他極為特殊的傳奇事蹟做出詮解，為後進提供了一個研究範本。自此之後，凡有研究李泌者，大抵也都遵循此法。而時間從八〇、九〇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與李泌相關的研究逐漸從「略論」、「試論」的嘗試性書寫深化到專門議題中，除了對他的生平背景之文

獻持續考究疏解之外，還試圖對他的事功與遊隱事蹟進行更深層的探討。以下就不同內容，分四點述評：

其一，討論李泌輔政治國、造就事功之內容者。這類研究成果豐碩，幾乎所有李泌研究之論文都與此有所牽扯，而最核心的治國方略及事功有三，一是「靈武定計」、二是「壓制藩鎮」、三是「聯回制蕃」。其中較具價值者如劉海霞的〈困蕃之策：中唐名臣李泌的邊疆戰略〉、〈由名臣李泌看中唐的邊疆經略〉，專門深入剖析李泌的對中唐邊境民族問題的認知與施為，並闡釋他外交與軍事策略的成功之處與缺失。其餘各論固然有其價值，但往往較早提出定論者，其論便不斷遭後人沿用，這使得研究方法過於僵化，論述內容雷同度亦高，令此研究之進程一直停滯不前。

其二，探究李泌尋仙求道、退避隱居事蹟者。這類研究的狀況與前述相似，在李泌研究之成果中，也是經常出現的議題。討論這方面議題者，多半將焦點集中在他在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年）時，為了避免李輔國、張良娣二人之陷害，故毅然遁隱以避禍。此論固有其依據，但因襲此論者卻太過氾濫，進而忽略了得以深究之多元背景。至少還應考慮李泌本身的志向，以及唐肅宗在安史之亂前後的作為與展露出的個性。且李泌隱逸之事蹟，除了上述之外，至少還有三次。探討這另外三次隱逸事蹟之內容，相信對李泌研究之進展也有極大之助益。

其三，以《鄴侯外傳》、《鄴侯家傳》為研究對象者。如郝潤華〈《鄴侯外傳》及其與《家傳》的關係〉、韓文奇〈李繁生年及其《相國鄴侯家傳》考辨〉、羅寧跟武麗霞〈《鄴侯外傳》與《鄴侯家傳》考〉等論，對李泌後人所作之《鄴侯家傳》、《鄴侯外傳》做出相當程度的考證。須知《鄴侯家傳》、《鄴侯外傳》乃是正史之外與李泌密切相關的珍貴文獻，雖然內容稍嫌浮誇，但它們仍提供了更多元的文獻資料，對考察李泌生平事蹟與形象極有幫助。

其四，考察李泌與當代文人之間的關係者。目前僅有鄧小軍〈杜甫與李泌〉、〈杜甫與李泌（下）〉二論，從杜甫的詩歌下手，自詩中的寄託與隱喻，探求杜甫對唐王朝再振興之希冀，以及對李泌個人的欽佩與期待。除此之外，作者同時兼論杜甫與李泌的同事關係、政治行動、政治見解、軍事見解及道德觀等，乃是與李泌相關研究成果中立意極新者，對於考察文人眼中的李泌形象有很大的貢獻。

（二）裴度

人們對裴度的關注，自前世紀八〇年代中期開始。時至今日，雖然相關成果數量不多，但因其其在政、文二壇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故研究的面向相對還是較為廣闊。以下分別由學位論文與期刊論文表列，並重點分析其中內容。

1.學位論文方面

作者	論文名稱	出版年	核心內容
江美英	《裴度與中晚唐政局》	1988	分析裴度在中晚唐政壇中的浮沈，探討他的政治作為與貢獻，兼論其人對政局之影響力。
陳玉雪	《裴度交往詩研究》	1995	簡述裴度的家世與生平，申明他與文學的關係，並探討他的交往詩。旨在釐清裴度的交往狀況，同時彰顯他人眼中裴度的形象，以突出其人在中晚唐政壇、文壇中的特徵與地位。
單凌寒	《裴度與中唐文學》	2012	探討裴度與中唐文人、詩人的交往狀況。從交往詩中，挖掘彼此交流而產生的各種文學影響。釐清裴度的文學與古文運動、閒適詩風之間的關係。

2.期刊論文方面

作者	篇名	出版年/月	核心內容
趙云旗	〈論裴度在平淮西中的作用〉	1984	認為史學界低估裴度在淮西戰役中的具體作用。具體分析裴度在此役中，內反妥協、外抗藩鎮，堅持其主張，最終成功伐叛之種種。
彭易芬	〈淺談裴度在元和年間反對藩鎮割據鬥爭中的作用〉	1987	探討裴度在元和年間，如何能夠堅持己見，反對妥協勢力，堅定憲宗伐叛思想，最終成功蕩平淮西叛鎮。
呂武志	〈裴度的文學觀和散文〉	1992/4	由裴度〈寄李翱書〉來闡明其人宗經傳道、達心窮理，同時又反對詭奇雕飾的文學思想。
鐘再琴	〈裴度與中唐詩人〉	1994	探討裴度的交往狀況與文學表現，集中在他與韓愈、白居易、劉禹錫的互動之中。
董克昌	〈淺談裴度的忠誠與擇人〉	1994	探討裴度的忠誠之心的具體表現與根源，分析他的大儒思想與政治作為，兼論他擇人的標準。
賁大強、王曉	〈裴度與淮西之亂的平定〉	1997	分析淮西之亂之所以得以平定的時代、環境因素，肯定裴度平定淮西的貢獻，同時也指出平定

如			淮西對當時唐王朝的助益。
趙建梅	〈裴度在洛陽的文酒生活及其詩歌創作〉	2005	探討裴度任職洛陽的原因，同時深入瞭解他在洛陽的生活。分析他的交往狀況與相關詩作，並凸顯其人在文壇的地位。
張少華	〈論裴度與淮西戰役〉	2005/11	申明裴度力主平叛的立場，同時分析他趕赴淮西前線後的具體作為。稱裴度是「橫身冒難以輔天子」的主要決策人。
黃樓	〈〈平淮西碑〉再探討〉	2006/12	詳細的分析韓愈〈平淮西碑〉與段文昌重撰〈平淮西碑〉的原委，談到皇帝以文治武的內在期望；又文中對唐、宋、明、清時對此二碑的相關論辯也有詳細討論。
鐘華	〈裴度與中唐文壇〉	2007	分析裴度在平定淮西前後的文學表現，並集中探討他被貶洛陽後的文學活動，說明他在當時文壇的影響力。
陳鈺玟	〈談韓愈〈平淮西碑〉的公平性〉	2008/3	分析韓愈〈平淮西碑〉中的立場與觀點，解釋他褒裴度而抑李愬的原因。
徐子方	〈道德和命運的博弈——關漢卿《裴度還帶》剖析〉	2008/11	探查關漢卿《裴度還帶》一劇的取材與立意，解析劇本之內容，彰顯裴度的歷史形象與劇中形象的呼應關係。
鄭英玲	〈韓、段〈平淮西碑〉對比分析〉	2008/8	比較韓愈、段文昌〈平淮西碑〉二者，從文體之差別、內容之差異、立場之不同、後人評價之懸殊等方面分析。
劉豔萍	〈裴度分司東都與大和末年洛陽的詩歌唱和〉	2009	討論裴度分司東都時的生活，分析他的交往狀況與唱和作品。
魏波	〈裴度還帶故事發展演變探析〉	2010	分析〈裴度還帶〉故事文本之流傳狀況，探討故事中的古代相術，發掘故事背後的文化意涵。
萬德敬	〈柳宗元與裴度交遊考論〉	2011	探討柳宗元與裴度之間的關係及交往狀況。以劉禹錫為比較組，指出柳宗元沒有因二人的交往而獲得太多幫助。

唐代中興名相研究述評（1970-2015 年）

陳冠明	〈裴度集團平叛日曆簡編之一〉	2012/1	探討唐憲宗元和年間，以裴度為首形成的政治利益兼文學創作集團，他們的政治與文學活動內容。通過各種考證的功夫，將各大事件依時間先後繫年、月、日，並分析事件發生之原因、狀況與影響。
陳冠明	〈裴度集團平叛日曆簡編之二〉	2012/5	同上。
楊文春	〈論元和淮西戰爭的首功之臣〉	2012	辨析唐憲宗元和年間淮西戰役中的三大功臣，裴度、李愬、李光顏三人的表現與具體功績。
劉豔萍	〈唐宋洛陽分司長官對文人群體的影響——以裴度、錢惟演、文彥博、韓絳為中心〉	2013/8	分析唐宋時期分司東都的長官與當地文人的交往狀況，其中有部分以裴度為討論主題。
杜學霞	〈裴度、元稹矛盾對中唐文學的影響〉	2014/1	分析中唐時期，裴度、元稹二人由融洽到惡化、矛盾之政治關係，不僅影響政壇，同時更對中唐文壇與文學發展產生影響。

自上列二表可見，在前世紀八〇年代中期開始，大陸地區的學者如趙云旗有〈論裴度在平淮西中的作用〉、彭易芬有〈淺談裴度在元和年間反對藩鎮割據鬥爭中的作用〉，以及臺灣地區的江美英有《裴度與中晚唐政局》等論，他們率先提出研究裴度之成果，其著眼點都在著名的淮西戰役，以此概括他一生最主要的政治活動，也就是「堅定帝王之伐叛思想」與其後的「整肅藩鎮」。當然，除了「伐叛」之外，裴度還有許多事功與作為，然而人們往往仍以他「平定藩鎮」之事蹟為核心，其它事功就僅有點綴之效。而在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後，人們在裴度事功表現與政局影響連動關係之研究仍持續發展。在不斷探尋的過程中蛻變出三種全新的議題，它們橫跨了文學與文化的範疇，並跟裴度顯赫之事功密不可分：

其一，以裴度的文學表現、交涉事蹟及圍繞著他形成的文人集團為主要研究對象者。如呂武志〈裴度的文學觀和散文〉一論，就試圖自裴度的文學作品來闡釋其人為文之宗旨，以凸顯裴度的文學觀及其散文之內容與價值；又如陳玉雪《裴度交往詩研究》、單凌寒《裴度與中唐文學》兩篇碩士論文，

探討裴度的詩文及唱酬應和之內容，藉此釐清他與當時文人來往、共同創作的相關情況；而以相似主題研究的還有鐘再琴〈裴度與中唐詩人〉、趙建梅〈裴度在洛陽的文酒生活及其詩歌創作〉、鐘華〈裴度與中唐文壇〉、劉豔萍〈裴度分司東都與大和末年洛陽的詩歌唱和〉……等，這些文章不僅分析裴度的詩文與交往狀況，同時對當時東都文人群體的形成也有討論，在研究裴度對當時文壇、文學集團的影響力等方面有很大的幫助。此類議題為裴度相關研究注入極大的活力，在研究成果接連問世的過程中，亦大大的加重了裴度研究在中唐文學史中的地位。當然，此種研究也成為近二十年來裴度研究的主流，且持續不斷的發展。

其二，以淮西戰役首功之人的爭議為研究對象者。如楊文春〈論元和淮西戰爭的首功之臣〉，便對淮西戰役首功之人選提出質疑，將裴度、李愬、李光顏三人置於天秤上估量，辨析他們的具體事功與影響，企圖找出淮西戰役中最有影響力的名臣。而實際上有關淮西戰役「首功」的爭論在唐代早已展開，最顯著的便在韓愈〈平淮西碑〉與段文昌〈平淮西碑〉的差異上。這個議題頗具研究之價值，今人如黃樓〈〈平淮西碑〉再探討〉、陳鈺玟〈談韓愈〈平淮西碑〉的公平性〉、鄭英玲〈韓、段〈平淮西碑〉對比分析〉等，在他們的文章中就詳細討論了韓碑與段碑撰寫的背景與目的，一方面展現帝王重文抑武的內在期望，另一方面更證明了裴度便是當時掌權者所衷心期盼的角色，此亦可見其人身地位的特殊性與影響力絕不容小覷。

其三，因應裴度曾被形塑成小說人物，便有專門討論小說文本與其中裴度形象者。如徐子方〈道德和命運的博弈——關漢卿《裴度還帶》剖析〉、魏波〈裴度還帶故事發展演變探析〉，便是探討小說故事之內容，釐清裴度之所以被選為小說人物之原因，同時還分析故事演變之軌跡脈絡。這方面的議題，往往以裴度平庸的外貌對比其宰相身分及顯赫之事功，除了有相當程度的教化功能外，同時也反應了唐代選舉制度的特殊文化。

（三）李德裕

李德裕作為中晚唐最後一位中興名相，因其顯赫的事功、特殊的地位以及文學造詣之高超，使得歷來學者一直都對他充滿興趣。以下分別由學位論文與期刊論文表列，重點分析其中內容。

1.學位論文方面

表 1-5 李德裕研究學位論文表

唐代中興名相研究述評（1970-2015 年）

作者	論文名稱	出版年	核心內容
湯承業	《李德裕研究》	1970	深究李德裕的生平、家世、交遊、學養、政事、事功、文學、生活及心靈活動等，尤以歷典州鎮、改革朝政及戰時方略的分析與討論特別精闢。並將李德裕與唐代十五名相相比較，凸顯其人的政治作為、政治藝術與歷史地位。
羅燕萍	《李德裕及其詩文研究》	2003	研究李德裕的詩文，簡論其詩賦中隱含之物我寄託及憂患意識，並探討其人政治應用文的美感、特色與價值。
徐曉峰	《李德裕創作心態研究》	2006	分析李德裕文學面貌形成之外在因素與內在意識，兼論他對自我身份的期待與實踐。
耿美香	《李德裕詩文用韻研究》	2006	分析李德裕的詩、賦及雜體散文的用韻情況，挖掘其詩文押韻的語音內涵。以張仲素的律賦為比較組，對比李德裕的文賦，藉此釐清唐代文賦與律賦本質上的異同。
方海林	《李德裕的文學創作及其與文壇關係》	2006	探討李德裕的政治應用文、史論雜文、詩賦等，發掘他的創作動機、目的以及風格，並伸張其人文學的源流與對當代文壇的影響。
高瑋	《李德裕賦作研究》	2006	分析李德裕賦作的創作背景、動機及思想。指出其賦透露出對「永恆」與「平穩」人生之追求，以及對佛、道教之態度，還有對隱逸生活之嚮往。最後更探討其賦之藝術特色及源流，可溯及屈賦及漢賦之傳統。
韓鵬飛	《論李德裕的政論文》	2008	探討李德裕政論文。將他與韓愈的政論文相比較，以為其人之文章有因襲古文運動的跡象，但在藝術表現方面比韓愈更為突出。
李進寧	《李德裕政論文思想內容研究》	2010	結合李德裕生平經歷和文學、政治思想，探討其人政論文的文學價值、思想內涵、實用功能，並伸張其人的歷史地位與影響力。
唐誕	《李德裕詩文研究》	2012	從李德裕的政論文、賦作與詩歌三方面下手，研究其人的為人與事功、生活經歷與情感體驗，同時彰顯李德裕的品德與操守。

2. 期刊論文方面

表 1-6 李德裕研究期刊論文表

作者	篇名	出版年 /月	核心內容
----	----	-----------	------

湯承業	〈論李德裕的「雙軌」取士——既主張科舉又崇尚門第〉	1972/12	論析李德裕不喜科試的源由，詳細探討他取士之標準，駁斥「李德裕抑薄進士」之觀點。
湯承業	〈李德裕的相業與學業〉	1973/1	探討李德裕的學習歷程與學養內涵，聯繫他為相之作風與其學業之間的關係。
湯承業	〈論李德裕裁抑闈寺的謀略〉	1973/3	分析唐代闈禍生成之原因，並辨明李德裕「緩急為用」、「去其爪牙」以對付闈寺的策略。
湯承業	〈晚唐黨禍試釋——論李德裕無黨及其破除朋黨〉	1973/7	分析中唐後的黨爭狀況，並質疑李德裕為李黨黨魁身份的真实性與正當性，更申張其人破除朋黨之立場及使用之策略。
湯承業		1973/7	詳盡考述李德裕祖孫三代的家世背景、政治作為、學養風度等內容。
李學綱	〈李德裕在西川〉	1975/6	探討唐代川蜀地區開發狀況，比較歷任首長的政績，並在最終襯托出李德裕治蜀之功績。
湯承業	〈李德裕與唐代十五名相互比較論〉	1976/6	將李德裕與唐代十五名相互比較，凸顯其人的政治作為、政治藝術手腕與歷史地位。
湯承業	〈唐相李德裕國計與民生合一的經濟建設〉	1983/1	探討李德裕在地方與中央的經濟政策、建設，以及具體作為、成就等。
周建國	〈富有文才的名相李德裕〉	1991	讚賞李德裕之文才，將其文學分成三種類型，系統性的探討其中內容。
陳建樑	〈李德裕政風二題〉	1994	分析李德裕對藩鎮的裁抑以及對科舉的改革。
楊積慶	〈三鎮浙西、出入十年——李德裕與鎮江〉	1994	分析李德裕三次出鎮浙西的背景因素，並探討他鎮浙西期間的具體作為與實績。
粟美玲	〈李德裕與“會昌之政”〉	1995	簡述李德裕入仕之經過，並條述他會昌年間與唐武宗合力佈政之狀況。
封野	〈論李德裕與會昌滅佛之關係〉	1998	釐清李德裕在唐武宗會滅佛這一事件中的作為，標舉具體事證證明他當時權勢已大不如前，應無法主導此事。
傅璇琮、周建國	〈中晚唐政治文化的一個縮影——寫在《李德裕文集校箋》出版前〉	1998	綜述李德裕的生平、事功、文學、交往等內容，將他的各種活動與作為與中晚唐政治緊密扣合。同時更詳細分析李德裕自編之詩文集，以及至今流傳的狀況。

唐代中興名相研究述評（1970-2015年）

傅璇琮、周建國	〈李德裕及《會昌一品集》研索〉	1998/10	說明李德裕研究有助於釐清中晚唐的文人及政治活動。而要研究其人，則必須先從考證基本史料之真偽、整理校定其文集下手。故文中分析李德裕《會昌一品集》的成因，以及歷代流傳的狀況。
傅璇琮	〈《李德裕年譜》新版題記〉	1999/12	認為中晚唐政治、文學無法脫離牛李黨爭的範疇，申明研究李德裕有助於理解中晚唐文學情況。並講述編寫《李德裕年譜》所用之方法與歷程。
房銳	〈李德裕在西川〉	2001	討論李德裕的人格特質，並分析他出鎮西川時的具體功績。
傅璇琮	〈一心為學，靜觀自得——《李德裕年譜》新版題記及補記〉	2001	聲明「牛李黨爭中，核心人物是李德裕。中晚唐文學的複雜情況，需要從牛李黨爭的角度加以說明」。直指研究李德裕的重要性，並說明《李德裕年譜》中的缺失，且添補了新的資料。
孫敏	〈李德裕〈文章論〉考證及其文學觀〉	2003	以李德裕〈文章論〉為主題，從中辨明他的文學觀，指出其人在不同時期、不同狀況下的文學觀是有變化的。
李文才	〈試析唐代贊皇李氏之門風——以李棲筠、李吉甫、李德裕政風之比較為中心〉	2005	討論李德裕祖孫三代的行政作風、政治態度、為人處世、道德文章等方面，發掘其中的傳承性與差異性。
趙建梅	〈試論李德裕的平泉詩〉	2005	分析李德裕平泉詩的意象與意境特點，挖掘這些特點形成的深層原因，同時暴露出其人隱逸思歸之情緒。
張珠龍	〈李德裕“政文一體”生命體驗淺析〉	2008	探討李德裕文章融駢入散的藝術特徵，及其人文章經世論說的特質。指出李德裕乃是「政文一體」的英雄人物。
曲景毅	〈論李德裕的公文創作與《左傳》、《漢書》之關係〉	2009	聯繫李德裕公文創作與《左傳》、《漢書》之間的關係，認為他善於援引故事，並以兼顧實用與美感的文章輔佐帝王，更由此創立會昌中興之局勢。
李進寧	〈論李德裕〈文章論〉的美學意蘊〉	2009	分析李德裕〈文章論〉中透露出的「氣貫說」、「不拘音韻說」、「揚棄說」等，認為他的文章乃是中晚唐文學的一項指標，在當代有

			範本性，對後代也有誘導和影響作用。
李文才	〈李德裕政治思想研究〉	2010	從李德裕的政功、作為以及文章，分析其人尊君主、親賢臣、遠小人、重務實、重名節、立功業、反朋黨、尚權變的政治思想。
曲景毅	〈論李德裕制詔奏議之作風〉	2010	分析李德裕制詔奏議之文章中「氣象雄毅而有英雄本色」、「簡嚴中能盡事理」、「辭情兼備又能明白曉暢」的特質。
曲景毅	〈李德裕賦與中晚唐賦的發展〉	2010	認為李德裕賦作駢散相間而語義自然，並以議論入賦，在中晚唐文壇獨樹一格，更影響了後代賦作的發展。
韓鵬飛、楊泉	〈論李德裕的政論文藝術風格〉	2010	指出李德裕政論文以才情為主，風格尚實；以壯為美，風格雄健。
許東海	〈宰相·困境·家園：李德裕辭賦之罷相書寫及其陶潛巡禮〉	2010/12	深入研究李德裕的文學作品，探討其人罷相被貶後的文學活動與作品內容。指出李德裕乃是以宰相身份展開陶潛巡禮之人。
楊發鵬	〈論李德裕在會昌滅佛中的作用〉	2011	辨析李德裕在會昌滅佛中的具體作為，認為會昌滅佛並非出自他的安排，其人在當時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許東海	〈李德裕袁州辭賦的動物鋪陳與人生沉思〉	2011	以李德裕放逐南楚時的文章為研究對象，分析其中與動物書寫相關的作品。由珍禽困境、蟲獸隱喻等方面著手，發掘李德裕逐臣身份下的自我對話與情志脈絡。
陳小芒、曹淼	〈李德裕袁州賦作的遷謫情懷〉	2011	分析李德裕遷謫袁州時的賦作，挖掘其中對仕途險惡的憂懼化解，以及對異域山林的眷戀思慕，反應他在袁州期間的政治心態跟文學情懷。
許東海	〈宰相辭賦與家族地圖——李德裕罷相時期辭賦之花木書寫及其文化解讀〉	2011	從屈騷香草美人隱喻的文學傳統對話入手，並以李德裕家族的記憶與文化背景，分析其人放逐南楚時的文章。從其中挖掘出李德裕的家族記憶、祖德先志、門第風範等內容。
肖俊玲	〈從詩賦看李德裕的仕隱矛盾〉	2011	以李德裕仕途之起伏為線索，解讀他詩賦中所透露出的仕隱矛盾，並由此分析他的政治心態。
傅璇琮、周建國	〈政治實踐是評述歷史人物的重要標〉	2012	詳細的說明《李德裕文集校箋》編成之方法與過程，申明「政治實踐是評述歷史人物的

唐代中興名相研究述評（1970-2015 年）

	準——《李德裕文集校箋》新版訂補概述》		重要標準」，並以此凸顯他的政治事功及歷史地位。主張歷史人物及其撰寫的歷史文本在特殊的時代具有特殊的意義，故《李德裕文集校箋》的編成意義非凡。
黃曉、劉珊珊	〈唐代李德裕平泉山居研究〉	2013	詳細的研究李德裕的平泉詩與平泉山居。探討平泉山居的成因、定位其地理位置、考證內部的建築與山水花草等景物的配置及內容。
肖俊玲	〈李德裕與平泉山莊——一個私人領域的文化解讀〉	2013	討論李德裕經營私領域的經驗及生活，將他的「平泉體驗」自當時遊賞宴飲、園林酬唱的模式中區別出來，是中晚唐苦心經營卻不得善終的一種典型。這種典型對唐代以後的詩風與士風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許東海	〈南國行旅與物我對話——李德裕罷相時期的辭賦書寫及其困境隱喻〉	2013/9	深入探討李德裕首次罷相後辭賦書寫之特殊意義，探討他在其中開展的人生探索。指出其人以南楚的山川風物為主要題材，透過南國行旅以及物我對話重新審視自我，展現出強烈的困境隱喻。
朗瑞萍、葉會昌	〈趙郡李氏遷徙與唐代詩歌發展——以李德裕家族為個案〉	2013	由李德裕祖孫三代的家族經營、遷徙、交遊、從政等記憶，來連結、分析他們不斷組織的文學活動、文學創作。同時也討論趙郡李氏的文學活動對當時文壇之影響。
王思豪	〈身歷仕宦風波中魂入山泉逸境來——李德裕“知天命”之年的山水賦書寫〉	2014	指出李德裕〈大孤山賦〉、〈望匡廬賦〉、〈靈泉賦〉三篇山水賦在唐代的稀有價值；更探討賦中「傲然挺立」、「些許皈依」、「嚮往歸隱」的內涵，藉此更加瞭解他知天命之年後的心境轉變。
賴瑞和	〈唐後期三大類詞臣的升遷與地位——以白居易、元稹、權德輿、李德裕為例〉	2014/9	以白居易、元稹、權德輿、李德裕為例，探討唐德宗以後，學士院之詞臣如何晉升，在政治上、文壇中又有何影響力。而詞臣雖然未必能握有實權，但卻能開創文風、引領文壇。
吳程玉	〈游壽《李德裕年譜》考證的文獻價值〉	2015/2	文中點出游壽《李德裕年譜》中幾個重要的段落，並詳引其考證之經過，大力讚許游壽作《李德裕年譜》之價值。

由上列二表可知，三位唐代中興中，與李德裕相關的研究成果最為豐碩。早在前世紀七〇年代初到八〇年代中期，台灣學者湯承業所撰之多篇論文，就已對李德裕的生平、家世、交遊、學養、政事、事功、文學、生活及心靈活動等方面的文獻與議題，做了相當程度的考究、疏解、論證、塑型的連續性工作。不過湯承業為政治學背景，其關切之重點多在政治人物之養成、政治制度的推展、實績的取得、對政局影響等，真正深入文學作品的成果相當有限。但他仍為後來學者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研究範式，提前揭示了往後四十多年李德裕研究的輪廓與梗概。以下筆者試著統合前世紀七〇年代至今的李德裕研究成果，分三類述評：

其一，如陳建樑〈李德裕政風二題〉、楊積慶〈三鎮浙西、出入十年——李德裕與鎮江〉、粟美玲〈李德裕與“會昌之政”〉、房銳〈李德裕在西川〉、李文才〈李德裕政治思想研究〉……等論，有考究李德裕生平者，可以知悉其人成長之背景與脈絡；有綜合討論李德裕政治思想理論者，可以知道他的政治品格、權變思想與政治態度等；也有專門討論不同時期特別事功者，包含了改革科舉、出鎮浙西、治理西川、討伐回鶻、會昌中興、會昌滅佛等等，分析其事功對當世的影響及進步意義等。這些研究成果不斷的層層堆疊，有的因循前人，亦有蛻變出全新成果者。但不論如何，就如傅璇琮、周建國論文題目所云「政治實踐是評述歷史人物的重要標準」。人們對李德裕特殊的身份與際遇展現強烈興趣時，進一步探討其人的政治思想與政治活動，所為的便是想替他尋得一個更客觀、更多元、更加豐沛的形象，以利於賦予他最正確的歷史之定位。

其二，除了研討李德裕政治面的論文外，他的文學作品及文學活動，在九〇年代後也逐漸受人關注。有趣的是，詩賦固然讓李德裕在文學界有一定的名聲，但真正讓他盛名遠播的卻是與政事及事功相結合的應用文、政論文。這也讓早先研究李德裕政治議題的論文得以與他文學面結合，不過根據研究的詩賦及文章的不同，實作時又有許多差異。一般來講，學位論文的篇幅較大，能包容較多議題，所以如羅燕萍《李德裕及其詩文研究》、徐曉峰《李德裕創作心態研究》、方海林《李德裕的文學創作及其與文壇關係》、唐誕《李德裕詩文研究》等論，兼顧了官文書的應用文、政論文與一般的詩賦，對李德裕的事功觀、文學觀有較全面的深究。而他們最大的共通點，往往都將李德裕的〈文章論〉奉為其文學的核心觀念，並由此延伸，舉凡李德

裕的官文書、賦作、詩作都可拿來與他的〈文章論〉比較、印證；不過仍有不少研究僅擇某一類型深入探討，如韓鵬飛《論李德裕的政論文》、李進寧《李德裕政論文思想內容研究》、張珠龍〈李德裕“政文一體”生命體驗淺析〉、曲景毅〈論李德裕制詔奏議之作風〉、韓鵬飛跟楊泉〈論李德裕的政論文藝術風格〉等等，這些文章便專以李德裕官文書的應用文、政論文為研究對象，有追溯他公文創作觀念之源頭者，也有討論他文章作風、藝術風格與實際功用者；當然，除了官文書，人們對李德裕的詩賦也很著迷。自本世紀初開始，李德裕詩賦研究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冒出，如耿美香《李德裕詩文用韻研究》、高瑋《李德裕賦作研究》、曲景毅〈李德裕賦與中晚唐賦的發展〉、許東海〈李德裕袁州辭賦的動物鋪陳與人生沉思〉……等論，有分析詩賦體式、用韻方法者，亦有探討創作動機、心態者，更有挖掘詩歌寄託與隱喻內容者。最值得注意的是近五年，學者將他的文學作品與仕宦生涯、生命歷程之起伏緊密扣合，分析、演繹他自外在景物的觸發和內在心靈的感知，以及審視過往、當下並展望將來後得到蛻變的整體過程。總體而言，就當今李德裕詩文研究發展如此迅速的狀況來看，此類議題往後也必定能繼續成長、茁壯。

其三，以李德裕平泉詩、平泉山莊為研究對象者。此類議題與前述文學方面重疊，但在私領域、生命探索方面卻值得再立論深究，在許多研究中也都可見部分討論。而在一系列論文中，筆者特別留意到黃曉、劉珊珊所撰的〈唐代李德裕平泉山居研究〉，這篇研究所使用的方法相當新穎，討論平泉山居的成因、背景，分析它的地理位置，同時還詳細考證平泉山居內部的山水花草等景物。且因作者二人為建築學院背景，不受正統中文學院之束縛，更能從不同的角度予以觀照，得在眾多李德裕研究中別開蹊徑，其勇氣、創意與實踐力相當值得肯定。

最後，還有一部分的文章獨立於上述三類之外，如傅璇琮等人的〈中晚唐政治文化的一個縮影——寫在《李德裕文集校箋》出版前〉、〈李德裕及《會昌一品集》研索〉、〈一心為學，靜觀自得——《李德裕年譜》新版題記及補記〉、〈政治實踐是評述歷史人物的重要標準——《李德裕文集校箋》新版訂補概述〉，這些多是研究專書出版前後的序言或補充。而傅璇琮為研究李德裕之權威，這些文章講述他《李德裕年譜》、《李德裕文集校箋》這

類李德裕研究核心成果的編撰過程與發現、研究方法與心得等，相當具有典範價值，可供往後學者參考、治學之用。

三、結語

在回顧不同時期的李泌、裴度、李德裕三位唐代中興名相研究之後，可以很輕易的發現人們在前世紀七、八〇年代開始對他們展露興趣並開始進行研究。此後的研究雖然都持續茁壯，但就議題的豐富度與成熟度來講，李德裕居首、裴度第二、李泌則是第三。

先看到李泌研究的部分。就前文所見，大篇幅研究李泌之成果只有王淑端《李泌與中唐政局》此孤例。而單篇論文方面雖有固定成果，但內容多局限在史傳資料的分析與歸納，僅探討他的事功、對當局之影響及些許隱逸的事蹟。在文學方面，也僅有鄧小軍〈杜甫與李泌〉、〈杜甫與李泌（下）〉二文，注意他與當代文人的聯繫。由上可知，至今李泌研究之發展與進程不太活絡，這當然與文獻資料有限，尤其是文學作品散佚極多有關。然而以專門人物研究來講，單在李泌推展政策、造就事功方面，仍可與其時之政經社會、朝廷權勢、人物心理等研究結合，需要更多系統性的論述。而有關他隱逸的動機與過程，也可以結合前述事功研究之成果，並以筆記小說、詩作雜文為輔，予以更多的關照。又關於文學表現方面，則更需要學者齊力發掘隱沒的資料，期望能有更多的突破。以上乃是往後欲研究李泌者可發力、切入深究之方向。

再看到裴度。比起李泌，裴度擁有較豐富的史傳文獻與文學作品傳世。至今為止，大篇幅的論文雖然也不多，但也涵蓋政治事功、文學活動與人際交往等議題。然而，裴度在元和中興的關鍵戰役中表現太過亮眼，使得大部分研究他政治事功者，多著眼在淮西一役中，而少關注他其它的事功。筆者以為，盪平淮西之功對裴度固然意義重大，然而仍不應忽略他其它方面的作為，否則對其人的認識便會有所偏隅且不完整。而關於裴度的文學活動，現有的成果偏向他與文壇要人交往、贈酬應和方面之內容。這些成果相當寶貴，但在前人的研究中，對於他投身文壇的原因以及過程仍可深入，也必須整合其人政治事功、仕宦生涯、文學活動、私人生活等各方面的研究探討，

方能釐清其完整之脈絡。最後，筆者深覺裴度在唐代大臣羣相中極為特殊，宜將他與各時期的名臣、名相相比較。他既有相才、亦有將才、更有文才，而其人雖然仕途起伏，但在大寶之上多秉朝衡、受貶時亦中隱自如，此非一般朝臣官員、文儒、儒將可概括者。往後應可著眼於此，在相互比較之下，為其塑型造相，甚至藉此推展、釐清不同時期朝廷核心官員之質性與生活軌跡、生命脈絡。

最後看到李德裕。觀前文可知，李德裕研究從早年生平傳記、政治事功等文獻的抄攝考據、排比引證等，到近年兼融公領域與私領域之範疇，深入探討其人生活脈絡與思想內容，並延伸到文學活動與作品的疏解等，分工越趨細膩、重點也越來越偏向個人內在思想、情志等心靈活動的闡發。加上各方研究者都能廣納文獻、詳加考究，乃至於有《李德裕年譜》、《李德裕文集校箋》等集大成之專書問世，更為李德裕研究之環境提供相當良好的發展背景。在此種研究進程、背景之催化下，相信在後人充分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更能全方面的探討李德裕的政治活動、文學活動、心靈思想活動等內容。而就筆者之觀察，往後相關研究應可以其人形象之變化為突破點，從史傳的記載、自我書寫的文字、他人書寫的作品以及前人比較少關注的筆記小說的內容中，在李德裕「李黨黨魁」、「會昌第一大手筆」、「會昌中興名相」等基礎面貌上，來進一步探討他的政治、文學的繼承、表現與影響，並賦予他更加多元、更豐沛的形象。

參考書目

(依「文獻年代」升冪排列。)

一、期刊論文

- 湯承業：〈論李德裕的「雙軌」取士——既主張科舉又崇尚門第〉，《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26期，1972年12月，頁233-254。
- 湯承業：〈李德裕的相業與學業〉，《書和人》第203期，1973年1月，頁1-5。
- 湯承業：〈論李德裕裁抑閹寺的謀略〉，《食貨月刊》第2卷第12期，1973年3月，頁617-624。
- 湯承業：〈晚唐黨禍試釋——論李德裕無黨及其破除朋黨〉，《中國學人》第5期，1973年7月，頁41-74。
- 湯承業：〈李德裕的家世考述〉，《東海學報》第14卷第6期，1973年7月，頁1-19。
- 李學綱：〈李德裕在西川〉，《國立編譯館館刊》第4卷第1期，1975年6月，頁175-193。
- 湯承業：〈李德裕與唐代十五名相比較論〉，《國立編譯館館刊》第5卷第1期，1976年6月，頁69-117。
- 湯承業：〈唐相李德裕國計與民生合一的經濟建設〉，《臺北市銀月刊》第14卷第1期，1983年1月，頁45-64。
- 趙云旗：〈論裴度在平淮西中的作用〉，《山西師大學報（會科學版）》1984年第2期，頁73-78。
- 李韜：〈試論李泌〉，《許昌學院學報》1985年第3期，頁61-66。
- 何敦華：〈試論李泌在穩定中唐政局的作用〉，《歷史教學》1986年第2期，頁20-23。
- 盧華語：〈略論李泌〉，《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頁80-85+122。
- 彭易芬：〈淺談裴度在元和年間反對藩鎮割據鬥爭中的作用〉，《內江師範學院學報》1987年第1期，頁51-58。

唐代中興名相研究述評（1970-2015年）

- 李向平：〈難為中興卻能免禍全身的從政智慧——論唐中期政治家李泌〉，
《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4期，頁33-38。
- 周建國：〈富有文才的名相李德裕〉，《文史知識》1991年第11期，頁78-82。
- 呂武志：〈裴度的文學觀和散文〉，《中國學術年刊》第13期，1992年4月，頁165-188。
- 董克昌：〈淺談裴度的忠誠與擇人〉，《求是學刊》1994年第5期，頁95-100。
- 鐘再琴：〈裴度與中唐詩人〉，《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頁47-52。
- 楊積慶：〈三鎮浙西、出入十年——李德裕與鎮江〉，《鎮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4期，頁40-44。
- 陳建樑：〈李德裕政風二題〉，《史學月刊》1994年第6期，頁26-31。
- 馬亮寬：〈李泌與中唐政治〉，《歷史教學》1995年第10期，頁43-47。
- 粟美玲：〈李德裕與“會昌之政”〉，《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頁82-85。
- 馬尚林：〈試論李泌〉，《西南民族學院（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2期，頁50-57。
- 張金奎：〈李泌家學及入道原因〉，《文學雜誌》1997年第5期，頁30-32。
- 龔大強、王曉如：〈裴度與淮西之亂的平定〉，《唐都學刊》第13卷第1期，1997年，頁9-12。
- 沈世培：〈李泌與平定藩鎮割據〉，《鐵道師院學報》第15卷第2期，1998年，頁81-84。
- 傅璇琮、周建國：〈中晚唐政治文化的一個縮影——寫在《李德裕文集校箋》出版前〉，《河北學刊》1998年第2期，頁101-109。
- 封野：〈論李德裕與會昌滅佛之關係〉，《江蘇社會科學》1998年第3期，頁133-138。
- 傅璇琮、周建國：〈李德裕及《會昌一品集》研索〉，《唐代文學研究》第7輯，1998年10月，頁664-677。
- 陳宏對：〈李泌簡論〉，《淮南師專學報》第1卷第4期，1999年，頁47-50。
- 劉晶、吳豔玲：〈匡扶中唐政局的李泌〉，《齊齊哈爾大學學報》第6期，1999年，頁62-63。

- 傅璇琮：〈《李德裕年譜》新版題記〉，《書目季刊》第33卷第3期，1999年12月，頁147-150。
- 郝潤華：〈《鄴侯外傳》及其與《家傳》的關係〉，《中國典籍與文化》第36期，2001年1月，頁44-48。
- 房銳：〈李德裕在西川〉，《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頁69-71。
- 房銳：〈李德裕治蜀〉，《文史雜誌》2001年第2期，頁70-72。
- 傅璇琮：〈一心為學，靜觀自得——《李德裕年譜》新版題記及補記〉，《中國文化研究》2001年第2期，頁36-39。
- 孫敏：〈李德裕〈文章論〉考證及其文學觀〉，《西華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頁118-122。
- 趙建梅：〈裴度在洛陽的文酒生活及其詩歌創作〉，《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2期，2005年，頁29-33。
- 李文才：〈試析唐代贊皇李氏之門風——以李棲筠、李吉甫、李德裕政風之比較為中心〉，《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頁77-82。
- 趙建梅：〈試論李德裕的平泉詩〉，《文學遺產》2005年第5期，頁141-144。
- 韓文奇：〈李繁生年及其《相國鄴侯家傳》考辨〉，《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5期，2005年9月，頁43-47。
- 張少華：〈論裴度與淮西戰役〉，《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1卷第6期，2005年11月，頁83-85。
- 黃樓：〈〈平淮西碑〉再探討〉，《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3冊，2006年12月，頁116-132。
- 鐘華：〈裴度與中唐文壇〉，《安徽文學》2007年第12期，頁91-92。
- 張珠龍：〈李德裕“政文一體”生命體驗淺析〉，《江蘇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頁61-64。
- 陳鈺玟：〈談韓愈〈平淮西碑〉的公平性〉，《思辨集》第11期，2008年3月，頁1-18。
- 鄭英玲：〈韓、段〈平淮西碑〉對比分析〉，《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24卷第4期，2008年8月，頁46-48。
- 徐子方：〈道德和命運的博弈——關漢卿《裴度還帶》剖析〉，《中國戲曲學院學報》第29卷第4期，2008年11月，頁60-63。

唐代中興名相研究述評（1970-2015年）

- 曲景毅：〈論李德裕的公文創作與《左傳》、《漢書》之關係〉，《江淮論壇》2009年第4期，頁152-157+170
- 李進寧：〈論李德裕〈文章論〉的美學意蘊〉，《語文知識》2009年第4期，頁11-14。
- 劉豔萍：〈裴度分司東都與大和末年洛陽的詩歌唱和〉，《作家雜誌》2009年第5期，頁112-113。
- 曲景毅：〈論李德裕制詔奏議之作風〉，《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頁47-51。
- 李文才：〈李德裕政治思想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頁23-29。
- 韓鵬飛、楊泉：〈論李德裕的政論文藝術風格〉，《太原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頁18-21。
- 羅寧、武麗霞：〈《鄴侯外傳》與《鄴侯家傳》考〉，《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頁65-73。
- 曲景毅：〈李德裕賦與中晚唐賦的發展〉，《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頁39-43。
- 魏波：〈裴度還帶故事發展演變探析〉，《青年文學家》2010年第7期，頁38-39。
- 許東海：〈宰相·困境·家園：李德裕辭賦之罷相書寫及其陶潛巡禮〉，《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16期，2010年12月，頁57-80。
- 許東海：〈宰相辭賦與家族地圖——李德裕罷相時期辭賦之花木書寫及其文化解讀〉，《文學與文化》2011年第1期，頁25-38。
- 鄧小軍：〈杜甫與李泌〉，《杜甫研究學刊》2012年第2期，頁11-21。
- 楊發鵬：〈論李德裕在會昌滅佛中的作用〉，《宗教學研究》2011年第1期，頁101-106。
- 許東海：〈李德裕袁州辭賦的動物鋪陳與人生沉思〉，《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頁60-68。
- 陳小芒、曹淼：〈李德裕袁州賦作的遷謫情懷〉，《贛南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頁57-61。
- 鄧小軍：〈杜甫與李泌（下）〉，《杜甫研究學刊》2012年第4期，頁70-78。
- 萬德敬：〈柳宗元與裴度交遊考論〉，《中州學刊》2011年第5期，頁184-186。

- 劉海霞：〈困蕃之策：中唐名臣李泌的邊疆戰略〉，《文山學院學報》第 24 卷第 5 期，2011 年 10 月，頁 67-61。
- 尚俊玲：〈從詩賦看李德裕的仕隱矛盾〉，《文學教育（中）》2011 年第 12 期，頁 18-19。
- 陳冠明：〈裴度集團平叛日歷簡編之一〉，《周口師範學院學報》第 29 卷第 1 期，2012 年 1 月，頁 18-25。
- 黃曉、劉珊珊：〈唐代李德裕平泉山居研究〉，2012 年《建築史》第 3 期，頁 79-98。
- 楊文春：〈論元和淮西戰爭的首功之臣〉，《殷都學刊》2012 年第 4 期，頁 47-50。
- 陳冠明：〈裴度集團平叛日歷簡編之二〉，《周口師範學院學報》第 29 卷第 3 期，2012 年 5 月，頁 12-20。
- 傅璇琮、周建國：〈政治實踐是評述歷史人物的重要標準——《李德裕文集校箋》新版訂補概述〉，《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5 期，頁 1-6。
- 劉海霞：〈由名臣李泌看中唐的邊疆經略〉，《文山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4 期，2012 年 8 月，頁 21-26。
- 汪武軍：〈“飄忽仕隱”之唐中興名臣——李泌述略〉，《蘭臺世界》2012 年第 9 期，頁 6-7。
- 路學軍：〈道士宰相李泌與唐代中期政局〉，《蘭臺世界》2012 年第 18 期，頁 60-61。
- 尚俊玲：〈李德裕與平泉山莊——一個私人領域的文化解讀〉，《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6 期，頁 20-25。
- 朗瑞萍、葉會昌：〈趙郡李氏遷徙與唐代詩歌發展——以李德裕家族為個案〉，《河北北方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6 期，頁 11-14+18。
- 劉豔萍：〈唐宋洛陽分司長官對文人群體的影響——以裴度、錢惟演、文彥博、韓絳為中心〉，《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1 卷第 4 期，2013 年 8 月，頁 11-15。
- 許東海：〈南國行旅與物我對話——李德裕罷相時期的辭賦書寫及其困境隱喻〉，《成大中文學報》第 42 期，2013 年 9 月，頁 75-102。

唐代中興名相研究述評（1970-2015 年）

- 王思豪：〈身歷仕宦風波中 魂入山泉逸境來——李德裕“知天命”之年的山水賦書寫〉，《古典文學知識》2014 年第 4 期，頁 45-50。
- 杜學霞：〈裴度、元稹矛盾對中唐文學的影響〉，《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1 期，頁 99-104。
- 袁志鵬：〈李泌與唐德宗民族政策的轉變〉，《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4 年第 1 期，頁 103-106。
- 賴瑞和：〈唐後期三大類詞臣的升遷與地位——以白居易、元稹、權德輿、李德裕為例〉，《學術月刊》第 46 卷第 9 期，頁 137-145。
- 吳程玉：〈游壽《李德裕年譜》考證的文獻價值〉，《文藝評論》2015 年第 2 期，頁 126-129。

二、學位論文

- 湯承業：《李德裕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0 年。
- 王淑端：《李泌與中唐政局》，臺北：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 年。
- 江美英：《裴度與中晚唐政局》，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年。
- 陳玉雪：《裴度交往詩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 羅燕萍：《李德裕及其詩文研究》，西安：西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年。
- 方海林：《李德裕的文學創作及其與文壇關係》，安徽：安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
- 耿美香：《李德裕詩文用韻研究》，山東：山東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
- 高瑋：《李德裕賦作研究》，廈門：廈門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
- 徐曉峰：《李德裕創作心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
- 韓鵬飛：《論李德裕的政論文》，陝西：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周樂：《李德裕與牛李黨爭》，廈門：廈門大學中國古代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李進寧：《李德裕政論文思想內容研究》，四川：四川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

董麗萍：《裴度散文風格的多樣化》，武漢：華中科技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

唐誕：《李德裕詩文研究》，福建：漳州師範學院古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

單凌寒：《裴度與中唐文學》，吉林：東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

唐日文化、人物及禮令交流研究述評

嚴茹蕙^{*}

一、前言

眾所周知，唐朝盛世時期，唐人勇敢進取，性情開放，皇室又是胡漢融合，對於周邊民族相容並蓄，而有華夷一家的精神，使唐文化光披四表，呈現豐富多彩樣貌。唐文化既集前代不同源頭文化之大成，且具有先進性，唐的優勢文化伴隨其強大國力向外傳布，成為所謂中華文化圈。其中，唐的法制文化核心乃是禮與律，唐代的律令與禮學密不可分，先賢學者已多有研究，成果豐碩。對於周邊國家而言，為了在以唐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取得一定地位，不能不學習唐的禮法等相關知識，採用唐所認可的方式與唐及鄰近國家往來，藉禮法教化黎民、治理國家、提升本國文明與統治者權威。因而在七至十世紀時，東亞地區的律令文化曾高度發達，乃其來有自。法制與禮制，也成為東亞傳統文化中的特殊共通背景。中國自古以來的民間風俗習慣，因化俗成禮，禮法關係又密不可分，因此民間的風俗習慣經由禮與法之

*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間的吸納、互動與規範，進入了唐的法律之中。唐的禮律文化向外傳布，其實也代表著中國的禮俗文化伴隨中國文明一同傳布到了東亞各國。

中國文化與異文化接觸後所產生的「文化變容」（涵化）現象，雖然以往已有許多豐碩研究成果，但此重要歷史文化現象，值得反覆再三從各個不同角度重新思考。歷史現象本有其普遍性與特殊性存在，中華文化因為屬於優勢文化，所以在特定地區（所謂「中華文化圈」）內具有普遍性特徵；特殊性的形成，則有其外在與內在因素。以日本而言，在自己的歷史條件、文化脈絡以及當時社會環境之考量下，依其需要而對大陸文化作某種程度之修正，凸顯其國家社會之特殊性，實乃正常的文化交流現象。唐朝的法令與制度，透過渡唐日人（例如遣唐使）的見聞與學習，以及書籍文物資料陸續進入日本。唐文化除了透過代表性人物推廣外，更重要的是經由國家力量主動篩選抉擇，由上而下推行至民間。

本文為筆者博士論文《八、九世紀唐日文化交流探索——以人物交流及禮令之影響為主》的研究史回顧部分，加以修改而成。拙稿介紹研究史範圍，雖然始於近現代，但將著重介紹戰後作品，特別是最近十至二十年間出版的臺灣及日本論著。由於筆者學力有限，論述範圍無法涵蓋所有唐日文化交流內容，故切入角度選擇八到九世紀渡唐日人所見唐代的法制與禮俗施行情形，凸顯唐日文化交流史上法制禮俗的層面，同時藉渡唐日人歸國後，對本國律令法制的建設，進而考察唐代法制禮俗對日本奈良平安時期的影響。所謂渡唐日人，原則是日本於八、九世紀派出的遣唐使節團成員，包含遣唐使、留學生/僧，並對同時期赴日的唐朝民眾適度加以介紹（拙稿將此類民眾總稱為「渡日唐人」）。釐清渡唐日人貢獻，對於研究唐代禮制與法制運作、唐文化的影響力，以及唐文化在傳布過程中如何消長變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辨認出日本法令中所刻意保留的自身傳統，以及吸納接收中國傳統禮俗的部分，也是拙稿試圖達成的目標。終極目標，是希望從歷史中找到

唐日文化融合，成為日本自身文化傳統的證據，做為唐文化在整個東亞地區歷史中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側面說明。另外，佛、道教在東亞文化傳播與交流中佔有重要地位，日本本土原創的神道教對於日本也具有重大意義，但因筆者力有未逮，僅能就宗教傳布時引發的普遍現象加以說明，教義相關問題，不在拙稿研究及述評範圍之內。

二、研究史介紹與述評

（一）通論：唐日文化交流

唐代各地出現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很多，前輩學者對於此等現象產生的原因所在，已有中肯的解釋。如傅樂成認為開元天寶年間以前，唐人吸收胡化，不出娛樂享受範圍，¹唐人社會中的胡人習俗上承魏晉南北朝文化，²因而在安史之亂前對於胡風異俗以及夷夏區別，並不若安史之亂以後嚴格。³至於唐日文化交流的背景，一般認為根源於日本主動攝取大陸文明，遣使進行綜合性的交流，才使得此等文化現象發生。

過去文化交流被視為交通史中的一個環節，對於唐日文化交流史而言，以文化為主軸，探討雙邊人事物互動與變遷的作品很早即已出現。其中研究中日交通，從通論中談到唐日文化交流，早期作品多出自日本學者之手。舉

¹ 傅樂成，〈唐代夷夏觀念之演變〉，收入氏著，《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77），頁 213。

²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收入氏著，《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77），頁 339。

³ 傅樂成，〈中國民族與外來文化〉，收入氏著，《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77），頁 397。

例而言，較早問世的研究作品有內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⁴、辻善之助《增訂海外交通史話》⁵、秋山謙藏《日支交涉史研究》⁶、藤田元春《上代日支交通史の研究》⁷，戰後作品可舉藤家禮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⁸為例。在眾多研究作品中，具有代表性者為木宮泰彥《日支交通史》⁹（陳捷譯為《中日交通史》¹⁰）、《日華文化交流史》¹¹。王輯五《中國日本交通史》¹²，為木宮泰彥《日支交通史》的節譯本。同書中譯本甚多，¹³此處不重覆開列。在戰後的中文作品中，梁容若所著論集《中國文化東漸研究》¹⁴，上篇介紹內容從八世紀成書的日本最早漢詩集《懷風藻》，至近現代日本漢學研究，下篇為翻譯日本學者研究成果，介紹中國文學、史學東漸現象。余又蓀撰寫多篇介紹性質專文，如〈唐書所書日皇世系考〉¹⁵、〈日王子入唐記〉¹⁶。汪向榮、夏應元編有《中日關係史資料匯編》¹⁷，基本上是中國官修史書以

⁴（日）內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東京：弘文堂，1925），另由劉克申譯，《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為加入內藤氏演講稿之編譯作品。

⁵（日）辻善之助，《增訂海外交通史話》，東京：內外書籍株式會社，1930 一版，1936 三版。

⁶（日）秋山謙藏，《日支交涉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39。

⁷（日）藤田元春，《上代日支交通史の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43。

⁸（日）藤家禮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東京：東海大學出版會，1977。

⁹（日）木宮泰彥，《日支交通史》，東京：金刺芳流堂，1926。

¹⁰（日）木宮泰彥著，陳捷譯，《中日交通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臺北：三人行出版社 1973 重印。

¹¹（日）木宮泰彥，《日華文化交流史》，東京：富山房，1955。

¹²王輯五，《中國日本交通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

¹³參見（日）木宮和彥，〈生誕百年を記念して再刊するにあたり〉，收入木宮泰彥，《日華文化交流史》（東京：富山房，1955 初版，1987 再版），頁 i-iii。

¹⁴梁容若，《中國文化東漸研究》，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

¹⁵余又蓀，〈唐書所書日皇世系考〉，《中央日報》1957-6·4。

¹⁶余又蓀，〈日王子入唐記〉，《中央日報》1957-9·10。

¹⁷汪向榮、夏應元編，《中日關係史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4。

及《日本書紀》、《大日本史》中的中日史料匯編，附有中日年號對照表，便於查閱。汪向榮論著另有《中日關係史文獻論考》¹⁸等多部作品，探討範圍從記載古代中世（明代以前）中日交流文獻性質，到古代中國人的日本觀，¹⁹範圍甚廣。劉百閔、張其昀等著論文集《中日文化論集》及其續編，²⁰對於中日交通、文學、文化交流等各層面多所論及，初編著重於唐宋以前，對宋後交流狀況稍有論及，其中收入陳固亭〈古代中日文化關係之回溯〉²¹等文。續編則著重明清現代的漢學、儒學、武士道等文化現象及外交關係，但仍有著重於唐代教育對日本教育影響，²²以及史學、經濟、佛教等方面專文。1995年後，《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²³共十卷在日本與中國陸續出版，屬論文集形式，討論涵蓋日本與中國在各層面及各斷代的文化交流史。

將時代斷限定於隋唐五代時期中日關係史的研究，戰後臺灣最早的通論專著，應為余又蓀《隋唐五代中日關係史》²⁴，這可能是戰後唯一一部於臺灣地區出版的隋唐五代中日關係史專論。其他涉及隋唐中日文化關係的論著，舉例而言，如李則芬《中日關係史》²⁵、高明士《日本古代學制與唐制的比

¹⁸ 汪向榮，《中日關係史文獻論考》，長沙：岳麓書社，1985。

¹⁹ 汪向榮，《古代中國人的日本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²⁰ 劉百閔、張其昀等撰，《中日文化論集》（一）（二）臺北：文物供應社，1955；《中日文化論集續編》（一）（二）（臺北：文物供應社，1958）。

²¹ 陳固亭，〈古代中日文化關係之回溯〉，收入陳固亭等著，《中日文化論集》（臺北：中華大典編印會，1967），頁21-27。

²² 臧廣恩，〈唐代教育對日本教育之影響〉，收入前引劉百閔、張其昀等撰《中日文化論集續編》（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8），頁207-236。

²³ （日）中西進，周一良編集代表，《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全10冊），東京：大修館書店，1995-1998。簡體中文版《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全10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²⁴ 余又蓀，《隋唐五代中日關係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

²⁵ 李則芬，《中日關係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較研究》²⁶、高明士《唐代東亞教育圈的形成》²⁷、鄭樑生的《中日關係史》²⁸、周一良《中日文化關係史論》²⁹、石曉軍《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³⁰一至三章、王貞平《漢唐中日關係論》³¹、蘇進添《日中關係史考：漢籍による弁證の研究》³²。鄭樑生另著有《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共十四冊，³³為論文集形式，該論集諸文論及的背景時空多半為明朝以後的近現代史，但亦收錄與唐日文化交流相關的專論，例如〈唐代學制對日本古代教育的影響〉³⁴。又如陳水逢《中國文化之東漸與唐代政教對日本王朝時代的影響》³⁵，為陳水逢於 1964 年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說明日本古代文化的形成，及隋唐政教影響於日本的概況。同氏尚著有《日本文明開化史略》³⁶。朱雲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³⁷，該書集結朱雲影自 1965 年以後在各報章雜誌發表的系列專文，書中提出「中國文化圈」概念，說明中國對日本及韓國、越南歷史的影響，均為相當早期且具代表性的通論作品。1980 年代以前，

²⁶ 高明士，《日本古代學制與唐制的比較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1977 初版、1986 增訂一版。

²⁷ 高明士，《唐代東亞教育圈的形成》，臺北：國立編譯館，1984。簡體版修訂更名為《東亞教育圈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²⁸ 鄭樑生，《中日關係史》，臺北：五南書局，2001。

²⁹ 周一良，《中日文化關係史論》，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³⁰ 石曉軍，《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³¹ 王貞平，《漢唐中日關係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³² 蘇進添，《日中關係史考：漢籍による弁證の研究》，臺北：致良出版社，1997。

³³ 鄭樑生，《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全十四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2005。

³⁴ 鄭樑生，〈唐代學制對日本古代教育的影響〉，收入氏著《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冊 11（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頁 159-197。

³⁵ 陳水逢，《中國文化之東漸與唐代政教對日本王朝時代的影響》，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6。

³⁶ 陳水逢，《日本文明開化史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修訂版。

³⁷ 朱雲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臺北：黎明文化，1981；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簡體版）。

論者往往認為「唐代文物之直接輸入，使日人至今仍懷念不忘，仰慕無已。」³⁸此說產生有其時空背景，於今經過至少三十年以上的世情變化，對於古代的華夷觀、以中國為尊等觀點，近期已有學者重新進行審視與思考。³⁹王勇編《中日關係的歷史軌跡》⁴⁰上半部討論隋唐至宋元之際，書籍文物及人物間中日文化交流。由王勇撰寫及主編的旨趣類似論文集，尚有《中日關係史考》⁴¹、《東亞坐標中的書籍之路研究》⁴²等作品。其他主題相近的論述尚有徐先堯〈倭隋邦交新考〉⁴³、《二王尺牘與日本書紀所載國書之研究》⁴⁴、王金林《漢唐文化與古代日本文化》⁴⁵、林景淵〈隋唐時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幾個問題〉⁴⁶、蘇啟明〈漢唐的中外交流〉⁴⁷、李寅生《論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⁴⁸等作品。盛邦和著《內核與外緣——中日文化論》⁴⁹，性質屬於文化傳播理論，與上述諸作取徑有異。

³⁸ 同前引臧廣恩，〈唐代教育對日本教育之影響〉，頁 236。

³⁹ 例如韓東育，〈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

⁴⁰ 王勇編，《中日關係的歷史軌跡》，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⁴¹ 王勇，《中日關係史考》，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

⁴² 王勇編，《東亞坐標中的書籍之路研究》，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

⁴³ 徐先堯，〈倭隋邦交新考〉，收入《唐代研究論集》第 1 輯（臺北：新文豐出版，1992），頁 497-554。

⁴⁴ 徐先堯，《二王尺牘與日本書紀所載國書之研究：隋唐期中日關係史之一章》，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 初版；臺北：藝軒圖書，2003 增訂新版。

⁴⁵ 王金林，《漢唐文化與古代日本文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⁴⁶ 林景淵，〈隋唐時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幾個問題〉，《國立中興大學共同學科期刊》2，1992.6，頁 243-252。

⁴⁷ 蘇啟明，〈漢唐的中外交流〉（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112 期，2002.11），頁 16-23。

⁴⁸ 李寅生，《論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成都：巴蜀書社，2001。

⁴⁹ 盛邦和，《內核與外緣——中日文化論》，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

日本學界中，討論唐日關係作品，被視為日本的海外關係領域，此類專著作品自明治時代以來新著迭出，無法全數列舉。茲舉最近二十年內的名家專著為例，大庭脩著《古代中世における日中關係史の研究》⁵⁰在時代斷限上，雖論及至中國明末清初（例如豐臣秀吉受封日本國王事），實際以漢代以後，唐宋之際的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代表性文獻，如《大唐開元禮》、遣唐使高階遠成所獲唐告身與位記，以及典籍傳入為考論重點。堀敏一著《東アジアのなかの古代日本》⁵¹，討論魏晉隋唐時代，日本與亞洲大陸（主要為中、韓）的國際關係及人物交流。金子修一《隋唐の國際秩序と東アジア》⁵²，以隋唐的外交禮儀及政策為中心，對國書、王號、爵號、遣使等問題進行討論，其中當然亦論及唐與日本的互動，並整理了「在日本發表的隋唐時代國際關係研究文獻表」⁵³，連同補遺，至該書出版為止，合計有近百部專書及專論。另如榎本淳一《唐王朝と古代日本》⁵⁴，則深入探討了渡海制、唐代出入國管理制度及對外方針、運用《天聖·關市令》討論唐物貿易、漢籍流布等唐日關係，以及文物交流等方面。

另外，由於中日韓三國歷史有連動性，故也有從東亞觀點討論漢唐之際國際關係及文化交流的作品。例如汪高鑫、程仁桃《東亞三國古代關係史》⁵⁵，介紹從遠古至清中葉時期的中日韓關係，屬通史類作品，而側重於

⁵⁰ (日)大庭脩，《古代中世における日中關係史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96。

⁵¹ (日)堀敏一，《東アジアのなかの古代日本》東京：研文出版，1998。

⁵² (日)金子修一，《隋唐の國際秩序と東アジア》，東京：名著刊行會，2001。

⁵³ (日)金子修一，〈日本における隋唐時代國際關係研究文獻表〉，收入前引氏著《隋唐の國際秩序と東アジア》，頁20-34。

⁵⁴ (日)榎本淳一，《唐王朝と古代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2008。

⁵⁵ 汪高鑫、程仁桃，《東亞三國古代關係史》北京：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06。

隋唐時代的文化交流。1980 年代以前⁵⁶臺灣地區研究作品，可舉王儀《隋唐與後三韓關係及日本遣隋使遣唐使運動》⁵⁷為例，關於渡唐日人、禮儀及東傳民俗，該書均作初步簡介。王儀所撰類似主題作品尚有《古代中韓關係與日本》⁵⁸，論述殷商時代至魏晉南北朝，中韓日三國政治、經濟關係與文化交流史實；以及《趙宋與王氏高麗及日本的關係》⁵⁹，論述宋與王氏高麗和日本的學術、藝術文化交流。另如高明士近作《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索》⁶⁰，則是將日本的地位放在唐代的天下秩序中審視，由綜觀角度進行唐日關係論述，用以佐證「天下法」的秩序原理。取徑類似的論文集，如《黃約瑟隋唐史論集》⁶¹、韓昇著《海東集——古代東亞史實考論》⁶²，主要討論中日韓於四至九世紀間在文化及宗教上，人物及典籍等的互動。日本學者鈴木靖民所編《古代日本の異文化交流》⁶³，以日本為中心，論及日本本土及外來信仰、文化，所論國際交流，除古墳時代後的中國、朝鮮半島外，更及於八、九世紀的渤海、新羅。

（二）人物交流

人物交流帶動文化交流。在唐日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八世紀已有渡唐留學生、留學僧留下彌足珍貴的傳世資料，這些人歸國後對日本所作的貢獻甚

⁵⁶ 參見賴亮郡、嚴茹蕙，〈隋唐五代中日交流史研究概況〉，收入《中國唐代學會會刊》19 期（臺北：樂學書局經銷，2012），頁 142-154。

⁵⁷ 王儀，《隋唐與後三韓關係及日本遣隋使遣唐使運動》，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 初版，2015 再版。

⁵⁸ 王儀，《古代中韓關係與日本》，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3 初版，2015 再版。

⁵⁹ 王儀，《趙宋與王氏高麗及日本的關係》，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 初版，2015 再版。

⁶⁰ 高明士，《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⁶¹ 黃約瑟著，劉俊明編，《黃約瑟隋唐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

⁶² 韓昇，《海東集——古代東亞史實考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⁶³ （日）鈴木靖民編，《古代日本の異文化交流》，東京：勉誠出版，2008。

大，若事蹟見於歷史文獻，即可據此更加宏觀地來探討唐日文化交流。以下就拙稿論述範圍加以介紹。

1. 化外人

「化外人」一詞，見於《唐律·名例律》中的「化外人相犯」條（總48條）。過去關於化外人的研究，關心焦點常集中於「化外人」是否等於「外國人」，舉例而言，仁井田陞在《補訂·中國法制史研究：刑法》書中，認為化外人即是外國人，⁶⁴錢大群等也採此論點。⁶⁵陳惠馨的〈《唐律》「化外人相犯」條及化內人與化外人間的法律關係〉一文也論及此點，但對化外人和今日定義的「外國人」的法律地位是否相同進行了探討，⁶⁶並在〈從規範概念史的角度談中國傳統法律中「國籍」、「化外人」、「外國人」觀念的變遷〉⁶⁷一文中再次對於「化外人」、「外國人」的分別進行探討。亦有研究是將唐律「化外人相犯」條規範視為唐的外國人政策，以一個特定時期、特定地區為中心，考查外國人活動，例如金相範的〈唐代後期揚州的發展和外國人社會〉⁶⁸一文。歷史上的認同問題，近期研究如王小甫的〈唐五代北邊的內外之際與國家認同〉一文，則以北方民族為主，討論了生熟蕃的變化、

⁶⁴（日）仁井田陞《補訂·中國法制史研究：刑法》（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9年初版，1980年補訂版），頁418。

⁶⁵錢大群、夏錦文，《唐律與中國現行刑法比較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頁66。

⁶⁶陳惠馨，〈《唐律》「化外人相犯」條及化內人與化外人間的法律關係〉，收入高明士主編，《唐代身分法制研究——以唐律名例律為中心》（臺北：五南出版社，2003），又收入氏著《傳統個人、家庭、婚姻與國家——中國法制史的研究與方法》（臺北：五南出版公司，2006），頁284-308。

⁶⁷陳惠馨，〈從規範概念史的角度談中國傳統法律中「國籍」、「化外人」、「外國人」觀念的變遷〉，收入甘懷真等編，《東亞視域中的國籍、移民與認同》（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頁1-15。

⁶⁸金相範，〈唐代後期揚州的發展和外國人社會〉，收入《師大歷史學報》44期（臺北：師範大學歷史系，2010），頁37-66。

與唐的互動關係，以及種族的文化意識。此文在收入作者專著《中國中古的族群凝聚》時，結語中尚增補了對於中日關係、文化同化及民族認同的看法。⁶⁹甘懷真〈從《唐律》化外人規定看唐代國籍制度〉⁷⁰，是藉由考證分析《唐律·名例律》中的「化外人相犯」條，探究唐代的國籍制度，進而分析當時東亞的「國」概念，用以說明皇帝制度的二個面向，亦即「天下國家」的世界觀。

2. 渡唐日人

(1) 遣唐使

由於遣唐使為隋唐時期，日本綜合外交、貿易、文化交流的重要制度，故拙稿將遣唐使研究相關成果獨立為一類說明。

除了前述的中日文化交流通論作品中，會論及遣唐使的作用與成就之外，早期亦有參照舊史、黃遵憲《日本國志》內容，以及參考日文中譯研究如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等書撰寫的中文專著，如張鵬一《唐代日人來往長安考》⁷¹，部分論述雖因採二手資料，容或有所謬誤，仍有介紹之功。將遣唐使視為群體活動及現象的研究論述，可舉武安隆《遣唐使》⁷²一書為例，該書針對遣唐使的功能、性質、分期、人物等進行探討。至於戰後日本學界代表性著作，除早期森克己知名作品《遣唐使》⁷³、增村宏《遣唐使の研究》⁷⁴、

⁶⁹ 王小甫，〈唐五代北邊的內外之際與國家認同〉，收入《唐研究》卷 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1-26。增補後收入氏著《中國中古的族群凝聚》（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181-209。王氏對中日文化交流及民族認同的總結看法，見該書頁 209。

⁷⁰ 甘懷真，〈從《唐律》化外人規定看唐代國籍制度〉，收入《早期中國史研究》3:2，2011（臺北：ISSN: 2075-0366），頁 1-32。

⁷¹ 張鵬一，《唐代日人來往長安考》，西安：秦風周報社，1937；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 重印。

⁷² 武安隆，《遣唐使》，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

⁷³ （日）森克己，《遣唐使》，東京：至文堂，1972。

⁷⁴ （日）增村宏，《遣唐使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88。

東野治之《遣唐使船：東アジアのなかで》⁷⁵等著作外，21世紀之後出版作品亦成果豐碩，可舉古瀨奈津子《遣唐使眼中的中國》⁷⁶、森公章《遣唐使と古代日本の對外政策》、⁷⁷《遣唐使の光芒》⁷⁸、河內春人《東アジア交流史のなかの遣唐使》⁷⁹等日本學者著作為例。此外，亦有日本論文集將遣唐使往來期間視為一個時代段落，如江上波夫編《遣唐使時代の日本と中国》⁸⁰，討論此時期的文化交流，遣唐使的文化、政治、歷史意義及唐對日本律令法的影響；⁸¹或是探討時段較拙稿再提前一些的論文集，如氣賀澤保規編《遣隋使がみた風景：東アジアからの新視点》⁸²，論及遣隋使派遣的意義、文物交流、國書問題等。

在單篇論述方面，臺灣出版作品可舉何健民〈隋時日本遣華使僧及文化之東傳〉⁸³、戴禾〈中日史籍中的日使來唐事異同考〉⁸⁴、伊藤真奈美〈試

⁷⁵ (日)東野治之，《遣唐使船：東アジアのなかで》，東京：朝日新聞社，1999。

⁷⁶ (日)古瀨奈津子，《遣唐使の見た中国》，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高益泉中譯，《遣唐使眼中的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簡體版鄭威譯，《遣唐使眼裡的中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⁷⁷ (日)森公章，《遣唐使と古代日本の對外政策》，東京：吉川弘文館，2008。

⁷⁸ (日)森公章，《遣唐使の光芒——東アジアの使者》，東京：角川選書，2010。

⁷⁹ (日)河內春人，《東アジア交流史のなかの遣唐使》，東京：汲谷書院，2013。

⁸⁰ (日)江上波夫編，《遣唐使時代の日本と中国》，東京：小學館，1982。

⁸¹ 例如(日)井上光貞，〈古代日本と律令法〉，收入前引(日)江上波夫編，《遣唐使時代の日本と中国》，頁31-40。

⁸² (日)氣賀澤保規編，《遣隋使がみた風景：東アジアからの新視点》，東京：八木書店，2011。

⁸³ 何健民，〈隋時日本遣華使僧及文化之東傳〉(《臺大人文科學論叢》1，1960.6)，後收入張曼濤主編，《中日佛教關係研究》(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頁53-67。

⁸⁴ 戴禾，〈中日史籍中的日使來唐事異同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5，1984，頁153-168。

論玄宗時期日派遣唐使之目的與特性》⁸⁵等文為例。學位論文則有：楊維欽《遣唐使の研究》⁸⁶、伊藤真奈美《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研究》⁸⁷、蔡明勳《東亞文化交流中日本遣唐使與留筆者的角色定位及身分認同》⁸⁸等。

(2) 遣唐留學生/僧

針對遣唐使節團中的個別人物進行研究及成就進行考查，並在臺灣地區出版的文章可舉以下諸文為例：林文月〈阿倍仲麻呂(朝衡)事蹟考略〉⁸⁹、向榮〈仕唐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呂)〉⁹⁰、劉崇稜的〈空海與最澄——日本兩位傑出的漢詩文作家〉⁹¹、傅醒民〈弘法大師空海〉⁹²、李欽賢〈空海留唐歸國——平安前期的密教美術〉⁹³、松本曉美〈改變日本歷史的人物系列(2)——空海〉⁹⁴、黃約瑟〈日本留唐筆者橘逸勢事蹟考〉⁹⁵、拙作〈試論「化外人」與文化認同——以八世紀的渡唐日本人為例〉⁹⁶。學位論文則有

⁸⁵ (日)伊藤真奈美,〈試論玄宗時期日派遣唐使之目的與特性〉《逢甲中文學刊》1,2008.01,頁 207-224。

⁸⁶ 楊維欽,《遣唐使の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⁸⁷ (日)伊藤真奈美,《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

⁸⁸ 蔡明勳,《東亞文化交流中日本遣唐使與留學生的角色定位及身分認同》,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11。

⁸⁹ 林文月,〈阿倍仲麻呂(朝衡)事蹟考略〉,《思與言》8:6,1971.3,頁 22-25。

⁹⁰ 向榮,〈仕唐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呂)〉,《中國文選》102,1975.10。

⁹¹ 劉崇稜,〈空海與最澄——日本兩位傑出的漢詩文作家〉,《日本研究》161,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78.6、〈李白與阿倍仲麻呂〉《日本研究》160,1978:6。

⁹² 傅醒民,〈弘法大師空海〉,《日本研究》246,1985.6。

⁹³ 李欽賢,〈空海留唐歸國——平安前期的密教美術〉,《雄獅美術》218,1989.4。

⁹⁴ (日)松本曉美,〈改變日本歷史的人物系列(2)——空海〉,《日本文摘》11:3,1996.4。

⁹⁵ 黃約瑟,〈日本留唐學生橘逸勢事蹟考〉,收入《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下冊,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修改標題後收入劉健明編,《黃約瑟隋唐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15-138。

⁹⁶ 拙文,〈試論「化外人」與文化認同——以八世紀的渡唐日本人為例〉,收入高明士編,《唐律與國家秩序》(臺北:元照出版社,2011),頁 303-344。

黃介如《空海之研究》⁹⁷。張哲俊《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研究》⁹⁸述及日本在中國文學中的形象轉變，日本形象取決於中日政治文化的交流，與中國文化觀察事物的方式。其中論及唐日關係，及唐朝詩人贈予日本人的詩，從詩文中討論兩國互動，認為日本人熱衷學習中國事物，使得日本在唐朝詩人心中的形象改變。

在唐玄宗時期，曾有數名知名的遣唐使團成員滯唐未歸，成為後世學者關注及研究對象。例如阿倍仲麻呂（晁衡）終老中國，二戰期間，日本學者杉本直治郎於 1940 年出版其博士論文《阿倍仲麻呂傳研究》⁹⁹，考證縝密，論述條理分明，為研究阿倍仲麻呂生平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巨著。另外，井真成也是於八世紀前期入唐的遣唐使節團成員，於中國任官身故，獲追贈尚衣奉御官銜。2004 年 10 月在西安發現井真成墓誌，轟動一時。相關研究作品，舉其代表者，如日本專修大學・西北大學共同プロジェクト編《遣唐使の見た中国と日本》¹⁰⁰，該書收錄多篇對井真成墓誌的研究論文，以及同時期遣唐使節團成員，如美奴岡萬墓誌的相關研究。¹⁰¹ 馬一虹則認為，井真成並非與阿倍仲麻呂同時入唐，作為留學生的身分為請益生（短期留學生），為有專門技術之人才或官員，與阿倍仲麻呂以長期留學生身分入唐，地位不同。¹⁰²

⁹⁷ 黃介如，《空海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⁹⁸ 張哲俊，《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⁹⁹ （日）杉本直治郎，《阿倍仲麻呂傳研究 手沢補訂本》，東京：勉誠出版，2006。

¹⁰⁰ 專修大學・西北大學共同プロジェクト編，《遣唐使の見た中国と日本 新発見「井真成墓誌」から何がわかるか》，東京：朝日新聞社，2005。

¹⁰¹ （日）礪波護，〈遣唐使の二つの墓誌——美奴岡萬と井真成〉收入前引專修大學・西北大學共同プロジェクト編，《遣唐使の見た中国と日本 新発見「井真成墓誌」から何がわかるか》，頁 337-346。

¹⁰² 馬一虹，〈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入唐時間與在唐身份考〉，《世界歷史》2006:1，頁 58-65。

八、九世紀，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宗教因素往往伴隨特定人物活動而展開，故對於宗教及特定人物的研究也成為研究者關心的焦點。涉及八、九世紀中日宗教交流的論文集、研究專著及專文亦多，例如：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叢刊中的第 81 冊《中日佛教關係研究》，前半部收錄諸文，均與宋代以前中日佛教交流史相關。¹⁰³其他主旨接近論著尚可舉釋東初《中日佛教交通史》¹⁰⁴、朱雲影〈中國佛教對日、韓、越的影響〉¹⁰⁵、傅醒民〈鑒真和尚與日本佛教〉¹⁰⁶、鄭樑生〈唐大和尚東征傳——中國佛教東傳的一幕〉¹⁰⁷、弘德〈日本佛教律宗的建立——唐代高僧鑒真東渡日本宏揚佛法〉¹⁰⁸、丁天降〈佛教文化在日本（2）——聖德太子與法隆寺〉¹⁰⁹等文為例。學位論文有：李映瑾《佛教願文的發展及其東傳日本研究》¹¹⁰、楊芳瑋《智者大師《摩訶止觀》常行三昧之思想及其影響》¹¹¹，述及常行三昧對日本天臺宗與淨土宗的影響，以及林靜怡《日僧筆下的晚唐佛教—以圓仁、圓珍為中心》¹¹²等

¹⁰³ 張曼濤主編，《中日佛教關係研究》，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¹⁰⁴ 釋東初，《中日佛教交通史》，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1970。

¹⁰⁵ 朱雲影，〈中國佛教對日、韓、越的影響〉，《歷史學報（師範大學）》4，1976.4，後收入前引氏著《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第 19 章，簡體版頁 441-480。

¹⁰⁶ 傅醒民，〈鑒真和尚與日本佛教〉，《日本研究》1，1980.1。

¹⁰⁷ 鄭樑生，〈唐大和尚東征傳——中國佛教東傳的一幕〉，收入《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頁 155-174。

¹⁰⁸ 弘德，〈日本佛教律宗的建立——唐代高僧鑒真東渡日本宏揚佛法〉，《香港佛教》344，1989，頁 25-27。

¹⁰⁹ 丁天降，〈佛教文化在日本（2）——聖德太子與法隆寺〉，《中國佛教》54:7，2010.07，頁 28-34。

¹¹⁰ 李映瑾，《佛教願文的發展及其東傳日本研究》，中正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論文，2008。

¹¹¹ 楊芳瑋，《智者大師《摩訶止觀》常行三昧之思想及其影響》，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¹¹² 林靜怡，《日僧筆下的晚唐佛教—以圓仁、圓珍為中心》，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11。

文。綜合性討論唐日高僧往來，帶動文化交流的論著，可舉韓昇編《古代中國：東亞世界的內在交流》¹¹³論文集為例。

在人物研究方面，扣除具遣唐使、僧身分的人物，對於群體人物的研究論述有：謝海平《唐代詩人與在華外國人之文字交》¹¹⁴，專文有陳明姿〈古代日本女性的美麗與哀愁〉¹¹⁵、王秉泰、陳建華〈中日兩國文人贈答唱和詩初探——以唐代開元為中心〉¹¹⁶、何方耀〈晉唐時期海路交通中往來佛僧的群體考察〉¹¹⁷等諸文。

關於個別人物，相關專文有：李嘉〈親為日皇授戒的揚州和尚——鑒真〉¹¹⁸、傅醒民的〈推動日本華化的聖德太子〉¹¹⁹、史言〈唐鑒真和尚的東渡與日本藝術〉¹²⁰、黃得時〈楊貴妃東逃日本之謎〉¹²¹、李永熾〈日本的女性天皇與道鏡禪師〉¹²²、鄭樑生〈漢籍之東傳對日本古代政治的影響——以聖德太子為例〉¹²³、鄭樑生〈賴世和博士（E. O. Reischauer）與《圓仁入唐求法記》〉¹²⁴、李豫川〈日本高僧圓仁和他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¹²⁵、余

¹¹³ 韓昇編，《古代中國：東亞世界的內在交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¹¹⁴ 謝海平，《唐代詩人與在華外國人之文字交》，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

¹¹⁵ 陳明姿，〈古代日本女性的美麗與哀愁〉，《歷史月刊》155，2000.08，頁 72-78。

¹¹⁶ 王秉泰、陳建華，〈中日兩國文人贈答唱和詩初探——以唐代開元為中心〉，《北體學報》11，2003.12。

¹¹⁷ 何方耀，〈晉唐時期海路交通中往來佛僧的群體考察〉，《普門學報》32，2006.03。

¹¹⁸ 李嘉，〈親為日皇授戒的揚州和尚——鑒真〉，臺北：《中央日報》、《聯合報》，1965.8.20。

¹¹⁹ 傅醒民，〈推動日本華化的聖德太子〉，《日本研究》231，1984.3。

¹²⁰ 史言，〈唐鑒真和尚的東渡與日本藝術〉，《藝壇》222，1986.9。

¹²¹ 黃得時，〈楊貴妃東逃日本之謎〉，《臺灣新生報·新生副刊》，1986。

¹²² 李永熾，〈日本的女性天皇與道鏡禪師〉，《歷史月刊》14，1989.03，頁 72-83。

¹²³ 鄭樑生，〈漢籍之東傳對日本古代政治的影響——以聖德太子為例〉，收入氏著《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頁 1-22。

¹²⁴ 鄭樑生，〈賴世和博士（E. O. Reischauer）與《圓仁入唐求法記》〉（收入氏著《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頁 149-171。

仁〈圓仁目睹的唐武宗滅佛〉¹²⁶、黃運喜〈有關唐武宗滅佛的史料問題——「圓仁目睹唐武宗滅佛」一文的商榷〉¹²⁷、李健超〈唐長安實際寺的高僧——吉藏、善導、鑒真〉¹²⁸、劉昭瑩〈唐代日僧圓仁在長安的生活與見聞〉¹²⁹、黃約瑟〈春太郎和神一郎——唐朝到中國的日本商人〉¹³⁰、松本曉美〈改變日本歷史的人物系列(1)——聖德太子〉¹³¹、楊曾文〈圓仁和日本天臺宗〉¹³²、黃清連〈圓仁與唐代巡檢〉¹³³，大陸學者近年作品可舉韓昇〈佛教東傳的開拓者〉¹³⁴、〈開啟日本佛教新時代的兩位大師〉¹³⁵等文為例。相關學位論文有：陳靜萱《唐僧鑑真之研究》¹³⁶等。

¹²⁵ 李豫川，〈日本高僧圓仁和他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香港佛教》396，1993.05，頁 18-20。

¹²⁶ 余仁，〈圓仁目睹的唐武宗滅佛〉《歷史月刊》63，1993.4，頁 82-92。

¹²⁷ 黃運喜，〈有關唐武宗滅佛的史料問題——「圓仁目睹唐武宗滅佛」一文的商榷〉《獅子吼》33:6，1994.2，頁 21-26。

¹²⁸ 李健超，〈唐長安實際寺的高僧——吉藏、善導、鑒真〉，《歷史月刊》75，1994.4，頁 82-89。

¹²⁹ 劉昭瑩，〈唐代日僧圓仁在長安的生活與見聞〉，《建國學報》14，1995.2，頁 257-269。

¹³⁰ 黃約瑟，〈春太郎和神一郎——唐朝到中國的日本商人〉，《歷史月刊》88，1995.5，頁 115-120。

¹³¹ (日)松本曉美〈改變日本歷史的人物系列(1)——聖德太子〉，《日本文摘》11:1，1996.2。

¹³² 楊曾文，〈圓仁和日本天臺宗〉，《中華佛學學報》10，1997.6，頁 267-278。

¹³³ 黃清連，〈圓仁與唐代巡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4，1997.12，頁 899-942。

¹³⁴ 韓昇，〈佛教東傳的開拓者〉，收入上海博物館編，《唐·物 鑒真和空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¹³⁵ 韓昇，〈開啟日本佛教新時代的兩位大師〉，收入陳燮君，陳克倫編，《鑒真和空海：中日文化交流的見證》（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0），頁 13-17。

¹³⁶ 陳靜萱，《唐僧鑑真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與拙文論述範圍相關思想及文學類研究，可舉以下專論為例：翁蘇倩卿〈從「古事記」看古代日本人之思想〉¹³⁷、陳明姿〈《遊仙窟》與日本平安朝物語〉¹³⁸及〈中日兩國文學裡的「理想鄉」——以唐代傳奇與《源氏物語》為主〉¹³⁹、徐翔生〈探討日本人古代死生觀之源流——以《古事記》中所見之「黃泉國」為例〉¹⁴⁰、徐翔生〈日本神道と中国思想——天皇思想をめぐつて〉¹⁴¹等文。其中，據研究，張鷟（字文成，658?-730）作品《遊仙窟》撰成後，可能於八世紀初期，由具歌人身分的遣唐使山上憶良攜回日本，書中敘述男女風流情事方式，對奈良、平安時代的日本文學造成莫大影響，此書中國亡佚，幸在日本留存，而於清末傳回故土。¹⁴²同樣對平安時代日本文學造成重大影響的《白氏文集》，亦可能是由九世紀唐商攜至日本，或由最後一次遣唐使中的請益生吸收學習，而後在日本廣傳。¹⁴³學位論文有：蔡朝枝《日本天臺宗之中國法源研究——以最澄(767-822)思想為中心》¹⁴⁴等。

3. 圓仁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¹³⁷ 翁蘇倩卿，〈從「古事記」看古代日本人之思想〉，《亞洲與世界月刊》15:2，1991.10，頁 2-14。

¹³⁸ 陳明姿，〈《遊仙窟》與日本平安朝物語〉，《臺大日本語文研究》3，1992.12，頁 1-19。

¹³⁹ 陳明姿，〈中日兩國文學裡的「理想鄉」——以唐代傳奇與《源氏物語》為主〉，《臺大日本語文研究》4，1993.06，頁 1-16。

¹⁴⁰ 徐翔生，〈探討日本人古代死生觀之源流——以《古事記》中所見之「黃泉國」為例〉，《外國語文研究》5（臺北：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2007.01），頁 89-110。

¹⁴¹ 徐翔生，〈日本神道と中国思想——天皇思想をめぐつて〉，《臺大日本語文研究》19，2010.06，頁 223-242。

¹⁴² 張文成著，李時人、詹緒左校注，《遊仙窟校注·前言》（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42、45-46。

¹⁴³ 參見（日）古瀨奈津子，〈遣唐留學生與日本文化的形成〉，收入王勇編，《東亞座標中的遣隋唐使研究》第 14 章，（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頁 156-157。

¹⁴⁴ 蔡朝枝，《日本天臺宗之中國法源研究——以最澄（767-822）思想為中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記載唐朝晚期禮俗最詳盡的資料，當數日僧圓仁在九世紀撰寫成書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它在研究唐朝晚期的社會、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以及唐日交流史上都是極具價值的貴重史料，論及渡唐日人的貢獻，本書的撰成無疑是其中一項重要成果。對於禮俗研究而言，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錄了唐國忌行事，提及唐朝節日時，常舉日本節日的禮俗作比較，正可做為唐日節俗文化研究的比較，堪稱研究唐朝文化對日本影響的最佳史料。另外在法制文獻上，圓仁所記錄牒、狀的內容，廣義來說都是貴重文獻。尤其圓仁是武宗廢佛的見證人，其記錄是目前最重要資料。就目前搜尋所見，在公驗、過所方面的研究成果方面，前人成果已多，經典代表作品，可舉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的〈三井寺所藏の唐過所に就て〉¹⁴⁵、礪波護的〈唐代の公驗と過所〉¹⁴⁶、荒川正晴〈唐の通過公証制度と公・私用交通〉¹⁴⁷及大陸學者程喜霖《唐代過所研究》¹⁴⁸等，已作詳細探討。但學界對日本所藏牒、狀等官文書的作用，進行研究者甚少，管見所及，多半是利用敦煌文書與吐魯番文書內容進行研究。傳世史料中，尚有圓珍入唐所得公驗、過所、牒、狀等資料。「過所」為唐代通關所需重要官文書之一，另外還有相關的公驗、牒、狀，從明鈔本《天聖令·關市令》內容中，可知尚有「錄白案記」等。附帶一提，雖然圓珍所撰寫日記《行歷抄》，目前流傳的版本有所殘缺，但就唐日法制史研究來說，也是貴重研究材料。

¹⁴⁵ (日)內藤湖南，〈三井寺所藏の唐過所に就て〉，收入《內藤湖南全集》(7)，東京：筑摩書房，1970。

¹⁴⁶ (日)礪波護，〈唐代の過所と公驗〉，收入氏編，《中国中世の文物》，(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頁 661-720。

¹⁴⁷ (日)荒川正晴，〈唐の通過公証制度と公・私用交通〉，收入氏著《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國》，(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0)，頁 385-443。

¹⁴⁸ 程喜霖，《唐代過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0。

自 20 世紀以來，不少日本學者對《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作深入研究，因而成果豐碩。《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原始的手稿已經亡佚，現在日本流通最早的抄本是京都東寺觀智院古抄本，錄文見於 1907 年 12 月由國書刊行會發行的《續續群書類從》第十二輯·宗教部（二）。津金寺本原件已下落不明，幸而留下文本（1914 年由《四明余霞》第 329 號附錄刊行）。1915 年《大日本佛教全書》第 113 冊《遊方傳》中，出版了以東寺觀智院為底本，《四明余霞》為校正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並附考證。影印本則是在 1926 年，以東寺觀智院本的照片複製，由岡田正之整理，刊登於《東洋文庫論叢》第 7 號，限量發行三百部，岡田正之於 1913 年所撰〈關於慈覺大師的入唐紀行〉¹⁴⁹做為解說，放在附錄一併發行。

研究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圓珍《行歷抄》及圓載等渡唐日本高僧事蹟的名家，戰後初期代表性日本學者可舉小野勝年、足立喜六、佐伯有清等。《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日譯注，具代表性者除了小野勝年堪稱里程碑的四卷本《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の研究》¹⁵⁰，尚有足立喜六以 1947 年叡山文庫原稿做譯注，鹽入良道所補注的二卷本，¹⁵¹近年來深谷憲一的譯注本¹⁵²也深受注意。

20 世紀中期，美國駐日本大使賴世和(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1910-1990) 撰寫了“*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¹⁵³此書對圓仁的日記和行動提出超越佛教史、日本史或中國史的新見解，認為圓仁的經歷是「宗

¹⁴⁹ (日) 岡田正之，〈慈覺大師の入唐紀行に就いて〉，《史學雜誌》24:10，1913。

¹⁵⁰ (日) 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の研究》(一)~(四)，京都：法藏館，1989。

¹⁵¹ (日) 足立喜六譯注、塩入良道補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1、2，東京：平凡社東洋文庫，1970、1985。

¹⁵² (日) 深谷憲一譯，《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東京：中央公論社中公文庫，1990。

¹⁵³ (美) 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 “*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 New York: Ronald Press Company, 1955.

教的獻身、知性的探索與高貴的冒險，令人驚奇的結合」，並附上詳盡的註解，此書引起了西方學者注意，後來也出現了法文、德文譯本，使圓仁的作品進入國際的視野。賴世和將圓仁原本的四卷日記原文打散，再增加圓仁相關研究，變成 9 章，每章下再分成許多小段落進行更詳細的講解，書末並且附上圓仁的生平年表，讓第一次接觸圓仁的讀者，特別是西方讀者，可以更容易瞭解圓仁的偉大之處。此書後由日人田村完誓翻譯為日文。¹⁵⁴

以下再介紹《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文版版本。以抄本而言，國家圖書館和南京圖書館各有四卷抄本，國圖抄本字跡工整，南京圖書館筆觸娟秀，比對可知出自不同書家。¹⁵⁵

抗戰前出版的中文排印本有：1936 年羅振玉校閱過的石印本《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在 1937 年由海上淨業佛教社出版一卷本，僅有第一卷。戰後臺灣發行兩次。¹⁵⁶大陸地區出版者，則有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入唐求

¹⁵⁴ (日)田村完誓日譯，《圓仁 唐代中國への旅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の研究》，東京：實業之日本社，1963，原書房，1985，講談社學術文庫，1999。

¹⁵⁵ 國家圖書館與南京圖書館分別藏有《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手抄本事，感謝日本學友河野保博先生告知，並於 2015 年 1 月中旬邀筆者一同前往國家圖書館調查藏本狀況，借筆者翻閱其影印自南京圖書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抄本，盛情可感，附記於此，以表感謝。以國家圖書館抄本而言，為貴重線裝善本藏書。原件雖不供調閱，但已製成膠卷可供現場查閱，惜不知為何人據何版本抄寫，亦不知抄成年代，僅能從所用紙張上的朱紅印刷字體「庫籍整理處製」，判斷與羅振玉有所相關，蓋羅氏於 1933 年於旅順成立「庫籍整理處」，此抄本應與羅振玉有所關連，且晚於 1933 年抄成。經請教國家圖書館善本室館員，據聞是民國三十年代與其他善本書一同購入，輾轉來到臺灣，手抄本目前藏於國家圖書館。日後或有全部數位化上網供各界查閱之可能。目前可於「典藏臺灣」網站看到上述國家圖書館抄本的第一頁，網址為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8/49/82.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14 日)

¹⁵⁶ 分別為 1971 年，臺灣文海出版社翻印《大日本佛教全書》出版《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另一部為潘平釋譯，《入唐求法巡禮記》(高雄：佛光文化出版社，1998 初版，2014 再版)，選錄與佛教相關段落，附注釋與白話譯文，並對《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成書經過、版本做概要介紹。

法巡禮行記》¹⁵⁷、白化文、李鼎霞等人據小野勝年研究成果，修訂改編為《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¹⁵⁸，以及《行歷抄校注》¹⁵⁹。廣西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¹⁶⁰附有《行歷抄》的文本、標點及簡單的註解，便於閱讀，惜未註明由何人註解或根據什麼版本出版。

在研究成果方面，援引《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進行專題研究的中文作品不在少數，卻仍待深入加以運用。臺灣援引《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進行探討的法制、政治史方面單篇論文，管見所及僅有黃清連〈圓仁與唐代巡檢〉¹⁶¹與林楓珏〈論圓仁筆下的中唐基層行政組織〉¹⁶²一文。再以臺灣的碩博士論文為例，含筆者的碩士論文《唐日令中所見節假生活初探》(2010)在內，至2015年春為止可找到115筆相關文獻，但與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書直接相關的臺灣地區學位論文，僅有1988年政治大學葉綦綦碩士論文《圓仁法師「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所見的唐代文化》，其研究內容為概觀性的介紹，和拙著偏重於審視中日法制與禮俗交流的出發點頗有差異，而且距今也超過二十年以上。日文相關論文，據1990年以後歷屆日本國學院大學同學整理，至2014年春天為止，已有340篇。如再將研究論述回顧範圍擴及以韓文、英文等語文寫作的研究作品，實非短短篇幅內可以敘述。

¹⁵⁷ (日)圓仁撰，顧承甫、何泉達點校，《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¹⁵⁸ (日)圓仁撰，白化文、李鼎霞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石家莊市：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橫排版2007。

¹⁵⁹ (日)圓珍撰，白化文、李鼎霞編，《行歷抄校注》，石家莊市：花山文藝出版社，2004。

¹⁶⁰ (日)圓仁撰，《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桂林：廣西大學出版社，2007。

¹⁶¹ 黃清連，〈圓仁與唐代巡檢〉，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4，1997，頁899-942。

¹⁶² 林楓珏，〈論圓仁筆下的中唐基層行政組織〉，收入《早期中國史研究》3:1(臺北：早期中國史研究會，2011)頁123-136。

由於成果甚多，涵蓋層面極廣，故以下介紹的相關先行研究，鎖定在運用圓仁見聞，系統性地針對唐末禮俗、法制、文化交流討論的代表性中日文作品。

藉《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內容，來研究唐末唐土境內的經濟社會生活、村里組織，唐人、新羅人、日本人之間交往互動情形，或圓仁旅行路線狀況的大陸學者作品，例如張葳〈唐中晚期山東北部地區民眾的經濟生活與社會信仰初探——以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為中心〉¹⁶³即是一例，作者經由考查發現，在唐中晚期山東北部地區民眾的經濟生活中，自然經濟仍佔有絕對支配的地位，商品經濟在各個方面都受到自然經濟的限制，而此區的社會信仰亦以功利性為主，具有趨眾、多元的特點。取徑類似者可舉劉再聰〈「在田野者為村」——以《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為中心的考察〉¹⁶⁴、王福昌〈日人圓仁視野中的唐代鄉村社會〉¹⁶⁵、程少燕〈日僧圓仁途經青州路線考述〉¹⁶⁶等文為例。運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對於唐代社會生活進行研究者，例如納春英〈圓仁視野中晚唐長安平民男子的服飾——以《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為中心的考察〉¹⁶⁷，論及關於唐人生活時尚及習俗。黃濤、萬軍，〈日僧圓仁來華遊記中的唐代節日習俗辨析〉¹⁶⁸，討論圓仁在唐所見節俗與

¹⁶³ 張葳，〈唐中晚期山東北部地區民眾的經濟生活與社會信仰初探——以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為中心〉，收入《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2，頁 84-91。

¹⁶⁴ 劉再聰，〈「在田野者為村」——以《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為中心的考察〉，《中國農史》2010:1，頁 95-104。

¹⁶⁵ 王福昌，〈日人圓仁視野中的唐代鄉村社會〉，《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1。

¹⁶⁶ 程少燕，〈日僧圓仁途經青州路線考述〉，《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3，頁 94-96。

¹⁶⁷ 納春英，〈圓仁視野中晚唐長安平民男子的服飾——以《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為中心的考察〉，《唐史論叢》17輯（陝西：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 124-135。

¹⁶⁸ 黃濤、萬軍，〈日僧圓仁來華遊記中的唐代節日習俗辨析〉，《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6，頁 20-29。

日本的節日風俗異同，尤其是中秋節起源。在衍生作品方面，董志翹依據他從日本蒐集到的各種古抄本，將他的博士論文擴大撰寫成《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詞彙研究》，該書雖屬於語言學方面研究，但對於解讀《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文本頗有助益。又如史睿撰寫〈圓仁求法目錄所記五臺山石刻考〉¹⁶⁹，是運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行歷抄》、《廣清涼傳》、《宋高僧傳》、《淨土往生傳》、敦煌文獻等資料，考證〈圓仁請來目錄〉¹⁷⁰內容。亦有時間斷限、主題和拙稿取徑有所相似的大陸地區碩士論文，如孫一敏《9世紀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以唐日貿易為契機》¹⁷¹、汪晶石《日本高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與九世紀的在唐新羅人》¹⁷²、齊會君《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所載文書研究》¹⁷³。

日文作品中，近年運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內容做為研究素材的專書，可舉古瀨奈津子《遣唐使眼中的中國》¹⁷⁴一書為例。此書主要是運用唐與日本的儀式、典禮的比較，並大量援引唐日歷史文獻、法典、禮典，如《唐六典》、《大唐開元禮》、吐魯番出土文書，日本的正倉院文書、《養老令》、《類聚符宣抄》、以及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等史料，以詳實而淺近的文字內容來說明歷次的遣唐使節團，是如何從日本出發，抵達中國後的見

¹⁶⁹ 史睿，〈圓仁求法目錄所記五臺山石刻考〉，《文獻》2005:4，頁128-140。

¹⁷⁰ 參見（日）竹內理三編，《平安遺文・古文書編》4455號〈僧圓仁請來目錄〉，東京：東京堂，1928。

¹⁷¹ 孫一敏，《9世紀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以唐日貿易為契機》，浙江工業大學碩士論文，2010。

¹⁷² 汪晶石，《日本高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與九世紀的在唐新羅人》，山東：延邊大學碩士論文，2013。

¹⁷³ 齊會君，《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所載文書研究——兼與圓珍文書、敦煌文書比較》，河南：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4。

¹⁷⁴ （日）古瀨奈津子，《遣唐使の見た中国》，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

聞、參與的典禮及宴會，比較唐與同時期的日本的法制與禮儀，探討其意義，並說明歷次遣唐使團為日本帶回何種有形與無形的文化成果。

另外，該書尚運用比較史學的手法，從唐代的「會」與日本的「節會」，以及其他禮儀的進行方式不同，來探討日本天皇與官員的君臣關係，經過各種細膩的比較，導出結論：唐皇帝的性質位於權力的頂點，「會」是饗宴的性質，皇帝的權力可及於地方，同時期的日本天皇雖然也採中國的律令儀式框架，權威卻狹窄得多，政權是以中央官為主，節會是用來確認與五位以上中央官的關係，所以日本天皇的性質與唐皇帝不同，權力也無法及於地方。

至於運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研究禮制空間的專文，則可舉妹尾達彥〈長安：禮儀之都——以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為素材〉¹⁷⁵為例。此文是基於圓仁以參加者身分目睹長安城中的王權禮儀，運用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記載，對唐的王權禮儀加以分析。從開成五年(840)八月二十日至會昌五年(845)期間，圓仁在長安生活，所記錄的諸事項，妹尾教授認為是見證了唐王朝禮儀由以為政者為核心的閉鎖型禮儀，逐步轉型為庶民也參與的開放性禮儀的過程。此文中所整理的王權禮儀史回顧，特別是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當具有參考價值。

該文將圓仁所經歷的王權禮儀，歸類為 1.皇帝喪葬禮儀、2.皇帝降誕日與國忌、3.祀天禮儀（南郊）、4.公開處刑（棄市），並將圓仁的記錄與中國史料加以核對，歸納出九世紀唐王朝禮儀的特色，一方面處於變化之中，一方面也使得儒佛道、民間信仰及四季禮俗等多元要素結合為一體，當時中國社會的變化體現於王權禮儀的變化之中，一方面囊括了所有人，而宗教也在此過程中隨之世俗化。

¹⁷⁵ (日)妹尾達彥，〈長安：禮儀之都——以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為素材〉，收入《唐研究》15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385-434。

4.圓仁傳記相關

如前一小節所言，從 20 世紀初，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抄本刊行問世以來，學界運用圓仁見聞進行了各方面研究，成果豐碩。除此之外，亦有作品是使用當時人為圓仁所撰寫的傳記進行研究。例如 1972 年小野勝年發表〈「圓仁三藏供奉入唐請益往返傳記」について〉¹⁷⁶一文為例。小野勝年是以研究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聞名的日本學者，該文中，對唐人樂部著〈圓仁三藏供奉入唐請益往返傳記〉的記載做了簡要的版本介紹、日語白話文翻譯及原文校錄。除了樂部所撰的圓仁傳記外，其他知名的圓仁傳記，舉例而言，尚有藤原實平等人所撰《日本三代實錄·圓仁卒傳》、三千院本《慈覺大師傳》、源英明跋《慈覺大師傳》等，日本學者佐伯有清據以撰成《慈覺大師傳の研究》¹⁷⁷。此書與同為佐伯有清撰寫的《圓仁》一書中，雖然均提及樂部所撰的《圓仁三藏供奉入唐請益往返傳記》，但僅是寥寥數語，且《圓仁》書中特別指出樂部對於圓仁歸國前情形的記載，與圓仁所記載的經歷相反。¹⁷⁸

至於中文研究著作方面，首先注意到樂部所著圓仁傳記者，應是顧承甫〈圓仁事跡的最早記載〉¹⁷⁹，該文對樂部所寫圓仁傳記做簡單介紹，雖然認為「所記堪與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彼此印證，頗有史料價值。」但是管見所及，未找到進一步的相關研究。經過二十年，才再有王勇、王麗萍合

¹⁷⁶ (日)小野勝年，〈「圓仁三藏供奉入唐請益往返傳記」について〉，《東方宗教》40 (東京：日本道教學會，1972)，頁 1-11。

¹⁷⁷ (日)佐伯有清，《慈覺大師傳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提及《圓仁三藏供奉入唐請益往返傳記》處，見該書頁 234。

¹⁷⁸ (日)佐伯有清，《圓仁》(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頁 217。

¹⁷⁹ 顧承甫，〈圓仁事跡的最早記載〉，《中華文化論叢》2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 40。

著〈唐人樂部《圓仁三藏供奉入唐請益往返傳記》校錄〉¹⁸⁰一文問世，為文獻學性質的專文。2006年，王勇以前文為基礎，擴大內容為〈《圓仁三藏供奉入唐請益往返傳記》諸本雜考及注釋〉¹⁸¹，介紹了各個版本的文獻之間的系譜、淵源及校勘，以日文在日本發表。活字排印錄文，除以上所介紹外，另可參考《大日本佛教全書》¹⁸²，以及《全唐文補編》¹⁸³中所載內容。

5. 跨界人物

大凡人口移動，不外基於社會、政治、經濟、戰爭、貿易諸原因。¹⁸⁴日本現今所謂「渡來人」或「歸化人」，此種人物以現代的語言來說屬於前往唐或日本的國外移民，具有跨界特性。回顧此類人物研究史，歷史背景設定於日本古代的作品，多半傾向於研究奈良時代時期的人物行動，例如關晃《歸化人》¹⁸⁵一書中將歸化人分為前後二期，後期雖止於日本平安時代初期，但內容未觸及晚唐唐人渡日動機問題。王勇《唐から見た遣唐使：混血児たちの大唐帝国》¹⁸⁶介紹了唐日混血兒在唐土與日本之間的活動情形。王勇另以中文撰寫〈遣唐使時期的中日混血兒〉¹⁸⁷。葛繼勇博士論文〈《續日本紀》

¹⁸⁰ 同前引王勇、王麗萍，〈唐人樂部《圓仁三藏供奉入唐請益往返傳記》校錄〉，收入王勇編，《東亞座標中的書籍之路研究》（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頁234-242。

¹⁸¹ 王勇，〈『圓仁三藏供奉入唐請益往返傳記』諸本雜考及び注釈〉，《日本漢文學研究》2（東京：二松學舎大学，2007.03），頁335-356。

¹⁸² （日）高楠順次郎等編，《大日本佛教全書》冊113〈遊方傳・慈覺大師入唐往返傳〉（東京：有精堂出版，1932初版，1979覆刻版），頁283-285。

¹⁸³ 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下）又再補卷6〈圓仁三藏供奉入唐請益往返傳記〉（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2320-2321。

¹⁸⁴ 同前引王儀，《隋唐與後三韓關係及日本遣隋使遣唐使運動》，頁105。

¹⁸⁵ （日）關晃，《歸化人》，東京：講談社學術文庫，2009。

¹⁸⁶ 王勇，《唐から見た遣唐使：混血児たちの大唐帝国》（東京：講談社，1998）

¹⁸⁷ 王勇，〈遣唐使時期的中日混血兒〉，收入氏編，《東亞座標中的跨國人物研究》，頁14-25。

所載赴日唐人研究》¹⁸⁸的時間斷限則止於《續日本紀》成書年代，即奈良時代結束。其他的中日文先行研究，對於晚唐時期的渡日唐人，多半著重在僧侶或商人階層的活動、群體性質及意義分析，例如榎本淳一〈來日した唐人たち〉¹⁸⁹，將赴日本唐人分類為唐使、非唐使及俘虜三大類，非唐使之中又分為僧侶、俗人、混血兒。山崎覺士《中國五代國家論》第五章〈九世紀における東アジア海域と海商——徐公直と徐公祐〉¹⁹⁰，提到九世紀的東亞是以刺史、僧侶、海商三者為主角，為新穎觀點，亦論及義空國書、大宰府鴻臚館與海商等。朴天中〈八至九世紀東亞交易航線考察〉¹⁹¹一文也值得參考。

6. 圓珍、圓載及綜合研究

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後，仍有日本僧侶自行乘唐人商船赴唐求法巡禮，例如智證大師圓珍。他的赴唐日記《行歷抄》多所散逸，但仍屬珍貴文獻，記錄了他赴唐求法途中的心情，特別與圓載見面後的記事，是為數不多關於圓載的記錄。近人代表性研究作品如小野勝年《入唐求法行歷の研究—智證大師円珍篇》¹⁹²上、下二冊，佐伯有清《智證大師傳研究》¹⁹³，白化文、李鼎霞編注有《行歷抄校注》¹⁹⁴。臺灣學位論文中，對圓珍生平或見聞的研究，

¹⁸⁸ 葛繼勇，〈《續日本紀》所載赴日唐人研究〉，浙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07。

¹⁸⁹ (日) 榎本淳一，〈來日した唐人たち〉，收入遣唐使船再現シンポジウム編，《遣唐使船の時代—時空を駆け抜けた超人たち》(東京：角川選書，2010)，頁 126-146。

¹⁹⁰ (日) 山崎覺士，《中國五代國家論》第 5 章〈九世紀における東アジア海域と海商——徐公直と徐公祐〉(京都：思文閣出版，2010)。

¹⁹¹ 朴天中，〈八至九世紀東亞交易航線考察〉，收入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 10 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2)，頁 217-227。

¹⁹² (日) 小野勝年《入唐求法行歷の研究—智證大師円珍篇》(上)、(下)，東京：法藏館，1982。

¹⁹³ (日) 佐伯有清，《智証大師傳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

¹⁹⁴ 白化文、李鼎霞，《行曆抄校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4。

則僅有周雅容碩士論文《智證大師圓珍之研究》¹⁹⁵及林靜怡碩士論文《日僧筆下的晚唐佛教—以圓仁、圓珍為中心》¹⁹⁶，此二篇碩士論文偏重於佛學的研究，與拙稿所持視角甚有出入。

宮崎市定〈留唐外史〉¹⁹⁷為介紹圓載生平專文。專書可舉佐伯有清《悲運の遣唐僧》¹⁹⁸為例。探索圓載成就的中文學術論文更為罕見，胡錫年〈隋唐時代中日關係中的二三事〉¹⁹⁹，用「圓載的歷史冤案」專段，對《行歷抄》中圓載事進行考辯，認為《行歷抄》中對圓載的記述並非完全可靠。張偉然則再一次對胡文及《行歷抄校注》中與圓載相關的記述提出考辯。²⁰⁰大陸學者王勇的〈最後一次遣唐使的特殊使命——以佚存日本的唐代文獻為例〉²⁰¹，介紹圓載在天台山所進行抄經事業及透過圓載送回日本的文獻，包括唐決與經論義疏等。此文曾改題為〈天台入唐僧與書籍之路〉²⁰²。臺灣學者釋真定撰寫〈《法華五百問論》在日流傳史〉²⁰³，對於圓載保存天台宗重

¹⁹⁵ 周雅容，《智證大師圓珍之研究》，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¹⁹⁶ 林靜怡，《日僧筆下的晚唐佛教—以圓仁、圓珍為中心》，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院碩士論文，2012。

¹⁹⁷ (日)宮崎市定，〈留唐外史〉，收入《宮崎市定全集》(22)(東京：岩波書店，1992)，頁 8-26。亦收入氏著，《日出づる国と日暮るる処》(東京：中公文庫，1997)，頁 1-35。

¹⁹⁸ (日)佐伯有清，《悲運の遣唐僧——円載の数奇な生涯》，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¹⁹⁹ 胡錫年，〈隋唐時代中日關係中的二三事〉，《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78:3，頁 46-58。

²⁰⁰ 參見張偉然，〈《行歷抄校注》商疑——特別是關於入唐留學僧圓載的史實〉，《九州學林》(香港：香港復旦大學，2008.7)，頁 304-320。

²⁰¹ 王勇，〈最後一次遣唐使的特殊使命——以佚存日本的唐代文獻為例〉，收入氏編《東亞座標中的遣隋唐使研究》(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頁 64-83。

²⁰² 王勇，〈天台入唐僧與書籍之路〉，收入氏編，《中日關係的歷史軌跡》(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頁 3-28。

²⁰³ 釋真定，〈《法華五百問論》在日流傳史〉，收入《華梵人文學報》天臺學專刊(臺北：華梵大學，2013)，頁 281-310。

要典籍功勞加意推崇，並出版《《法華五百問論》校釋》²⁰⁴，使這部包含圓載苦心的佛學作品終於在千餘年之後正式回到故土獨立出版。

綜合性探討跨國人物的論文集，可舉王勇編《東亞座標中的跨國人物研究》²⁰⁵、《東亞座標中的遣隋唐使研究》²⁰⁶等二本論文集為例。其中跨國人物平均分散在民國時期以前，關於遣唐使時期人物的論述相對較少，未如《東亞座標中的遣隋唐使研究》中所收錄諸論文主題集中，但皆有參考價值。

（三）禮令研究：宋天聖令、唐日喪葬令、假寧令等相關

對於禮令研究，因筆者學力和識見有限，且全面性回顧現存的唐禮或日本王權禮儀研究，實非以短篇幅可以達成，故以下暫先將核心課題鎖定在唐日法令中呈現的法制禮俗問題。

1. 唐代禮令法制化源流

自古以來，社會秩序的建立，大致是由習俗而禮教，進而有國法，尤其是在統一王權完成以後。²⁰⁷春秋到戰國是成文法典發生時期，從典籍與考古資料可知，早在秦漢時期即有律的存在。漢魏以後，陸續整理禮律，律、令二分，建立納禮入律令、違禮令入律的原則，始於西晉編成的泰始律令。令典的體系化，是晉至唐之間最受矚目的成果。除政治制度法制化之外，更重要的是將春秋戰國以來的儒家學說，尤其是禮教融入法典。²⁰⁸唐朝律令制度是集古來法制發展的大成，作為國家社會秩序的準繩，其立法原理「一准

²⁰⁴ 同前引釋真定撰，《《法華五百問論》校釋》上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²⁰⁵ 王勇編，《東亞座標中的跨國人物研究》，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

²⁰⁶ 王勇編，《東亞座標中的的遣隋唐使研究》，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

²⁰⁷ 參見高明士，〈引言〉，收入氏編《東亞傳統家禮、教育與國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頁 i。

²⁰⁸ 詳見高明士，《中國中古政治的探索》第 5 章〈法制化與盛世的再思考〉（臺北：五南出版社，2007），頁 227-247 之說明。

乎禮」²⁰⁹，而成為一套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法典。另如徐道鄰認為，「唐律的基本觀念，是一種禮教的法律觀。禮教的目的，是維持社會的善良關係。所以唐律也表現出一種很發達的社會觀念。」²¹⁰這些論點都可說明唐代禮令關係密切。除了法令中有禮的概念，國家也進行禮典編纂。首次將五禮作為禮典內容，是在曹魏末由荀凱等編纂，至西晉建國之初所完成的《新禮》。從西晉的《新禮》，到唐玄宗頒行《開元禮》，至直明清，官方制禮均以五禮為基本內容。²¹¹

唐的法制對於日本，乃至東亞地區影響深遠，前輩學者已多所論及，例如楊鴻烈《中國法律在東亞諸國之影響》²¹²、曾我部靜雄《日中律令論》²¹³、高明士《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索》、《律令法與天下法》等專著中都有精到論述。張中秋《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比較》²¹⁴使用比較方法，討論了唐代中國法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以及日本的選擇與變通。

由於唐代以前的令典，包括唐令在內，多數亡佚，傳世文獻記載甚為零碎，只留下了律典較為完整，此即現今所見的《唐律疏議》，使得後世較難瞭解當時社會及法律施行的全貌。20世紀以來，日本前輩學者努力復原唐令，如中田薰首先利用日本《養老令》進行復原唐令、仁井田陞著《唐令

²⁰⁹ 參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82。

²¹⁰ 參見徐道鄰，〈中國法律制度〉，收入氏著《中國法制史論集》（臺北：志文出版社，1975），頁 11，並可參見同書〈唐律中的中國法律思想和制度〉，頁 56-67。

²¹¹ 詳見高明士，《中國中古禮律綜論——法文化的定型》第 1 章〈中古時期的制禮〉（臺北：元照出版社，2014），頁 17-25 說明。

²¹² 參見楊鴻烈，《中國法律在東亞諸國之影響》三〈中國法律在日本之影響〉甲節〈自天聖天皇時代至醍醐天皇時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臺一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簡體版），臺版頁 199-288。

²¹³ （日）曾我部靜雄，《日中律令論》，東京：吉川弘文館，1963。

²¹⁴ 張中秋，《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比較研究：以唐與清末中日文化的輸出與輸入為觀點》，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拾遺》以及池田溫等著《唐令拾遺補》等。但所據非為第一手材料，不免有難窺唐令原貌之情況。雖然唐令散逸，但日本令大致留存，故在早在 1960 年代，即已有運用現存日本令研究日中關係的作品，如曾我部靜雄《律令を中心とした日中關係史の研究》，²¹⁵論及了力役、官制、戶籍、民間習俗諸問題。以下進行分項介紹。

(1) 《天聖令》殘卷

《天聖令》是近十來年中古法制最重要的發現，開拓了大量新研究課題。《天聖令》是宋仁宗（1010-1063，於 1023-1063 在位）於天聖七年（1029）下詔呂夷簡等編成，²¹⁶在天聖十年（1032，是年十一月改元為明道元年）時頒行。《天聖令》是依據唐令，因應宋代當時需要而加以修訂：「凡取唐令為本，先舉見行者，因其舊文參以新制定之。其今不行者亦隨存焉」。《天聖令》明朝抄本文字分兩段記載，前半主要是承襲舊文（唐令）刪修訂定的宋令，後段標示「右令不行」，記載唐朝令文，提示宋朝不用此等唐朝令文。此處所言唐令，學界一般以為是以《開元二十五年令》為主，如大陸學者戴建國的〈天一閣藏明抄本《官品令》考〉²¹⁷，以及日本學者岡野誠〈天聖令依據唐令の年次について〉²¹⁸、坂上康俊〈再論《天聖令》藍本唐令《開元

²¹⁵ （日）曾我部靜雄，《律令を中心とした日中關係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8。

²¹⁶ 《天聖令》編成的詳細經過，可參見（清）徐松輯，馬泓波點校，《宋會要輯稿》（上），〈刑法一之四·格令一·仁宗〉（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頁 11。

²¹⁷ 參見戴建國，〈天一閣藏明抄本《官品令》考〉，收入《歷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9:3），頁 71-86。又見氏著《唐宋變革時期的法律與社會》第二章對天聖令所本唐令為開元二十五年令之論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185-200。

²¹⁸ （日）岡野誠，〈天聖令依據唐令の年次について〉，收入日本法史學研究會編，《法史學研究會會報》第 13 號（東京：法史學研究會，2008），頁 1-24。

二十五年令》說》²¹⁹諸文中均有論證，但在《開元二十五年令》前後的令制，都有可能成為《天聖令》取法的對象。

《天聖令》原有三十卷，流傳時間不長，²²⁰過去以為該令內容已佚亡，1999年，大陸學者戴建國在寧波天一閣發現明抄本《官品令》，後來證實即是北宋《天聖令》殘卷。他發表〈天一閣藏明抄本《官品令》考〉論文披露消息後，立即引起海內外唐宋史學界廣泛注意。經過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成員的整理，2006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以下簡稱《天聖令殘卷》），本為三十卷的《天聖令》殘存的最後十卷得以重見天日。《天聖令殘卷》最後十卷收有《田令》、《賦役令》、《倉庫令》、《廩牧令》、《關市令》、《捕亡令》、《醫疾令》、《假寧令》、《獄官令》、《營繕令》、《喪葬令》、《雜令》等十二篇令文，合計宋令 293 條，不行唐令 221 條，另含《喪葬令》附〈喪服年月〉 10 條，共計 524 條。這部殘存的法令集雖不完整，對於唐宋之際的法制史研究而言，仍堪稱貴重資料。高明士認為，以「令」作為行政制度的法典形式，《天聖令》在令典發展史上，其歷史意義至少有①政治的法制化，②王化、教化的意義，③「唐宋變革」論的下限。²²¹

對於《天聖令》殘卷研究，海內外學者已發表計兩百篇以上的專論專著，研究風氣可謂相當熱烈。²²²如趙晶近作《《天聖令》與唐宋法制考論》²²³，

²¹⁹（日）坂上康俊著，何東譯，〈再論《天聖令》藍本唐令《開元二十五年令》說〉，收入《天聖令論集》（上），頁 53-64。

²²⁰ 參見高明士，《中國中古禮律綜論》第 15 章〈「天聖令學」與唐宋變革〉頁 416-421 之論述。

²²¹ 參見高明士，〈天聖令的發現及其歷史意義〉，收入《法制史研究》16 期（臺北：中國法制史學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頁 1-32，增補後收入前引氏著《中國中古禮律綜論》第 15 章，頁 415-440。

²²² 並參見前引高明士，〈「天聖令學」與唐宋變革〉，頁 415-416 註 1 所述諸研究成果。

是以《天聖令》殘卷為出發點，嘗試從令篇構造、條文源流、法律術語、唐令復原及規範意涵等方面，切入唐宋令及唐宋法制研究。日本學者中村裕一著述《唐令逸文の研究》²²⁴則是將範圍再擴大到散逸的唐令遺文研究。其後中村氏又運用現存的《唐六典》及重見天日的《天聖令》殘卷等文獻撰述《唐令の基礎的研究》²²⁵、《大唐六典の唐令研究—「開元七年令」説の検討—》²²⁶等著作。

以《天聖令》殘卷中的《假寧令》為例，其內容規定官員休假、請假等，包括固定日期的節假、旬假，以及與官員婚喪相關的事假等。筆者的碩士論文《唐日令中所見節假生活初探》²²⁷，即運用《天聖·假寧令》宋 1 到宋 3 條中規範的節日與假日，以及相關律令規範的時限、空間，選擇數個問題，對唐代、日本、北宋前期，官方與民間的節日、假日與生活禮俗進行初步探討。《喪葬令》則是規範了皇室及官員親屬喪禮、凶禮的適用範圍、守喪及儀式等級、墓田等。據大陸學者吳麗娛統計，在唐令中，有十五篇令文與《喪葬令》內容有所交會，共計 57 條，而《假寧令》則是《喪葬令》之外涉及喪葬最多的令文，因為與官員逢喪事給假有關。²²⁸禮與令的重要交叉點，在五服制度中。²²⁹將《喪葬令》與《假寧令》搭配起來看，可以看出傳統的禮

²²³ 趙晶，《《天聖令》與唐宋法制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²²⁴ (日)中村裕一，《唐令逸文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

²²⁵ (日)中村裕一，《唐令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2。

²²⁶ (日)中村裕一，《大唐六典の唐令研究—「開元七年令」説の検討—》，東京：汲古書院，2014。

²²⁷ 拙文，《唐日令中所見節假生活初探》，臺中：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²²⁸ 吳麗娛，〈以官員為中心的唐朝《喪葬令》與《喪葬禮》〉，收入氏著《終極之典》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413。

²²⁹ 姜伯勤，〈唐禮與敦煌發現的書儀——《大唐開元禮》與開元時期的書儀〉，收入氏著《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6），頁 431-435。

制既與當時風俗、宗教信仰等互相融合，成為傳統中國文化的一環，並成為國家法制，而具有拘束性與強制性。

對於研究日本令而言（由於日本於八世紀初施行的《大寶令》目前絕大部分已散逸，以下提及日本令時，主要是指八世紀中期頒布的《養老令》），發現《天聖令殘卷》的具體意義，除可復原散逸的唐令（主要指《開元二十五年令》）外，也可以作為復原日本《養老令》散逸部分的最佳資料，如《倉庫令》、《醫疾令》等，並透過《養老令》對唐令條文的增刪，探討八世紀的日本在模仿中國修撰日本令時，究竟有多少是吸收自唐令，而又有哪一些內容是為因應日本當時的現狀而加以刪修，讓現代研究者能更加清楚瞭解八世紀時期日本建設律令國家的基本方針，以及八至九世紀唐日文化交流、傳播或認同等問題。同時也可訂正《唐令拾遺》、《唐令拾遺補》等重要唐令著作，實是近十來年中古法制最重要的發現與新研究課題的開拓。

2. 唐禮相關

拙稿因並非將研究重心置於唐代施行五禮相關問題，故以下僅就禮令關係研究史、拙論中述及的禮典——《大唐開元禮》及《大唐元陵儀注》，以及凶禮中的喪禮、吉禮這兩項在禮令中較顯突出的面向，介紹近年研究成果，而著重敘述與唐日交流相關的研究成果。

論及唐代禮書，甚至隋唐禮令制度之研究，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是必讀之鉅著。近年東西方學界研究唐代禮制蔚為潮流，成果迭出，代表性學人如高明士、周一良、姜伯勤、吳麗娛、金子修一、妹尾達彥、David L. McMullen（麥大維）、Howard J. Wechsler等，多有蕁路藍縷之功。²³⁰

²³⁰ 並可參見楊華，〈論《開元禮》對鄭玄和王肅禮學的擇從〉，收入氏著《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臺北：五南出版社，2007），頁305所做介紹。

高明士新作《中國中古禮律綜論——法文化的定型》²³¹介紹唐禮及其法制化源流。唐代禮制的研究成果，中國部分可參考《二十世紀唐研究·政治卷》²³²中，甘懷真所撰寫〈禮制〉一章，回顧二十世紀學界對唐代禮制的研究，並對過去禮儀制度的研究歸納出脈絡。對於禮典研究，張文昌《唐代禮典的編纂與傳承——以《大唐開元禮》為中心》²³³及《制禮以教天下——唐宋禮書與國家社會》²³⁴兩部作品甚有深度，細緻整理了過去的研究史及唐宋國家禮典的淵源與作用。

因唐朝及其前代的禮典文本，現僅有《大唐開元禮》傳世，故學者所論，多針對文本所記載的「禮制」或「儀式」而展開；探索「禮典文本」及其體例傳承的研究，相對卻顯寂寥。因此學界對於隋唐禮儀之研究，「禮制」的份量遠大於「禮典」。²³⁵

在諸多對隋唐禮儀及禮律關係研究中，高明士〈隋代的制禮作樂〉²³⁶可謂代表性作品，內容承陳寅恪的論點，考察隋文帝、煬帝制定禮典、樂典之經過，指出隋代制禮作樂乃在確立對華夏文化的認同，並強調以皇帝為中心之集權政制，故隋代禮制乃是追隨漢、魏，而非北周舊制。史睿〈北周後期至唐初禮制的變遷與學術文化的統一〉²³⁷，則認為在隋文帝之前，北周武帝

²³¹ 高明士，《中國中古禮律綜論——法文化的定型》，臺北：元照出版社，2014。

²³² 胡戟等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²³³ 張文昌，《唐代禮典的編纂與傳承——以《大唐開元禮》為中心》，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8。

²³⁴ 張文昌，《制禮以教天下——唐宋禮書與國家社會》，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

²³⁵ 張文昌，〈唐代禮典與禮制研究之回顧與探索〉，《中國唐代學會會刊》19，頁 113-141。

²³⁶ 高明士，〈論隋代的制禮作樂〉，收入《隋唐史論集》（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3），頁 15-35。增補後收入氏著，《中國中古禮律綜論——法文化的定型》第 7、8 章，頁 181-229。

²³⁷ 史睿，〈北周後期至唐初禮制的變遷與學術文化的統一〉，收入《唐研究》第 3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165-184。

即已編修「五禮」，並改變宇文氏舊制，努力接近魏晉傳統，藉山東儒士吸收北齊與南朝文化；此精神後為隋文帝所承襲，在隋煬帝與唐太宗時更大量引進南朝文化，終在唐朝形成南北「文化統一」之局。

進入唐代，從唐高祖到唐玄宗都有大規模編修國家禮典的措施。高明士〈論武德到貞觀禮的成立——唐朝立國政策的研究之一〉²³⁸，指出高祖武德時期雖未撰立禮典，但將新禮納入令文，捨大業而直取開皇之制；而太宗朝《貞觀禮》的編修，內容則是比《武德令》更接近開皇，甚至跳過漢、魏，直追周制，同時南朝禮學亦漸抬頭，後終成主流。

唐高宗時期所編《顯慶禮》，因武后圖謀奪權，故在禮典編修與禮儀執行上企圖施展其意志，造成高宗至武周時期禮制陷入動盪，禮儀的運行多靠禮官維持，方得不墜。²³⁹吳麗娛²⁴⁰和史睿²⁴¹均有專論討論顯慶禮。

唐玄宗時期，編成最具代表性的禮典——《大唐開元禮》。作為中國現存最早之國家禮典，《開元禮》在內容與規模上都已經達到成熟的地步，而且成為唐以後歷代編修國家禮典之藍本；同時也因為杜佑《通典》中錄有《開元禮》之簡編，故內容能夠保存至今。論及《大唐開元禮》的相關的研究作品，除池田溫為汲古書院出版之刊本所撰寫的〈大唐開元禮解說〉²⁴²外，

²³⁸ 高明士，〈論武德到貞觀禮的成立〉，收入中國唐代唐代學會編，《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1159-1214，增補後收入前引氏著，《中國中古禮律綜論——法文化的定型》第9章，頁232-269。

²³⁹ 參見前引張文昌，〈唐代禮典與禮制研究之回顧與探索〉，頁115。

²⁴⁰ 吳麗娛，〈《顯慶禮》與武則天〉，收入前引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10輯，頁1-16。

²⁴¹ 史睿，〈顯慶禮所見唐代禮典與法典的關係〉，收入（日）高田時雄編，《唐代宗教文化與制度》，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7，頁115-132。

²⁴² （日）池田溫〈大唐開元禮解說〉，（唐）蕭嵩等撰，古典研究會編，《大唐開元禮·附大唐郊祀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光緒12年（1886）洪氏公善堂刊本（東京：汲古書院，1972），頁822-832。

尚可舉吳麗娛〈營造盛世：《大唐開元禮》的撰作緣起〉²⁴³、〈禮用之辨——《大唐開元禮》的行用釋疑〉²⁴⁴，以及前述張文昌《唐代禮典的編纂與傳承——以《大唐開元禮》為中心》、楊華〈論《開元禮》對鄭玄和王肅禮學的擇從〉²⁴⁵等作品為例。李玉生〈唐令與禮關係析論〉²⁴⁶則綜合性探討納禮入令，以及禮令間的銜接與衝突。至於唐代禮典對唐代社會所產生的規範效力，則有待研究。

中晚唐社會結構變遷，導致禮儀與令式的改變，禮典修撰的情況，亦與唐代前半不同。雖然禮典散逸，幸而 20 世紀前後，大量敦煌文書與書儀等資料重見天日，吳麗娛據此撰寫《唐禮摭遺——中古書儀研究》²⁴⁷，認為現存書儀，反映了作為禮儀核心的等級關係，從圍繞家族血緣為中心到以官場為中心的轉變，以及唐、五代的禮漸趨庶民化、實用化和官僚化。David L. McMullen (麥大維) 在“The Death Rites of Tang Daizong”²⁴⁸一文中討論唐代宗葬儀及《元陵儀注》，是最早關注《元陵儀注》的海外學者。²⁴⁹近期日本學者金子修一糾集對唐日禮制有興趣的青年學人，從《通典》中抄錄《元陵儀注》逸文，並進行日文譯注釋讀，現已完成出版。²⁵⁰

唐朝因國力的強大與文化上的優勢，連帶使得唐的禮典對當時的日本、韓國之禮儀、法律制度，都造成很大影響。日本最早的圖書目錄，為九

²⁴³ 吳麗娛，〈營造盛世：《大唐開元禮》的撰作緣起〉，《中國史研究》2005:3。

²⁴⁴ 吳麗娛，〈禮用之辨：《大唐開元禮》的行用釋疑〉，《文史》2005:2。

²⁴⁵ 楊華，〈論《開元禮》對鄭玄和王肅禮學的擇從〉，收入氏著《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頁 305-326。

²⁴⁶ 李玉生，〈唐令與禮關係析論〉，《唐史論叢》第 10 輯，頁 40-56。

²⁴⁷ 吳麗娛，《唐禮摭遺——中古書儀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²⁴⁸ David L. McMullen, “The Death Rites of Tang Daizong,” in *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 ed. McDermott, Joseph P., pp. 150-9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²⁴⁹ 同前引張文昌，〈唐代禮典與禮制研究之回顧與探索〉，頁 117。

²⁵⁰ (日)金子修一主編，《大唐元陵儀注新釋》，東京：汲古書院，2013。

世紀藤原佐世所撰之《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其中已有《江都集禮》、《顯慶禮》的紀錄，可見唐代的禮典，特別是《開元禮》對鄰邦，應具有禮源之性質。²⁵¹唐禮對四鄰的影響，在戰後有更細緻的研究問世，不過重點多是偏重在日本的部份。首先對此課題進行研究之日本學人，為瀧川政次郎與坂本太郎，二人均為唐、日禮制比較研究之先驅，且都指出唐禮對日本「儀式」與「律令」有相當之影響。瀧川政次郎曾發表〈唐礼と日本令〉、〈江都集礼について〉、〈中国の礼制と日本儀式〉、〈江都集禮と日本の儀式〉²⁵²等與唐日禮令相關研究諸文。坂本太郎在〈儀式と唐礼〉²⁵³一文中，除討論了「儀式」與唐禮的關係，並提醒不可過度強調唐禮的影響，而忽略日本自發性因素。古瀨奈津子則運用現存日本令、唐代書儀等古文書來討論唐禮及日本禮儀的運作，以及禮制與政治的關係，進行比較研究。新近作品可舉〈從書札禮看日唐親屬的比較研究〉²⁵⁴為例。

(1) 喪禮

「喪服」是「喪禮」中最受重視的部份，歷來研究眾多，以下舉幾例近年對唐代喪葬禮制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進行介紹。甘懷真〈漢唐間的喪服禮與政治秩序〉²⁵⁵，透過對舊君之喪服，指出漢、唐間的君臣關係越來越趨

²⁵¹ 同前引張文昌，〈唐代禮典與禮制研究之回顧與探索〉，頁 127。

²⁵² (日)瀧川政次郎，〈江都集禮と日本の儀式〉(收入《岩井(大慧)博士古稀記念典籍論集》，該事業會編刊，1963)，頁 342-347。

²⁵³ (日)坂本太郎，〈儀式と唐礼〉，收入《坂本太郎著作集 7 律令制度》(東京：吉川弘文館，2013)，頁 146-154。

²⁵⁴ (日)古瀨奈津子著，嚴茹蕙等譯，〈從書札禮看日唐親屬的比較研究〉，收入高明士編，《中華法系與儒家思想》(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 403-416。

²⁵⁵ 甘懷真，〈漢唐間的喪服禮與政治秩序〉，收入氏著《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頁 391-440。

向父子化。高明士〈唐代禮律規範下的婦女地位——以武則天時期為例〉²⁵⁶，指出武則天強調女性在唐代禮律的重要性僅屬政治手段，並未真正提高唐代女性地位。趙瀾認為唐代有鑒於家庭生活情況有所改變，故對母系親屬喪服加以提高，反映唐代禮制對傳統禮制有所更張，但是卻未改變唐代婦女地位，反受父權與夫權更嚴密的束縛。²⁵⁷羅彤華〈唐代官人的父母喪制〉²⁵⁸，則是從唐令「諸喪解官」條進行思考，結合禮令，討論官人為父母服喪禮之規定。張文昌〈服制、親屬與國家——唐宋禮法之喪服規範〉²⁵⁹，則是結合禮令之規定，探索唐、宋間男子為本宗與妻為夫族服制之變化，其中附多幅親屬相互服喪規範示意圖，對拙稿深具啟發。吳麗娛針對《喪葬令》及唐宋相關禮令問題，撰成巨著《終極之典——中古喪葬制度研究》²⁶⁰共上下二冊，其導言部分亦對喪葬禮制研究述論做細密的回顧。

喪禮中的喪儀用具，林耀曾〈唐宋喪禮禮數之比較研究〉²⁶¹，對唐、宋喪禮儀節與禮器進行比較。王銘〈中古喪葬方相、魃頭禮制等級考論〉²⁶²、〈開路神君：中國古代葬儀方相的形制與角色〉²⁶³諸文，對於喪葬禮制中方相、魃頭使用的場合及隨時代推演，使用層級向下移動過程有所討論。

²⁵⁶ 高明士，〈唐代禮律規範下的婦女地位——以武則天時期為例〉，收入氏著《中國中古禮律綜論——法文化的定型》第5章（臺北：元照出版社，2014），頁137-162。

²⁵⁷ 參見趙瀾，《唐代喪服制度研究》第5章，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8。

²⁵⁸ 羅彤華，〈唐代官人的父母喪制〉，收入《天聖令論集》（下），頁3-42。

²⁵⁹ 張文昌，〈服制、親屬與國家——唐宋禮法之喪服規範〉，收入《天聖令論集》（下），頁199-243。

²⁶⁰ 吳麗娛，《終極之典——中古喪葬制度研究》（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

²⁶¹ 林耀曾，〈唐宋喪禮禮數之比較研究〉，《高雄師院學報》6，1977.11，頁3-74。

²⁶² 王銘，〈中古喪葬方相、魃頭禮制等級考論〉，《中國中古史研究》11，2011.12。

²⁶³ 王銘，〈開路神君：中國古代葬儀方相的形制與角色〉，《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2。

學位論文方面，邱衍文《唐開元禮中喪禮之研究》²⁶⁴，以《開元禮》所載之喪服與喪儀為對象，對細節進行考證。延續此論題者尚有張長臺《唐代喪禮研究》²⁶⁵，同是針對《開元禮》中之喪禮儀節進行討論，輔以考古遺址與文物，考察唐代的喪葬禮俗。近年臺灣青年學者所撰與唐代喪服、五服制相關學位論文，可舉黃亮文《敦煌吉凶書儀寫卷與其五服制度研究》²⁶⁶為例。涂宗呈《神魂、屍骸與塚墓：唐代兩京的死亡場景與喪葬文化》²⁶⁷則與唐代喪葬文化、儀式有關。

(2) 吉禮

鄭玄與王肅對禮經解讀的爭議，從魏晉以來就是禮制發展的重要課題。唐代對於吉禮的議論，大都集中在唐君主對於神祇與宗廟的祭祀上。郊祀與宗廟是吉禮中最受君主重視的祭禮，這是因為郊廟象徵皇權的來源，祭祀郊廟與皇權的關係，自然成為學者注目的焦點。雖然在唐代國家祭典上，宗廟的地位不如郊祀，但其重要性仍不容忽視。²⁶⁸關於宗廟祭祀禮儀及相關研究史，高明士新著《中國中古禮律綜論》第四章中有詳盡說明及探討。²⁶⁹

《開元禮》中，「吉禮」的部分只有記載皇室祭祀神祇宗廟，以及官人的宗廟之祭，民間的祭祀或宗教信仰並未在禮典中出現。但唐代官方對於禮典以外的祭祀並非不加管理，反而是積極地透過各種形式，將國家的力量

²⁶⁴ 邱衍文，《唐開元禮中喪禮之研究》，臺北：郁氏印書及獎學基金會，1984。

²⁶⁵ 張長臺，《唐代喪禮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

²⁶⁶ 黃亮文，《敦煌吉凶書儀寫卷與其五服制度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3。

²⁶⁷ 涂宗呈，《神魂、屍骸與塚墓：唐代兩京的死亡場景與喪葬文化》，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

²⁶⁸ 同前引張文昌，〈唐代禮典與禮制研究之回顧與探索〉，頁 120。

²⁶⁹ 同前引高明士《中國中古禮律綜論》第 4 章〈中古皇家宗廟的祭祀禮儀〉，頁 85-136。

滲透到佛、道與民間信仰中。²⁷⁰高明士《中國傳統政治與教育》²⁷¹一書中，以專章討論皇帝權力的來源，及其在郊廟禮制上的呈現。雷聞《郊廟之外——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²⁷²則探討了隋唐國家和地方社會處理國家祭祀和民間信仰活動的運作過程，國家禮制與民眾生活亦互相影響。朱溢新作《事邦國之神：唐至北宋吉禮變遷研究》²⁷³，是其博士論文增補而成，揭示了唐至北宋時期吉禮體系的連續性，從中亦可看到吉禮制度與政治秩序、權力觀念、思想學說、宗教信仰之間的複雜關係。

(3) 禮俗·挽歌

唐日喪葬禮俗與相關生活禁忌，例如清潔、穢惡等問題，為拙稿著重的一環。禮俗史在近年益發受重視，指涉範圍包含民俗與風俗，涵蓋物質生活、社會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層面，屬社會史或文化史的一部分，主要目的在研究生活禮俗的變遷與傳承，瞭解民族與社會文化的特性，以期更全面具體的呈現歷史面貌，²⁷⁴但亦與近人所謂「日常生活史」²⁷⁵有所區別。以禮俗為名或涉及禮俗的研究作品為數甚夥，由於拙稿亦注重社會生活與法制層面，在理論方面，主要參考作品為瞿同祖《中國法制與中國社會》、王貴民《中

²⁷⁰ 同前引張文昌，〈唐代禮典與禮制研究之回顧與探索〉，頁 122。

²⁷¹ 參見高明士，《中國傳統政治與教育》上篇 2 章 2 節〈皇權的性質與運作〉及下篇 2 章 3 節〈從禮律看治統廟制與道統廟制的消長〉，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4 訂正二刷。

²⁷² 雷聞，《郊廟之外——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北京：三聯書店，2009。

²⁷³ 朱溢，《事邦國之神：唐至北宋吉禮變遷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²⁷⁴ 參見劉增貴，〈中國禮俗史研究的一些問題〉，收入《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歷史組 法制與禮俗》論文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2），頁 157、162。

²⁷⁵ 其定義可參照連玲玲，〈典範抑或危機？「日常生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新史學》17:4（臺北：三民書局經銷，2006.12），頁 255-282，及胡悅晗、謝永棟，〈中國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評〉，收入《史林》2010:5（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2010），頁 174-182。

國禮俗史》及劉增貴〈中國禮俗史研究的一些問題〉²⁷⁶。其中瞿氏作品雖無禮俗之名，但具前瞻意義。王貴民專書為中文出版品中第一本出現「禮俗史」之名，並對「禮俗」加以定義的作品。²⁷⁷劉文則對中國禮俗史提出定義、研究回顧及檢討。另外，王明珂〈慎終追遠——歷代的喪禮〉²⁷⁸以喪禮的發展說明歷代禮俗的交融過程，洪德〈俎豆馨香——歷代的祭祀〉²⁷⁹則討論了祭祖、社祭、祭天，從原始宗教成為現實生活中的禮俗過程。張捷先《中國喪葬史》²⁸⁰對於隋唐五代時期的喪葬禮俗亦有所介紹。

從晉到唐代的喪葬禮俗中，出現了挽歌，而日本最古的和歌集《萬葉集》中亦屢見「挽歌」二字。近年討論挽歌的作品，多視之為文學的一環，如一海知義〈文選挽歌詩考〉²⁸¹，討論了挽歌詩三首一組的體裁，黃旨彥〈送行者的樂章：唐代挽歌文化初探〉²⁸²，側重於挽歌成為文學作品及挽歌在社會習俗中作用演變，鄭雅芬〈大唐天子的輓歌——從《全唐詩》看唐代人臣對帝王的傷悼〉²⁸³，則是討論唐代臣子如何以詩歌哀輓帝王的薨逝。另外因為近年在石刻墓誌史料中發現挽歌內容，故亦有針對墓誌挽歌撰寫的研究，

²⁷⁶ 同前引劉增貴，〈中國禮俗史研究的一些問題〉，頁 157-203。

²⁷⁷ 同前引劉增貴，〈中國禮俗史研究的一些問題〉，頁 161。

²⁷⁸ 王明珂，〈慎終追遠——歷代的喪禮〉，收入藍吉富·劉增貴主編《中國文化新論 宗教禮俗篇 敬天與親人》（臺北：聯經出版社，1982），頁 307-357。

²⁷⁹ 洪德，〈俎豆馨香——歷代的祭祀〉，收入藍吉富·劉增貴主編《中國文化新論 宗教禮俗篇 敬天與親人》，頁 359-410。

²⁸⁰ 張捷先，《中國喪葬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²⁸¹ （日）一海知義，〈文選挽歌詩考〉，《中國文學報》12（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研究室，1960.4），頁 19-48。

²⁸² 黃旨彥，〈送行者的樂章：唐代挽歌文化初探〉，收入〈第三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會議論文集（武漢：武漢大學，2009.8.23-30），頁 349-372。

²⁸³ 鄭雅芬〈大唐天子的輓歌——從《全唐詩》看唐代人臣對帝王的傷悼〉，收入《興大中文學報》26(2009.12)，頁 27-63。

如胡可先撰寫〈墓誌新輯唐代挽歌考論〉²⁸⁴，從文學角度討論了唐代挽歌的內容、形式、哀挽對象（含自挽詩）等。另如劉天琪著《隋唐墓誌蓋題銘藝術研究》的第六章第三節〈地域風格：挽歌、鋪首、八卦符號與志蓋題銘——以新出土隋唐潞州地區墓誌為例〉²⁸⁵、王慶衛〈從新見墓誌挽歌看唐五代澤潞地區民間的生死觀念〉²⁸⁶等文，也對挽歌的文學面向加以介紹。學界此前對於挽歌已有許多研究成果及細緻論述，挽歌在唐代喪葬禮儀中受到重視，甚至得到獨立地位，例如吳麗娛《終極之典》上冊討論挽歌挽郎以及鐸問題，²⁸⁷下冊引用妹尾達彥〈唐代後期的長安與傳奇小說——以《李娃傳》的分析為中心〉一文對唐後期長安民眾使用挽歌等喪葬儀具進行論述，²⁸⁸亦在《敦煌禮儀與書法》書中引司馬光《書儀》，討論輿及鐸。²⁸⁹但對於挽歌為何存在於《天聖令》宋令，卻未進入日本《養老令》的問題，除了吳麗娛〈唐喪葬令復原研究〉²⁹⁰中稍有提及外，管見暫未發現深入討論的作品。

對於日本古代的葬禮與喪葬禮儀，代表性的研究作品可舉和田萃的《日本古代の儀禮・祭祀と信仰》²⁹¹為例。和田萃認為，中國的挽歌是指挽歌歌

²⁸⁴ 胡可先，〈墓誌新輯唐代挽歌考論〉，收入《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9:3（2009.5），頁 175-183，增補後收入氏著《出土文獻與唐代詩學研究》第 7 章（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549-573。

²⁸⁵ 劉天琪，《隋唐墓誌蓋題銘藝術研究》（深圳：南方出版社，2011），頁 269-274。

²⁸⁶ 王慶衛，〈從新見墓誌挽歌看唐五代澤潞地區民間的生死觀念〉，收入《陝西師範大學學報》41:3(2012.5)，頁 111-117。

²⁸⁷ 參見吳麗娛，《終極之典》（上），頁 98-101、237。

²⁸⁸ 參見吳麗娛，《終極之典》（下），頁 505-506。

²⁸⁹ 吳麗娛，《敦煌禮儀與書法》（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頁 150。

²⁹⁰ 同前引吳麗娛，〈唐喪葬令復原研究〉，收入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校證，《天聖令校證》，頁 701-702。

²⁹¹ （日）和田萃，《日本古代の儀禮・祭祀と信仰》（東京：塙書房，1995），共上中下三冊。

者，日本在殯宮詠挽歌是禮儀的一環²⁹²討論日本萬葉時代的挽歌性質問題，另可舉小倉久美子〈古代における死を悼む和歌の展開：挽歌と哀傷歌の比較検討を通して〉²⁹³、菊池咸雄《万葉の挽歌》²⁹⁴等著作為例。

土葬和火葬是唐日葬法中極為不同的一點。關於火葬研究，那波利貞〈火葬法の支那流傳に就いて〉²⁹⁵、宮崎市定〈中國火葬考〉²⁹⁶、黃敏枝〈中國的火葬習俗〉²⁹⁷、劉淑芬《中古的佛教與社會》的丙部分²⁹⁸，及和田萃〈仏教と喪葬儀礼の変化〉²⁹⁹、三上真由子〈日本古代の喪葬儀礼に関する一考察—奈良時代における天皇の殯期間の短期化について—〉³⁰⁰，都討論了佛教改變中古中國或日本的喪葬習俗。前述三上真由子專文，尚討論了天皇的不同葬法，以及「殯」的天數、形態等問題。

2. 古代日本喪葬禮俗

²⁹² 同前引（日）和田萃，《日本古代の儀禮・祭祀と信仰》（上）第I章〈喪葬儀礼と即位儀礼〉，頁20-22。

²⁹³ （日）小倉久美子，〈古代における死を悼む和歌の展開：挽歌と哀傷歌の比較検討を通して〉，《万葉古代学研究所年報》10，奈良：2012，頁83-100。

²⁹⁴ （日）菊池咸雄，《万葉の挽歌》，東京：塙書房，2007。

²⁹⁵ （日）那波利貞，〈火葬法の支那流傳に就いて〉，支那学社編，《支那学》1:7，（京都：弘文堂書房，1921），頁553-558。

²⁹⁶ （日）宮崎市定，〈中国火葬考〉，收入《塚本善隆博士頌壽紀念佛教史學論文集》（京都：塚本博士頌壽念會，1961），頁794-808，後收入（日）佐伯富等編，《宮崎市定全集17 中国文明》（東京：岩波書店，1993）。

²⁹⁷ 黃敏枝，〈中國的火葬習俗〉，收入傅樂成教授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史新論：傅樂成教授紀念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頁691-739。

²⁹⁸ 劉淑芬，《中古的佛教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²⁹⁹ （日）和田萃，〈仏教と喪葬儀礼の変化〉，《歴史公論》6，東京：雄山閣，1934.6。

³⁰⁰ （日）三上真由子，〈日本古代の喪葬儀礼に関する一考察—奈良時代における天皇の殯期間の短期化について—〉，收入奈良大学史学会編，《奈良史学》23（奈良：奈良大学大学院，2005.12），頁11-31。

論考唐禮與日本禮之間的相互影響作品很多，拙稿側重介紹喪禮及禮令相關，在此範圍內的論著，除了池田溫〈唐日喪葬令の一考察——條文排列の相異爲中心として〉³⁰¹、古瀨奈津子《日本古代王權と儀式》³⁰²，稻田奈津子〈喪葬令と礼の受容〉³⁰³等文，其他作品，例如前述和田萃的《日本古代の儀禮・祭祀と信仰》³⁰⁴、所功《平安朝儀式書成立史の研究》³⁰⁵、三橋正《平安時代の信仰と宗教儀礼》³⁰⁶《日本古代神祇制度の形成と展開》，皆屬知名作品。近期大陸學者王海燕著《日本平安時代的社會與信仰》³⁰⁷，雖未直接討論日本喪葬禮俗，但介紹了神道教、佛教、陰陽道等平安時期流行的宗教歷史背景與貴族生活，亦有參考價值。

(1)《養老・喪葬令》相關

最早有系統對於日本進行研究的作品，學者以為是明代薛俊著《日本考略》，³⁰⁸但旨在海防，多抄錄中國方面舊史，且內容謬誤甚多，其價值在於語言學，而非介紹日本風俗。³⁰⁹近現代中文著作中，最早以日本方面史料說明日本古代喪葬禮儀中風俗與中國有異者，應是清人黃遵憲的《日本國志》，他在〈禮俗志〉中，首先說明他對異國禮俗的看法：

³⁰¹ (日)池田溫，〈唐日喪葬令の一考察——條文排列の相異爲中心として〉，收入《法制史研究》45期，1995，頁39-71。

³⁰² (日)古瀨奈津子，《日本古代王權と儀式》，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

³⁰³ (日)稻田奈津子，〈喪葬令と礼の受容〉，收入(日)池田溫編，《日中律令制の諸相》(東京：東方書店，2002)，頁283-309。

³⁰⁴ (日)和田萃，《日本古代の儀禮・祭祀と信仰》(東京：塙書房，1995)，共上中下三冊。

³⁰⁵ (日)所功，《平安朝儀式書成立史の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1985。

³⁰⁶ (日)三橋正，《平安時代の信仰と宗教儀礼》，東京：続群書類従完成会，2000。

³⁰⁷ 王海燕，《日本平安時代的社會與信仰》，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³⁰⁸ 參見汪向榮，《中日關係史文獻論考》(長沙：岳麓書社，1985)，頁218-238。

³⁰⁹ 同前引汪向榮，《中日關係史文獻論考》，頁218-238。

禮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因人情而為之者。人情者何？習慣是也。光嶽分區，風氣間阻，此因其所習，彼亦因其所習，日增月異，各行其道，習慣之久至於一成而不可易，而禮與俗皆出於其中。是故先王之治國化民，亦慎其所習……及其既成，雖其極陋甚敝者，舉國之人習以為然，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嚴刑峻法所不能變。³¹⁰

這是對禮俗形成非常中肯貼切的看法。黃遵憲將禮俗區分成：朝會、祭祀、婚娶、喪葬、服飾、飲食、居處、歲時、樂舞、遊讌、神道、佛教、氏族、社會等十四類。雖然多半介紹江戶以至明治時代的禮俗，在〈喪葬〉中卻從日本古代的厚葬之風，以及古墳（黃氏作「帝陵」）的大小開始說起，其下割注介紹《養老·喪葬令》中的陵戶，介紹中世佛教葬俗時，引用部分《令集解·喪葬令》「親王一品」條的文字，並取意引用《古記》對「遊部」的介紹，以及《日本書紀》中「土師部」（黃氏作「土部」）的內容，以說明在佛教傳入前，日本自身的原始禮俗。在〈喪葬〉的最後，尚記錄了明治時代行用的服忌的日數與親等範圍。黃氏作品主要是在介紹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在抄錄古代令文與注釋時，可能因為對日本古事不夠熟悉，文字容或有所出入，也未必能理解到日本的《養老·喪葬令》和唐朝法制禮俗間的關係，但終究是注意到古代日本與前近代中國相異之處。黃遵憲作書時的胸襟與識見，至今仍值得加以推崇。

黃遵憲之前，雖然尚有清人傅雲龍《遊歷日本圖經》用一卷的分量介紹了日本風俗，喪葬部分列為〈俗禮〉，但內容僅抄錄《魏志·東夷倭人傳》，並不超出唐代以前所知內容，以今日眼光觀之，稍感美中不足。

(2)服喪、喪服、服忌令相關

³¹⁰（清）黃遵憲著，吳振清、徐勇、王家祥點校整理，《日本國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據光緒十六年羊城富文齋刊版，2005），頁 819-820。

過去對於唐日禮法進行比較研究的作品為數甚多，拙稿礙於篇幅，暫不一一列舉。若將範圍限縮至本世紀以來十餘年間對於日本古代的天皇服喪，特別是拙稿中所論日本清和天皇為祖母服喪一事相關的先行研究，舉其要者，例如日本學者增田美子《日本喪服史・古代篇》³¹¹，此書側重於喪服服飾變遷，考證在時空變遷中，古代日本喪服服飾的發展，材質、顏色在不同身分者身上所表徵的親屬關係和穿戴意涵。雖然對於喪服做為禮的符號表徵用力甚深，但對於喪禮之所以為「禮」的意義、思想、其後原始的文化與精神層面，似乎著墨較少。又例如小倉久美子〈日本古代における天皇服喪の実態と展開〉³¹²，關注重點在於清和天皇與攝政藤原良房之間權力關係的變化，稻田奈津子最近對此條文獻進行日文譯注。³¹³皮慶生〈唐宋時期五服入令過程試探〉³¹⁴論及本案的關注點則是橘廣相的論述，是否確為歷史實情，因為它牽涉到《養老・喪葬令》的「服紀條」是承襲唐制還是日本自行創作，以及喪服年月原始的位置究竟是放置在《假寧令》或是《喪葬令》後，也頗令人關心。以上諸作雖然均對筆者多有啟發，但與拙稿所欲探討角度——「禮」做為制度在不同時空中的意義、思想、其後的文化認同與精神層面不盡相同。

日本的律令制中，《神祇令》脫胎自唐令的《祠令》，而所規範的祭祀對象、地點與祭祀活動，與唐相當不同。祭祀對象有「神祇」、「天神地

³¹¹ (日) 增田美子，《日本喪服史【古代篇】—葬送儀礼と装い》，東京：源流社，2002。

³¹² (日) 小倉久美子，〈日本古代における天皇服喪の実態と展開〉，收入《日本歴史》773 (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頁 1-17。

³¹³ (日) 稻田奈津子，〈藤原順子のための天皇喪服議—註釈『日本三代実録』貞觀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十月七日条一〉，收入《法史学研究会会報》18 (東京：明治大学法史学研究会，2015.03)，頁 82-102。

³¹⁴ 皮慶生，〈唐宋時期五服制度入令過程試探——以《喪葬令》所附《喪服年月》為中心〉，收入《唐研究》14 期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381-411。

祇」、「神」等說法，《令義解·神祇令》的題解謂：「天神曰神，地神曰祇」，「天神地祇」條規範：「天神者，伊勢、山城鴨、住吉、出雲國造齋神等類是也。地祇者，大神、大倭、葛木鴨、出雲大女神等類是也。」³¹⁵進一步舉出了具體的神名。《令集解·職員令》「神祇官」條對「神祇」注釋很多，例如「跡云」的解釋是：「自天而下坐神也。就地而顯曰祇也」³¹⁶，來區分「神」與「祇」。由於拙稿主要探討內容並非《神祇令》中的神道教宗教思想，故將範圍限定在「穢」、「齋」、「服」、「祓」與母法唐令間的關係、在日本令中的規範，以及日後的演變。拙稿中，若提及「日本式的穢、忌、齋」之說，基本上是視為與日本本土的宗教思想有所關連，已與中文的原始意涵有所差距。日本的神道教與律令制下的王權禮儀之間關係，代表性的作品，可舉井上光貞《日本古代の王權と祭祀》³¹⁷、楊永良《日本古代王權の祭祀と儀式》³¹⁸、西宮秀紀《律令国家と神祇祭祀制度の研究》³¹⁹為例。

另外，日本學者山下洋平、³²⁰小倉久美子、³²¹稻田奈津子³²²等人近作對喪服與服喪問題雖有所論及，但著重於平安時代服喪期間與追善佛事的討論，以及臣下為天皇服喪等問題，與拙稿所持視點有異。

³¹⁵ 並見（日）清原夏野等撰，《令義解》卷2《神祇令》，收入（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館，1974），頁77。

³¹⁶ （日）惟宗直本撰，《令集解》卷2《職員令》，收入（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館，1974），頁28。

³¹⁷ （日）井上光貞，《日本古代の王權と祭祀》，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4，2009新裝版。

³¹⁸ 楊永良，《日本古代王權の祭祀と儀式》，臺北：致良出版社，1989。

³¹⁹ （日）西宮秀紀，《律令国家と神祇祭祀制度の研究》，東京：塙書房，2004。

³²⁰ （日）山下洋平，〈后・皇太子のための臣下服喪儀礼からみた日本古代王權の特質：唐代の事例を参考として〉，收入古代學協會編，《古代文化》65，2013:09，頁242-260。

先行研究中，前賢似殊少論及日本《服忌令》問題，管見未發現相關中文著作。楊鴻烈論及唐代中國法律在日本之影響時，曾特別注意到《養老·儀制令》「五等親」條，討論它與《唐六典》中記載「五等親」的差別，認為日本《喪葬令》中的「五服」純為喪服之規定，不以之別親等。³²³日文著作方面，目前僅見岡田重精有專論〈忌服考〉³²⁴及專書《古代の齋忌》³²⁵、《齋忌の世界》³²⁶等書，討論日本古代喪服禮、《服忌令》的形成，以及與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明石一紀〈古代的喪禮與服假制〉³²⁷亦是相關專論。若將討論《服忌令》範圍擴及近現代，專著有林由紀子作品《近世服忌令研究》³²⁸。另外孝本貢、八木透編《家族與死者祭祀》³²⁹一書前半部分，則介紹了從中國周代的喪服制度，一直到明治初年，日本的喪與穢，以及服忌觀念變遷。若將將拙稿先行研究的出版時間範圍擴大到明治、大正時代作品，三島敦雄著《法曹至要抄正解》³³⁰中，對於《法曹至要抄》中所引用的《養

³²¹ (日)小倉久美子，〈日本古代における天皇服喪の実態と展開〉，《日本歴史》773，2012，頁1-17。

³²² (日)稻田奈津子，〈日本古代の服喪と追善〉，收入日本史研究會編，《日本史研究》618(京都：日本史研究會，2014:2)，頁34-54。

³²³ 同前引楊鴻烈，《中國法律在東亞諸國之影響》三〈中國法律在日本之影響〉甲節〈自天聖天皇時代至醍醐天皇時代〉臺版頁222-223。

³²⁴ (日)岡田重精，〈忌服考〉，收入現代神道研究集成編集委員會編，《現代神道研究集成 4 祭祀研究編 1》(東京：神社新報社，1999)

³²⁵ (日)岡田重精，《古代の齋忌—日本人の基層信仰》，東京：国書刊行会，1982。

³²⁶ (日)岡田重精，《齋忌の世界—その機構と変容—》，東京：国書刊行会，1989。

³²⁷ (日)明石一紀，〈古代的喪禮と服假制〉，收入孝本貢、八木透編《家族と死者祭祀》(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06)，頁22-51。

³²⁸ (日)林由紀子，《近世服忌令の研究—幕藩制国家の喪と穢》，大阪：清文堂，1998。

³²⁹ (日)孝本貢、八木透編《家族と死者祭祀》，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06。

³³⁰ (日)三島敦雄，《法曹至要抄正解》，愛媛：三島文庫藏版，1901。

老·喪葬令》及《延喜式》等法律文獻有所解析，關義臣《服假沿革略考》³³¹對於從日本史前時代到明治時代的服喪及喪葬禮儀變化的記載有詳盡整理，而又以明治時期皇室成員服喪內容為主要核心。

具注曆上所示的忌日、禁忌，屬陰陽道的範圍，方位的吉凶禁忌，與穢、齋之間的關係，則可參考三橋正〈日本的信仰構造の成立と陰陽道〉³³²。另拙論《唐日令中節假生活初探》第四章亦對日本具注曆及「穢」問題有簡單介紹，但尚未及於服忌問題。從先行研究的不足，顯見尚有探討空間。

三、結語

由以上所述諸多論著，可知前賢研究唐日文化交流、人物及法制禮俗等相關課題，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已有豐碩成果積累，到了最近二十年，更可謂蓬勃發展。然而文化的變貌需要透過比較方能凸顯，八、九世紀的日本模倣唐朝前半的禮法制度，上至朝廷禮儀，下至民間習俗，都有唐文化影子。隨著年深日久，遺留在日本的唐文化遺風，至今已演變成具日本特色的文化，須細細耙梳，尋找來自中國的禮俗元素，將之與日本自己原有的風俗逐一區別分辨，方能見到日本法令中刻意保留日本本身的特殊文化，發現唐朝法令實際在日本行用時的落差，以及日本社會因應自身需要，對外來文化所做的調整及變化。八、九世紀的日本，透過渡唐日人在唐朝的體驗及學習成

³³¹ (日)關義臣，《服假沿革略考》，東京：金港堂，1913 初版，東京：龍溪書舍，2003 復刻版。

³³² (日)三橋正，〈日本的信仰構造の成立と陰陽道〉，收入(日)鈴木靖民編，《古代日本の異文化交流》(東京：勉誠出版，2008)頁 160-179。

果，吸收外來的中華文化，從而產生的各種文化變貌，仍有許多未被前人探索過的課題，期待今後由有志研究者從各方面加以研究探討。

唐日文化、人物及禮令交流研究述評

臺灣地區唐代文學 研究概況（2014-2015 年）

洪國恩^{*}

一、前言

每條匯入歷史的河流都是汪洋中的巨流。唐代，無疑是這時代巨流中，最滔滔不絕的一個時代。其中不乏時代之鳴，不乏畢至的少長群賢，不乏一時紙貴的名作，唐代，正是一個因為文學的豐富，致使多姿而善舞的時代。而每年研究唐代文學者多如繁星，精采絕倫，研究成果日新月異，常有超越性的突破。是以，本文紹繼楊明璋的研究成果，僅就二零一三年八月至二零一五年六月，臺灣地區研究唐代文學的論文做耙梳，冀能示現臺灣地區近兩年來對於唐代文學的研究成果，細分為諸文體類別，包含總論、詩、文、小說、其他等，並依研討會、學位論文、期刊論文等分門別類，希望能對於唐代文學近兩年間在臺灣地區的突破和新觀察清楚呈現。然而，囿於資訊流通、平台縱汜，資料蒐集與編匯越發不易，筆者只能盡己所能將可收錄的資料蒐集齊全，多有疏漏，還望諸位先賢不吝指正。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二、近兩年間有關唐代文學之學位論文

近兩年間有關唐代文學之學位論文，我們大抵可以切分為幾個部分觀之，分別為唐詩專家研究、唐詩主題研究、唐代辭賦研究、唐人小說研究、唐代文學比較研究等，皆是近年學位論文較為常見之類目，以下分別論述：

（一）唐詩主題研究：

台大中文王正利《唐詩中的意志與命運》（臺大中文 2013 博），認為在意志與命運的主題下，可延伸出五個探討角度，包含返鄉意識、進京之思、盛世追求、成功想望、生之意志以及死之命運。從返鄉意識言，包含故鄉意義、望鄉之舉、思鄉之淚、思鄉之情、夢回故鄉；進京之思包括京華意義、朝廷宮殿、天子國君；盛世追求在於盛世情結、人事作為與諍諫意識；成功想望談論窮達以時、科舉之路、知遇情結；最終，生之意志以及死之命運則解構時間、空間與宗教人文思想對唐代詩人的影響。

中興中文劉芳佳研究《自然、人文與心靈圖像——唐詩雨境書寫研究》（中興中文 2013 碩），認為「雨」始終是激發文人創作及抒發情思的靈感來源，將唐詩中的「雨境」分成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並使用賦比興作為貫串的手法。其言初唐時期是以景語為主的客觀摹寫，至盛唐轉為主觀融攝，並利用賦與比形容雨境，興則為雨後的聯想；至中唐，雨境描寫則更有主觀且有多元情貌，著墨點在於感官意象的開展；至晚唐，雨境進入敘述主體的情景交融成熟期，縱融時空意象與感官意象，表現詩人的心靈圖象。論文後附表檢索雨境書寫詩歌一覽。

淡江中文陳淑芬研究《唐詩菊花意象研究》（淡江中文 2013 碩），首先從菊花的生物觀察與人文觀察切入，論其生物特性與歷史背景，再談論唐詩菊花意象與重陽節，從菊花在重陽節的使用，到對於故舊、家國的懷思，最終論及人生況味的部分，認為菊花有渴望入世、懷才不遇、感嘆遲暮、孤獨、渴望成仙的意象特質。論文後附檢索以菊為題和菊花入詩的作品。

中山中文蘇彭琪研究《全唐詩中初、盛唐之「芳草」詩探討》（中山中文 2013 碩），探究初盛唐詩中「芳草」的諸多意涵，斟酌當時的時代背景與作者遭遇，依「芳草」的內容，將其所運用到的主題區分為：自然芳草、

臺灣地區唐代文學研究概況（2014-2015 年）

芳草作喻、懷古傷逝、離情之悲、隱逸絕塵、深閨幽怨、思鄉之情，並以顏色運用、和詩、季節、觸景生情，以及其意義涵涉分別剖析初、盛唐的「芳草」詩。

姓名	學位論文	校／系／年度	碩博士
王正利	《唐詩中的意志與命運》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2013 年	博士
劉芳佳	《自然、人文與心靈圖像——唐詩兩境書寫研究》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2013 年	碩士
蘇彭琪	《全唐詩中初、盛唐之「芳草」詩探討》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2013 年	碩士
陳淑芬	《唐詩菊花意象研究》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 2013 年	碩士

（二）唐詩專家研究

逢甲中文林錦婷研究《韓愈文學思想與詩賦旨趣研究》（逢甲中文 2013 博），從韓愈文學思想伊始，論述韓愈「道」的概念、「時」的概念、「氣」的概念、「言」的概念、「文」的概念、「鳴」的概念。接著再由「戲」而「變」、由「異」而「用」，並對「作者」有不求所知，但為世所用的概念。接著論述韓愈論詩賦旨趣，從以「鳴國家之盛」，到以「自鳴其不幸」，再到餘事作詩人。再分析韓詩體製變化與主題類型，並分為開展期（從貞元元年到貞元二十一年）；全盛期（從元和元年到元和十二年）；歸適期（從元和十四年到長慶四年）三個時期。最終分析韓愈旨趣，從其賦作篇章的認定，到以賦為名之作旨趣分析，終導向韓愈賦作跨體為文。

東海中文張之璿研究《李商隱詩歌修辭探析》（東海中文 2013 碩），以修辭學的角度來觀察其作品之美，探討雕章琢句的形式下，可歸納出哪些修辭藝術表現？而透過李商隱巧妙運用各種修辭手法，體會他如何寄寓自己對社會或人生的感觸或思想？論文先從詞章形式修辭辭格探析，分為對偶、類疊、鑲嵌、頂真幾類；再從強化詩意修辭辭格探析，包含頂真、夸飾、映襯、設問；再從增強生動性修辭辭格觀之，包羅摹寫、轉化、示現；最終是意境幽遠的修辭辭格探析，羅列譬喻、用典、象徵、雙關。

政大中文沈鈺寧研究《李商隱愛情詩之空間感與抒情性》（政大中文 2013 碩），以義山愛情詩為底本，從「空間」的「抒情」特色著眼，溯及時空結構與形式美感。再由感官包含嗅覺、聽覺、視覺、觸覺切入，管窺其愛情詩的感知表現。再者，從高與遠雙重向度，仙境與人境的二元對立，進

而延伸出水平、垂直兩種不同向度，探究空間他者化、自我認同、地方再現、記憶附著等現象。更有甚者，從語音語言的方向探究義山愛情詩的節奏，平仄、重疊、虛詞皆影響其空間與抒情的呈現。

中興中文劉文心研究《困境、逆溯與喻示——李賀女性神話詩歌研究》（中興中文 2013 碩），將李賀創作了大量以女性神話題材的詩歌作品作為文本，而這些女性神話詩歌中夾含了大量的隱喻、意象、情感投射。從一開始提及李賀生命中有三重矛盾，包含社會動盪、懷才不遇、追求永恆；再從其喜用神鬼題材的原因切入，並列討論文學傳統中的女神意象，至李賀筆下寄託情感的女神群。最終加以詮解，李賀女性神話詩作主要烘托了其營造幽深奇譎的詩風，轉化了書寫失意困頓的生命情結，昇華了抒發「憂病而傷老，畏死而求生」的時空意識。

彰師大國文陳文鐸研究《岑參七言邊塞古詩之音韻風格研究》（彰師大國文 2013 年碩），嘗試用語言風格學的研究方法探討岑參七言邊塞古詩之音韻風格，先從聲母方面著手，發現岑參在七言邊塞古詩中慣用「齒音」，表現「悲鬱」之情感、善用「塞音」，表達「雄渾」與「壯」之風格，並使用「頭韻」現象營造詩歌之韻律；從韻母方面進行探究，得知岑參在七言邊塞古詩中多以「開口」、「細音」表現情感、喜用「諧韻尾」豐富詩歌之韻律，並頻繁地運用「轉韻」使詩歌節奏急促多變；從音韻重疊，可見岑參在七言邊塞古詩中慣用「類字」與「疊字」來表達出韻律感。實開岑參詩歌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佛光中文龔育瑩研究《權德輿的文學觀與詩歌研究》（佛光中文 2013 碩），以權德輿之《權德輿詩文集》為主要研究文本，並以前人的研究文獻為基石，探析唐代政治文人權德輿之時代背景以及在政壇與詩壇的成就；就其「尊經」、「載道」、「言而蘊道」、「尚氣」、「尚理」、「有簡」、「有通」之文學觀加以論述。再述權德輿詩歌的內容及風格特色的同時，藉此了解權德輿在中唐詩壇有著承先啟後的地位其所受之評價。

文化中文鄭采薇研究《李賀詩歌意象探析》（文化中文 2013 碩），先詳敘李賀詩歌的創作背景，再論李賀詩歌意象的三重境界，包含幽冥的鬼域、奇麗的仙境、乖謬的人世；再更細究李賀詩歌的時空意象，涵涉時空交錯與融合；最終對李賀詩歌意象特徵及表現方式評議，以奇詭虛幻的世界、

華美穠麗的風貌、激越淒冷的心境三者分別論述。論文後附李賀生平經歷及作品簡表、李賀詩全集、書影。

玄奘中文謝淑慰研究《杜牧七絕詩探究》（玄奘中文 2013 碩），總結杜牧的文學觀重視「實用」與「內容」，認為詩文創作要言之有物，有所為而作。其創作態度力求「高絕」，追求思想內容的意高與藝術風格的絕妙，以展現個人獨造的創作特色。而杜牧的七絕詩因氣壯、意新，展現出豪健俊逸、拗峭尚奇的陽剛美；或因情摯、辭婉，表現出輕倩秀艷、含蓄深窈的柔性美，呈顯出剛柔參融的詩歌風格。而杜牧七絕內容含攝多元，呈現多重樣貌，憂國傷時與自慨不遇是其基調。且其七絕詩歌意象鮮明，深具情韻內涵。其中春日與秋日、明月與流水、酒意象，皆寄寓不同的情懷，為詩歌營造出情味雋永的動人力量。

屏大中文戚家源研究《張九齡交往詩研究》（屏大中文 2014 碩），論文以張九齡交往詩為主題，先敘述其生平及時代背景，仕宦前後的交誼，再從交往詩的對象，包含天子、長輩長官、平輩同僚、後輩下屬、親屬；以及題材內容，包含贈答、應制、紀遊、悼亡、送別、詠物等；以及藝術形式，諸如修辭、用韻、體裁等方面探討，呈現張九齡交往詩的特色。論文後附檢索交往詩一覽表、交往詩之修辭技巧、交往詩之用韻。

文化中文熊智銳研究《李白遊仙詩研究》（文化中文 2014 碩），認為遊仙詩是以「遊」為書寫手段和資源，以「仙」為書寫主題和意念，先論歷代遊仙詩的淵源與源流，並從李白生平切入，交代李白的時空背景，再區分李白遊仙詩主題，包含贈送酬答、遊賞行役、吟詠頌讚、怨懟感懷，最終揭示李白遊仙詩神采、心理與其價值。論文後附檢索李白遊蹤與遊仙詩作一覽表。

華梵中文陳奇璋研究《李白詩歌雲意象探析》（華梵中文 2014 碩），將李白詩中的雲意象拆分成積極進取，不畏波折的「雲」、失意落魄，淒冷漂泊的「雲」、離塵安適，嚮往自由的「雲」三者，並釐清其藝術風貌，包含譬喻、誇飾、轉化、用典等。論文後附李白詩歌雲意象摘句一覽表。

佛光中文黃碧珠研究《王維山水詩空間意涵研究》（華梵中文 2014 碩），將王維詩境與畫境結合，從山水詩空間布局美學，包含「高遠」、「深遠」、「平遠」等構圖法。到山水詩的行旅境界美學，包含詩中的「無我之境」、「有我之境」。進而探究其山水詩的色彩美學，色彩的映襯、冷暖色調的意

象，以及各種顏色意象。最終呈現其線條的美學、動靜的詩情、四季的意象，皆豐富了王維詩境與畫境的研究。

屏東中文陳耕僕研究《王昌齡邊塞詩研究》（屏大中文 2014 碩），從王昌齡的背景談起，切入邊塞詩的內容、題材，包含胡漢戰地和胡漢人物。豎立王昌齡邊塞詩的價值，包括愛國情操，凸顯英雄愛國的壯志立業；邊塞生活，謳歌誓斬邊患的雄心業績；人道精神，抨擊禦敵無能的庸將腐朽；邊塞思鄉，抒寫久戰不歸的親情思念。羅列王昌齡邊塞詩的意象分布，諸如馬、樂器、植物，以及風格，最後彰顯其邊塞詩之成就。論文後附王昌齡邊塞詩一欄表。

華梵大學劉祐任研究《王維詩作中的生命觀》（華梵人文 2014 碩），從探究王維的三教思想開始，漸步深入王維的禪學中心思想，再開展出王維禪詩及其詩中的生命觀，包含萬象本空、任運隨緣的生命體悟；色空不二、煩惱即菩提的中觀思維；般若智慧、真空妙有的無量胸懷。論文清楚地彰顯出王維禪詩的生命價值。

屏東中文吳素文研究《論庾信詩歌的性格二重組合》（屏大中文 2014 碩），將庾信的詩歌中的心理結合歷史背景，以劉再復《性格組合論》提出的「性格二重組合論」分析庾信詩歌，歸結出庾信詩歌中的性格二重組合有「鄉關之思與無心歸南」、「重視節操與屈節仕北」、「自信武勇與懷疑懼禍」、「避世歸隱與眷念仕途」。最終，將詩歌中的二重性格，重新帶回庾信自身，形成主導性格為「兼容並蓄」、「與世推移」。

姓名	學位論文	校／系／年度	碩博士
林錦婷	《韓愈文學思想與詩賦旨趣研究》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 2013 年	博士
沈鈺寧	《李商隱愛情詩之空間感與抒情性》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2013 年	碩士
劉文心	《困境、逆溯與喻示——李賀女性神話詩歌研究》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2013 年	碩士
陳文鐸	《岑參七言邊塞古詩之音韻風格研究》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3 年	碩士
龔育瑩	《權德輿的文學觀與詩歌研究》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2013 年	碩士
鄭采薇	《李賀詩歌意象探析》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 2013 年	碩士

臺灣地區唐代文學研究概況（2014-2015 年）

謝淑慰	《杜牧七絕詩探究》	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13 年	碩士
張之璿	《李商隱詩歌修辭探析》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2013 年	碩士
戚家源	《張九齡交往詩研究》	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14 年	碩士
熊智銳	《李白遊仙詩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 2014 年	碩士
陳奇璋	《李白詩歌雲意象探析》	華梵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2014 年	碩士
黃碧珠	《王維山水詩空間意涵研究》	華梵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2014 年	碩士
陳耕僕	《王昌齡邊塞詩研究》	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14 年	碩士
劉祐任	《王維詩作中的生命觀》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所 2014 年	碩士
吳素文	《論庾信詩歌的性格二重組合》	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14 年	碩士

（三）唐代文學比較研究

彰師大國文洪曜南研究《唐代書論與詩論之比較研究》（彰師大國文 2013 博），其認為從詩論與書論本質言，在身體義的直接性和符號義的間接性；其次梳理唐代以前書論，以「形」「勢」而「意」的發展為主，詩論則是由「志」「情」而「意象」的發展；唐後，「法」的發展與「中和」觀提出，漸步復古求變與強調「風骨」，終究在發展後探究「勢」、「骨」、「氣」、「神」、「法」、「非法」、「意」、「象」、「境」、「外」等問題，進一步明確指出唐代書論與詩論發展之特色所在，也更進一步肯認盛、中唐的發展轉向，誠具有「百代之中」的關鍵轉折地位。

清華中文林泓任研究《唐代效齊梁體詩作研究》（清大中文 2013 碩），認為齊梁體不等於齊梁詩，以及齊梁體不應只限定為一固定格律類別，甚而可以擴及唐代討論。從初、盛唐對齊梁體認知消長之勢，看見唐詩對於齊梁體的揚棄與再臨，並例舉岑參為其時效齊梁體的大家；中唐一改前貌，出現齊梁體的「雅正之機」，從白居易雅正齊梁體，到唐文宗的「雅正齊梁格」，然改革畢竟未竟；齊梁體最終於晚唐面臨復興或覆轍，晚唐諸家如李商隱等皆效齊梁體，甚至影響溫庭筠。因而唐代齊梁體是取用與更新，並不囿於過去的限制，具備半古半律、失粘與多仄韻的特徵。

東吳英文張斐欽研究《元稹及哈代悼亡詩中之回憶與觸景生情》（東吳英文 2014 碩），本論文為英文論文，且著重在比較文學，元稹的「遣悲懷」及哈代的 *Poems of 1912—13* 分別是中英悼亡詩的代表性作品，本論文討論詩中的二項重要主題：回憶與重複。元稹及哈代的悼亡詩均為其亡妻所作，與亡妻共同度過的光陰成為詩人創作的重要題材，而哈代的悼亡詩雖然繼承西方詩學的傳統，但中國傳統詩論中情景關係仍可用於分析哈代悼亡詩的感情重現。

姓名	學位論文	校／系／年度	碩博士
洪曜南	《唐代書論與詩論之比較研究》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3 年	博士
林泓任	《唐代效齊梁體詩作研究》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2013 年	碩士
張斐欽	《元稹及哈代悼亡詩中之回憶與觸景生情》	東吳大學英文學系 2014 年	碩士

（四）唐代辭賦研究

中正中文鄭色幸研究《唐賦中的女性書寫研究》（中正中文 2013 博），自神女傳說始，比較神女傳說的淵源、神女傳說的文人筆觸、神女傳說的民間流傳。接著探究歷史女性書寫之類型與內涵，以及當代女性書寫之類型與內涵，包含唐前歷代后妃、唐前貴族仕女、唐前歷代宮人、唐前民間婦女等幾個類型。最終明示唐賦中女性書寫之主題意蘊與審美情趣，包含外在的審美情趣，以及唐賦的幾個女性書寫特性，包含以帝王為中心的書寫特質、辭賦家情感的置換與轉移，以及表現當代生活百態與情思。

文化中文江之陵研究《蔣防辭賦之研究》（文化中文 2013 碩），認為世人只注意到蔣防的《霍小玉傳》，而忽略他辭賦文學這塊才華。其為律賦開創新局，從體式創新到內容和藝術手法皆可看出，對中晚唐賦「上承魏晉六朝，軌開宋元明之流」的重要作用。並將蔣防辭賦分為君子立命、為政理想、祥瑞思想、寓言神話，並細梳其寫作特色，包含故事筆法融入辭賦、散文風格揮灑自如、具有電影分鏡下的概念、刻畫景物精緻細膩、禎祥吉瑞的寫作觀。論文後附蔣防生平年表；蔣防辭賦作品出處表；蔣防辭賦作品布局、對偶、押韻表；蔣防辭賦作品。

姓名	學位論文	校／系／年度	碩博士
鄭色幸	《唐賦中的女性書寫研究》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2013 年	博士
江之陵	《蔣防辭賦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 2013 年	碩士

（五）唐人小說研究

東海中文廖珮芸研究《中晚唐傳奇研究：世變與現實的再現》（東海中文 2013 博），先敘述中唐以降的世變與士人心態，從王權與國家體制的弱化，到仕途之路艱辛，以至於詩風從浪漫轉向現實。因此世人重新建立起兩個對立的時空，包含了對當代的衝突與對過去的緬懷。自然也導致了秩序感的重建，從失序的生命到理想的世界。並將愛情傳奇劃分為公我與私我空間，而俠義敘述則是義與孝的反省。

南大國文鄭喬云研究《唐五代筆記小說之唐代佛教研究》（台南國語 2013 碩），專以筆記小說為主要文本探究佛教對社會之影響，旨在利用筆記小說的「史遺」價值，挖掘正史所未能記載的佛教面貌，並透過小說家的記述了解與佛教相關的種種事件在唐人眼中有何評價。並從唐五代小說中探究政治環境變遷、士人階級接受、平民階級接受，至小說中的僧人形象探索，呈現出唐小說中的豐富而多元的佛教面貌。

雲科大漢學所李總員研究《唐人小說中豪俠的俠客特質研究》（雲科大漢學 2013 碩），藉由汪聚應輯校之《唐人豪俠小說集》所載錄篇章，以重現唐人小說中豪俠的俠客特質。從唐代豪俠小說產生的背景與俠的發展談起，至豪俠人物社會階級的特性，再至豪俠人物性別形象的特色，再者豪俠人物任務取向的特質，最終收束於豪俠人物獨特風格的展現。

元智中文邱天偉研究《唐五代文言佛教小說研究》（元智中文 2014 碩），探討唐五代文言佛教小說的主題和思想，並以文學理論分析佛教小說之結構與敘事特色，更針對佛教與中國人文傳統的融合，探究三教合一對唐五代佛教小說的意義。融會佛教與時代觀察、三教合一的趨勢，藉小說文本以彰顯時人對於佛教與社會之觀察。

姓名	學位論文	校／系／年度	碩博士
廖珮芸	《中晚唐傳奇研究：世變與現實的再現》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2013 年	博士
鄭喬云	《唐五代筆記小說之唐代佛教研究》	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 2013 年	碩士
李總員	《唐人小說中豪俠的俠客特質研究》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 2013 年	碩士
邱天偉	《唐五代文言佛教小說研究》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14 年	碩士

(六) 小結

綜觀近兩年臺灣地區唐代文學的研究成果，在碩士、博士的學位論文中，可說是碩果纍纍，可幾三十之數。無論在於唐詩、唐賦、唐人小說等方面，皆有相當的建樹。就以上資料分析，學位論文於這兩年臺灣地區的研究取向最主要集中在唐詩的專家研究，尤其是以專家中的某些意象來作為切入點，重新釐清該作家之生平、風格、意象使用與抉擇，使作家與作品更被細緻的剖析，以求其深度。而在唐詩主題研究，則是多聯繫植物的意象，讓植物意象與作家、時代風氣、文化傳承做脈絡式關聯。

或許因為唐詩是盛唐氣象的代表，因而在研究唐詩上人數較之其他類型為高，尤其在於盛唐、中唐之名家，尤其以李白為主。一方面名家作品較多、亦較完備，在研究上較能圓融地多方命題；另一方面，以李白為主的原因，則是相對於過去杜甫研究的完備，現今學者企圖整理李白學，是以李白成為專家詩研究的大宗。於此，或許專家研究部分，後起的研究者可以試圖整理一些主題式的研究，串聯唐代較為小家的詩人，以彰顯唐代整體的歷史氛圍及特色。

而在比較文學、辭賦、小說方面，則亦殊有可觀處，一方面對於專家做深入剖析，另一方面則對於歷時性與共時性的命題多方處理，涉及佛教、世變、書論，以及西方文學等。面對較為固定的題材，近年的處理方式多是化用西方理論作為方法學，藉以重新耙梳一個斷代之間的舊文本，讓舊文本能夠呈現新的特色。若後進有志於唐代此數類型文學，建議可以從專家下手，或是從藝術史方面切入，可能會較容易展現新的樣貌。綜言之，近兩年在臺灣地區描寫唐代文學的學位論文，不僅樣貌多元，亦皆能刻劃甚深，在今日的唐代文學研究中大放異彩。

三、近兩年間有關唐代文學之期刊論文

近兩年間，有關唐代文學研究之期刊論文，多散見於各大學的學報之中，以及部分研討會所出版的定期性期刊中，我們大抵可以切分為幾個部分

觀之，分別為唐詩專家研究、唐詩主題研究、唐代辭賦研究、唐代文（變文）研究，皆是近年期刊論文較為常見之類目，以下分別論述：

（一）唐詩主題研究

韓學宏〈唐詩中的珍禽書寫〉（《長庚人文社會學報》7 卷 1 期，201404，頁 21—48），以唐詩中的「珍禽」書寫為研究，探討珍禽的物種，暨其所延伸的文學主題或文化意涵。珍禽多數被視為外觀優美（被帝王貴族或商賈所豢養）的鳥類物種；但就其「珍」意而言，同樣也指涉人類高潔而善美的靈魂，作為君臣人倫的隱喻，凡此皆本文所要觀察的面向。再者，本文也嘗試從「凡鳥」與「惡鳥」的範疇中，層層檢視唐代詩歌中「珍禽」的種類，以及其涵攝的相關主題與寓意。

周曉蓮〈論唐代的詠胡旋舞詩〉（《藝術學報》11 卷 1 期總號 96，201504，頁 163—179），本中選出其中的詠胡旋舞詩做深入的探究，並彰顯其蘊含的人文、史料及美學的價值，在文學與舞蹈的融合上，呈現多彩之姿，如李端〈胡騰舞〉、白居易〈胡旋女〉、劉禹錫〈和樂天拓枝〉等。

姓名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日期／頁數
韓學宏	〈唐詩中的珍禽書寫〉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7 卷 1 期，201404，頁 21—48
周曉蓮	〈論唐代的詠胡旋舞詩〉	《藝術學報》11 卷 1 期總號 96，201504，頁 163—179

（二）唐詩專家研究

1、杜甫

以抒情傳統的角度觀杜甫。馬千惠〈抒情傳統下的詩史典範——以杜甫〈垂老別〉為例〉（《輔大中研所學刊》32 期，201507，頁 53—64），認為杜甫的敘事詩，其中一些不協調的因素則需要突破「詩史」傳統甚至進入與之對立的「抒情」傳統進行理解。以〈垂老別〉詩篇第五節為例，本文認為對其中感情的突變、意義的變化以及與〈新婚別〉和〈無家別〉相比「沒有自我稱謂」的理解都必須突破所謂的「詩史」觀念來進行。所謂的「詩人的介入」在〈垂老別〉中的顯現實際上要求我們通過將其放入抒情傳統下重新觀照，對杜甫敘事詩創作進行更加深入的理解。

杜甫研究在意象、物件的突破，諸如劉俊廷〈杜甫詩中的梧桐意象析論〉（《全臺通識暨專業期刊》1期，201502，頁101—116），即探究杜甫詩中的梧桐，究竟有何特異之處，甚而與杜甫生命情懷、藝術境界有何連結。孫千淇則連刊發表〈論杜甫詩中佳人形象〉（《中國語文》114卷1期總號684，201406，頁90—100）、（《中國語文》115卷1期總號685，201407，頁106—111），呈現杜甫詩中的佳人書寫、描繪，及其內在的意涵與潛化的思維。林柏堅〈杜甫兩篇詠異國刀劍的詩歌——〈蕃劍〉與〈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國文天地》30卷3期總號351，201408，頁51—55），藉杜甫詠嘆異國刀劍之詩歌，管窺杜甫書寫方式與想法。而在杜甫生命的轉折與心態轉折，如同何騏竹〈杜甫病後的意義治療與自我實踐〉（《成大中文學報》44期，201403，頁43—80），即書寫杜甫四十餘歲旅食京華時期，其漸患病，在其詩作與心態的轉折，並在文中論及「儒家型意義治療學」。戴維揚〈點燃杜甫心流光啟歷程——從〈望嶽〉到〈登樓〉〉（《國文天地》29卷9期總號345，201402，頁44—52），談到杜甫的人生三境與心流經歷的心路歷程，認為杜甫一生並不順，可是他仍然期望「夜闌更秉燭」，找到光源就可「來天地」、「變古今」，並認為杜甫是能夠繼承「聖之時者」的「聖之任者」。

在杜甫的地域詩方面研究亦有突破，曹淑娟〈杜甫浣花草堂倫理世界的重構〉（《臺大中文學報》48期，201503，頁39—84），文中探索杜甫浣花草堂倫理世界的重構，包括三部分：其一、探論杜甫棄官離京的多重性意涵，是為漂泊的開始；其二、尋索杜甫何以不能安居秦州、同谷，一再展開流動的過程；此二單元用以彰明浣花草堂作為整體流動經驗中一段停駐的里程。其三、闡述成都浣花草堂的建構及其倫理實踐意涵，尤為本文重心，彰顯杜甫在草堂中逐步舒展的人性體驗，重整與人倫品物的關係。並引響後進，當浣花草堂作為唐代早期文人園林基型之一，相較之下，王維輞川別業、白居易履道宅園、廬山草堂等文人園林主流，傾向於背離社會人群，也弱化了家庭人倫關係，走向個人自得的內在世界，它們引領了宋明以降的園林朝向模擬壺中天地發展。孫聖鑒發表〈試論杜甫寓居成都時期的閒適詩〉（《新亞論叢》15期，201412，頁121—131），鎖定杜甫寓居成都時期，所發表的閒適詩作，將杜甫生命中最安適的時期的作品，透過歸納分析，重新呈現給讀者。潘啟聰〈杜甫秦州詠物詩的心理探析——應用本土化文藝心理學理

論的嘗試）（《鵝湖月刊》40 卷 8 期總號 476，201502，頁 21—30），以心理學的角度剖析杜甫在泰州時所作的詠物詩，探討其寫作時的心理狀態。乾元二年是杜甫一生最艱苦時期，由七月棄官赴泰州到十二月離同谷入蜀，杜甫共創作一百一十七首詩歌。然過去論者多將此歸類為悲劇美學、失望沉潛，但參考儒家的理論，以之分析杜甫在寓秦時所作的詠物詩，卻發現由詩歌中的用字和內含意象指出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詩人在詩歌中，其實表現出其對生活的積極態度。

許清雲〈杜甫七律之會通與轉化〉（《東吳中文學報》26 期，201311，頁 61—90），認為七律詩體之振，當從杜少陵開始。少陵七律，既用心會通前人創作經驗，又用意轉化成老杜風格特色，璀璨紛呈，百世嘆為觀止。以其「會通轉化」的技巧作為切入點，深入探究杜詩。其又接續研究杜詩的七律聲調，詳見許清雲〈杜甫七律調聲研究〉（《臺北大學中文學報》15 期，201403，頁 25—35），認為杜甫寫詩是相當用心在經營與雕琢上的，尤其晚年大量創作的七言律詩，極具音樂之美。杜詩七律調聲技藝相當多元，或浮聲切響，或雙仄異調，或入聲複疊，或拗救調聲，皆頗具成效，能達成其理想目標。文中觀察其整體的聲律結構，運作靈活，手法老練，盡善盡美，所以有極佳的音樂美感。

2、李白

陳宣諭〈論李白詩中「龍劍」的象徵意義——以〈梁甫吟〉、〈感寓二首其一〉二詩為例〉（《博雅教育學報》11 期，201312，頁 91—110）以李白的兵刃書寫切入，綜觀其時的刀劍詩歌、歷史背景，以及詩人所賦予其之意義。

3、白居易

鄒孟潔〈從〈與元九書〉探析白居易詩學思想的承繼與開展及其諷諭詩底蘊〉（《問學》18 期，201406，頁 207—222），談論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清楚呈現，以知識份子的身分，用創作提出對社會的正面關懷。白居易將自己的詩分為四類：諷諭詩、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其中白居易較重視的是「關於美刺興比者」的諷諭詩，並藉諷諭詩的特質與生命力，由

此梳理白居易的詩學思想內涵，捕捉白居易在創作上所展現的理念抱負與情志意蘊。

林玉茹〈白居易詩歌中的蘇州空間書寫〉（《思辨集》17期，201406，頁224—244），則由空間詩學的想法切入，深究白居易在詩歌描寫時，對於「蘇州」此一空間地景的建構與重構。

陳家煌〈論白居易詩的晚期風格〉（《國文學報》54期，201312，頁113—147），談論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陽，自62歲卸任河南尹之後，優游自得，但是他晚期詩作卻呈現「與時調不同」（*Untimely*）的風格，例如題材重覆、語言結構鬆散。論文援用薩依德論晚期風格的理論，重新審視白居易晚期詩作，並且從詩人放棄政治權力、詩人在詩作上的技藝、詩人正視衰老等待死亡等三部分，從白居易晚期創作意識、詩歌形式、詩歌題材，討論白居易詩作的晚期風格。

陳家煌〈從鶴的物性看白居易詩中的鶴〉（《成大中文學報》45期，201406，頁95—138），白居易自五十一歲任杭州刺史之後便擁有長達廿餘年養鶴經驗，文中探討白居易養鶴前、後，詩中鶴意象的轉變，白居易養鶴及裴度乞鶴的過程，最後探討白居易洛下詩中書寫鶴的特殊意涵，並以洛下寫鶴詩闡發白居易晚年處境，揭露白居易詩中的鶴不僅是詠鶴，而是人鶴雙憐。

許輔宸〈由聲情角度——詮釋白居易〈琵琶行〉〉（《國文天地》29卷8期總號344，201401，頁16—20）亦由聲情角度，重新管窺白居易的琵琶行，為琵琶行研究下了新的註解。

4、李商隱

孫紹振〈讀李商隱〈錦瑟〉〉（《國文天地》30卷12期總號360，201505，頁5—9），對歷代詩評家的眾多說法作了歸納和評析，而後直接面對文本，重新解讀李商隱〈錦瑟〉一詩。余金龍〈李商隱〈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詩考〉（《龍陽學術研究集刊》10期，201501，頁1—18），主張其為開成五年正月文宗帝崩時所作。江曉輝〈論義山古體對長吉詩風的摹仿和開拓〉（《淡江中文學報》32期，201506，頁385—423），依滄桑與苦悶之時局氛圍、自許與失意之心路歷程，以及瑰奇與幽艷之藝術傾向三點切

入，從雙李相近之背景，探究其詩風如何接受與摹仿；繼而由體裁與韻律、章法結構、修辭手法三方面切入，通過對兩人詩歌之比較，具體分析商隱於摹仿外，復能有所開拓，並發展出自己之特色。

簡錦松〈杜甫、李商隱七律的根本差異示例——從吟詠聲情考察〉（《東華漢學》19 期，201406，頁 77—119），其言杜甫與李商隱，是唐人七律中最具代表性的兩家，從吟詠聲情這一點來看，兩家七律實存有極大差異。杜甫七律，從一句到一篇，其字音的高低長短洪細，在口腔中產生很多變化，往往愛用大開大合之法。李商隱七律，口腔開合度比較小，他喜歡讓字音在窄小的口形中，纏綿吟揉。因此，兩家在聲情表現上，面目截然不同。

5、其餘諸家

何騏竹〈盧照鄰病後之自我身心治療過程〉（《淡江中文學報》31 期，201412，頁 91—137），闡發盧照鄰一生以患病為分界，病前胸懷大志，染病之後問醫養病，與病魔纏鬥許久，終不堪其苦而投水自溺。因而以盧照鄰詩文為研究對象，區分其生命為病前／初病／病廢三期，考察盧照鄰在惡疾的催勵下，儒、釋、道思想於其身心所起的轉化與治療作用，當他奮力向上擴出一精神自由空間，病痛的襲擊又讓他墮入真實的病體知覺中，臨終前雖展現靈光乍現之悟道成果，然最終深層內在的轉化並未全幅落實，構成獨一無二之身心治療過程。

王家琪〈從唐代「和詩」體制論王維等四人所作〈早朝大明宮〉詩之優劣〉（《靜宜中文學報》5 期，201406，頁 35—57），論詮〈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一首，是在賈至首唱之後，王維、岑參、杜甫接著唱和，不但形成唱和詩之典範，更受到歷來諸多詩評家的關愛注目並與對其進行品第排名。到底是基於後代讀者之愛尚，而各有擁護支持者？抑或是賈、王、岑、杜四人之所作真有高下之別？而「和詩」之特徵究竟為何？什麼樣的「和」法才算好的唱和之作？本文先從宋、明詩話評論家論述賈、王、岑、杜四人所作之相關評論，看宋、明詩評家對四人詩作之接受態度；再試著從唐代對「和詩」體制之要求與規範，檢視四人所作，為「和詩」之品評找尋一理論依據。

姓名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日期／頁數
杜 甫		

中國唐代學會會刊 第二十一期

許清雲	〈杜甫七律之會通與轉化〉	《東吳中文學報》26期，201311，頁61—90
戴維揚	〈點燃杜甫心流光啟歷程——從〈望嶽〉到〈登樓〉〉	《國文天地》29卷9期總號345，201402，頁44—52
何騏竹	〈杜甫病後的意義治療與自我實踐〉	《成大中文學報》44期，201403，頁43—80
許清雲	〈杜甫七律調聲研究〉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15期，201403，頁25—35
孫千淇	〈論杜甫詩中佳人形象〉（上）	《中國語文》114卷1期總號684，201406，頁90—100
孫千淇	〈論杜甫詩中佳人形象〉（下）	《中國語文》115卷1期總號685，201407，頁106—111
林柏堅	〈杜甫兩篇詠異國刀劍的詩歌——〈蕃劍〉與〈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國文天地》30卷3期總號351，201408，頁51—55
劉俊廷	〈杜甫詩中的梧桐意象析論〉	《全臺通識暨專業期刊》1期，201502，頁101—116
潘啟聰	〈杜甫秦州詠物詩的心理探析——應用本土化文藝心理學理論的嘗試〉	《鵝湖月刊》40卷8期總號476，201502，頁21—30
馬千惠	〈抒情傳統下的詩史典範——以杜甫〈垂老別〉為例〉	《輔大中研所學刊》32期，201507，頁53—64
李 白		
陳宣諭	〈論李白詩中「龍劍」的象徵意義——以〈梁甫吟〉、〈感寓二首其一〉二詩為例〉	《博雅教育學報》11期，201312，頁91—110
白 居 易		
林玉茹	〈白居易詩歌中的蘇州空間書寫〉	《思辨集》17期，201406，頁224—244
鄒孟潔	從〈與元九書〉探析白居易詩學思想的承繼與開展及其諷諭詩底蘊	《問學》18期，201406，頁207—222
陳家煌	〈論白居易詩的晚期風格〉	《國文學報》54期，201312，頁113—147
陳家煌	〈從鶴的物性看白居易詩中的鶴〉	《成大中文學報》45期，201406，頁95—138
李 商 隱		

臺灣地區唐代文學研究概況（2014-2015 年）

簡錦松	〈杜甫、李商隱七律的根本差異示例——從吟詠聲情考察〉	《東華漢學》19 期，201406，頁 77—119
余金龍	〈李商隱〈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詩考〉	《龍陽學術研究集刊》10 期，201501，頁 1—18
孫紹振	〈讀李商隱〈錦瑟〉〉	《國文天地》30 卷 12 期總號 360，201505，頁 5—9
江曉輝	〈論義山古體對長吉詩風的摹仿和開拓〉	《淡江中文學報》32 期，201506，頁 385—423
其 餘 諸 家		
王家琪	〈從唐代「和詩」體制論王維等四人所作〈早朝大明宮〉詩之優劣〉	《靜宜中文學報》5 期，201406，頁 35—57
何騏竹	〈盧照鄰病後之自我身心治療過程〉	《淡江中文學報》31 期，201412，頁 91—137

（三）唐代文、變文研究

孫慧琦〈基於儒學道統觀的「文以明道」——試論韓愈的文道觀〉（《輔大中研所學刊》31 期，201506，頁 35—52），從「文」與「道」的關係探討韓愈文學創作觀念。其認為「文以明道」是韓愈文道觀念的核心，而「文」是「道」的外在，「道」是「文」的內涵。「文能明道」，文能夠充分地傳達道的內涵，「道」可以言傳，而不是意在言外；同時，「文必明道」，文的形式無法阻止道的外顯，無法掩飾道的面貌，文必定真實地反映著道的「醇」。比起宋代理學家的文道觀，韓愈更強調文章的地位與其獨立性，在韓愈的文章觀中，「文」與「道」二者並重，相輔相成，可以說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

王基倫〈《禮》與柳宗元古文〉（《文與哲》第 23 期，201312，頁 69—98），探究柳宗元跟「禮」之間的連結，包含守禮的生活型態、個人對禮的認知，以及認為禮落實在古文寫作上，可以展現道德意義、關懷民生、經世濟民等意義，正式「本之《禮》以求其宜」的價值所在。

方介〈柳宗元〈河間傳析論〉——兼論子厚對「人欲」的省思與書寫〉（《臺大中文學報》49 期，201506，頁 129—178），深究柳集中，〈河間傳〉一文與柳宗元素倡甚有不同，以極大膽之筆法書寫女子淫慾，觸犯社會禁忌。然梳理其文、考察諸說，探明其文背景、寓意，而後就其筆法觀其用

心，知其意在逼使讀者正視「人欲」，深切反省、自制。甚而可知，柳對士人內心修養亦頗重視，才會對「人欲」多所省思、書寫。

楊明璋〈敦煌講史變文中的祭祀敘述及其與祭祀活動之關係〉（《中國學術年刊》，201403，頁 1—22），認為敦煌變文中的祭奠神鬼敘述，有二種類型：一是做為提供信息資訊的祭祀敘述，以講經變文為多；二是做為故事情節的祭祀敘述，以講史變文為多。後者尤值得關注，在唐五代，表演伎藝往往伴隨宗教齋會儀式，甚至喪葬祭祀也有英雄故事的伎藝表演，流行至後代，許多的戲劇演出也結合齋會道場、祭奠神鬼儀式，且演出的故事主題也多為英雄神鬼。另外，若干敦煌寫本抄錄〈伍子胥變文〉、〈韓擒虎話本〉、〈前漢劉家太子傳〉等講史變文的同時，也抄寫齋願文、讚文等宗教應用文書。這些都表明了部分的敦煌講史變文與祭祀活動應是有所關聯的。

姓名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日期／頁數
王基倫	〈《禮》與柳宗元古文〉	《文與哲》第 23 期，201312，頁 69—98
楊明璋	〈敦煌講史變文中的祭祀敘述及其與祭祀活動之關係〉	《中國學術年刊》，201403，頁 1—22
孫慧琦	〈基於儒學道統觀的「文以明道」——試論韓愈的文道觀〉	《輔大中研所學刊》31 期，201506，頁 35—52
方介	〈柳宗元〈河間傳析論〉——兼論子厚對「人欲」的省思與書寫〉	《臺大中文學報》49 期，201506，頁 129—178

（四）唐代辭賦學研究

許東海在〈南國行旅與物我對話——李德裕罷相時期的辭賦書寫及其困境隱喻〉（《成大中文學報》42 期，201309，頁 75—102），探究李德裕首次罷相後所撰辭賦的特殊意義，除作為放逐南楚之情志見證外，辭賦又是此次貶謫期間的主要書寫文類，對於李德裕宰相人生之研究課題誠然別具特殊意義。李德裕的辭賦創作，主要密集於初次罷相期間，其中大體以南楚風物為其主要題材，具體涵蓋當地山川地理、歷史遺跡與動物、植物、器物等。本文主要藉由南國行旅與物我對話的重新審視，探索李德裕罷相時期的辭賦書寫及困境隱喻。

而許東海在〈山水正名與賦體問對——柳宗元〈愚溪對〉及其相關續衍的書寫變創與賦學觀照〉（《漢學研究》31 卷 4 期總號 75，201312，頁 53—76），認為辭賦文體對於山水文學的發展流變及其書寫特性舉足輕重，

臺灣地區唐代文學研究概況（2014-2015 年）

除由謝靈運所揭，主要藉由山水書寫展現其與外在世界或自我心靈的內在對話的山水文學流派外，另一種藉由賦體的具體問對形態所展開的另類山水對話書寫則有另種與山水對話的可能，本文主要以柳宗元〈愚溪對〉為中心，以〈囚山賦〉與〈貪泉對〉為主要對照組，探索其中之模擬與變創書寫脈絡，從而觀察柳宗元〈愚溪對〉結合山水書寫與賦體問對的典範地位，及其書寫變創與抒情新蘊，對於山水文學傳統或辭賦書寫史的重要意義。

姓名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日期／頁數
許東海	〈南國行旅與物我對話——李德裕罷相時期的辭賦書寫及其困境隱喻〉	《成大中文學報》42 期，201309，頁 75—102
許東海	〈山水正名與賦體問對——柳宗元〈愚溪對〉及其相關續衍的書寫變創與賦學觀照〉	《漢學研究》31 卷 4 期總號 75，201312，頁 53—76

（五）小結

唐代文學在今兩年的臺灣地區期刊論文裡，以唐詩的專家研究為多，舉凡杜甫、李白、白居易、李商隱等，皆為目前的研究重點，從抒情傳統、形象與意象、空間地域、心理療癒等不同視角切入，雖與過去研究有相當程度的差異，較少論及唐詩廣範圍的論文，但卻在專家研究上更加精細。可能因為專家在期刊論文的描寫上，相較於廣泛論述容易深入主題核心，篇幅內容完善。而目前唐詩研究，亦多集中在杜甫、李白、白居易、李商隱上，建議後學在研究時，或許可以從其他諸家下手，尋一主題縝密論述之。

在唐文與變文部分，亦有相當研究，包含重探韓、柳的古文，進而重構其對古文的反思，以及其古文本源論和影響論，甚而談及變文；在唐代辭賦學方面，以許東海的研究為主，論及李德裕及柳宗元的辭賦書寫，以及其辭賦中的隱喻線索及觀照。近年之研究糅綜了儒學、禮學入唐代變文，融會山水想像與旅行書寫入辭賦書寫，皆是積極追尋唐代文學與外在線索的突破。然多著墨於柳宗元，有志於此者或許可以從其他諸家切入觀察，驗證近年之文是否為特殊的個案，或是是一時代的趨勢。

綜言之，現階段臺灣地區的唐代文學研究更側重的部分，在於歸類與重構，一方面將文學作品重新分類，另一方面又結合他領域，例如空間、心理等，皆能使唐代文學展現不同風貌，使唐代文學研究更為多元。

四、學術研討會研究成果

唐代文學在臺灣學術研討會的研究成果多元富盛，研究更是散布在各國際、全國、地區等級的研討會。關於學者間的研討會共計有四場，其中包含中國唐代學會所舉辦的第十一屆唐代會議。在研究生的部分，本研究共收錄四場全國會議。從師生發表之熱烈，堪見唐代文學的研究，在臺灣地區已然紮根甚深。

在學者間的研討會方面，主要是著重在大師唐代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再發揮。何寄澎在「林文月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大學中文系，20130905—20130906）中，發表〈應酬與文學——韓愈古文改創的策略與實踐〉，以方法論和功能論來重新探討韓愈古文改創的動機與目的，不將韓愈古文運動視為理所當然，或是一既定事實，實大有可觀之處。李宜學在「張夢機紀念學術研討會」（中興大學中文系，20150424）中，發表〈論張夢機之李商隱詩研究〉，深究張夢機對於李商隱研究的貢獻，以及其貢獻再闡發，以及對於其往後詩作的深厚影響。

除此之外，「2014 唐宋生態文學學術研討會」（明道大學中文系，20140530）亦有諸多學者發表唐代文學有關之研究，從李威熊演講〈論唐代文人的自然倫理〉，其後兵界勇〈柳宗元的生態觀與政治隱喻〉、陳正平〈李白詩中的山水田園與自然人文〉、李寶玲〈唐代詩人筆下的汴河〉、李建崑〈論唐宋竹枝詞之生態書寫與人文風情〉、陳金木〈愚溪僂人的山水療癒：柳宗元永州詩文析論〉、洪如薇〈中唐詩歌生態意識初探〉、吳惠珍〈論白、蘇在杭的關懷與書寫〉、普義南〈「一切禽鳥皆能言」—論唐宋詠物詩歌中的代言書寫與體物想像〉，以及陳鍾琇〈「蝗災食苗民自苦」—論唐宋蝗災詩中的災異、防治與寓意〉，皆對於後進研究唐代文學者，有相當深厚的啟發。

在學生研討會方面，則是側重於唐代文學中的深厚隱喻與意象探索，進而對於某些類目的闡發。因地區性研究生會議猶多，不勝枚舉，且水準參差，是以僅收錄全國研討會之論文作為參酌。在「2013 道南論衡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裡，政大中文游勝輝發表〈唐代花木賦中的君子隱喻與謫宦身影〉，直切入唐代賦學的領域，從中使用以物逆志的方式尋找主題式的相關，最終順承脈絡為植物的君子隱喻和謫宦身影，對唐代賦學中的草木思維增添新一清晰的主線；而政大國教游經順則在該研討會發表〈空間、地景與文化記憶——唐代樂遊原地景的人文書寫〉，從空間、地景、文化記憶等面向，剖析唐代文人「遊」的各種想法與風貌，以及其連帶的文學思維。中興中文林靖凱則在「第一屆麗澤全國中文研究生學術研討會」中，發表〈杜甫論書詩研究〉，結合書道與論書詩兩者，讓杜甫研究中的論述型的更多元化、類型更豐富，更是難得的跨領域結合嘗試。在「第九屆、十屆有鳳初鳴漢學多元化領域之探索學術研討會」中，東華中文熊貴藍發表〈論唐人傳奇三大愛情名篇的互文對話、關係〉，談論唐傳奇三大愛情名篇中相互關聯與對話，藉由加深三者的共通性與可比性，試圖將三大愛情名篇揉為一完備體系；台大中文王詩涵則發表〈重探韓愈「示兒」、「符讀書城南」二詩〉，重新對韓愈〈示兒〉、〈符讀書城南〉二詩加以詮釋，並將之體系化、功能化，使兩詩在後世的詮解上，有著更全面且富有高度意涵的解讀；東海中文吳賢妃發表〈語言學角度的詩歌解析——以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為例〉，則以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作為例子，貫串其語言學的詩歌詮解脈絡，將詩歌詮解以語言學的角度推陳出新，並試圖擴及詩歌史，確有其特殊的意義與價值。

除此之外，由中國唐代學會舉辦，以唐代文學文化作為核心研究的「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已由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舉辦第十一屆於 2014 年 6 月 26 日至 27 日，依議程分為「文學組」與「史學及敦煌學組」，其間發表攸關唐代文學議題共十六篇，包含王兆鵬發表〈20 世紀下半葉台灣唐代文學研究果量的變化與作者隊伍的構成〉；王輝斌發表〈唐人樂府題解與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林雪鈴發表〈邊塞的邊塞文學：唐代敦煌在地作品中的場域記憶及其特徵〉；藍基發表〈一個女人肖像的演變：從元稹鶯鶯到金聖嘆的鶯鶯〉；金鮮發表〈韓中女詩人被遺棄感（abandonment）之比較：以李梅窓與薛濤為例〉；李芳民發表〈韓愈懼為史官發覆：以〈答劉秀才論史書〉的釋說為中心〉；羅時進發表〈白居易在唐代詩歌中上的「第三

極」意義)；鍾曉峰發表〈自我的隱退：論孟郊的組詩〉；侯雅文發表〈元明時期載錄刻劉辰翁評點王維詩考論〉；張蜀蕙發表〈唐代南貶文人的水域書寫〉；蕭麗華發表〈唐詩中的維摩詰意象〉；佐藤浩一發表〈是散佚還是廢棄：日本研究者如何看待杜甫早期詩〉；林淑貞發表〈「織女」形象的顛覆與悖異：論唐小說〈郭翰〉對神話傳說之沿承與新創〉；嚴紀華發表〈一旦新妝拋舊樣：論〈時世妝〉的語彙指向與時代意義〉；劉衛林發表〈唐代清麗詩風與六朝隋唐禪法〉；吳靜宜發表〈佛教音律思維與唐代格律詩的關係〉，並延邀諸唐代文學研究之名家與會發表講評，讓想以唐代文學研究為主的莘莘學子，得以一睹大師風采。

研討會名稱	研討會日期	舉辦單位	發表者	發表篇章
林文月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30905—20130906	臺灣大學中文系	何寄澎	〈應酬與文學——韓愈古文改創的策略與實踐〉
2014唐宋生態文學學術研討會	20140530	明道大學中文系	李威熊	〈論唐代文人的自然倫理〉
			兵界勇	〈柳宗元的生態觀與政治隱喻〉
			陳正平	〈李白詩中的山水田園與自然人文〉
			李寶玲	〈唐代詩人筆下的汴河〉
			李建崑	〈論唐宋竹枝詞之生態書寫與人文風情〉
			陳金木	〈愚溪僂人的山水療癒：柳宗元永州詩文析論〉
			洪如薇	〈中唐詩歌生態意識初探〉
			吳惠珍	〈論白、蘇在杭的關懷與書寫〉
			普義南	〈「一切禽鳥皆能言」—論唐宋詠物詩歌中的代言書寫與體物想像〉
陳鍾琇	〈「蝗災食苗民自苦」—論唐宋蝗災詩中的災異、防治與寓意〉			
第十一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0626—20140627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王兆鵬	〈20世紀下半葉台灣唐代文學研究果量的變化與作者隊伍的構成〉

臺灣地區唐代文學研究概況（2014-2015 年）

			王輝斌	〈唐人樂府題解與吳兢《樂府古題要解》〉
			林雪鈴	〈邊塞的邊塞文學：唐代敦煌在地作品中的場域記憶及其特徵〉
			藍碁	〈一個女人肖像的演變：從元稹鶯鶯到金聖嘆的鶯鶯〉
			金鮮	〈韓中女詩人被遺棄感（abandonment）之比較：以李梅窓與薛濤為例〉
			李芳民	〈韓愈懼為史官發覆：以〈答劉秀才論史書〉的繹說為中心〉
			羅時進	〈白居易在唐代詩歌中上的「第三極」意義〉
			侯雅文	〈元明時期載錄刻劉辰翁評點王維詩考論〉
			鍾曉峰	〈自我的隱退：論孟郊的組詩〉
			張蜀蕙	〈唐代南貶文人的水域書寫〉
			蕭麗華	〈唐詩中的維摩詰意象〉
			佐藤浩一	〈是散佚還是廢棄：日本研究者如何看待杜甫早期詩〉
			林淑貞	〈「織女」形象的顛覆與悖異：論唐小說〈郭翰〉對神話傳說之沿承與新創〉
			嚴紀華	〈一旦新妝拋舊樣：論〈時世妝〉的語彙指向與時代意義〉
			劉衛林	〈唐代清麗詩風與六朝隋唐禪法〉
			吳靜宜	〈佛教音律思維與唐代格律詩的關係〉
張夢機紀念學術研討會	20150424	中興大學中文系	李宜學	〈論張夢機之李商隱詩研究〉
第十二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60422 -20160423	中興大學中文系		

五、結語

臺灣地區近兩年的唐代文學研究與發展，其實深耕易耨，不僅拓展了當代唐代文學的研究視野，也促進了唐代文學與生活、生命的結合。筆者整理自二零一三年八月至二零一五年六月，臺灣地區研究唐代文學的期刊論文、學位論文，以及研討會和學術活動，雖必有疏漏，尚待更多專家學者指教，然在現行資料中可以發現，唐代文學近年研究的著重點，仍是在唐詩專家研究上。無論是開展新的研究對象，或是重新將已研究的研究對象重新檢核、評價，或是用不同視角切入，窺見不同的學術思考與想像，都是臺灣地區近兩年學術的努力方向。以下簡單對於學位論文、期刊論文，及研討會論文做概括性的小結：

（一）學位論文

在碩士、博士的學位論文上，近年可說碩果纍纍，單就篇目可幾三十之數。在研究取向方面，最主要集中在唐詩的專家研究，含括了杜甫、李白、李商隱、杜牧、李賀、王維、岑參等著名詩人，並對其詩加以闡發論證，亦開發前人較少研究的詩家，諸如權德輿，剖析該作家之生平、風格、意象使用與抉擇，使作家與作品更被細緻的深度連結。亦有唐詩主題研究，分別就命運、雨境、芳草、菊花等不同角度切入唐詩，希望能與唐代詩人做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脈絡關聯。而在比較文學、辭賦、小說方面亦有可觀，一方面對於專家做深入剖析，另一方面則對於橫互式的命題多方處理，涉及佛教、世變、書論，以及西方文學等。

（二）期刊論文

在近三十篇的期刊論文裡，以唐詩專家研究為眾，舉凡杜甫、李白、白居易、李商隱等，皆為目前的研究重點，其中尤以杜甫研究為大宗。研究方向與方法亦各有殊異，從抒情傳統、形象與意象、空間地域、心理療癒等不同視角切入，在專家研究上類目更加精細；在唐文與變文部分，重探韓、柳的古文，進而重構其對古文的反思，以及其古文本源論和影響論，甚而談

及變文；在唐代辭賦學方面，論及李德裕及柳宗元的辭賦書寫，以及其辭賦中的隱喻線索及觀照。

（三）學術研討會

關於學者間的研討會共計有四場，有「林文月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張夢機紀念學術研討會」、「2014 唐宋生態文學學術研討會」、「第十一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者彼此切磋，激盪唐代文學研究的火花。在研究生的部分，本研究共收錄四場全國會議，包含「2013 道南論衡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第一屆麗澤全國中文研究生學術研討會」、「第九屆有鳳初鳴漢學多元化領域之探索學術研討會」、「第十屆有鳳初鳴漢學多元化領域之探索學術研討會」，亦有唐代文學研究的佳構在其中。

（四）其他

唐代文學的孕育不僅在學術論文中，除了學術論文的撰寫，更有專門的學術演講等，包含國家圖書館舉辦的「百代存風雅：唐宋古文八大家」，廣邀唐宋研究專家，延邀臺灣大學中文系何寄澎談論〈文字的魔術師——談韓愈古文之美〉，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顏瑞芳演講〈人生啟示錄——柳宗元的寓言世界〉，亦請中興大學中文系林淑貞演講〈柳宗元文學生命的調適與安頓〉，對於唐代文學在學術與生活的普及度上大為提升。

此外，「第十二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將在 2016 年 4 月 22 日至 23 日於中興大學舉辦，與「第十一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同心協力，廣邀名家學者，以及有志於此的青年研究者共赴盛宴，將歷屆承傳的唐代會議擴大舉辦，相信在此研討會中，唐代文學研究名家與新秀能夠激盪出唐代文學研究的新火花。

唐代文學本就為民所好，人人傳頌不已，而如今有更多管道可以接觸唐代文學，不僅讓民眾接觸唐代文學，受唐代文化之美的陶冶，更讓唐代文學能更廣為人所周知，進而能夠培養更多研究人才，讓唐代文學研究能蒸蒸日上，共創研究的新局。

臺灣地區敦煌學研究綜述

（2014—2015 年）

張家豪^{*}

本文接續〈2011—2013 年臺灣地區敦煌學研究綜述〉（《中國唐代學會會刊》20，2014.12，頁 47-60），報導臺灣 2014 至 2015 年間敦煌學相關論著發表之概況，並增補 2013 年未及載錄前文者以供參考。所收論著亦含非臺灣地區學者而在臺發表者標以「#」號，有助瞭解學界交流情形；文中分為文獻相關、語言文字、文學、宗教、藝術、史地社會、人物書評等類，每類復依主題相近為次，概述中遺珠之憾在所難免，尚祈見諒。

一、文獻相關

文獻整理及新材料之公佈，都能使敦煌學研究更為完善並有所突破，於此期間與文獻研究相關之專書有王三慶《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新文豐，2014.9）探討日本收藏敦煌、吐魯番文獻之價值與真偽；並追索月儀

*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書流變，論述中國書儀文獻在日本的藏製與發展；並闡述奈良朝古寫經與敦煌文獻之關係，及與東亞文化交流之情況；又以東土古寫經及敦煌文獻對中國佚失典籍進行補缺與復原，除發掘、整理文獻外，在研究視野與方法上皆有創新與突破。又作者在〈《文場秀句》之發現、整理與研究〉（《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12，頁 1-22）一文留意《文場秀句》在中日兩國間資料之關涉，呈現兩國文本資料的互通與互補性，為一系列研究成果。期間作者尚有〈敦煌文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佚名注本再探——以天理大學圖書館イ 183-293 為中心〉，（成大中文學報 47，2014.12，頁 135-180）認為該卷可與 BD.03610、P.3904 及津藝 275、256 等寫卷相呼應，將之比較整理以使五個複本關係廓清，亦能復原其內容，而此卷咒文漢譯乃歷來諸譯本所無，註文又是無名氏佚註，具重要文獻與宗教意義，加上寫卷以盛唐嚴整書法抄寫，具清代多位書法名家題跋，識語涉及當日太平軍流竄事件與外交事務，在書法史及清代史料上亦具珍貴價值。

著眼散藏敦煌文獻者有鄭阿財〈青島市博物館藏敦煌文獻經眼錄〉（《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25-643）將新公佈青島市博物館藏八件敦煌遺書製成簡錄，敘其來源與價值。朱鳳玉〈散藏敦煌寫卷題跋研究發凡〉（敦煌學 31，2015.3，頁 11-37）則致意於散藏寫卷題跋之搜輯整理，說明散藏文獻概況並凸顯其價值，指出寫卷題跋透露早期甘肅寫卷流散情況，並可供寫卷抄寫斷代之參考，在書法史上亦具珍貴價值。朱玉麒#〈段永恩與吐魯番文書的收藏研究〉（《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5-58）亦重視文獻題跋之價值，計在清末民初人裝裱為 10 卷之吐魯番文獻中，對段永恩留下之 28 則題跋進行錄文、箋注，並說明其書法、歷史價值與學術特點。波波娃#〈敦煌文獻標注日期問題之若

干說明〉（《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57-161）則討論未收錄《俄藏敦煌文獻》中的 Dx.10267 寫卷之日期、用印相關問題。

針對文獻進行考辨者有石冬梅#〈《俄藏敦煌文獻》第 11 冊非佛經文獻新校考〉（書目季刊 47：4，2014.3，頁 1-31）針對 32 件非佛教文獻進行考辨、定名並說明其價值。郜同麟#〈八種英藏敦煌文獻殘片的定名與綴合〉（敦煌學 31，2015.3，頁 39-46）考定 S.11507B、S.11672、S.11911、S.11921、S.119692、S.11972V、S.12043、S.12370 等 8 件未題名文書之內容，指其部分可與其他敦煌殘卷綴合。高田時雄#〈藏文書寫的漢文《願新郎、願新婦》〉（《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33-239）考辨現藏於法國國立圖書館之藏文寫本 PT1254 之內容為藏文書寫的漢文願文《願新郎、願新婦》，乃婚禮時祝福新人而祈求幸福生活者，作者當為十世紀的白十德。玄幸子#〈關於 P.2668 裡面的數種雜寫〉（《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3-33）對文獻進行校錄、考察，認為書寫者可能與翟奉達相關，受十王思想影響，此雜文對十恩德、十解夢提供了重要研究材料。

另外，崔溶澈#〈韓國所藏敦煌吐魯番文物及絲綢之路研究活動〉（《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69-381）一文介紹韓國所藏敦煌吐魯番文物現況、韓國敦煌學會及中亞學會之活動、國際敦煌項目中心等傳播活動與敦煌學研究成果和特徵。

二、語言、文字

語言文字乃解讀文獻之基礎，期間語言相關論著有洪藝芳〈敦煌變文中的妻子稱謂詞探析〉（《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09-232) 爬梳變文而得指稱妻子之稱謂詞 17 個，並針對其中唐、五代時期新興與用法改變如：「妻室」、「妻房」、「前家」、「小娘子」、「阿婆」、「婦兒」……等 11 個妻子稱謂詞之意義、形態、演變、運用等現象進行分析，藉以重現變文中妻子稱謂詞之實貌、詞彙形態之雙音趨勢、詞彙意義的歷時變遷與運用時的語境制約等，揭示詞彙蘊含之文化內涵以填補傳世典籍之不足。張小豔#〈敦煌社會經濟文書疑難詞語輯考〉（《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11-321）則考釋敦煌社會經濟文書中「禮席」、「祝索」、「著作」……等 5 個詞語。黑維強#、唐永健#〈契約文書中的「分數」類詞語釋義〉（《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47-462）指出敦煌及宋代以後契約文書中，關於土地、家產等分割內容的文字表述常用「分數」、「分籍」、「分法」、「分範」……等詞語，經考察可知其乃一組同義詞，表示份額、數額之義。

朴庸鎮#、徐真賢#〈新羅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語言研究舉隅〉（東海中文學報 28，2014.12，頁 227-248）則對《往五天竺國傳》寫本 1-114 行之異體字、缺漏字、仲介語詞彙等提出分析。梁銀峰#〈中古漢譯佛經和敦煌變文中由「於」引出的賓語小句〉（清華中文學報 13，2015.6，頁 153-180）認為中古漢譯佛經和變文之標補詞「於」的產生與語言接觸有關，但與漢語史上其他類型的外借成分不同處在於不是完全引進，而是在佛經原典語言之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可視為「接觸引發的語法化」，然由於與漢語固有語法系統不相容，故產生後很快退出歷史舞臺。

廖湘美〈《大般涅槃經》音切的比較研究：以敦煌 P.2172 與《可洪音義》為中心〉（《漢傳佛教研究的過去現在未來會議論文集》，佛光大學，2015，頁 115-138）認為 P.2172《大般涅槃經》之音切反映唐五代西北方音特色，為研究中古漢語系統的重要材料，其內容以音切為主，並大量使用直音法，與約同時期之《可洪音義》相較，可發現 P.2172 反映元韻與仙韻 B

字混用、濁音清化、-n 與-ŋ 相涉、入聲與陰陽相涉、異調相涉等現象外，還有殘留唇音類隔及與經師取音不同之現象。

俗字研究方面有朱鳳玉〈敦煌通俗字書中音樂語詞呈現之樂器析論〉（《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9-77）一文析論《開蒙要訓》、《雜集時用要字》等通俗字書所載音樂詞語之樂器名目，凸顯通俗字書於研究唐五代社會文化之價值。而蔡忠霖〈俗字研究瑣議〉（《敦煌學 31》，頁 83-100）討論敦煌寫卷俗字研究中俗字意涵、俗字解讀、寫本俗字研究的特異性、俗字與隸變、俗字書寫現象等議題。

三、文學

敦煌文學研究仍是臺灣地區研究之主體；專書方面有楊明璋《敷演與捏合——敦煌通俗敘事文學的敘人體物》（政大出版社，2015.9）上編分三章，以通俗敘事作品之敘「人」為核心，討論講經敘事的善惠故事、講史敘事中劉家太子故事及漢高祖故事；下編六章關注文本所敘之「物」，論述〈伍子胥變文〉之劍、〈目連變文〉之鉢與錫杖、〈葉淨能詩〉的符籙與衣著、講唱文學中的禮物、〈韓朋賦〉中的鳥蟲魚及敦煌本《搜神記》之神變敘事與物件，以物質文化角度檢視文學中「物」的功能與象徵性，拓展文本之深度與新意。

韻文方面曲子詞研究有李文鈺〈從「敦煌」到花間：物質書寫與詞體特質的構成〉（《林文月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頁 431-479）一文亦關注物質書寫，觀察詞從民間到文人之創作，認為從敦煌到花間詞，書寫之物質從質樸實用轉趨精緻巧

飾，從書寫物質之原貌轉趨物態之精密塑造、組織，透過物質所抒寫之內容從現實心聲轉趨內在幽遠的情思。

劉鑒毅〈敦煌寫卷 P.2704 及其相關寫卷研究〉（北市大語文學報 11，中國語文領域，2013.12，頁 65-95）認為 P.2704 寫卷應為俗講變文受民間雜曲歌謠影響之唱辭，可分〈三冬雪〉與〈千門化〉二組「重句聯章」；P.3618〈秋吟一本〉則為法師於朱門講唱經文後勸募冬衣之吟辭，而 P.2704 為 P.3618 寫卷之改作，乃一般僧尼吟唱望濟寒衣之歌辭；P.3618 與 P.2704 〈三冬雪〉當作於吐蕃統治時期，或因〈三冬雪〉與〈千門化〉之內容、形式相近，後人遂將二首唱辭傳抄一卷，相關寫卷除記載當時佛典經律外，亦反映晚唐民眾之宗教態度與僧尼地位之低落。

講經變文研究有蕭文真〈《敦煌秘笈》羽-100 號殘卷用途之試探〉（敦煌學 31，頁 145-154）探討《敦煌秘笈》擬題「不知題經講經文」殘卷之內容，認為其匯集數十種經文，雖主要抄錄大乘經典與論疏，然有淺化佛理及通俗化傾向，而其選材兼採俚、俗語，用語淺白易記，此些特質與俗講吻合；再者具有同意換字、採字記音、文字簡化等見於說話類或講經有關文稿之現象，故推測原卷近於俗講法師所備手稿或信眾聽講筆記，非經整理之完稿。而楊佳蓉〈敦煌《降魔變文》與經變壁畫之探析〉（育達科大學報 37，2014.4，頁 177-205）探討《降魔變文》來源、與《賢愚經·須達起精舍品》、《勞度差鬥聖變》之異同，藉以闡述佛經、變文與壁畫三者之密切關係。又楊明璋〈從講經儀式到說唱伎藝：論古代的唱釋題目〉（敦煌學 31，頁 65-82）則從變文實際運用於儀式之內容進行立體地思考，探究唐五代講經活動中唱釋題目的內容，指出當時一般講經或俗講活動均有以開示經題旨義為目的之「唱釋題目」，於敦煌文獻中可見押座文末尾有法師催都講唱題目，而講經文、變文與說話伎藝之入話有關者除押座文外即此唱釋題目，講經之「唱題目」一詞更被宋代合生伎藝繼承，其關聯尚包含皆為演出者在一主一從互相

配合進行，且吟誦、歌詠之文字均採比興手法，用語亦具對比性、口語化傾向。

講史變文研究有楊明璋〈敦煌講史變文中的祭祀敘述及其與祭祀活動之關係〉（《中國學術年刊》36：春，2014.3，頁 1-22）凸顯祭祀敘述在講史變文中的作用，或渲染故事與人物之悲壯、哀傷，亦藉賦誦祭文對主角予以總結性評述；雖其儀式性較講經變文淡，然唐五代的表演伎藝常伴隨宗教齋會，喪葬祭祀亦有英雄故事表演，〈伍子胥變文〉、〈韓擒虎話本〉、〈前漢劉家太子傳〉等講史變文抄寫之時亦抄齋願文、讚文等宗教應用文書等，皆可證敦煌講史變文與祭祀活動應有所關聯。而林仁昱〈敦煌變文的英雄唱述探究〉（《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63-188）一文探究變文唱述出的英雄形象，包含能顯現真理精神的先知特質英雄釋迦牟尼、入地獄救母的宗教英雄目連、具復仇意識的忠臣英雄伍子胥、以孝義感天地的英雄舜、尋夫義婦「女英雄」孟姜女、堅持文化認同的「女英雄」王昭君，及武將王陵、李陵與統領地方的張義潮、張懷深等；透過文本分析，參酌坎伯《千面英雄》揭示之英雄旅程，結合變文生成之時空環境進行詮釋，論述英雄們踏上旅程之因緣、經歷與性格。又張家豪〈從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記》論《西遊記》中「太宗入冥」故事之運用〉（《敦煌學》31，頁 47-63）指出《西遊記》賦予變文太宗入冥故事嶄新詮釋，使太宗形象轉為守諾有德，入冥後之宗教意涵亦更凸顯，乃為使入冥故事與奉敕取經欲保君王江山永固的取經動機緊密結合，儒家忠君思想藉此故事統攝宗教題材之百回小說，形成前後呼應之敘事框架。學位論文有楊靜宜《唐代「和親」主題文學之研究》（嘉義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14）運用唐代和親詩作及〈王昭君變文〉展開和親主題文學之論述。林穎欣《敦煌歸義軍時期時事文藝的「空間」與「英雄」概念研究》（中興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13）藉「空間」與

「英雄」概念，探討歸義軍時期時事文藝對於敦煌與中原之「空間」認同與感受，以及「英雄」形象的象徵意義等。

敦煌賦的研究有項楚#〈敦煌本〈醜婦賦〉校注商榷〉（《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11-418）對潘重規、伏俊連之校注提出若干商榷意見。包晏寧〈文人與民間的關照：柳宗元賦體文學與敦煌俗賦探析〉（《第三十二屆南區中文系碩博士生論文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14，頁 97-111）試圖說明柳宗元賦體雜文與敦煌俗賦之共性，認為唐代文人作賦在典故與情節運用皆具民間性與故事性，趨於大眾化。又汪時宇〈尋常百姓家的故事——敦煌《燕子賦》淺論〉（《第三十屆南區中文系碩博士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屏東教育大學，2013.12，頁 163-178）析論文本之敘事藝術。

劉惠萍〈敦煌類書事森與漢魏六朝時期的孝子傳〉（《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01-623）發現敦煌類書《事森》所引《孝子傳》如董永、郭巨、老萊子、吳猛、王循等孝子故事，或非源於現今可知見之任一傳世《孝子傳》，反而與兩漢至魏晉南北朝出土墓葬之「孝子圖」有更高相似性，推論自兩漢至魏晉，除各文人士子及官修史書所編撰之《孝子傳》外，民間可能有另一套更普遍流傳之孝子故事系統，此研究凸顯敦煌類書《事森》除具輯佚、校勘及考證等價值，更提供探討古代孝子故事傳衍系譜及「知識精英」與「民間思想」間互動互依關係等重要之訊息。作者另有〈呈現「孝道」——以「丁蘭刻木事親」敘事為中心的一種考察〉（成大中文學報 47，2014.12，頁 241-284）一文亦結合墓葬圖像，出土文獻，以知識考古方法對丁蘭刻木事親敘事之承衍進行梳理，乃一系列研究成果。

經、子典籍方面有黃亮文〈論韓愈為嫂服期之相關問題〉（《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19-446）因韓愈為鄭氏服期以報養育之恩，此一服制自宋以來屢見學者解釋卻未中肯綮，故文中首先考其所

服異於傳世文獻，進而探究該服制之緣由，並以敦煌書儀 P.4024 中〈齊衰期·義服〉進行論述，釐清韓愈此服緣由，並反觀歷來對此事之評價。而山本孝子#〈唐五代時期書信的物質形狀與禮儀〉（敦煌學 31，頁 1-10）一文以唐代書儀與實用過的書信為研究材料，探討書信的物質形狀特徵如：料紙與字體之選用、封緘方式、書信紙張數量等，闡述其所具有的禮儀作用，確認「以多為恭」之趨向。又杜冰梅#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之《敦煌寫卷《老子》綜合研究》（花木蘭，2014.3）在臺灣出版，論述敦煌寫卷《老子》之文獻、版本、異文及字樣整理。

類書相關研究有劉全波#〈論敦煌類書的分類〉（《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47-579）以漢宋間中國類書分類特徵考察敦煌類書。魏迎春#〈敦煌寫本 P.3907 蠶金殘卷考釋〉（《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69-683）考釋此殘缺之類書文獻。陳茂仁〈敦煌寫卷《蠶金》增輯《新序》佚文一則〉（書目季刊 48：1，2014.6，頁 45-47）則以 P.2537《蠶金》增輯《新序》。而楊明璋〈傳統通俗文化的婚儀問答與門：從敦煌本下女夫詞到日用類書佳期綺席詩，徽州文書饅房文詞〉（《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63-485）一文將敦煌本〈下女夫詞〉與宋、元日用類書《事林廣記》、《翰墨全書》「佳期綺席詩」、《中國喜歌集》中所錄清末民初喜歌及徽州文書《饅房文詞》進行比較分析，藉以論述漢語文獻中婚儀文學的問答運用情形及承衍，發現運用問答的時機大抵與「門」相關，婚儀時發生於門內外之詩文問答過程如「過度禮儀」般藉障礙之考驗達到從分隔到邊緣再到聚合的意義，婚儀中無論障礙解除或論難結束，皆代表新人下一階段順暢，乃積極、再生、創造的展現。

此外尚有邱君亮〈敦煌蒙書研究——《王梵志詩》蒙詮〉（《第四十六屆中區中文研究所碩博士生論文研討會論文集》，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頁 288-312）關注敦煌蒙書，論述王梵志詩的蒙書因素與價值，認為

蒙書乃為大眾啟蒙而非僅限童蒙。林秀娟《敦煌本《搜神記》研究》（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14）關注敦煌小說，分析情節、主題並論述敦煌《搜神記》之文化意蘊。郭彧岑《敦煌俗文學故事之類型與敘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2013）以 AT 等分類法討論敦煌俗文學之「故事類型」、「情節單元」與「敘事手法」。

四、宗教

由於藏經洞文物多數與佛教相關，宗教研究焦點依舊在佛教；相關研究有崔中慧#〈德國收藏吐魯番出土早期《華嚴經》寫本殘片研究〉（2014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4.10，頁 23-48）一文延續作者〈吐魯番出土北涼且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研究〉（華嚴學報 6，2013.12，頁 217-262）系列成果，關注德藏吐魯番文獻中四件《華嚴經》殘片 Ch667、Ch2545、Ch1825、Ch1508，並據書法風格，推斷為北涼寫經，又藉佛教史料說明《華嚴經》於北涼已傳至北方且為官方重視，而北涼已有官方寫經組織與寫經生，除本地人，亦有外域及南方者，致使寫經呈現南北交融又具中亞風格之書法特色，此種種原因奠定北魏敦煌出現敦煌鎮「官經生」或「典經師」的正式官職。作者尚有〈由〈涼王大且渠安州造寺功德碑〉探討北涼宮廷寫經體〉（《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45-368）藉北涼王渠安州於高昌建造佛寺所立之碑探討北涼宮廷寫經體。

羅恩#〈The Scripture on Saving and Protecting Body and Life: An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中華佛學學報 27，2014.7，頁 1-34）介紹並英譯《救護身命經》，其含註解之譯文乃以日本七寺的寫本為底本，並參照敦煌與《房山石經》之寫本。方廣錫#〈Defining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Its Origin, Periodization, and Future〉（中華佛學學報 28，2015.7，頁 1-34）詳述中國佛教史中大藏經的演變，釐清名稱來源，並將大藏經分為寫本、刻本、近代刻本及數位化時期。

郭麗英#〈敦煌寫經中西域傳譯經與中原未傳經〉（《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77-293）討論吐蕃時期到十世紀間，北庭和安西鎮翻經抄寫流傳前後事宜，並論述敦煌地方撰述「迴向輪經」、「佛說金剛壇廣大清靜陀羅尼經」、「金剛峻經」等密教經典之相關議題。蘇錦坤〈試論「甘肅博物館 001 號《法句經》寫本」的異讀〉（福嚴佛學研究 10，2015.4，頁 19-39）指出甘博寫本的部分異讀與今存世之各雕版《法句經》用字不同，然與《出曜經》、《法集要頌經》之對應偈頌呼應，甚至與梵、巴《法句經》偈意相符，又甘博寫本之用字時與《磧砂藏》、「宋、元、明藏」相同，時與《高麗藏》、《趙城金藏》相同；認為若寫卷確實出自敦煌、吐魯番戰事紛繁、經卷短缺之地，向壁虛造幾乎全無可能，應是根據古版寫本抄寫，且據以抄寫之「祖本」與各版《法句經》不同，應是今所未見之「版本」，故可以將甘博寫本作 T210《法句經》之「校本」。

釋長觀《「杏雨書屋」所藏敦煌寫卷「羽 619」與「阿含部類」的關係研究》，（法鼓佛教學院佛教學系碩士論文，2014）認為「羽 619」另有半卷殘本存世，名為「近墨堂 1002.hs」，二者可綴接，進一步從「寫本淵源」、「字體」、「紙張拼接」、「上下文意」等方面判斷綴接順序，指出羽 619、近墨堂 1002.hs 與《增壹阿含經》的注釋書《分別功德論》性質最為接近。

值得注意的是「維摩詰」相關研究因佛光大學「《維摩經》與東亞文化」計畫得到較集中之關注，文獻方面林純瑜〈《維摩經》藏譯本周邊文獻考察〉（佛光學報新 1：2，2015.7，頁 471-534）說明藏譯本來源、研究史，並就敦煌寫本殘卷與藏譯本的譯出、譯者與年代、影響……等議題進行闡述提出未來研究可發展之方向。萬金川〈《維摩詰經》支謙譯本的點校——兼論該

一經本的譯者歸屬及其底本語言〉（佛光學報新 1：2，頁 101-232）一文乃自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寫卷所展開之討論。何劍平#〈維摩詰信仰在中國中古時期的演進歷程與特徵〉（佛光學報新 1：2，頁 357-387）認為佛教進入中國便形成庶民與士大夫佛教兩個世界，敦煌寫卷出現之時，湮沒已久而作為庶民文化之維摩詰信仰世界方被人們所認識；有別於士大夫重玄理，而民眾信仰具有崇拜神力、重視經卷之書寫和供養、倡導通俗講唱和注疏、中土民俗與禮懺法事相結合等特質，呈現通俗化傾向，此特性於中唐後由於淨土教、禪宗推動的佛教教理和佛教藝術的通俗化趨向而與士大夫信仰合流。潘亮文〈敦煌隋唐時期的維摩詰經變作品試析及其所反映的文化意義〉（佛光學報新 1：2，頁 535-583）一文結合石窟圖像與藏經洞文獻，認為石窟之經變圖從窟頂到西壁龕外兩側，後到東壁或南壁或北壁，其位置改變使畫面空間變大，是表現品數內容得以增加之因，亦知其信仰日益受到重視；據現有經變可推測該圖像在隋代由中原傳入，唐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後，可能又有一波來自中原的影響，吐蕃時期基本構圖形式大致底定，推測信仰有一定程度之普及，晚唐時與道教有些許連結。此外，查屏球〈從西域之神到東土隱士——唐宋維摩詰圖題詩之衍變〉（佛光學報新 1：2，頁 305-356）亦採用部份敦煌壁畫材料進行論述。

由佛教圖像探究其思想者有汪娟〈佛教瑞像的特徵與形成的思想基礎：從印度、于闐、敦煌到東土瑞像的整體考察〉（《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07-129）論述瑞像與一般佛像在造像由來、準則、特徵、功能之差異，並由佛身觀的歷史發展，說明以大乘佛教法身思想做為瑞像形成的理論基礎之成因，進而以吉美博物館藏五代 M.G17655 絹本為例，說明在法身示現思想影響下所產生的瑞像圖之形式衍化。而簡佩琦〈從「目連經變」至「十王經變」圖像遞嬗之跡〉（《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85-709）亦將文本與圖像結合論述，以十王圖卷

與榆林窟 19 窟之目連經變進行比對，認為敦煌十王圖卷之源流出自目連經變，乃因兩者有「地獄」作為相互連接之共通點，並統整十王圖像所顯示的文本時間，認為 S.3961 最早，其次為 P.2870、P.2003，而 P.4523 最晚。又殷光明#〈試論敦煌盧舍那法界像配置反映的佛教思想〉（華嚴學報 6，2013.12，頁 177-21）則結合圖像、文獻，探究敦煌盧舍那法界像與涅槃圖像、單尊像、經變畫之間的配置，及其所反映之佛教思想。學位論文有釋慧謹《佛教孝道的義理與實踐：以大足、敦煌石窟為重點》（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將石窟圖像與文獻對應於佛教經典義理，認為石窟孝道之弘揚依於經典，並以石窟供養人及敦煌文獻之救度方法，說明佛教孝道之實踐。

佛教文化相關研究有梁麗玲〈敦煌文獻中的護童信仰〉，（《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95-309）認為敦煌文獻呈現之護童信仰以簡便易行、操作方便為主；當小兒生病而藥物難以處理時，透過《佛教護諸童子陀羅尼經》所示持誦呪語真言，或針對 ch.00217 所繪護童女神進行祭拜，便可庇護身體而解除病苦；而民間俗信以為小兒夜啼是被鬼神所攝，若無法醫療則誦念「佛咒小兒衣（夜啼）方」乃最好民俗療方；從宗教醫療角度，敦煌文獻中提供祛除小兒疾病之法，皆直接簡易地念誦陀羅尼咒，或祭祀護諸童子女神，此乃基於民間實用性的立場，對佛經進行摘抄，甚至重新組合的結果。又荒見泰史#〈敦煌本五臺山讚文與念佛法事、齋會〉（《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63-275）一文將文獻置於實用儀式中進行思考，通過調查《五臺山讚文》及其在念佛法事的使用情況，確認「《法照和尚念佛讚》系統中的《五臺山讚文》」是在法照門徒的念佛法事上歌唱所用，比較此系統文獻之文字，可知為了實際法會使用會發生改寫情況，其中 P.3645 相對來說保留原來讚文面貌，龍谷大學藏本、

P.2483 等可說為了實際用途而被改寫，此情形如同變文在實際宣唱時，也有類似韻文被改寫之情況。

釋大參〈敦煌《觀音經》題記節俗齋日抄經文化之考察〉（敦煌學 31，頁 155-177）亦從文獻實際運用角度論述，考察敦煌《觀音經》題記，指出當時人們抄經時間與中國民俗節慶、佛教節日及齋日有密切關係，且可知佛教傳入敦煌乃以寺院凝聚僧俗四眾，於佛教重要節日或中國傳統春節、元宵等，寺院提供四眾弟子造經與造幡等廣修供養之機會，此乃宗教修持與經典流行之因素，又經考察可知敦煌地區《法華經》系統衍生之觀音信仰隨佛教齋日與節俗而深入人心，至初盛唐後之寫經數量大幅成長，晚唐五代更盛行不衰。此外，蘇哲儀〈敦煌文書所見唐五代佛教活動與文化表現〉（《2013 佛學與人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逢甲大學，2013.11，頁 197-216）以敦煌佛教相關文獻，說明當時佛教之大致發展，並試圖還原佛教徒組織及活動情形，說明佛教的中國化、實用化、功利化。

《壇經》研究有趙威維#〈敦煌本《壇經》中「善知識」的角色探究〉（宗教哲學 70，2014.12，頁 151-169）探究《壇經》中大善知識、外善知識、內善知識等三類善知識在開悟過程之角色與作用，並討論慧能悟道過程中的善知識。

道教研究方面有周西波〈《洞淵神咒經》探論〉（《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12，頁 189-207）指出隨著第 20 卷敦煌寫本發現，可推測敦煌地區在藏經洞封閉前已傳播 20 卷本《神咒經》或與《道藏》本後 10 卷內容相關的道教文書，在唐高宗、武后之後，政治圖讖因素消失，其持續流傳並擴充增修應具政治外的宗教、社會因素，故對照前後 10 卷內容，發現末世思想始終如一，其作用在警示世人信道之重要，再利用鬼魅為崇之心理，將經典功能與世俗生活需求緊密聯繫，目的在於推動作齋轉經活動，也可能是此經流行之主因，而其科儀化

取向或許乃《道藏》將之歸於洞玄部之因。又劉屹#〈古靈寶經業報輪迴觀念的發展——以新經、舊經中的「先世」一詞為中心〉（《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81-600）討論靈寶經中出現的「先世」一詞，揭示此詞在新、舊經之不同含義，指出在舊經中，「先世」指祖先或指修道者個人前生，而新經基本上皆指個人的前生，可知新經作者對此詞理解乃前後統一，作者應為一人；而舊經作者幾乎肯定不是同一人，以此呼應作者過去提出新經最可能出自葛巢甫，其造構者為「仙公新經」部分，而非「元始舊經」或全部靈寶經；又從新經對佛教個人業報思想之襲用角度，亦可證其作者應受東晉中後期思想界對報應理論研討的啟發，而此時間段正與葛巢甫「隆安末，造構靈寶，風教大行」相吻合。此外，楊秀清#〈道教的大眾化與唐宋時期敦煌大眾的道教思想：以敦煌文獻為中心的研究〉（《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87-512）則宏觀探討唐宋時敦煌大眾之道教思想，指出儀式、技術成為當時大眾祈福禳災之依據，道教的數術方伎背景使陰陰五行為核心的宇宙觀念隨著道教的大眾化傳播而普及，乃敦煌大眾知識與思想體系中不可缺少之部分。

陳峻誌〈從敦煌具註曆日到寺廟安太歲：太歲以下諸神體系的起源與演變趨勢〉（興大中文學報 36，2014.12，頁 61-102）一文則著眼庶民信仰以「太歲」為首的神煞體系「太歲以下諸神」，蒐羅歷代包含敦煌等相關文獻，發現此體系約在盛唐確立，得見唐以來庶民文化一個側面，並認為《赤松子章曆》的部分相關內容應作於五代後，《張果星宗》之相關部分則作於宋元間，二書皆經累代增寫。

五、藝術

書法相關專書有李宗焜《敦煌遺書法書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5）從 2013 年底中研院史語所整理出版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一厚冊所收 51 件文書中，精選 5 件唐寫本之書法特美者，依原尺寸印出以呈現唐楷之面貌。王菡薇#、陶小軍#《千年遺墨：敦煌南朝寫本書法研究》（蒼璧出版，2014.12）在整理敦煌南朝寫本之基礎上，區分題記為南朝寫本者 24 卷，題記未註明而可能為南朝寫本者 43 卷，製成敘錄，簡要評述每卷寫本書寫內容與書法風格，並對東吳建衡二年寫本《太上玄元道德經》、東晉紀年寫本《法句經》、南齊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梁天監寫本《大般涅槃經》、陳寫本《佛說生經》等五個寫本進行個案分析。

繪畫相關研究專書有羅德瑞克·韋陀#編集、解說、林保堯編譯《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斯坦因蒐集品：敦煌繪畫 1》（藝術家，2014.9）為《西域美術》三卷之第一卷，1982 年羅德瑞克·韋陀編集三卷《西域美術》並刊載發行，一、二卷為繪畫，三卷為染織品，至今已譯為英、法、日文，中文版遲至近年方由北藝大林保堯教授陸續編譯連載於《藝術家》雜誌；此書序言概述斯坦因之蒐集過程與藏品，內容收錄數鋪經典作品、8 世紀以後繪畫、敦煌佛教幡畫等，解說詳盡且圖版精美。同系列文章尚包含羅德瑞克·韋陀撰#、林保堯編譯〈唐代〈淨土圖殘片〉〉（藝術家 479，2015.4，頁 346-349）、〈唐代〈禹受洛書傳說圖〉與〈北方神星、計都星像護符〉〉（藝術家 485，2015.10，頁 344-347）等。

沈以正〈由張大千論敦煌與唐畫、唐卡（上）〉（藝文薈粹 17，2015.1，頁 15-21）、〈由張大千論敦煌與唐畫、唐卡（下）〉（藝文薈粹 18，2015.7，頁 6-11）介紹張大千敦煌摹畫過程及成果，並指出其欲突破畫幅長短大小限制並使所繪與壁畫質地相類，只能以「布」為載體，此方式便與唐卡相關，而其流傳作品中便有數幅摹自唐卡。

石窟藝術相關者有陳俊吉〈「華嚴藏海圖」與「七處八會圖」的獨立發展至結合探究〉（書畫藝術學刊 16，2014.7，頁 45-105）針對北齊至初唐早期華嚴經變相發展階段中「七處八會圖」與「華嚴藏海圖」之配置關係進行整體關照，認為至初唐時兩圖有結合之趨勢；論述中運用今可見最早「華嚴藏海」造像——盛唐莫高窟第 44 窟，並指出今可見唐五代莫高窟華嚴經變壁畫及藏經洞發現之華嚴經變相之「光中化佛」並非絕對需要繪出，若空間有限則裝飾圖案可省略。作者尚有〈中唐至五代華嚴經變的「入法界品圖」探究〉（書畫藝術學刊 18，2015.06，頁 133-174）運用敦煌遺存唐五代之華嚴經變，探究早期華嚴經變發展，指出經變圖在初唐主要依《六十華嚴》，盛唐以降為《八十華嚴》，在中唐以降規模較宏大的華嚴經變會配置有入法界品圖，但晚唐至五代時有較簡易者並未配置，反而華嚴經之入法界品圖有獨立趨勢，可離開華嚴經成為獨立造像，為宋代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立下基石。又〈唐五代「入法界品圖」中善財童子的造形與特色〉（書畫藝術學刊 19，2015.12，頁 151-203）亦為作者同系列研究成果，關注敦煌唐五代時入法界品圖之造形，指出圖中「世俗人物形」之造像主要傳達出善財童子「初發心始終無二」，並且有「勵行求法遍法界」的精神，而「菩薩形」之造像思惟，傳達出善財童子為「菩薩的本質性」，以及「示現度眾的悲願」。

學位論文昌筱晨《敦煌風華——老石窟壁畫中供養人研究》（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探討敦煌壁畫中男、女、僧侶供養人之服飾文化，並分析供養人題記，呈現壁畫供養人之現實性。李靚彤《唐代敦煌藻井裝飾研究》（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碩士論文，2013）以圖像研究法分析藻井形式、構圖、題材與內容。在石窟藝術之現代應用方面則有蔡依蓁《飛天再現·滿唐采——敦煌飛天創作研究》（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碩士論文，2014）以敦煌飛天為研究主題，探討相關文獻、風格、圖像與文化內涵，並舉飛天在當代設計的應用實例，最後才轉化為創作；劉

瓊櫻、黃尹柔、林明惠〈穿越千年藝術——炫金敦煌〉（《建國科技大學美容科學研討會學術論文集》，2013，頁 176-182）則將敦煌藝術用於彩妝。

舞蹈方面陳宜青 2012 年博士論文《「敦煌舞」的佛教藝術思想研究》（花木蘭，2014.9）出版。王佳玲《敦煌舞蹈之意涵分析》（南華大學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碩士論文，2015）對敦煌舞與宗教、音樂、文化、符號、傳播之關係加以解析。

六、史地、社會

石窟史相關者有張先堂#〈敦煌莫高窟的家族營造活動：以供養人圖像和題記為中心〉（《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23-344）藉全面考察石窟供養人圖像與題記，論述莫高窟家族營造活動的組織形態、歷史演變及其所反映的傳統文化特徵如：為現存眷屬禳災祈福之功利目、光耀家族而使石窟成家族功德碑和紀念館、報恩君親之題材使石窟成為表達忠孝觀念之載體等。又沙武田〈敦煌石窟營建里程碑式文獻《莫高窟記》題於莫高窟第 156 窟相關問題申論〉（《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79-105）認為第 156 窟乃張議潮功德窟，其作為推翻吐蕃統治之領導人物，此文獻出現於其功德窟應有獨特歷史背景，故重新解讀其內容、時代意義，而據《莫高窟記》所在寫本 P.3720 寫卷的整體觀摩，對其可能為悟真作品卻不署作者名，亦不記 156 窟營建之事亦進行探討。

楊發鵬#、李偉靜#〈兩晉南北朝時期河隴地區佛教寺院考略〉（新世紀宗教研究 13：3，2015.3，頁 1-28）關注佛教史地，因史籍與佛典關於兩晉南北朝河隴地區佛教寺院之記載較少，故爬梳史料及敦煌文獻，得此時佛教

寺院 20 餘所，通過分布狀況，總結其具有從西到東迤邐分、西多東少、後期寺院較多……等特點，建築形式上推測亦流行回字形塔寺。

政治史方面趙和平#、趙晨昕#〈《記室備要》再研究——以樞密使為中心的內廷軍政機制研究〉（《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13-523）一文認為具書儀性質之官文書集《記室備要》，其中卷所載各等級宦官間官方性質的往來書信，有助研究唐中後期宦官官制及唐中樞內廷軍政運作，故以此書為切入點，圍繞樞密使這一宦官使職，揭示唐中後期宦官群體及其與中樞軍政互相聯繫、運作之內在規律。

社會史有羅彤華〈試析僧龍藏牒的家世與財產問題〉（《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711-721）關注 P.3774 吐蕃丑年十二月沙州僧龍藏牒，指出此乃家產分割之訴訟文書，其中僧龍藏與大哥爭訟，似乎起因龍藏之僧人身分，而大哥想藉此侵占其財產，雖未知最終判決，然文書透露僧龍藏之家世，家庭財產性質與歸屬及同居家庭共財、私財之分畫等問題，在認識家庭財產之分疏上極具價值。而張梅雅〈試論晚唐至宋初的敦煌僧尼與社邑的互助關係：中古佛教僧尼參與社會慈善活動的動機與意義〉（輔仁社會研究 5，2015.1，頁 27-64）運用社邑文書說明九世紀中期以後社邑成員之行為準則受大乘佛教影響，在敦煌有一部份社邑成員於僧尼帶領下進行慈善救濟活動如：營建石窟、舉辦齋會等；又在一般社會生活中，敦煌社邑成員遇喪事或重大變故，可主動向社邑管理者申請救助，此利人利己的社邑活動與佛教菩薩思想相關聯，反映由民間發起、以特定群體與事件為救助對象之宗教慈善救助類型。又余欣#〈敦煌出土簡牘文書所見漢唐相馬法述考〉（《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45-156）認為斯坦因所獲敦煌漢簡相馬法殘簡乃古本《相馬經》傳文的一部分，很可能是與馬王堆帛書同一經文的不同解說經義之文字，傳文內容和風格與帛書本不同，體現了當時傳習《相馬經》的相士有不同的流派，並各有遵從之傳釋

文本，故文中對《相馬經》進行箋釋，並論述相馬之法，呈現社會生活史的一個側面。此外，吳蘊慧#《《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研究》（花木蘭，2013）在臺出版

交通史研究有鄭炳林#〈漢唐敦煌羅布泊間的交通與環境演變〉（《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45-667）一文說明疏勒河下游與羅布泊地區之交通始於張騫出使西域前，漢武帝經營西域達到高峰繁榮，西漢後交通地位始降，至隋設伊吾城，唐設伊吾郡並開通伊吾道，交通繁榮之景不再出現，其主因乃地理環境演變且條件惡劣，政府無法承受送往迎來之負擔，不得不將其廢棄。

關注郡望大族者有馮培紅#〈論中古時代敦煌、吐魯番大族間的關聯〉（《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83-410）一文論述漢晉敦煌大族在高昌的軍事活動、十六國高昌隗氏與敦煌大族之西徙高昌、敦煌大族後裔在高昌國扮演的角色、唐代沙州與西州大族間的聯絡等問題。而王晶#〈論郡望及其演變：以敦煌、武威的索氏、陰氏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44，2015.11，頁 1-42）利用敦煌文書、正史及出土墓誌，以索氏、陰氏為個案，對影響中古家族郡望變化之普遍性因素進行探討，指出家族實力為支撐郡望的主體，家族遷徙擴大郡望之知名度與影響力而推動其發展，郡望間相互融合使其成熟與壯大等現象。

李方#〈高昌國與唐代水渠關係考〉（《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31-143）、高啟安#〈漢魏時期的串炙——以河西走廊為中心〉（《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41-262）等文雖未直接運用敦煌材料，仍著眼周邊吐魯番與河西出土文物進行研究。此外，車守同#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時代背景與史事日誌》（擎松圖書，2013.12）在臺出版。

七、人物、書評

人物方面與常書鴻有關之著作有常書鴻#、池田大作#《敦煌的光彩：暢談美與人生》（正因文化，2014）乃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常書鴻與池田大作緊扣敦煌藝術與東方文明之對談紀錄。此外常書鴻#《守護敦煌五十年：常書鴻自述》（新銳文創，2013）一書則是自述其平生經歷及其與敦煌藝術之淵源。

書評方面王觀#〈見微知著皆史料，鴻爪雪泥覓法跡——評鄭顯文著《出土文獻與唐代法律史研究》〉（法制史研究 25，2014.6，頁 273-285）闡述此書特點在於對新發現史料做細緻的搜集整理，綜合運用了敦煌吐魯番文獻、北宋《天聖令》殘卷等進行論述，並對學界鮮有研究或具爭議問題進行探討，具廣闊視野而啟人深思，然因此書乃論文集，故結構略見鬆散，又以「暗合」來示意中華法系與羅馬法存在交流與借鑒，較難令人信服。壘謝苗#評介〈Irina Popova and Liu Yi, eds."Dunhuang Studi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敦煌學：第二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漢學研究通訊 33：2=130，2014.5，頁 69-71）分類介紹 2012 年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出版此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所收各篇章。

此外，鄭阿財〈臺灣敦煌學研究的發展歷程與展望〉（敦煌學 31，頁 101-144）一文由於作者長期致力於敦煌學研究，並搜集敦煌學論著編輯成《1908-1997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1998-2005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對臺灣敦煌學研究有長期之觀察，故撰此文說明臺灣敦煌學研究發展之制約與背景，並經計量分析呈現其成果與歷程，進而對研究主體「文學」類進行總體考察與反思，闡述當前研究之優勢與困境。

台灣地區：「第十一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台灣地區：「第十一屆唐代文化國際 學術研討會」綜述

林淑貞^{*}

壹、簡訊

2014年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假中國文化大學曉峰紀念館舉辦台灣地區第十一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次主辦單位為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中國唐代學會；協辦單位為科技部及國史館。與會學者包括台灣、大陸、日本、韓國、香港、法國等地之學者專家凡五十三人，二天議程分作A組（文學）、B組（史學及敦煌學）進行討論，各開展八場研討會。文學組討論的範圍，擘分三系：一、詩歌部份，包括評點、意象、詩風禪法、語彙、格律、組詩等議題；二、小說部份，包括肖像演變、形象顛覆等議題；三、散文部份，包括貶謫、邊塞等議題，另外，更有日本學者探討如何看待杜甫早期詩作，以及韓國學者分析韓中女詩人被遺棄感的差異性，甚至法國學者探析唐傳奇中「崔鶯鶯」形象之轉變等。二天議程討論熱烈，提供多元論學意義，大會特別安排會後參訪文化大學的博物館與圖書館。

*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專任教授兼系主任

貳、綜述

2014年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假中國文化大學曉峰紀念館舉辦第十一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次主辦單位為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中國唐代學會；台灣地區的唐代會議，分作：文學、歷史、敦煌三組，二天會議擊分為A B組進行討論，A組為文學組，B組為歷史與敦煌組，與會學者包括來自日本、韓國、法國、香港、大陸及台灣等地，凡五十三人。本次承辦單位為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故而主題演講安排史學，由高明士主持，王壽南教授主講〈談歷史人物的評價：從武則天談起〉內容精采，論點精闢。

二天議程文學組共發表十六篇論文，**第一場**由王基倫主持，武漢大學王兆鵬教授發表〈20世紀下半葉台灣唐代文學研究果量的變化與作者隊伍的構成〉。王輝斌教授發表〈唐人樂府題解與吳兢《樂府古題要解》〉由王兆鵬講評。**第二場**由王俊彥主持，林雪鈴發表〈邊塞的邊塞文學：唐代敦煌在地作品中的場域記憶及其特徵〉，周西波講評。藍基發表〈一個女人肖像的演變：從元稹鶯鶯到金聖嘆的鶯鶯〉，高桂惠講評。**第三場**由王輝斌主持，金鮮發表〈韓中女詩人被遺棄感（abandonment）之比較：以李梅窓與薛濤為例〉，王俊彥講評。李芳民發表〈韓愈懼為史官發覆：以〈答劉秀才論史書〉的釋說為中心〉，由王基倫講評。**第四場**由廖美玉主持，羅時進發表〈白居易在唐代詩歌中上的「第三極」意義〉，廖美玉講評。鍾曉峰發表〈自我的隱退：論孟郊的組詩〉，李宜學講評。

台灣地區：「第十一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第二天議程開展四場，**第五場**由蕭麗華主持，侯雅文發表〈元明時期載錄劉辰翁評點王維詩考論〉，徐國能講評。張蜀蕙發表〈唐代南貶文人的水域書寫〉，侯雅文講評。**第六場**由川合康一主持，蕭麗華發表〈唐詩中的維摩詰意象〉，劉衛林講評；佐藤浩一發表〈是散佚還是廢棄：日本研究者如何看待杜甫早期詩〉，川合康三講評。**第七場**由林淑貞主持，林淑貞發表〈「織女」形象的顛覆與悖異：論唐小說〈郭翰〉對神話傳說之沿承與新創〉，嚴紀華講評；嚴紀華發表〈一旦新妝拋舊樣：論〈時世妝〉的語彙指向與時代意義〉，林淑貞講評。**第八場**由蔡瑜主持，劉衛林發表〈唐代清麗詩風與六朝隋唐禪法〉，由蕭麗華講評；吳靜宜發表〈佛教音律思維與唐代格律詩的關係〉，蔡瑜講評。

根據上述可知，二天文學組議程以武漢大學王兆鵬教授發表〈20 世紀下半葉台灣唐代文學研究果量的變化與作者隊伍的構成〉作為總論開端，該文以計量的角度，統計並分析 20 世紀下半葉台灣唐代文學研究成果量化升降變化，以分析不同年度、不同時段的研究成果漲落、研究熱點的遞移現象，進而分析作者隊伍之興替等等。其餘篇章依文類別之，成果最為集中，研究為最深入，可分作以下五類：

一、唐代詩歌研究

本次研討會文學組中，攸關唐詩領域的篇章數量不少，所論述的面向包羅萬象，除了聚焦於杜甫、白居易等各大詩人外，更注目於唐代佛學對唐詩的影響，以及唐人選詩、唐詩的傳播與接受等面向。

（一）詩家討論研究

關於詩家討論研究，有羅時進發表〈白居易在唐代詩歌中上的「第三極」意義〉，強調白居易不同於李白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詩界典型，以及杜甫沉鬱

頓挫，晚年留心聲律的詩學風範，反而開脫出平凡樸實的詩人胸懷與不突破道德底線下的最充分物質與精神享受。文中雖稍修正張在林「白居易是宋型文化第一個代表人物」的說法，但卻也贊同白居易乃是在李白杜甫後，善於容納兼有，思通雅俗，表現出其特殊生存智慧與文學姿態的「第三極」，並確立元和體在中唐以降，白派詩人的代表地位。

鍾曉峰發表〈自我的隱退：論孟郊的組詩〉，旨在表現孟郊一系列組詩描述的自然世界與社會世界，著實為探索自我晚年內心圖景的途徑之一。文中將其組詩分前後期，指出前期組詩呈現惡意自然與自我對立的世界，強調孟郊面對現實挫折的態度，然其挫折不僅表現在仕途不遇，更有古道於現實世界難以實行的焦慮。後期組詩則是詩人透過兩種身分，確認自我核心價值的體現。一以「詩人」身分表述「至親唯有詩，抱心死有歸」，二以面對「賢人」受困於現實世界，所發出的沉痛呼告。二者多含有死亡主題，然而，孟郊更以悲秋之懷，融涉二者身分，聚焦於悲老嘆逝，更凸顯出專屬於老人情懷的情感體驗與死亡恐懼，形成其獨一無二的隱退心態。

（二）唐代佛學影響

蕭麗華發表〈唐詩中的維摩詰意象〉，該文首先回到經論中，重新考察「維摩詰」的居士形象在佛教中的意義，並試著討論《維摩詰經》在「居士佛教」概念的形中，扮演的角色所構成之影響，並在文中歸納《全唐詩》收錄作品中，文人所用的《維摩詰經》意象，重新梳理唐代文人的「維摩詰形象」，以認識詩人所理解以及想像的維摩詰居士，借以窺視中國居士文化的豐富意涵。

劉衛林發表〈唐代清麗詩風與六朝隋唐禪法〉旨在說明唐人主清麗詩風的理念源出，並自詩學觀念上分析及追溯其成因，以闡明唐代清麗文風與六朝隋唐間禪法之密切關係。文中得出唐代清麗文風與詩論異於六朝，乃在於

其清麗之作往往針對詩僧與禪學相涉之歌創作而言，諸如皎然、靈澈、齊己等，更有劉禹錫、權德輿等文士，多追求刻意藉著空寂定慧禪心冥搜萬物，以納萬景於虛寂之心的取境之法以成詩。

吳靜宜發表〈佛教音律思維與唐代格律詩的關係〉旨在說明佛教音律對格律詩興起產生何種影響？文中闡明中國魏晉時期聲律與對偶觀念尚未建立，僅有對句，直至佛教傳入，佛經上記載駢文文字，巧妙轉化為對偶句子，成為詩歌對偶的雛型。然而詩歌律化需等到六祖慧能提出三十六對，原意希望信徒不離自性，卻因此形成對句與聯句的興盛。再者，詩格與詩法的形成，更是不離佛法，文中說明聲律作乃是對禪法的體悟，因此唐代詩僧開始大量創作詩歌，並鑽研詩歌創作法則，因而有詩格之作。

（三）唐人選詩

王輝斌發表〈唐人樂府題解與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旨在論述《藝文類聚》對樂府詩的輯錄與整理，影響題解類批評的樂府著作紛紛問世，例如有劉餗《樂府古題解》、吳兢《樂府古題要解》、郝昂《樂府古今題解》等書，這些題解樂府專書具有批評史價值，對劉次莊《古樂府序解》、郭茂倩《樂府詩集》之編纂，亦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四）唐詩傳播與接受

侯雅文發表〈元明時期載錄刻劉辰翁評點王維詩考論〉旨在說明現今可見劉辰翁評點王維詩較早版本為《須溪仙聲校本王右丞集》，乃元刊本，六卷本。然而，明人所編著、刊行的「唐詩選集」、《王右丞集》箋注、注說、彙評本之中，所收錄的劉辰翁評語，卻與元刊本的內容，頗見差異，從中可見劉辰翁詮釋、評論王維詩的觀點，在刊錄過程中，呈現的消長關係。

二、唐代散文研究

本次研討會中論及唐代散文篇章，雖然僅有一篇，然卻能知人論世的透過作者背景與處境，還原其創作當時的心境與意義。李芳民發表〈韓愈懼為史官發覆：以〈答劉秀才論史書〉的繹說為中心〉即是以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一封書信，表面雖呈現書信中作者畏為史官以及怠惰史職的議論，遭致人們對於韓愈人格與道德的負面認識，然而，此文以對該書繹說為中心，結合韓愈當時的心境，以及為官理念，甚至當代著史現實環境的衝突，任職史館其間的實際作為等等，對韓愈作該書的特殊心跡作了系列探索，揭櫫文章背後韓愈所欲表達的濃鬱牢騷，以及情緒化的心理。並在文末肯定〈答劉秀才論史書〉乃是彰顯文人真實心跡與個性等可貴的價值性。

三、唐代小說研究

本次研討會攸關唐代小說的篇章亦僅有一篇。

林淑貞發表〈「織女」形象的顛覆與悖異：論唐小說〈郭翰〉對神話傳說之沿承與新創〉，以織女為研究對象，旨在論述唐人張薦《靈怪集·郭翰》一文對唐前織女神話傳說中所衍發互文性的情形，以見其顛覆傳統、新創織女形象的意圖。首先揭示唐前攸關織女神話傳說與敘寫範式。其二以董永故事為主，織女下凡助孝子董永償債，此二型奠立織女故事的基模。次論，〈郭翰〉對織女形象之延異現象，揭示先秦迄唐代，攸關織女神話傳說仍然流傳在民間，然而〈張翰〉故事雖以織女為主，形象卻悖異前說，不僅主動下凡追求人間情愛，且屢屢下凡展現對情之耽溺，主題迥異流傳中的故事基型。結論，分從主題、表述手法論述〈張翰〉所要表述的意圖，最後揭示織女形象悖逆之新創意義。

四、唐代文化研究

台灣地區：「第十一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本次研討會關於唐代文化討論上有三篇，且討論面向各自迥異，有以白居易〈時世妝〉探論唐代妝容者，亦有討論關於敦煌作品之在地與邊塞性者，更有專論唐代南貶詩人所建構出的水域書寫。嚴紀華發表〈一旦新妝拋舊樣：論〈時世妝〉的語彙指向與時代意義〉，說明唐詩為當代生活軌跡與所生存的環境留下針實記錄，而以白居易〈時世妝〉為基準，參照婦容圖影以及清編御訂《全唐詩》相關的時世妝容詩，分由其語彙指向探討唐代安史之亂後，唐詩體制發展的轉變。復由其妝容詩語中所描繪的婦女造形，所反映的審美風潮，及滲透於作品中時世的感嘆、歷史的借鑑，考察〈時世妝〉作為華風胡化交融疊錯的載體、珍貴社會文化史料的記錄。更多元的分析其夾帶肆放的時代精神、透射出變異的美學風格，如何具體而微的見證其所置身的社會與時代。

林雪鈴發表〈邊塞的邊塞文學：唐代敦煌在地作品中的場域記憶及其特徵〉，該文以「在地場域記憶」、「邊塞的邊塞文學」二個視角探討敦煌地方文學的在地特質，此一特質與作者曾經造訪邊塞或未曾踏足邊塞，以及在地時間久暫呈現在地性／在地化之間的差異。企圖突顯出在邊塞與中原的交流互動中，一方面邊塞地區的景觀特色，透過中原人士強烈的感受衝擊，被鮮明的凸顯出來；另一方面邊塞地區的地理特徵，也因為被定位為邊塞、被寄託以國家命運與個人理想而得以鮮明的存在。這些作品由於以中原為核心，自然也產生作品內容與邊塞地區之間的「在地性」與「在地化」落差。此一落差即是敦煌文獻中敦煌在地文學作品獨特而珍貴的原因。

張蜀蕙發表〈唐代南貶文人的水域書寫〉旨在說明唐代文人貶謫南方，筆下的風土民情、山嶺川澤，甚至南方水域的書寫，在舟行既有的身體感與視野變化下，「進入」文化異域，透過江河，空間轉換之際，對於南方水域的描寫，取擇為何？文中可知以屈賈自沈與馬援征南的水域書寫圖示進行開

展。然而文人的書寫場域由河洛、汾水一帶轉自南方水域，當文人身心俱疲時，又開如何開展其感知與書寫，正是該文的核心概念。

五、域外學者論唐代

本次國際研討會文學組有三位域外學者，分別來自日本、韓國、法國等，亦針對唐代研究進行深刻討論，其面向亦各自有別，諸如有以韓中女詩人為討論核心，企圖比較二者所產生被遺棄感的差異性者。亦有以日本學者角度觀看杜甫早年詩作屬於散佚或廢棄者。更有法國學者從傳奇、鼓子詞、諸宮調到金聖嘆點評之中，交叉比對建構出「鶯鶯形像」的演變性者。

韓國學者金鮮發表〈韓中女詩人被遺棄感（abandonment）之比較：以李梅窓與薛濤為例〉，旨在從「遺棄感」入手，討論韓國李梅窓及中國唐代薛濤二位女詩人遺棄感的形成背景、內心深處的反映，以了解她們真情實感。二者差異在於：李梅窓因對與人離別有強烈的不安感，因此每與知己離別時多感受悲傷，且因身分遭受歧視與誤解，而備受煎熬，疾病委屈的情感接連折磨，於是極度想將自身與外界隔離；薛濤則是為了掩飾自己的羞恥感，拼盡全力獲得他人的認可與寵愛。不斷為著討好他人而努力，卻因為說錯話或冒犯主人而使得鋪墊許久的信任與關心付之一炬，對於自身的坎坷處境深感嘆息，更對因瑣碎事件遭受拋棄的現實進行諷刺，傾訴她委屈的心境。

日本學者佐藤浩一發表〈是散佚還是廢棄：日本研究者如何看待杜甫早期詩〉，旨在表述杜甫早期的詩歌究竟是散佚抑是廢棄了呢？主張廢棄是因為杜甫三十歲遇到李白，與之生活一年半，體會詩歌應該開拓自己的風格與領域，故而轉向書寫社會詩；三十歲之前的作品則廢棄了；第二種說法是，散佚，大曆中晁有〈杜工部小集〉共六十卷，內容包括部份 30 歲前的作品。

法國學者藍基發表〈一個女人肖像的演變：從元稹鶯鶯到金聖嘆的鶯鶯〉，旨在演繹崔鶯鶯形象，從傳奇、鼓子詞、諸宮調到金聖嘆點評之中得

台灣地區：「第十一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出，金聖嘆眼中的崔鶯鶯與元稹差異性不大，無論是妖物、神仙或觀音等，男人筆下做為女性精髓本身的崔鶯鶯，似乎將對方引入異域一般。可知，崔鶯鶯此角色乃是一個富有魅力又顯得陌生的雙重「他者」形象。

在 2014 年 6 月 27 日下午進行閉幕式，本次研討會議程安排緊湊，以上豐富多元的論題，示現了唐代研究成果之蓬勃與豐碩。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七屆年會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紀要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七屆年會暨 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紀要

李堯涓^{*}

一、前言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在目前中國文學相關學會中，無論是規模或發展，均有極好的運作與評價。二年舉行一次的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聚集世界各地唐代研究之專家學者，相互交流切磋。2014年10月11日至14日，由中國唐代文學學會，蘇州大學文學院以及蘇州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聯合主辦，西北大學文學院和蘇州大學敬文書院協辦的「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七屆年會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在蘇州大學隆重召開。據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陳尚君教授估計，存世之唐詩作品，創作於蘇州者超過二千首，僅次於長安與洛陽，可見蘇州是唐代文學發展的重鎮之一。此次會議有來自臺灣與中國大陸、香港、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百餘位專家學者匯集、參與及發表論文，可謂盛況。

二、會議綜述

* 逢甲大學國語文中心兼任講師，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本次「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七屆年會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舉辦，規模尤其盛大，主要分成三個部分：圓桌論壇、分組學術交流、大會交流。會議首日安排「圓桌論壇」，分別就「唐代文學研究的現狀與前景」與「唐代文學研究的成果與發展路徑」之主題進行多方討論，並對近五年逝世的唐代文學研究者追思發言。隨後，三天的專場學術交流，主辦單位將與會的一百六十多位學者，分成五大組別進行交流。會議最後一天，首先安排「專題交流」，由日本岡山大學下定雅弘教授以及武漢大學文學院王兆鵬教授二位，分別就〈試論白居易《琵琶引》——其作年與使之成立的四個文學系統〉與〈20世紀國內唐代文學研究歷程的量化考察〉二題，展示其研究成果，接著由各組被指派代表匯報分組學術交流之熱烈討論與精彩過程。

（一）圓桌論壇

本次主辦單位特別於第一天上午安排二場「圓桌論壇」，第一場由北京大學葛曉音教授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劉躍進教授、上海大學董乃斌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蔣寅教授與上海古籍出版社高克勤先生等四人，以宏觀的角度，從教學、研究與出版等領域勾勒出唐代文學研究的現狀與前景。第二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趙昌平先生與逢甲大學廖美玉教授共同主持，演講者為南京大學莫礪鋒教授、淡江大學呂正惠教授、釜山大學金世煥教授與香港嶺南大學劉燕萍教授等人，專家一致指出當前研究成果難免有粗疏之弊，期許未來之研究，應更加重視文字功夫，且以「見樹亦見林」勉勵後進學者展現研究議題的深廣度。會議在諸位專家學者深入淺出，進行客觀分析與主觀分享下，正式揭開序幕。

（二）分場交流

會前的邀稿函中，主辦單位設定的會議主題有：一、地域文化與唐代文學關係研究；二、家族文化與唐代文學關係研究；三、唐代江南文學家及其創作研究；四、唐代文學海外傳播、影響研究；五、唐代應用文體研究；六、唐代文學新見史料研究；七、近代唐文學史家研究；八、唐代文學研究重大問題再討論。以實際發表篇章觀察，多數論文圍繞著唐代文學中的重大問題，再次進行深入的討論。其次，在地域文化與唐代文學關係的研究成果也頗為豐碩，包含西域地區、北疆地區、內蒙古地區以及會議所在地——江蘇地區等。再者，由於國外與會學者眾多，有關唐代文學在日本與韓國二地，

傳播與影響之研究，英語學界對於唐代文學翻譯情況研究等，足見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成員組成之多樣與規模。

會議的分場交流時間，大會於各組指定五位召集人，協助訂定規則與調配發表與評論時間。以下列舉各組別召集人與發表論文：

1、第一小組：上海大學董乃斌教授、逢甲大學廖美玉教授、韓國外國語大學柳晟俊教授、岡山大學下定雅弘教授、中興大學林淑貞教授為指定組別召集人。發表論文有（1）張中字（重慶師範大學）〈「天臺」與李唐的關係及浙東唐詩之路成因探略〉（2）柏紅秀（揚州大學）〈樂人身分與〈江南逢李龜年〉作者之爭〉（3）白金（河南大學）〈明清時期《王建詩集》刊本考〉（4）長谷川 真史（日本九州大學）〈元稹〈連昌宮詞〉創作年代考〉（5）陳冠明（魯東大學）〈論王維的「畫意詩」與「詩情畫」〉（6）趙陽陽（西北大學）〈《顏魯公文集》宋本原貌蠱測〉（7）韓震軍（安徽師範大學）〈《藏園群書經眼錄·詩紀》辨誤〉（8）侯雅文（臺灣大學）〈劉辰翁校評王維詩輯佚考論〉（9）李定廣（上海師範大學）〈杜甫、元淳、張泌生平考實〉（10）盧盛江（南開大學）〈《文筆眼心抄》非偽書辨〉（11）林淑貞（中興大學）〈唐小說對六朝之延異與互文——以〈郭翰〉與〈白水素女〉、〈董永〉為論〉（12）董就雄（香港珠海學院）〈清代後期王維接受史述論——以詩話為中心〉（13）廖美玉（逢甲大學）〈唐代〈月令〉組詩的物候感知與地志書寫〉（14）盧燕新（南開大學）〈《會稽掇英總集》之〈送賀監〉的編撰及其文化意義〉（15）下定雅弘（岡山大學）〈試論白居易〈琵琶引〉——其作年與使之成立的四個文學系統〉（16）羅寧（西南交通大學）〈《開元天寶遺事》是偽典小說〉（17）元娟麗（咸陽師範學院）〈《舊唐書·經籍志》樂府文獻探析〉（18）王永波（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李白詩在明代的編刻與流傳〉（19）彭燕（《杜甫研究學刊》編輯部）〈宋代巴蜀地區石刻杜詩〉（20）柳晟俊（韓國外國語大學）〈《全唐詩》與《全唐詩補編》所載渤海人詩考〉（21）陳建森（華南師範大學）〈從杜牧的重塑看元明清戲曲的審美取向〉（22）李宜學（中央大學）〈論清末清初李商隱詩接受中「比興說詩」視野的形成〉（23）張丹陽（浙江大學）〈教坊曲〈文潞子〉考〉（24）張巍（華南師範大學）〈《賦譜》釋要〉（25）趙榮蔚（鹽城師範學院）〈《續修四庫全書》韓集注本四種提要〉（26）周相錄（河南師範大學）〈從創作的角度看清代至民初文人對元稹詩歌的接受〉

(27) 鄧芳(日本東京大學)〈日本詩話中的唐詩論〉(28) 周睿(西南大學)〈隋唐五代讖文學的生成與傳播機制考論〉(29) 竺岳兵(蘇州大學)〈夢游天姥吟留別詩旨新解〉(30) 劉潔(日本九州大學)〈王維詩初漸扶桑考〉,計30篇。

2、第二小組:中國社會科學院劉躍進教授、南京大學莫礪鋒教授、淡江大學呂正惠教授、北京大學錢志熙教授、北京大學朱玉麒教授為指定組別召集人。(1) 莫道才(廣西師範大學)〈從任華〈寄杜拾遺〉看被忽略的杜甫輕狂性格〉(2) 顧國華(鹽城師範學院)〈論宗臣的李杜崇拜及其文化意蘊〉(3) 薛雅文(明道大學)〈近十年臺灣國家圖書館館藏唐代小說研究的回顧〉(4) 羅燕萍(四川外國語大學)〈《花間詞》中閨怨詞典型模式探討——流淌於幽閉空間、紙上園林的單緒幽情〉(5) 王樹森(安徽省社會科學院)〈論敦煌唐五代詩歌文獻的民族史意義〉(6) 莫礪鋒(南京大學)〈中唐詩壇上的韓朝柳江〉(7) 谷曙光(中國人民大學)〈論露布文體的唐宋流變及其文學價值〉(8) 錢志熙(北京大學)〈論隋唐之際詩學中雅正與浮艷的對立——兼論兩種體制合作觀念的各自流變〉(9) 曲景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謏論唐代開國「大手筆」作家〉(10) 景遐東(湖北師範學院)〈新出土閻仲連、蕭守規墓誌與唐代蕭氏及其他江南家族姻親研究〉(11) 尚永亮(武漢大學)〈「元白」並稱的特點及其符號意義〉(12) 沈文凡(吉林大學)〈唐代渤、日通聘贈答詩初探〉(13) 史哲文(蘇州大學)〈論《昭昧詹言》的唐代審美理論體系〉(14) 呂正惠(淡江大學)〈香草美人傳統的新變:論李商隱詩、溫庭筠詞中閨怨作品的意義〉(15) 孫植(南京師範大學)〈西域風情與岑參詩歌獨特的詩美風貌〉(16) 田苗(西北大學)〈冬日的詩思——試論王夢韋柳詩歌中的冬景書寫〉(17) 王輝斌(湖北文理學院)〈胡震亨的「唐代樂府論」〉(18) 吳光興(中國社會科學院)〈論唐人「文章即詩歌」的文學觀念〉(19) 吳河清(河南大學)〈論唐代賦得體詩的創作特徵及其流變〉(20) 吳夏平(貴州師範大學)〈試論中唐「六經皆文」觀念的生成〉(21) 吳相洲(首都師範大學)〈上官婉兒主持詩壇的意義〉(22) 吳振華(安徽師範大學)〈論韓愈的樂府觀念及其〈琴操〉的創作〉(23) 路海洋(蘇州科技學院)〈論錢基博的韓愈古文研究〉(24) 楊旭輝(蘇州大學)〈由會心到胎骨——試論王嗣奭的《杜臆》及其詩歌〉(25) 袁曉薇(合肥師範學院)〈右丞餘波:大曆詩人接武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七屆年會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紀要

王維的效果及其影響〉(26) 查正賢(台中科技大學)〈論唐詩創作中的「冥搜」概念與「冥搜得境」的命題〉(27) 張清華(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殷璠《河岳英靈集》及其詩學思想〉(28) 張震英(廣西民族大學)〈論古典詩歌流派的類型與姚賈詩派的歸屬〉(29) 朱棟(鹽城師範學院)〈唐代試律詩正文用典修辭效果考察〉(30) 朱玉麒(北京大學)〈宋刻張說集殘抄本流傳考〉(31) 周誠明(逢甲大學)〈唐文宗以「齊梁體格」試士之探討〉, 計 31 篇。

3、第三小組：武漢大學王兆鵬教授、東吳大學許清雲教授、臺灣師範大學王基倫教授、臺灣大學康韻梅教授、安慶師範學院方賜球教授為指定組別召集人。(1) 曹瑞娟(浙江工商大學)〈從白居易蘇杭詩看文學與地域的互動〉(2) 戴偉華(華南師範大學)〈〈使至塞上〉與崔希逸破吐蕃事無關〉(3) 方錫球(安慶師範學院)〈城鎮化和平民化——唐詩學「詩變論」形成的社會條件〉(4) 高人雄(西北民族大學)〈唐代〈伊州樂〉與詩詞〉(5) 許清雲(東吳大學)〈《文鏡秘府論》兩則唐詩調聲數據的價值〉(6) 郭院林(揚州大學)〈唐代文學中的西域歌舞藝術〉(7) 洪樹華(山東大學)〈唐代杜甫家族的詩歌情節及杜甫詩風的演化〉(8) 王基倫(臺灣師範大學)〈唐人文體觀念之辨析〉(9) 米彥青(內蒙古大學)〈唐代詩人出塞北詩述論〉(10) 何湘(湖南科技大學)〈唐末羅隱詩歌的接受和形象建構〉(11) 胡可先(浙江大學)〈新出石刻史料與唐代盧氏文學家族考論〉(12) 冷衛國(中國海洋大學)〈文本細讀與中國古典詩的闡釋問題——以白居易、李商隱的兩首詩歌為例〉(13) 李德輝(湖南科技大學)〈唐代五都交通圈及其文學效應〉(14) 李謨潤(廣西民族大學)〈唐詩涉蘇地佛寺略考〉(15) 李桃(中國社會科學院)〈從蕭李集團到韓門弟子——中唐文學流派的開始〉(16) 長谷部剛(日本關西大學)〈日本詩歌集錦《和漢朗詠集》與初唐詩流傳情況〉(17) 熊飛(廣東韶關學院)〈宋版張九齡《曲江集》流傳考〉(18) 李招紅(唐詩之路研究院)〈李白一生情系剡中〉(19) 梁爾濤(鄭州大學)〈論唐代姻婭詩群及其文學意義〉(20) 康韻梅(臺灣大學)〈《剪燈新話》與《剪燈於話》對唐代小說的模擬〉(21) 孫虎(蘇州科技學院)〈陳訐與陳氏家族杜詩學研究〉(22) 田恩銘(吉林大學)〈地域、土族與初唐文學格局建構中的文學圖譜重繪〉(23) 童岳敏(安慶師範學院)〈唐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維度——以私學為背景的文化

考察〉(24) 滕漢洋(鹽城師範學院)〈運河環境、寄戶身分與白居易符離修業生活考論〉(25) 王志清(南通大學)〈吳風日漸與唐詩轉型〉(26) 陶小路(上海大學)〈英語學界對唐傳奇的翻譯與研究〉(27) 吳淑玲(河北大學)〈唐代杜氏家族文化與杜氏文學家的誕生〉(28) 邢蕊杰(紹興文理學院)〈唐大曆浙東唱和與江南雅集文學復興〉(29) 俞曉軍(唐詩之路研究院)〈關於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教材改革的思考〉(30) 袁茹(安徽師範大學)〈由魯迅擬作〈楊貴妃〉事論〈長恨歌〉之形象重塑〉(31) 張海(四川師範大學)〈簡論韓國古代文人對杜詩「詩史」特徵的接受〉, 計 31 篇。

4、第四小組：北京大學葛曉音教授、臺灣大學何寄澎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蔣寅教授、韓國釜慶大學金昌慶教授、北京大學杜曉勤教授為指定組別召集人。(1) 陳尚君(復旦大學)〈李杜齊名之形成〉(2) 陳煒舜(香港中文大學)〈斟酌得解, 折中而舉——李炳南《詩階述唐·讀詩先讀求味》初探〉(3) 程蘇東(北京大學)〈從《毛詩正義》的「刪定」論其在唐代詩學研究中的定位〉(4) 崔際銀(天津財經大學)〈柳宗元「用世之文」試釋〉(5) 杜曉勤(北京大學)〈五言詩律化過程及唐詩體格律研究的歷史回顧和學術思考〉(6) 房銳(四川師範大學)〈清末民初日本人巴蜀游記中成都杜甫草堂〉(7) 高建新(內蒙古大學)〈李益邊塞詩及其對唐代中國北疆的書寫〉(8) 郭海文(陝西師範大學)〈唐五代女性詩歌綜論〉(9) 何寄澎(臺灣大學)〈韓愈古文的古典意義與現代意義〉(10) 戶崎哲彥(日本島根大學)〈日本鈔本紹定六年臨江軍刊王伯大《昌黎先生集音譯》與方崧卿佚書《韓詩編年箋校》〉(11) 劉明華(重慶國學院)〈「杜甫卷」整理與研究進展報告〉(12) 蔣寅(中國社會科學院)〈方氏詩論與桐城詩學的中唐詩取向〉(13) 金昌慶(韓國釜慶大學)〈晚唐詠史詩的興盛：以史官觀念的轉變為中心〉(14) 鞠岩(中國海洋大學)〈元、白制誥文改革的理論與進程〉(15) 李瀚(上海大學)〈士全隕蝕與唐代文學之啟幕——王通在唐初的湮沒為例〉(16) 李金坤(江蘇大學)〈孔穎達「比興」之釋義與唐詩比興生態世界審美〉(17) 李飛鵬(北京大學)〈唐代小說繁榮的原因新探〉(18) 李堯涓(逢甲大學)〈記憶年少——中唐寒士社群的勵志之路〉(19) 李正春(蘇州科技學院)〈論唐代景觀組詩對宋代「八景詩」體式定型化的影響〉(20) 郭麗(首都師範大學)〈論古樂府的經典化

過程〉(21) 李欣錫(清華大學)〈論「前為山谷後錢盧」在杜詩學上的意義〉(22) 林錦婷(逢甲大學)〈韓愈「餘事作詩人」之意探究〉(23) 李振中(商丘師範學院)〈徐鉉詩風辨〉(24) 曾智安(河北師範大學)〈氣候變遷與聖堂詩歌楷式的提出〉(25) 劉京臣(中國社會科學院)〈論宋人對杜牧詩歌的「崇高」消解〉(26) 朱易安(上海師範大學)〈略論竹枝詞的詩學傳統〉(27) 蕭曉陽(中南民族大學)〈晚唐小品文體之新變〉(28) 劉潔(西北民族大學)〈試論唐代夜泊詩的情感特徵及其表現〉(29) 鄭滋斌(香港城市大學)〈李商隱〈柳枝五首〉及其〈序〉文研究〉(30) 劉青海(上海師範大學)〈論中晚唐綺艷風尚中杜牧冶遊七絕之獨創性——兼論杜牧思想風度與東晉風流的關係〉,計 30 篇。

5、第五小組：上海古籍出版社趙昌平先生、釜山大學金世煥教授、香港嶺南大學劉燕萍教授、安徽師範大學丁放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劉寧教授為指定組別召集人。(1) 畢寶魁(遼寧大學)〈王維與李白關係臆說〉(2) 蔡阿聰(閩南師範大學)〈楚地文化性格與孟浩然詩風之關係〉(3) 劉寧(中國社會科學院)〈韓愈狠重文風的形成與袁和時期的文武關係〉(4) 陳才智(中國社會科學院)〈王漁洋之於白香山——取捨避就之道〉(5) 丁放(安徽師範大學)〈元代唐詩學的幾個問題〉(6) 崔小敬(浙江師範大學)〈唐代神僧萬回及其文學因緣〉(7) 張蜀蕙(東華大學)〈唐人舟行詩研究〉(8) 黃曉丹(江南大學)〈「力」「誠」「生」——顧隨唐詩批評中的三個概念及其邏輯關係〉(9) 陳珀如(新加坡新躍大學)〈唐代詩歌與佛教七寶〉(10) 葛景春(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李杜文化精神對當代的啟示〉(11) 阮堂明(蘇州科技學院)〈現代文化運動語境中的李白論——對李白現代接受史的一種考察〉(12) 凌郁之(蘇州科技學院)〈關於張旭詩歌辨偽的一點思考〉(13) 羅時進(蘇州大學)〈「花樹韋家宗會法」與唐代韋氏家族文學主題〉(14) 金世煥(韓國釜山大學)〈談九華山金地藏的傳說及其文學性〉(15) 李芳民(西北大學)〈長安佛寺及其文學記憶〉(16) 劉航(首都師範大學)〈妝飾——金荃詞的體態語言〉(17) 劉燕萍(嶺南大學)〈螺神、任務婚與難題——論(唐)《原化記·吳堪》〉(18) 曹麗芳(浙江工商大學)〈宋代詩詞中「三生杜牧」意象解讀〉(19) 黃奕珍(臺灣大學)〈以〈偶題〉一詩為例論杜甫晚年的文學思想〉(20) 王聚應(天水師範學院)〈唐人豪俠小說與佛道〉(21) 王頌梅(高雄師範大學)

〈唐代儒家應用美學——以建築、樂舞、律詩為例〉(22)楊曉靄(蘭州理工大學)〈「絲綢之路」與唐詩境界的開拓〉(23)方麗萍(青海師範大學)〈淺論《柳文指要》的成就及文化品格〉(24)胡旭(廈門大學)〈唐景龍修文館學士考辨及文學評價〉(25)邱曉(西北大學)〈試論杜甫詩歌「大水」意象的神話色彩和原型意味〉(26)查屏球(復旦大學)〈韓愈寓居宣城修業考論〉(27)趙紅衛(濰坊學院)〈唐詠牡丹詩的文化精神與人生意趣〉(28)蔡自新、翟滿桂(湖南科技學院)〈柳宗元與湘學論略〉,計28篇。

大會特意將各種研究主題分散,輔以多位經驗豐富的小組召集人,使得各組討論議題同時具備廣度與深度。就各組代表匯報之交流過程與結果,可知各發表人均盡情地對論題闡明作意,評論人也針對議題中之疑義提出意見,充分展現會議的意義與目的。

(三) 專題交流

會議最後一天,主辦單位安排岡山大學下定雅弘教授與武漢大學王兆鵬教授二人於大會上報告。首先,下定雅弘教授以〈試論白居易〈琵琶引〉——其作年與使之成立的四個文學系統〉一題發表,將流傳版本所云「元和十年,余左遷九江郡司馬」與日本舊鈔本「元和十五年秋,於左遷九江郡司馬」相互對照,推論〈琵琶引〉是白居易從忠州回到長安後,長慶初年所作的虛構作品。並且,下定雅弘大膽提出〈琵琶引〉最終能夠成立的四個文學要素:虛構文學、琵琶文學、閨怨文學、貶謫文學。在傳統白居易〈琵琶引〉的眾多研究中,其提供了不同以往的關注面,讓人不禁感佩日本學者學問研究的細緻度。此外,下定雅弘展示的《白居易研究年報》第十三號,是以「琵琶行——天涯淪落の歌」為主題,收錄超過二十篇有關〈琵琶行〉研究論文的特集,引起本次與會學者的熱烈討論。

接著,由武漢大學王兆鵬教授以計量學術史的角度,發表〈20世紀國內唐代文學研究歷程的量化考察〉之研究成果。歷時多年,王兆鵬以中國大陸地區20世紀的唐代文學研究成果量觀察,發現有四個高峰年,四個低谷段,六個轉折年。結合社會情況觀察後,提出內部學術機制,學術平台的推動,甚至是政治局勢,都是影響學術研究相當重要的因素。進一步,王兆鵬將一百年來的唐代文學研究分成奠基、定型、轉型、停滯與發展,共五個階段,並指出第五階段是唐代文學研究的快速發展期。究其原因,唐代文學研

究能迎來黃金時期的主因有二：其一，老中青三代各自扮演引領者、主導者與成長者角色，同顯身手，爆發學術激情。其二，學會組織應運而生，研究以團隊的方式展開，有助於相互激活思維，開拓研究領域，促成研究成果產生。最後，王兆鵬也提出警訊：在計量分析過程中，其觀察到三重三輕（重詩歌研究、重盛中唐文學、重個體作家研究，輕散文研究、輕初晚唐文學、輕宏觀研究）的研究情況，並與與會學者共同討論研究分布失衡之隱憂。

三、結語

唐代文學於漢學研究中，始終是不容忽視的一環。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固定召開的唐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便是提供唐代文學研究者發表議題且相互交流的重要存在。承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陳尚君教授所言，此次會議乃是人氣最旺的一屆年會，除兩岸三地學者外，包括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各國唐代文學研究專家。會期中，來自各國研究學者，抑或接受不同領域訓練之研究學者熱烈地交換意見，由許多重要的研究議題，包括研究文本、研究方法與新視域開拓的討論，可以期許未來唐代文學研究朝向更加多元且豐富的面向。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七屆年會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各專題組代表
大會交流第一組報告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七屆年會暨唐 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各專題組代表 大會交流第一組報告

侯雅文^{*}

尊敬的主持人盧盛江教授，各位專家學者上午好：

承蒙本組召集人及各位專家學者的信任，由我來彙報本組(第一組)的研究成果及交流的情況。本人感到十分榮幸。本組就研究的方向而言，既有文獻考證的路線，亦有觀點詮釋的路線，既有唐代本位的研究進路，也有走出唐代本位之外，轉向歷史脈絡考察的進路。總體研究成果時而呼應大會所訂立的「家族文學與地域文化」主題。以下析分四個專題，各專題所屬篇目次序，悉依大會分組名單人名排列，向各位專家學者進行成果彙報：

專題一、對唐代詩話、詩文別集、總集等文獻的版本、刊刻、載錄，給予考辨：如南開大學盧盛江教授〈《文筆眼心抄》非偽書辨〉，提出《文鏡祕府論》和《文筆眼心抄》兩書，於編撰體例、思想上具有相似度，兩書有著共同的原典材料，由此推論兩書作者皆為空海，其書無法偽造，並對質疑的觀點做出反駁。西北大學趙陽陽教授〈《顏魯公文集》宋本原貌蠡測〉，對《顏魯公文集》的北宋本二種，與南宋本產出的先後，及資料增補的過程

* 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進行詳細考察，並對嚴可均的論見提出省思。安徽師範大學韓震軍教授〈《藏園群書經眼錄·詩紀》辨誤〉，在前人糾謬的基礎上，檢閱相關傳世文獻，對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集部所錄《詩紀》一書，究屬明代馮惟訥所編《詩紀》的殘卷，或是明代黃德水、吳琯的《唐詩紀》殘卷，給予考辨訂誤。南開大學盧燕新教授〈《會稽掇英總集》之《送賀監》的編撰考釋及其文化意義〉，就《會稽掇英總集》卷二所錄《送賀監》的詩歌主體，在於唐玄宗等人的送別詩，以及該選於再編輯的過程中，另外收入非屬送別詩者，一一做出考辨，從「兼具送別集、地域詩歌選本、斷代詩歌選本」三方面，闡釋《送賀監》的文化意義。咸陽師範學院亓娟莉教授〈《舊唐書·經籍志》樂府文獻探析〉，指出《舊唐書》著錄的樂府文獻之中，屬於唐人樂府的論著主要是初唐文獻。然而這類文獻或因詞多不經、詞多鄭衛，不得歸入經部樂類，所以被著錄於集部總集類。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王永波教授〈李白詩在明代的編刻與流傳〉，闡釋明代編纂、評注、刊刻李白集的盛況，與明代社會政治、經濟條件、士人心態、復古詩學的尊唐思潮之間的密切關係。《杜甫研究學刊》編輯部彭燕教授〈宋代巴蜀地區石刻杜詩〉，將宋代巴蜀地區的石刻杜詩分為杜甫手迹和他人手書兩類，並對它們的內容，給予評述，藉此地上、地下的杜詩文獻，為杜詩學的研究指出新方向。日本九州大學劉潔博士〈王維詩初漸扶桑考〉，結合中日兩國古文獻，對王維詩作在日本的存在形態，以及王維作品集初渡扶桑等問題展開論證。

專題二、對唐代特定名篇、箋注本的作者、撰著年代、主旨、地域文化、時代背景，給予深度的考辨與詮釋：如臺灣逢甲大學廖美玉教授〈唐代《月令》組詩的物候感知與地誌書寫〉，深刻闡釋唐代月令組詩如何透過江南節令、物候的地誌書寫，體現著重人地關係的地誌書寫特性，映現出特定地理區域的自然物候、日常生活及社會文化，因此可以在傳統地理志、風俗志、方志之外，為區域地誌的書寫提供更為豐富的觀察面向，與大會主題呼應密切。韓國外國語大學柳晟俊教授〈《全唐詩》與《全唐詩補編》所載渤海人詩考〉，由《全唐詩》及其《補編》之中，收集出自韓國古代國家渤海國的唐代詩人詩作，詳細考辨他們的籍貫，並詮釋其作品內容。日本岡山大學下定雅弘教授〈試論白居易〈琵琶引〉一其作年與使之成立的四個文學系統〉，推論〈琵琶引〉是白居易於長慶初年，剛從忠州回到長安不久所寫的虛構作品，不是以往學界所認定元和十一年白氏在貶地江州所作。此一推論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七屆年會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各專題組代表
大會交流第一組報告

奠基於四項文學傳統的佐證，分別是虛構文學、琵琶文學、閨怨文學、貶謫文學，此一論述將考證研究，從歷史實證導向兼顧文化傳統理解的新方向。日本東海大學佐藤浩一教授〈江南學術的精華《杜詩詳注》〉，由家族師友的傳承、寧波地區的文風與士風，闡明仇兆鰲《杜詩詳注》所以成書的原因，與大會主題呼應。日本九州大學長谷川真史教授〈元稹〈連昌宮詞〉創作年代考〉，將元稹〈連昌宮詞〉的撰成年代重新訂於元和十五年，並由作品的敘述觀點、預設讀者的分析為前題，對「六皇帝」一詞提出新解，由此詮釋元稹創作〈連昌宮詞〉的動機在於勸諫穆宗。上海師範大學李定廣教授〈杜甫、元淳、張泌生平考實〉，針對杜甫死後歸葬地、女道士詩人元淳的活動時期，與張泌即張曙等詩人行迹的補證、考辨，從而對相關作品編年的問題，提出解釋。日本東京大學鄧芳教授〈對〈靜夜思〉中日版本之差異的再討論〉，由日本版的〈靜夜思〉是「床前看月光」、「舉頭望山月」，和中國版本內容不同出發，說明導致此一現象出現的版本源由；並從「物哀」與「陰翳」的日本審美觀，詮釋何以日人較為肯認的是細小幽冷的山中彎月。揚州大學柏紅秀教授〈樂人身份與〈江南逢李龜年〉作者之爭〉，重新定位李龜年的身份是盛唐京城著名的市井樂人，並由此指出南宋胡仔質疑〈江南逢李龜年〉作者身份一事，係出於誤解而來的偽命題。浙江新昌唐詩之路研究院竺岳兵教授〈〈夢游天姥吟留別〉詩旨新解〉，指出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一詩中「天姥連天向天橫」的橫字才是詩眼，詩旨即是「掙脫樊籠，爭取自由」，據此對全詩意義進行重新理解與詮釋。

專題三、對唐代文學生成的因素或條件予以揭明：如重慶師範大學張中宇教授〈「天臺」與李唐的關係及浙東唐詩之路成因探略〉，有別於過去學界注重唐詩與終南山的研究方向，而另外關注唐代詩人對天臺山的鍾愛。以此為基礎，考察李唐的政治力量，天臺山的勝景，及當地道教等諸因素之間的關聯，對浙東唐詩的形成所發揮的促進作用。西南大學周睿教授〈隋唐五代讖文學的生成與傳播機制考論〉，針對隋唐五代的讖文學此一獨特的文類，分析它所以生成的語言特質是雙關與析字，並轉用傳播學的概念，建構讖文學所依倚的造讖、傳讖、解讖之傳播機制，從而撥去長久以來，貶斥讖文學為迷信與荒誕的偏見。

專題四、由讀者接受視野、互文理論的應用、偽典小說的理論觀念，闡釋唐代文學的新意義；或是對唐代文學理論著作所表述的觀念用詞，給予詳

析：如臺灣中興大學林淑貞教授〈唐小說對六朝志怪之延異與互文——以〈郭翰〉與〈白水素女〉、〈董永〉為論〉，借鑑西方的「互文」理論，詳析唐小說〈郭翰〉和六朝志怪的〈白水素女〉、〈董永〉諸文本，因處在互相影響、交叉、重迭和轉換的關係之中，故呈現互文性與延異性。在這項前提上，深入地揭明三篇小說故事所涉織女符號之多義和歧義的形成，及相反相成的小說敘寫模式。西南交通大學羅寧教授〈《開元天寶遺事》是偽典小說〉，先提出「偽典小說」的概念及類別做為依準，然後從文字風格、書籍體式的比對，推定《開元天寶遺事》約作於北宋中期，是與《雲仙散錄》、《清異錄》同類的偽典小說，因此該書的史料價值十分有限。魯東大學陳冠明教授〈論王維的「畫意詩」與「詩情畫」〉，由實地考察王維的繪畫及詩歌，來闡釋、印證蘇軾從「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觀點，接受王維詩的意義及價值。香港珠海學院董就雄教授〈清代後期王維接受史述論——以詩話為中心〉，選擇過去學界研究王維詩時，較少關注的清代後期三部具代表性的詩話《養一齋詩話》、《昭味詹言》、《筱園詩話》，詳析他們評說王維詩之觀點的同與異，從而呈現晚清接受王維詩的主流與歧向。華南師範大學陳建森教授〈從杜牧的重塑看元明清戲曲的審美取向〉，在論文的自我反思上，另外提出以元明清戲曲的歷史脈絡為參照，藉此呈現杜牧形象之重塑與轉變的論述角度；並認為應由劇場舞臺的場域，所造就的演員與觀眾的互動關係，對杜牧形象所以重塑的原因，給予詮釋。臺灣中央大學李宜學教授〈論明末清初李商隱詩接受中「比興說詩」視野的形成〉，文中一方面指出來自文字獄、蘇州文苑的家族師承傳統等外緣因素，另一方面指明來自於對宋明以來重賦輕比興，因而不利於抒情的詩學困境，所提出的反思等內緣因素，綜合這兩方面原因，詮釋明末清初李商隱詩接受中「比興說詩」視野形成的原因。華南師範大學張巍教授〈《賦譜》釋要〉，以同類文獻參證的方法，對成書於中唐後期的《賦譜》，依賦句、賦體分段、賦題三方面，一一對書中的專有名詞給予詮釋，並舉唐宋相關律賦的作品具體分析，以印證賦譜所能達致的約束效力。臺灣政治大學侯雅文教授〈劉辰翁校評王維詩輯佚考論〉，透過比對元刊本劉評，以及明代文人所載錄的劉評，提出「劉氏佚評」，並嘗試就「劉氏佚評」所呈現劉辰翁詩觀的消長變化，以及劉氏對唐宋時期王維詩評說史的接受歧向，給予探討。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七屆年會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各專題組代表
大會交流第一組報告

本組不論發表人、評議人、主持人一皆本著認真的精神。除了個殊論題的研討，也涉及推論合理、要求客觀憑據等共通的方法學。陳尚君會長蒞臨本組，使本組交流更加活絡。廖美玉教授、下定雅弘教授、林淑貞教授、佐藤浩一教授，所提交的論文觀點，為後進樹立觀摩學習的範本。盧盛江教授、柳晟俊教授、羅寧教授，所提交的論文觀點，是本組關注與熱烈討論的焦點。李浩教授、周相錄教授、陳冠明教授、李定廣教授、盧燕新教授、王永波教授、陳建森教授、董就雄教授，提供精到而具建設性的評議交流。張中宇教授、長谷川真史教授、趙陽陽教授、韓震軍教授、亓娟莉教授、彭燕教授、李宜學教授、張巍教授、鄧芳教授、柏紅秀教授、竺岳兵教授、劉潔博士、周睿教授，俱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觀點，在在呼應開幕時，董乃斌教授、蔣寅先生等諸位先生，所揭示的研究前景。少數學者先生不克出席宣讀，他們的精彩論見收錄在會前論文集之中，可供我們細細品賞。二天交流過程，嚴謹中不失幽默。這一趟充實而又愉快的蘇州之行，必為將來的學術工作，注入源源不絕的動力。我的報告完畢，謝謝大家。

敦煌學讀書會 2015 年活動訊息

林仁昱^{*}

一、敦煌學讀書會籌備會議

時 間：2015 年 6 月 5 日（早上 9:00-11:30）

地 點：鄭阿財教授寓所（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

指導老師：王三慶教授、鄭阿財教授、朱鳳玉教授

發起成員：汪娟、周西波、林仁昱、洪藝芳、梁麗玲、楊明璋、蔡忠霖、劉惠萍

緣起說明：讀書會宗旨

1. 傳承潘老師嚴謹學風
2. 突破敦煌學研究瓶頸
3. 培養敦煌學人才新秀
4. 增進同儕間學術交流

二、第一次敦煌學讀書會會議紀要

時 間：2015 年 9 月 19 日（週六）14:00~17:00

地 點：中正大學圖書館八樓 814 階梯教室

*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專任副教授

本次主持人：汪娟

研討流程紀要：

一、第一階段由鄭阿財老師主講，以吳其昱先生著〈敦煌漢文寫本概觀〉為綱要，進行補充說明，特別添增新材料，因此需分多次講述才能吸收。

參考資料：吳其昱著，伊藤美重子譯〈敦煌漢文寫本概觀〉；收入《講座敦煌第五卷·敦煌漢文文獻》，東京都：大東出版社，平成 4[1992]，頁 1~142。

本次研討範圍：一序說、二漢文寫本通說（寫本的發現與流布）。頁 3~9。

二、第二階段為敦煌學情報交流：

1. 第一次讀書會的召開，感謝莊慧娟同學代為籌借場地、圖書，準備茶水；江沛珊同學義務提供接送服務；林亞萱同學開設 FB『敦煌學讀書會』社團、簡佩琦老師開設 LINE『敦煌學讀書會』群組，協助會員間彼此的溝通與交流。

2. 簡介鄭炳林、鄭阿財主編《港臺敦煌學文庫》1~49 冊，甘肅人民出版社，2014.12

3. 議決下次讀書會的聯絡人、地點、時間。

三、第三階段由汪娟老師主講〔敦煌文獻與佛教研究〕，以如何使用大藏經索引、CBETA 電子佛典、佛教史傳、法寶總目錄（大正藏勘同目錄、著譯目錄）等佛教工具書從事敦煌文獻之研究為主。（有關 CBETA 電子佛典光碟的下載與安裝，詳見備註二。有關佛教藏經目錄數位資料庫的說明，詳見備註三。）

三、第二次敦煌學讀書會紀要

敦煌學讀書會 2015 年活動訊息

時 間：2015 年 11 月 28 日（週六）14:00~17:00

地 點：成功大學中文系二樓 21207 教室

本次主持人：林仁昱

研討流程：

一、第一階段由王三慶教授主講「因為敦煌，使你偉大」，介紹「十項全能」的敦煌學，於變偽、校勘、編作目錄與運用、輯佚、註釋、研究(文獻背景、價值認定)等方面的知識與方法；進而指出敦煌學在學術發展史、書籍印刷與裝訂史、科技史、文化史、文學史、宗教史、文獻史、庶民生活史上的地位與貢獻。此外，並透過敦煌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注疏本」的研究工作為例，指出發現前人著作有所疏漏後，如何透過更多的寫本考察、判讀等歷程，獲得更可靠的解釋、說明證據；再以考察日本天理大學眾多藏本的實際經驗，說明散藏敦煌寫本的流傳歷程與近代時局、文化變遷的關係。

二、第二階段為敦煌學情報交流：

1. 第二次讀書會的召開，感謝王三慶教授、陳淑萍老師代為籌借與布置場地、製作導引海報，準備點心、茶水與餐點；王三慶教授提供《敦煌學》期刊和潘重規教授的著作，長叡法師提供 cbeta 光碟片供與會者取閱或使用。

2. 議決下次讀書會的聯絡人、地點、時間。

三、第三階段由鄭阿財教授主講：「敦煌文獻的影印本和目錄的刊布」，介紹英、法、俄、中、日各地收藏寫卷的歷史、現今狀況、出版情形與運用方法。提供最新可運用敦煌寫卷影像、相關資料與論著的資訊。特別是指出在數位科技進步的今日，許多寫卷的公布、整理、比對、綴合與運用，都有了更精確的成果。而對於研究成果的編目、敘錄與評價，也在多方刺激與方便運用的條件之下，有了更多的發展，這使中國大陸、日本，甚至是歐美的敦煌學界都能夠有效累積學術成果，拓展更廣大的研究視野。因此，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之下，臺灣的敦煌學界，未來或許可以在透過分類組成研究團隊的方式，在我們比較擅長的文學、宗教(特別是佛教)、藝術等方面凝聚研究的力量。

四、敦煌學讀書會 2016 年預告

中國唐代學會會刊 第二十一期

2016年2月20日於鄭阿財教授寓所舉行臨時會，邀請西北大學李軍教授演講。第三次敦煌學讀書會，將於2016年3月26日（週六）14:00~17:00於政治大學中文系舉行，由楊明璋老師擔任主持人，並由鄭阿財老師、周西波老師擔任主講人。

唐人選唐詩讀書會簡介

林淑貞* 柯惠馨**

「唐人選唐詩」讀書會由台大葉國良教授向科技部人社中心申請，期程二年，從 103 年 9 月迄 105 年 9 月止，參與者以唐代詩學領域的學者為主，迄 104 年 12 月止已進行 14 場。茲將各期主講內容鉤稽如下：

1. 葉國良教授主講《翰林學士集》，探討該書的性質、名義問題，再將其中五十一首詩及序一首，依題目與作者官銜、姓名分成十三組，分別就內容探討每組詩作於何年何時何地，並依年代先後排序，以供參考。
2. 蔡瑜教教授主講《珠英集》，以探究《珠英集》與齊梁體格律問題為主。
3. 侯雅文教授主講《丹陽集》，揭示《丹陽集》因為久已亡佚，僅存後人輯本，故而研究的情況相對冷清，然而對於掌握殷璠整體詩學觀念而言，該書仍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因此試圖由初唐朝臣撰著的史書材料做為參照，考察《丹陽集》與初唐南北文學論述的關係。
4. 蔡瑜教授主講《河岳英靈集》1，揭示殷璠《河嶽英靈集》所闡明的詩學主張面向相當廣泛，從「聲律論」入手，可具體掌握其詩選以聲律語彙品藻詩人，進而可理解中國詩學聲律發展的重要環節。
5. 許銘全教授主講《河岳英靈集》2，揭示殷璠選《河岳英靈集》二十四詩人，探討此一文學社群背後的可能意義與思考。
6. 蘇怡如教授主講《國秀集》1，進行該書之內、外緣探討。
7. 蘇怡如教授主講《國秀集》2，揭示《國秀集》與《河岳英靈集》成書時間相近，皆成於唐玄宗天寶年間，遂將二書互相對照，期能突顯《國

*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專任教授兼系主任

**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專博士候選人

秀集》之選詩特色。

8. 林淑貞教授主講《篋中集》，揭示現存唐人選唐詩十三種之中，卷數最短小的莫過於元結（723-772）所編選的《篋中集》，只選錄七人二十四首詩歌，究竟元結選編該書意圖何在？蓋《篋中集》所選時間為乾元三年（760），是唐代由盛轉衰的過程，當時選盛唐詩有《國秀集》、《河嶽英靈集》二書，諸書編選的時代相近，則元結欲彰顯的選詩意圖或旨趣何在？故而進行詩家、選詩的內容、風格進行探論，進而揭示元結所要表述的審美風尚是否具有代表性或共通性。
9. 歐麗娟教授主講《玉台後集》，揭示李康成《玉臺後集》原書收錄 670 首詩作、209 位詩家，可惜散失嚴重，乃就選錄動機和選錄原則（有否反映共同的文化傾向）進行討論。
10. 徐國能教授主講《御覽詩》1，揭示《舊唐書》、《新唐書》均未載錄該書，遂就內緣外緣問題進行討論。
11. 徐國能教授主講《御覽詩》2，進行選家編選態度及後世接受情形進行探論。
12. 曹淑娟教授主講《中興間氣集》1，從版本、傳世、題名、編選動機、體例、收錄詩人、選錄詩人進行討論。
13. 教授主講《中興間氣集》2，從序文詩觀、詩人個評詩觀解讀、記存詩人交遊軼聞開啟詩話雛型、詩人群體交遊情形、「格詩」相關問題進行討論。
14. 歐麗娟教授主講《極玄集》，從選家姚合背景進行討論，包括選本外緣問題、內容概況等問題。

以上十四場研讀會，相摩相盪，討論熱烈，提供不同論述視角，期能為學界灌注新思惟。

唐人選唐詩讀書會簡介

〈「唐人選唐詩」讀書會預定進度一覽表〉

編號	預定日期	起迄時間	研讀書籍及主題	主持人	主講人
1	103/10/18	1100-1500	《翰林學士集》	歐麗娟	葉國良
2	103/11/15	1100-1500	《珠英集》	曹淑娟	蔡瑜
3	103/12/20	1100-1500	《丹陽集》	林淑貞	侯雅文
4	104/1/17	1100-1500	《河岳英靈集》1	葉國良	蔡瑜
5	104/2/21	1100-1500	《河岳英靈集》2	徐國能	許銘全
6	104/3/21	1100-1500	《國秀集》1	李欣錫	蘇怡如
7	104/4/18	1100-1500	《國秀集》2	侯雅文	蘇怡如
8	104/5/16	1100-1500	《篋中集》	葉國良	林淑貞
9	104/6/20	1100-1500	《玉臺後集》	蔡瑜	歐麗娟
10	104/7/18	1100-1500	《御覽詩》1	李宜學	徐國能
11	104/8/15	1100-1500	《御覽詩》2	侯雅文	徐國能
12	104/9/19	1100-1500	《中興間氣集》1	蕭麗華	曹淑娟
13	104/10/17	1100-1500	《中興間氣集》2	蕭麗華	曹淑娟
14	104/11/21	1100-1500	《極玄集》	蔡瑜	歐麗娟
15	104/12/19	1100-1500	《又玄集》1	許銘全	李欣錫
16	105/1/16	1100-1500	《又玄集》2	林淑貞	李欣錫
17	105/2/20	1100-1500	《才調集》1	徐國能	李宜學
18	105/3/19	1100-1500	《才調集》2	許銘全	李宜學
19	105/4/16	1100-1500	《搜玉小集》	歐麗娟	林淑貞
20	105/5/21	1100-1500	《元和三舍人集》1	李欣錫	許銘全
21	105/6/18	1100-1500	《元和三舍人集》2	李宜學	侯雅文
22	105/7/16	1100-1500	《竇氏聯珠集》1	蘇怡如	蕭麗華
23	105/8/20	1100-1500	《竇氏聯珠集》2	蘇怡如	蕭麗華
24	105/9/27	1100-1500	《瑤池新詠》	曹淑娟	葉國良

第 11 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 暨 第 12 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興大學中文系結合「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與「中國唐代學會」，預計於 105 年 4 月 22 日至 23 日舉辦「第十一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暨第十二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外重要學者專家共同參與學術交流，冀能達到輔學、攻錯雙重成效，茲將內容簡述如下。

壹、會議緣起

「通俗與雅正」標識著同時陳述著有相對性質的族群、思維、文化及文學，「通俗」與「雅正」在立場或意涵上看似對立，事實上卻是各具特色卻又相互融涉，促成文學在空間和時間的播遷和演進；而唐代亦在承續六朝思想的融合，迎接來自世界各地的思想與文明，於各社會階級和場域中進行著對話及互動，在雅和俗間創發著更豐富而多元的文化特質。也由此，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行之多年的「通俗與雅正」國際學術研討會，此次便和唐代學會持續辦理的「唐代國際學術研討會」有了學術上緊密的交會進而生成兩會合辦的契機，將在明年四月本系將與唐代學會，以及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唐代研究中心等單位，共同舉辦「第 11 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暨唐代學會 12 屆唐代國際研討會」。此次會議以通俗和雅正的辨證作為主線，聚焦在文化大開闢的唐代各形式表現的文學、文化上，並分別出古今、主客、場域、媒材等不同子題，邀集國內外學者專家與會，進行學術意見的交換和對談，凝聚出更充實的學術能量。

貳、舉辦目的

「唐代」是個能開盛世、能廣文化，具有豐富內涵與長遠影響力的朝代。從時間的縱軸來看，它終結了漢末以來數百年的亂局，也總合了這變動時代中的種種文化激盪，無論在政治、經濟、宗教、風俗與文藝表現方面，都有特出之處；從空間的橫向關係來說，它能控制西域、交通東瀛、掌握嶺南之南、威震北漠之北，在興盛的武功背後，一方面能展現兼容多元文化的氣度與格局，一方面則放射出強大的文化影響力。因此，不論是關係著國家政治經濟的變遷與發展，或是區域文化交流與轉化的各項課題，「唐代」都是特別注意的對象，加上百餘年前敦煌文獻的發現，敦煌壁畫的廣受重視，許多脫去塵封，直接來自唐代的「訊息」，更使這個朝代的「距離」變近，諸多現象益發明確，而「唐代研究」自有其立於學界中的重要意義。

但是，一個特定時空裡的諸多現象，絕對不是導於個別的因緣，也往往不僅象徵單獨的意義，若透過不同的視角、方法來觀察、解析，理當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概念與價值。所以，讓「雅正」與「通俗」在唐代對話，可以使許多過去研究「唐代」較為片面、缺乏檢驗的論點，由此產生別開生面的觀點；許多過去為人所忽略的議題與線索，也可能藉以顯現其重要性。換句話說，這次會議置「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的觀察於「唐代」，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使古來各種文類的傳承與思想融攝、官民或城鄉等不同主客體的交接與對話、空間擴展與華夷族群交流與活動，乃至於牽涉語言文字、文藝表演變遷的種種「跨界」展現，包括延及現代不同媒材的新詮釋，都能因為聚焦於「唐代」而有更具體、明確的對照與論述。而在這樣的考量之下，本屆以「唐代」為研討會主題，大會所設定的議題如下：

- (一) 唐代通俗雅正的古今承傳與融攝
- (二) 唐代通俗雅正的主客對話與流動
- (三) 唐代通俗雅正的文化場域交流與活動
- (四) 唐代通俗雅正的媒材、文類跨界書寫

(一) 唐代通俗雅正的古今承傳與融攝

學會預告

就文化言，唐代是儒釋道三教辯證、交涉與交融的大世代，奠定亦形構成中華文化的基礎；而就文體言，則是承繼起六朝時的文學自覺，各文類不僅皆有創作又多創發外，更承舊體而生新製，表述著這大開閤時代的文化意蘊。惟唐代創作者因著社會階級與身份的差別，擇用的文類和表述的意志皆有不同。文人的創作多以表述己志為要，用詞遣字自然尚雅，至於民間文學則多合於世俗的構思，文詞則俚俗近鄙，已存在著雅俗的差異：前者若詩賦、策論、史傳、筆記小說甚而入唐新生的傳奇，後者有民間歌謠、講唱和新製的變文，皆在已選擇的文類下續以創作，更由之開發新體，呈現著文學發展的歷史脈絡。至於個人亦會被向自己的信仰、價值觀和身份撰擇文類而書寫，呈現行文的差異，因此，唐代文學於古今流變中的承傳與融攝，即為本會議重要的關注命題。

（二）唐代通俗雅正的主客對話與流動

唐代是一文化蓬勃發展的時代，而以唐代最大宗的詩歌來說，唐詩繼承了六朝詩描摹物色，徜徉自然的傳統。詩人透過主體與外在物色世界結合，得到情景交融的美學。如嚴羽說的「盛唐諸人，惟在興趣」；如吉川幸次郎說的唐詩熱衷於書寫自然景色的一瞬間燃燒。而詩人的主體心靈如何與外在的客體世界對話，也成為文學史關注的重要議題。而另外一個層面，主客從內容心靈延伸到形式文體，如唐代最大宗的律詩，在形式上與律詩有密切關係，而小說、傳奇、變文又與辭賦、與駢文有著盤根錯節的關聯。

從作家心靈層面來說，這是一個主客體密切對話的時代；而從作品形式層面來說，這又是一個各種題材、體類脫去固著，持續流動的時代。各類與主體與客體對話、呼應、流動的相關主題，皆是本會議重要的關注命題。

（三）唐代通俗雅正的文化場域交流與活動

唐代，是一個朝廷擁有十部樂舞規模的年代，望向西方，有直通地中海的絲路，所謂「西域」正是帝國聲威遠伸之地，也是文化展延之區，無論是廣漠、沙河，還是高山都無法阻擋，華夏文化在此與波斯、天竺、龜茲、高昌的衣、食、音樂與宗教相逢、激盪、融合，眾多的「記憶」留在官兵、商旅、僧侶交際的文書、壁畫裡。觀想東方，學問僧、留學生絡繹於途，求學的紀錄勾畫了多少唐時的見聞，大化革新、鑑真東渡的影響力，豈止是千年。

朝北而看，突厥、薛延陀、回鶻固然是難以避免的邊患，然而唐軍都護著瀚海與燕然，諸蕃尊奉「天可汗」的聲威絕非虛名。往南而行，褚遂良、杜審言、沈佺期的貶謫之路，對應著越南的第三次北屬時期，華夏文化更隨著軍事、經濟力量，在這遙遠的嶺南之南茁壯，而義淨的取經之路，從室利佛逝到天竺，經歷著航行大海的危險與驚奇，更擴大了文化傳播與交流的可能性。所以，探討唐代的空間、族群與華夷交流種種現象與關聯性，同樣是論述通俗、雅正文化場域交流與活動的具體展現，且亦為本會議重要的關注命題。

（四）唐代通俗雅正的媒材、文類跨界書寫

除了唐代的古今、主客與空間場域之外，唐代文藝活動之跨媒材書寫及跨文類書寫同樣受到本會議所關注。所謂跨媒材書寫，即不同文藝表現形式之置換或彼此影響；而所謂跨文類書寫，即不同文學體裁之轉化或互相融攝。以前者為例，唐人對於各項文藝觀點，已有意識地通過不同媒材來展示。如對古人、史事的演繹，已不侷限於史書之編撰，而是見諸手足，成於歌舞、戲劇；而對義理、境界之闡述，亦已超脫了理論之建構，而是發諸情意，成於詩句、畫作。至於佛經議論和唐代的「說唱」、「俗講」，尤為中國文化中跨媒材書寫之顯例。以後者為例，唐代承繼先秦至南北朝千年以上文學成果，於詩歌創作、散文撰寫、小說構思、文藝評論，乃至古史考證、思想闡釋各方面，皆有自由、成熟、長足之發展；而這些不同文類之間又常互相滲透，使唐代文學呈現出豐富且多層次之面貌。必須注意的是，在這些不同媒材、文類的連繫中，雅正和通俗似乎有著一種辯證甚或是弔詭的關係：一方面創作者要求其作品保持通俗性，以迎合社會大眾的口味；同時又試圖在通俗性外納入雅正的成份，以取得官方之支持。反過來亦然：領導層必須鼓吹雅正之風；但為了其理念讓大眾接受，又不得不認可某程度的通俗性。究竟唐人在各種藝術媒介或文學體裁之間的跨越、過渡是否有平衡雅正、通俗兩者的考慮？跨媒材、跨文類是否貫通雅正與通俗之可取入路？因此文體、媒材的跨界書寫，亦為本會議的關鍵命題所在。

歡迎學者專家蒞臨指導，進行交流，提昇唐代研究之學術能量。

中國唐代學會會刊 第二十一期 2015 年 12 月發行

主 編：林淑貞

執行編輯：林仁昱、黃東陽、祁立峰、蕭振聲

出 版 者：中國唐代學會

總 經 銷：樂學書局

地 址：台北市金山南路 2 段 138 號 10 樓

電 話：(02) 2321-9033

傳 真：(02) 2356-8068



ISSN 1025-7586

中國唐代學會會刊 第二十一期

理事長

林淑貞

秘書長

林仁昱

執行秘書

黃東陽、祁立峰、蕭振聲

編輯顧問

王壽南 王吉林 王國良 王三慶

王基倫 朱鳳玉 林冠群 陳登武

廖美玉 高明士 宋德熹 鄭阿財

葉國良 蕭麗華 何寄澎 康韻梅

楊承祖 桂齊遜 謝海平 胡楚生

羅宗濤

(非經本刊書面同意，禁止以任何形式翻印、轉載及翻譯)